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推动历史进程的
巨人演讲——

世纪回声(上)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前 言

这是历史的回声，这是巨人的呼唤，这是对 20 世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起过重大推动作用至今仍震聋发聩并放射耀眼光芒的精粹演讲实录，这是一部适应于各级各类干部、大中专学生和有志于演讲的读者可用于鉴赏、收藏、参考运用的优美史诗和传世之宝。

古今中外的历史巨人，他们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经济学家，同时还是一位十分杰出的卓有成就的演讲家。通过演讲，他们把自己的政治主张、道德伦理、文学艺术、斗争实践巧妙地传播给听众，进而鼓动了人民、驳斥了敌人，捍卫了真理，倡导了文明，推动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通过演讲，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授之以知，导之以美，达到了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智导人，以美育人；甚至可以从根本上收到改变人的思想行为规范的理想效果。是演讲伴他们走向了成功之路，是演讲使他们为我们后人留下了震荡世纪的回声。

演讲是一门艺术，学习她能使人丰富知识、提高素质。

演讲是一种武器，掌握她能使人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演讲是一项技能，锻造她能使人论辩时思维敏捷、举重若轻。

演讲是一门科学，运用她能使人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帮你走向辉煌的成功。

我们怀着无比虔诚的心情，极其美好的愿望，按照演讲的不同类别的，分九种类型，独树一帜，精心编选了这部推动 20 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巨人演讲，以实录形式原本地展现给读者，目的在于方便读者学习、查阅和应用。这是一部具有高超演讲艺术和极强感染力的典范演讲；这是一部再现历史巨人慷慨陈辞、猛士如云唱大风的生动演讲；这是一部能使读者心中荡起层层波澜、催人奋进、助人向上的精粹演讲；这是一部融鉴赏、参考、应用于一体的具有重大方法论指导意义的宝贵演讲。她不仅能对读者学习语言、开阔思路、锻炼技能、增长知识提供很好的帮助，而且对于培养人才、开发智力、加强修养、规范行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她还将激励读者通过本书进一步了解社会、了解历史、了解演讲的巨大威力和学习中国巨人为国为民的高尚品德而不懈努力。

本书对巨人的演讲只作介绍，不予点评。主要是不使读者落入编者的思路框架，而是希望读者发挥各自的独特优势并通过此书进一步引导和启发读者产生对巨人演讲的极大兴趣和崇敬，从而能够使读者做到主动地去欣赏、去寻思、去探索、去追求……。

为查找阅读方便，我们对一些演讲按照其内容加了标题。另外，书中所出现的“苏联”均指前苏联，不再另做说明。

本书是团结协作、集体劳动的结晶，为达到“传世之宝”的效果，我们参阅了许多内部资料、文史档案和演讲文集，安排了部分独到的鲜为人知的篇幅。在构思编选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单位、领导、同仁、好友的热情关怀和大力帮助。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编 者

1995 年 12 月

努力，服从，协同
——1911年11月在武昌受任民军战时总司令时的演讲

黄兴

兄弟才识本不胜任，既承不弃，亦不能不尽力。现今各省响应，大功已将告成，然我同胞亦不可以此自满。兄弟今日有三层意思勸我同胞：第一须努力。现在黄河铁桥已毁，敌兵已无归路，誓不能不拼死命以与我对敌。我若稍存畏缩，敌即攻入我腹心矣。临战时尚不努力，后退者决意斩首示众。

（众拍手）第二须服从。军队纪律，非服从不可。倘不服从，长官命令皆不能行，此种兵士万不能以之临战。以后，军界同胞须服从长官命令，无论如何危险，皆不得规避。（众拍手）第三须协同。自来成大事定大业者，必自己能同心协力。若自己各存意见，互相枘凿，无论有何种势力，皆不能成事。洪杨之败，其前车之鉴也。我同胞无论办事人及兵士，皆宜互相友爱，以期共达其目的。（众拍手）

此次革命，是光复汉族，建立共和政府。斯时清廷仍未觉悟，派兵来鄂与民军为敌，我辈宜先驱逐在汉口之清军，然后进攻，收复北京，以完成革命之志。今日既承黎都督与诸同志举兄弟为战时总司令，为国尽瘁，亦属义不容辞。但是军人打仗，第一要服从命令，第二要同心协力。自今而后，对于作战，倘有不服从命令及临阵怯敌者，即以军法从事。尚望大众努力前途为要！

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
——1917年1月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演说

蔡元培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这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重，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且为人轻侮，更何足感人。然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志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勗，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

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重建新四军军部，推动抗战最后 胜利——1941年1月在就任新四军代军长时的演讲

陈毅

各位同胞各位同志：

今天是各界同胞抗战军队，在这里举行庆祝军部成立大会，这在中国抗战中、革命史上以及将来都是一件大事。我想只要是抗战的爱国的同胞，听到新四军军部恢复，一定会像诸位一样的欢欣与热烈的庆祝，仇恨的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反共顽固派与亲日派。因此今天新四军军部的恢复，是直接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前途。这不仅是兄弟个人、刘政委、张副军长、邓主任、赖参谋长，几个人在这里就职的问题，而是全国抗战中的一件大事。我们几个人只是作为一个代表出来讲话。我们要很好的完成抗战革命的大业，还要依靠各界同胞和所有抗战军队共同担负起来。有了民众及抗战军队一致团结的力量，我想我们几个人大胆来就职，一定能负起责任来，而且一定有把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场鼓掌）一定有把握打倒亲日派、反共顽固派。（全场鼓掌）这是一个光荣的责任，它将直接有力地使中国抗战革命取得胜利。我们可以告诉亲日派和反共顽固派，新四军是不能取缔和消灭的。反共顽固派一月十四号消灭了军部，但是一月二十五号我们的军部又成立了。皖南新四军被歼灭了，但是新四军在安徽、湖北、江苏、河南，仍继续存在，而且更加发展和壮大，这是一定会亲日派、反共派感到失望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大会，有坚持抗战最大的政治意义。

我想在这里讲一讲新四军的问题。新四军是一个什么队伍，在座的同胞和同志们都知道得很清楚的。在新四军成立的那一天起，兄弟就在新四军工作，直到现在十四年中都没有一天离开过。在民国十七年冬天就有了新四军（新四军前身是老四军）。大革命失败了，反动派破坏北伐革命，不愿意实行三民主义，与北洋军阀勾结，爆发反革命的清党活动，在南京广州掀起了反共的旗帜，一方面反共，一方面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人民与中国革命的事业。亲日派、反共顽固派头子，日本帝国主义应该想一想：在这十四年长期的历史中，是不是消灭了新四军——中国革命的军队！事实证明他们是失望了！（全场鼓掌）叶、项军长、朱、彭司令、毛泽东同志，在过去为了建设中国工农红军整整奋斗了十四年，反共顽固派动员了几百万大兵，经过了六次围剿，都不能消灭我们；顽固派着急了，抵不住了，只好拿下反共的招牌来合作。大头子被捉去了，还是周恩来去讲情放出来的，难道忘记了吗？

在大革命失败的时候，朱德总司令只带了八百多人上井冈山，就发展成为今天五十万大军。这样干下去是一定会胜利的。新四军的前身是南方各省的游击队，那时全部只有二千多人，因当时在残酷斗争中，还受到损失。项英同志和兄弟在一起，在广东、江西交界的一个山上，只有二百多人。三年后，新四军发展到九万人，今天九万人还被他消灭吗？要被消灭，在大革命失败时就可以被消灭；在三年游击战革命失利的时候，也可以被消灭，但是没有被消灭，相反的是十倍百倍的壮大与发展。今天新四军有九万人马，四、五省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将近一千万的人民拥护，谁想来消灭他，谁就要失败。新四军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他是最坚决的，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与人民的事业而奋斗。中华民族一天不解放，中国人民一天不解放，则新四军必

然会发展，是毫无疑问的。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为什么能够存在？就是因为有革命民众的帮助，爱国同胞以及成千上万的青年加入。虽然在斗争中有牺牲有伤亡，但是新生的力量继续地涌入我们的队伍，使我们愈加强大了。新四军是由优秀的分子组成，是代表抗日民众利益与要求，始终保持着和高举着这面抗战的大旗，坚决地抗战到底。有了这面大旗，这便是不能战胜的力量之根源。真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越打越强！正因为这样，所以重庆当局的亲日派、反共顽固派，看见新四军不可抵挡的发展，所以要来打新四军。他们不愿意抗战，与日本鬼子勾结起来，消灭取消抗战有功的新四军，这不仅是与新四军作对，而且是与中国抗战作对，和四万万老百姓作对！新四军有四万万抗日的老百姓的拥护，是一定会胜利的。今天新四军军部成立，受着苏北各界同胞的热烈拥护。我们的同志要明白我们的责任，是要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持抗战的大旗，我们什么都不怕，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新四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皖南事变后，重庆当局发出一个反革命的命令——取消新四军，我们可以置之不理。我们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恢复军部。我们拿革命的命令来反对反革命的命令，拿抗战的命令，打倒破坏抗战的命令！（全场鼓掌）重庆当局制造皖南事件，取消新四军，这完全是双簧，后面有日本鬼子发命令。同志们！我们要反对重庆当局的非法令，反对他们就等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各界同胞要了解，重庆当局变了。在皖南事变以前，他们还是领导抗战的；事变后，他不打鬼子，欲消灭新四军军部，取消新四军，发动二十万大军进攻我们。不愿领导抗战而领导内战，破坏抗战了！重庆当局负责的虽还是那几个人，但是变了，很快会撤去抗战的招牌了。汪精卫不是堂堂的副总裁、行政院长、国民参政会的议长？他公开地讲反共，他就变成汉奸了。皖南事变以及取消新四军番号，就是重庆当局改变其抗战国策的证据！这完全与汪精卫的改变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成立军部，就是要和他们作对到底。

新四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新四军十四年的历史，是为全中国谋解放的历史。新四军是为着老百姓的利益，为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文化界、教育界及公正开明绅士的利益奋斗到底。新四军是与军阀、腐烂政客、卖国贼作对到底！“中国人”三个字的解释，应该是真正爱国的人，才能算是中国人。爱国的绅士工农青年妇女，都是十足的中国人。过去的封建军阀、汪精卫、政客、党棍、韩德勤、李守维……他们压迫中国人，与帝国主义勾结，高高在上，把我们老百姓踏在脚下，自命为高等华人，把老百姓当作牛马奴隶，经常同日本帝国主义勾通，这些人不是中国人，不让他们冒充。各界同胞是清楚知道的，我们苏北，被重庆大头子的徒子徒孙搅得一塌糊涂，新四军当然要与他们坚决作战到底，建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新四军是革命的军队，所以新四军主张民主政治，提倡文化教育，组织民众，减轻苛捐杂税，军民合作，提倡革命的艺术，正当娱乐，这些是与他们相反的。他们取消和压迫新四军，就是要夺取老百姓的自由平安的生活。现在汤恩伯、李品仙等带了大批没有纪律的军队，要跑到苏北来发洋财。上官云相带了反共大军把新四军军部打垮了，在一月十五号，他的军队就开进了云岭、泾县、铜陵、繁昌，三年来新四军所建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顾祝同说是去剿匪去，就是去摧残民众团体，去剿老百姓。说他们是勾结新四军，是犯法的。顾祝同不但要消灭新四军，还要消灭老百姓。日寇也出动了大兵，配合起来夹击新四

军，打得非常好看。这是因为新四军是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所以顾祝同要压迫老百姓，就先要打新四军。今天我们新四军军部的成立，也就是为了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我们一定能打垮他，一定能粉碎华中亲日派、反共顽固派二十万大军的进攻。我们华中的老百姓，一定要团结起来打垮他们，我们才能抗战到底，过太平日子，不受压迫。最近我们盐城九区区长，他不是当官的，是替老百姓做事的，现在被韩德勤绑去了。因为韩德勤不准他替老百姓做事，要替他压迫老百姓。我们新四军军部成立，我们几个人的就职，我们是坚决为老百姓的利益而奋斗到底。我们相信，有了军民一致团结的力量，我们是一定能够胜利的。

今天军部成立，各位同志要了解我们新四军和其他军队的不同，我们新四军有政治委员制度，有了这个制度，我们几个人一定可以担负得很好，新四军一定可以由几万人发展到十万二十万，因为新四军有共产党的领导。新四军的每一个战士，不是为了做官拿薪水，是为了民族解放。他们的非法命令，新四军可以不接受。因为新四军有共产党的领导。有政治委员的制度，有政治部，这就保证新四军永远为革命事业、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不会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不会压迫欺侮老百姓，不会失败。我们今天军部的恢复，还要庆祝我们的政治委员就职。在三年抗战前，我们与重庆当局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主张全国抗战军队，都实行政治委员制度，不但是军官指挥，而且是政治委员来指挥。重庆当局的亲日派，汪精卫不肯，因为有了政治委员的制度，就变成了真正的国家军队，私人要利用军队去做反革命投降，就做不到。他们要造成家兵家将，指东打东，指西打西，要抗战就抗战，要投敌就投敌。新四军就决没有这样的事，因为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政治委员的领导。现在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少奇同志为我们的政治委员。我们军事工作人员只管训练军队，如何拿枪瞄准，如何包围迂回；政治委员就指挥我们如何打，打谁，打日本帝国主义，还是打亲日派、反共顽固派，不能打老百姓，所以新四军是可靠的。今天我和盐城各界同胞贡献一个意见，庆祝军部成立，一定要立即在全国抗战军队中，实行像新四军一样的政治委员制度，才能保持抗战军队不会被野心家阴谋利用，去作为压迫民众、投降日寇的工具。

刘少奇同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一。他有二十多年的斗争历史，中国的工人运动，就是他一手领导起来的。他不但为了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奋斗了二十年，而且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已经奋斗了有二十年到三十年的历史。抗战后，他到华北，华北抗日运动，就有了很大的发展；到皖东北，他同样开展了大的局面；到苏北，也一样是如此。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到这里来直接领导我们的。新四军直接在中央和刘少奇同志领导下，我们一定会胜利的，因为在政治委员领导之下，我们的政治方向不会错，我们能依照中共的政策做下去，我们好像火车在铁轨上走，一定能顺利达到目的。我们军部今天成立，就更要加强军队的政治领导，拥护政治委员制度，我们的军队一定能够百战百胜！

同胞们！同志们！皖南事变我们损失了军部，现在军部又恢复了；皖南事变我们有几千个指战员牺牲，但我们今天还有九万人的强大力量。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反共派所得并不多，他却失去全国人民的同情，引起全国军民的抗议，对比起来，坚决斗争下去，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希望大家努力！

关于起义的地点和方法
——1903年11月在华兴会成立会上的讲话

黄兴

本会皆实行革命之同志，自当讨论发难之地点与方法以何为适宜？一种为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临海内，有如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然英、法为市民革命，而非国民革命。市民生殖于本市，身受专制痛苦，奋臂可以集事，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若吾辈革命，既不能借北京偷安无识之市民得以扑灭虏廷，又非可与异族之禁卫军同谋合作，则是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今就湘省而论，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濡默化，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已蔓延固结，惟相顾而莫敢先发。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使能联络一体，审势度时，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然使湘省首义，他省无起而应之者，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故望诸同志对于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

“平民革命”与“督抚革命”

——1906年12月2日在庆祝《民报》创刊一周年大会上的演讲

章太炎

今日是《民报》纪元节大会。目下言论渐已成熟，以后是实行的时代。但今日实行上，有一种魔障，不可不破。因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强盗有力量，秀才没有力量。强盗仰攀不上官府，秀才仰攀得上官府。所以强盗起事，没有依赖督抚的心，秀才就有依赖督抚的心。前此数年，遍地是“借权”的话。直到如今，讲革命的，也想借到督抚的权，好谋大事，这真糊涂得很。

颇有人说：“学界中人不如会党，会党中人不如强盗。”依兄弟看来，知识高下，且不必说。但强盗从没有靠官造反的心，会党略有数分，学界中人，更加数倍。论他志气的下劣与自信力的薄弱，较之会党、强盗，不免有些惭愧。（大拍掌）只是思量办事的人，没有不舍难取易的。他看自己革命，不如借用督抚略为容易。不知不觉，这下劣的思想，就随地涌现出来。殊不知志气果好，便万分险阻艰难的事也办得去。若依赖督抚，倒比自己革命更难百倍。（大拍掌）

这是什么原由？

第一，督抚引用学生，不过充当文案、预备顾问。就有练陆军、办警察的，总不能自成一部。原像从前的督标中军一样，也不能得他的亲信。若善于谄媚的呢，还可以侥幸得几分。假如才气略长些，议论略多些，风骨略高些，就永远不能得志。若要得志，除是想几件压制革命的政策，或杀戮几个革命党人，方得有小小权柄到手，这还靠得住么？（大拍掌）

第二，今日的督抚富贵尊荣，与皇帝相差无几，难道放着平坦大路不走，反去革命，自寻荆棘？从来藩镇不是逼到没路的时候，断不轻易造反。远大且不必说，就看近来吴三桂，本要想步石敬瑭的后尘，做一个干儿皇帝。但不到撤藩的时候，吴三桂尚不敢举兵作难。因吴三桂自己有这心肠，将士却不肯应，故只得迟迟不发。后来有撤藩的事，此时平西王也去，将也去，兵也会。滇藩一部的人，没一个不失了饭碗，才能够激成大举。请看今日的督抚，权力比得吴三桂吗？就像袁世凯，是最有兵权的，满洲政府也不敢轻易动他。就动了她一人，北洋将校仍是依然无恙。一人愿革命，人人都不愿革命，这是万不得成的。（大拍掌）

第三，那老耄昏聩的督抚，往往有几个儿孙出洋留学，与学生通同一气。学生见他可用，就推心置腹，奉承个人了。这一班纨绔子弟，也趁他祖、父老耄昏聩，卖差卖缺、无所不为，一面又与学生同谋举义。试想此辈胸中，究竟所思何事，起得事来，他的权力岂肯轻轻送你？奉这蝇营狗苟的顽童，作为革命首领，还成个世界吗？（大拍掌）

因此三事，所以督抚革命万无可望。

再说向上一层，假如督抚革命果然成事，虽则种族问题可以解决，那政治改良的事仍是不成。且看从古革命的历史，凡从草茅崛起的，所用都是朴实勤廉的人士，就把前代弊政一扫而尽。若是强藩内侵，权臣受禅，政治总与前朝一样，全无改革。因为帝王虽换，官吏依然不换，前代腐败贪污的风俗流传下来，再也不能打扫。（拍掌大喝采）像现在官场情景，是微虫霉菌

到处流毒，不是平民革命，怎么辟得这些瘴气？（拍掌大喝采）若把此事望之督抚，真是其愚不可及了！（拍掌大喝采）

目下满洲政府正有中央集权的意思，要把财政兵政，都归几个满员掌握，外省督抚不过留个空名。有几个识见不到的人，都说此事若行，革命愈难措手。若依兄弟看来，正是相反。以前满洲将士曾打准噶尔、回部、青海等处，每战必胜。到得川、楚“教匪”起来，满洲兵就不能抵敌，全是杨芳、杨遇春等为虎作伥，方得制“教匪”的死命。太平王起来时候，赛尚阿、乌兰泰辈，没一个不一败涂地。竟靠着几个湖南督抚，就地捐厘，兼办团练，才能够打破洪氏。照这样看，督抚无权，革命军正是大利，有什么不好呢？（大拍掌）

从今以后，我汉人兄弟，请把依赖督抚的一念，早早打消。但想当兵，不要想当奸细；但想做将士，不要想做参谋。这革命大事不怕不成，中华民国不怕不立。何必怀着那下劣心思，为会党、强盗所笑呢？（拍掌大喝采）

团结奋进，实行民生主义
——1912年8月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

孙中山

兄弟此次北来，于南北同胞有无穷之希望。盖共和虽说成立，而国本尚是动摇。国本动摇皆由人心不能巩固，故欲巩固国本必先巩固人心。今五党合并，兄弟切望诸君同心合志，破除党界，勿争意见，勿较前功，服从党纲，修明党德，合五党之力量气魄，以促民国之进行。是中华民国前途之无量幸福。即有他党反对，我党亦宜以和平对付，决不宜为鹬蚌之争。中国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只宜万众一心，和衷共济。五党合并，从此成一伟大政党，或处于行政地位，或处于监督地位，总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则我中华民国将可日进富强。故兄弟于五党合并，有无穷之希望也。再者，现时人心总以军人破坏共和为虑。据兄弟看来，此次共和既由军人赞成，则军人决无破坏共和之事。吾人苟心志坚定，以国家为前提，决可不怕军人武力干预政事。军人如家主雇用之武士，以防外患者也。设家主父子不能相安，甚至杀人放火，则武士亦不忍坐视矣。故家主自能治家，然后武士自知防外患，军人固用以防外患，决不致用武力干预内政，以破坏共和。

政党均以国利民福为前提，政党彼此相待应如弟兄。要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吾国帝皇亦有圣明之主，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弊也。故欲免此弊，政党之必有两党或数党互相监督，互相扶助，而后政治方有进步。故政党者虽意见之不同、行为之不同，要皆为利国福民者也。今五党合并，诸君皆当持此观念，则民国前途永无危险之象。

我同盟会素所主张者，有三主义：一民族主义，二民权主义，三民生主义。今民族、民权已达目的，惟民生问题尚待解决。北方同胞误会吾党民生主义，以为劫富济贫，扰乱社会秩序。此荒谬绝伦，公理上决无此事，富人幸勿恐怕。要知民生主义，富人极应赞助提倡之。何则？民生主义盖防止富人以其富专制害贫民。譬如英、奥等国，君主国也，而政治之进步与民主国无异，因君主虽有君主之位，而不能干预政治专制害民故也。民生主义即以富人虽富，不使以其富害贫人，犹之君主虽有君主之位，无君主之权以害人民也。吾国受君主专制之苦，尚未受资本家之苦。举一例以明之，美国资本家以买空卖空手段，以十万元之股票吸收人民数百万元之现金，致人民不能聊生，此即资本家以富毒害人民之法也。吾国资本家尚无，然不可不预为富人劝告，预为贫人防备。此即民生主义也。

男女平权，本同盟会之党纲。此次欲组织坚强之大政党，即据五大党之政见，以此条可置为缓图，则吾人以国家为前提，自不得不暂从多数取决。然苟能将共和巩固完全，男女自有平权之一日。否则，国基不固，男子且将为人奴隶，况女子乎？

庶民的胜利
——1918年11月在天安门前参加北大举行的
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集会上的演讲

李大钊

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得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哪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

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我们记得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大……主义”的冲突。当时我们所听见的，有什么“大日尔曼主义”咧，“大斯拉夫主义”咧，“大塞尔维主义”咧，“大……主义”咧。我们东方，也有“大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等等名词出现。我们中国也有“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等等名词出现。“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的范围以内，又都有“大……主义”等等名词出现。这样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谁不如我？于是两大的中间有了冲突，于是一大与众小的中间有了冲突，所以境内境外战争迭起，连年不休。

“大……主义”就是专制的隐语，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道理。这等道理，表现在政治上，叫做民主主义，恰恰与“大……主义”相反。欧洲的战争，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我们国内的战争，也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结果都是民主主义战胜，“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和平，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大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可以做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的世界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们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应该有几个觉悟：第一，须知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

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三，须知此次平和会议中，断不许持“大……主义”的阴谋政治家在那里发言，断不许有带“大……主义”臭味，或伏“大……主义”根蒂的条件成立。即或有之，那种人的提议和那种条件，断归无效。这场会议恐怕必须有主张公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才开得成。第四，须知今后的世界，就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强盗和强盗夺不正的资产，也是一种的强盗，没有什么差异。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做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的时候，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工作呵！

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1918年11月在天安门前参加北大举行的庆祝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集会上的演讲

蔡元培

我们为什么开这个演说大会？因为大学职员的责任，并不是专教几个学生，更要设法给人人都受一点大学的教育，在外国叫作平民大学。这一回的演说会，就是我国平民大学的起点！

但我们的演说大会，何以开在这个时候呢？现在正是协约国战胜德国的消息传来，北京的人都高兴得了不得。请教为什么要这样高兴？怕有许多人答不上来。所以我们趁此机会，同大家说说高兴的缘故。

诸君不记得波斯拜火教的起源么？他用黑暗来比一切有害于人类的事，用光明来比一切有益于人类的事。所以说世界上有黑暗的神与光明的神相斗，光明必占胜利。这真是世界进化的状态。但是黑暗与光明，程度有浅深，范围也有大小。譬如北京道路，从前没有路灯。行路的人，必要手持纸灯。那时候光明的程度很浅，范围很小。后来有公设的煤油灯，就进一步了。近来有电灯、汽灯，光明的程度更高了，范围更广了。世界的进化也如此。距今一百三十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把国内政治上一切不平等黑暗主义都消灭了。现在世界大战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他。所以全世界的人，除了德、奥的贵族以外，没有不高兴的。请提出几个交换的主义作个例证：

第一是黑暗的强权论消灭，光明的互助论发展。从陆谟克、达尔文等发明生物进化论后，就演出两种主义：一是说生物的进化，全恃互竞，弱的竞不过，就被淘汰了，凡是存的，都是强的。所以世界只有强权，没有公理。一是说生物的进化，全恃互助，无论怎么强，要是孤立了，没有不失败的。但看地底发见的大鸟大兽的骨，他们生存时何尝不强，但久已灭种了。无论怎么弱，要是合群互助，没有不能支持的。但看蜂蚁，也算比较的弱极了，现在全世界都有这两种动物。可见生物进化，恃互助，不恃强权。此次大战，德国是强权论代表。协商国，互相协商，抵抗德国，是互助论的代表。德国失败了。协商国胜利了。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

第二是阴谋派消灭，正义派发展。德国从拿破仑时受军备限制，创为更番操练的方法，得了全国皆兵的效果。一战胜奥，再战胜法。这是已往时代，彼此专恃阴谋，不恃正义，自然阴谋程度较高的战胜了。但德国竟因此抱了个阴谋万能的迷信，遍布密探。凡德国人在他国作商人的，都负有侦探的义务。旅馆的侍者，菌圃的装置，是最著名的了。德国恃有此等侦探，把各国政策军备，都知道详细，随时密制那相当的大炮、潜艇、飞艇、飞机等，自以为所向无敌了，遂敢唾弃正义，斥条约为废纸，横行无忌。不意破坏比利时中立后，英国立刻与之宣战。宣告无限制潜艇政策后，美国又与之宣战。其他中立等国，也陆续加入协商国中。德国因寡助的缺点，空费了四十年的预备，终归失败。从此人人知道阴谋的时代早已过去，正义的力量真是万能了。

第三是武断主义消灭，平民主义发展。从美国独立、法国革命后，世界已增了许多共和国。国民虽知道共和国的幸福，然野心的政治家，很嫌他不

便。他们看着各共和国中，法、美两国最大，但是这两国的军备都不及德国的强盛，两国的外交，又不及俄国的活泼。遂杜撰一个“开明专制”的名词，说是国际间存立的要素，全恃军备与外交。军备与外交，全恃武断的政府。此后世界全在德系、俄系的掌握。共和国的首领者法和美且站不住，别的更不容说了。不意开战后，俄国的战斗力，乃远不及法国。转因外交狡猾的缘故，貌亲英、法，阴实亲德，激成国民的反动，推倒皇室，改为共和国了。德国虽然多挣了几年，现在因军事的失败，喝破国民崇拜皇室的迷信，也起革命，要改共和国了。法国是大战争的当冲，美国是最新的后援，共和国的军队，便是胜利的要素。法国、美国都说是为正义人道而战，所以能结合十个协商的国，自俄国外，虽受了德种种诱惑，从没有单独讲和的。共和国的外交，也是这一回胜利的要素。现在美总统提出的十四条，有限制军备、公开外交等项，就要把德系、俄系的政策根本取消。这就是武断主义的末日，平民主义的新纪元了。

第四是黑暗的种族偏见消灭，不同主义发展。野蛮人只知有自己的家庭，见异族的人同禽兽一样，所以有人食人的风俗。文化渐进，眼界渐宽，始有人类平等的观念。但是劣根性尚未消尽，德国人尤甚。他们看有色人种不能与白色人种平等，所以唱黄祸论，行“铁拳”政策。看犹太、波兰等民族又不能与雅利安民族平等，所以限制他人权。彼等又看拉丁民族、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不能与日耳曼民族平等，所以唱“德意志超过一切”，想先管理全欧，然后管理全世界。此次大战争，便是这等迷信酿成的。现今不是已经失败了么？更看协商国一方面，不但白种的各民族，团结一致，便是黄人、黑人也都加入战团，或尽力战争需要的工作。义务平等，所以权利也渐渐平等。如爱（尔）兰的自治，波兰的恢复，印度民权的申张，美境黑人权利的提高，都已成了问题。美总统所提出的民族自决主义，更可包括一切。现今不是又占胜利了么？这岂不是大同主义发展的机会么？

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以外，自然随大势而趋了。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的，执著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

关于男女同校
——1920年10月在燕京大学男女两校联欢会上的演讲

蔡元培

今日我承司徒校长招与男女两校联欢会。我知道这个会，是为要实行男女同校的预备，我得参与，甚为荣幸，甚为感谢。但秩序单上却派我作北京男校的代表。我要说句笑话，我似不好承认。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几个关系的学校，都不是专收男生的。如在法文专修馆，我是挂名的馆长，馆中有女生两人，在孔德学校，我是挂名的校长，校中一百多学生，女生比男生占多数。我所专任的是国立北京大学，现在也有女生九人。这几个学校，可以叫作男校么？

从前常常有人来问：“大学几时开女禁？”我就说：“大学本来没有女禁。欧美各国大学没有不收女生的。我国教育部所定的大学规程，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不过以前中学毕业的女生，并不来要求，我们自然没有去招寻女生的理，要是招考期间，有女生来考，我们当然准考。考了程度适合，我们当然准入预科。从前没有禁，现在也没有开禁的事。”那时考期已过，有各处女生要求到校旁听。我们审查资格后，允许旁听的，已有九人。今年暑假招考，如有女生来应试，一定照男生一样办理。

所以我的本意，似乎不必有男校、女校的分别。但燕京大学，历史的演进，校舍的限制，尚然男女分校，就是北京的学校，事实上大多数是男女分校的，况且今日代表北京女校的毛夫人，已经演说过了。我的不肯承认男校代表，只好算一句笑话。我现在仍遵司徒校长之命，代表北京男校敬致祝贺之意。

怎样做新闻记者工作 ——1922年2月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会上的演讲

李大钊

我今对于我们北大同学，发起这个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以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刚才胡先生说新闻事业，是要研究“活的问题”、“真的问题”，不希望诸位替人家做那“充篇幅”的事情。我现在更希望诸位对于新闻事业，是社会的事业，这一点也特别注意。因为社会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关系，要想把这不断的、发生的、多方面的社会现象描写出来，而加了批评或指导，非有相当的学问和知识不可。以前新闻界，所以有很多缺点，就是因为从事新闻业者的眼光不能映注到全社会的生活上的缘故。现在我们北大同学从事新闻事业的，如此之多，将来必能“改造”、“提高”新闻界。因为大学是一个最高的学府，所研究的学问，是多方面的，故由大学出身的人，必有比较的多方面的知识，或有与多方面的知识界接近的机会，希望诸位同学出其所学，把新闻界在社会上的地位提高，给新闻界开一个新纪元。

新闻记者的责任，于记述事实以外，还应该利用活的问题，输入些知识。胡先生说，新闻宜注意活的问题，不应单讲克鲁泡特金、马克思等等死的学说。这话诚然不错，但是材料虽是死的，若是用当也未尝不可把他变成活的。譬如平日登些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人便全不注意，若当接到克鲁泡特金逝世的消息，那一天，把他的历史，他的学说，写出来贡献在社会上，便可以引起社会一般人的注意了。又如但丁的历史和他的文学，在平日登出来，充充篇幅，实在于一般看报的人，没有多大的意味，若在去年有为他作六百年纪念的事实那一天登出，便可以引起社会一般人的兴味来。又如今天高师为达尔文一百一十三周年诞生纪念，开博物展览会，并讲演会，北京的报馆，若有在今日把达尔文的历史、肖像和他的学说的概要登出来的，岂不是格外有趣吗？又如一八七一年三月的巴黎自治团，在平时写出来，人并不十分注意，若在去年三月十八、九日恰恰是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把这一段历史纪载出来，登在报上，岂不是绝好的材料吗？可见死的材料，若是随着活的事实表现出来，便是活的、有趣味的材料。最好的材料，若作平日充满篇幅之用，因为他与现实的生活不相关联，于阅者亦丝毫不发生兴趣。照这样子做去，一切的科学知识，都可以觅得机会，利用一种活的事实，输入给大家。例如新疆、甘肃发生地震，我们便去访问地质学家。太阳忽然现出红光，我们便去访问天文学家。某种政治问题发生，我们便去访问政治学家。请他就此事实为学理上的说明。此外如有各国学者来华，亦当随时访问，叩其意见，以转为介绍于社会。这是新闻界对社会灌输知识的职分与方法，这点诸位要注意的。

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历史是过去，旧的，社会状况的写真。现在的新闻纸，就是将来的历史。历史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专记一方面的事情，应该是注重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新闻纸更应当如此。但是现在新闻界，遇着“督军的举动”，或“阔人的一言一行”，都是用大字，排在前几版，那穷人因穷自尽，或其他种种因为受环境压迫发生不幸的结果，乃社会上很大的变故，反用小字，排在报的未几版不注意的地方。这是旧习惯未退尽的一个最大的表现，也就是新闻界的一个大缺点。

这一点也希望诸位同学注意。

我们北大同学，在新闻界的人，发起这样一个团体，是一件很有关系的事。胡先生说，不希望主张必定一致，希望人人能发挥个性固然不错。但是有了这个团体，总可以借此情谊，立在同一的、知识的水平线上，常有机会来交换各人不同的意见。遇有国民的运动发生时，我们总可以定一大目标，共同进行，以尽指导群众，而为国民的宣传的责任。

敬祝北大新闻同志会的进展无涯！

实行三民主义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时的演讲

孙中山

同志诸君：

今天是我们国民党代表大会开会的第十天，也是这次大会闭会的一天。这次开会以来，所办的重要事项，秘书长刚才已经报告了。至于会中所办重要的事，即刻要拿去做宣传材料的，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全体，他作三段：第一段是讲中国国内的现状。第二段是解释本党的三民主义。这一段在宣言中尤其重要，因为我们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是永远不变的，要大家自始至终去实行。这个主义，在同盟会没有成立以前，已经是确定了，成立同盟会就是要实行这个主义。后来推翻满清以至于建立民国，也是为实行这个主义。但是自民国成立以至于今日，已经有了十三年，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主义的目的。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一是由于我们的办法不完全，二是由于各位同志不能同心协力，一致行动。我们这次开全国代表大会，订一个完全办法，划一统一的步骤，并议定党中的纪律，就是要大家能够实行三民主义，把这个主义的言论，一定做成事实。推究这个主义的来源，是我从前和各位同志经过了许久的讨论与研究，然后才确定出来的。在革命党没有成立以前，便有少数同志很赞同去实行；后来革命党成立了，就有多数同志赞同去实行；到了今日，便有极多的先觉先知赞同去实行。由此便可见本党的三民主义，是始终都不改变的。大家对于三民主义以后要心悦诚服，完全担负实行的责任。

宣言中的第三段，是本党的政纲，是实行三民主义的节目。我们因为要实行三民主义，所以不得不照中国的现状，依人民的要求，来规定这个政纲。人民所做不到的，我们要替他们去做；人民没有权利的，我们要替他们去争。所以三民主义是为人民而设的，是为人民求幸福的。我们从前革命，为三民主义去牺牲，就是为人民求幸福而牺牲。政纲既是依人民的要求来规定的，人民今年有什么要求，我们便要规定一种什么政纲；如果人民明年有别种要求，我们的政纲，便要依他们的新要求，重新去规定。但是人民的要求，在短时期中，决无大变动，所以我们订定的政纲，至少也要维持一年。在这一年之中，便要大家遵守，一致行动，照所订定的条件去实行。我们在这次大会所订定的政纲，或者有见不到的地方，诸君以后对于自己定的政纲以外，不能说没有新见解，所以这次所定出来的，不能说是完全周到，没有遗漏。但是诸君如果有了新见解，必须等到明年开第二次大会的时候才去修改。在没有开第二次大会之先，我们对于这次大会所定的政纲，就万不可违背，如果有了违背，便是乱大众的步骤。……政纲和主义的性质，本来是不同的：主义是永远不能更改的，政纲是随时可以修正的，但是修改的时期，最少都要一年，除非遇了很重大事情，对于政纲是发生根本变动的，我们临时才可以召集特别大会去修改。由此便可知政纲的修改，是有一定时间，因为预定了一定时期，大家进行的步骤，才有秩序，不致纷乱。本党党员，从前看见政纲有不对的地方，做事就立刻和政纲相矛盾，这是本党自乱的大毛病，此后大家必须要除去这个毛病。……以后要我们革命事业完全成功，便要大家一致行动，团结精神。自根本上讲起来，革命事业，是大家的事，不是一个

人的事。既是大家的事，必要大家同心协力，才可以实行，如果不能同心协力，便永远不能实行。所以这次所定的政纲，是本党临时的号令，至少要行一年。在此一年之中，不是要一两位党员去实行的，是要大家共同去实行的。大家共同去实行，便是一致行动；一致行动，就是党员的好道德。我们这次在广州开会，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从此以后，大家分散到各地方，便要希望一致奋斗。奋斗的方法，在中央的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各地方的，大家要组织区委员会或各委员会，把我们国民党布满到全国。诸君此次不远千万里而来，在此开了十日大会，议决了许多议案，是已经受了奋斗的任务，得了奋斗的材料。散会之后，带回到本地方去，应该分给本地的各位同志，教各位同志都要拿这种材料，分途去奋斗。……

这次的大会，是头一次试办，只决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去办理中央的事条；各地方委员会和地方上的事条，就要大家分头去办理。……现在已经是民国十三年，就是国民党在各地方分开奋斗了十三年。因为见到从前的奋斗尚不充分，所以这次要开大会，把全党来改组。从前奋斗不充分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办法，从此以后，有了办法，就要诸君担负责任，拿这个办法去替国人发生一个新希望。我们从前革命，因为没有好办法，所以成功与失败各有一半，从今以后，拿了好办法去革命，便可一往直前，有胜无败，天天成功，把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宣布到全国的民众，在今年之内，一定可把革命事业做到彻底的大成功。

爱国必先有文化

——1924年3月在石井兵工厂青年工人学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讲

廖仲恺

列位工友诸君：兄弟今日得到厂与各工友见面，非常欢喜。此校之所以要设立，其意思甚长。兄弟闻许多人言及“民主国”与“君主国”都是一样食饭，都是一样纳饷，用不着来理什么“民主”与“君主”这样的说话。都是未曾明白到“民主国”与“君主国”关系和分别之故。诸君之不能明白“民主国”与“君主国”的分别，就因为你们大家无从来认识。譬如有一块铜片是可以用来制子弹，别人则不知道，只知道是一块铜片而已，你何以知道这块铜片可以做子弹呢？因为你认识到用怎么法子就可以做成一个子弹。别人不知道这块铜能为子弹，就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法子来做子弹。工友们！我们的民国情形与往日不同呢！即如知道这块铜片能够成为子弹一般，我们明白到现在是民主国家，你们不能明白，因为现在民主国家未曾造成，其理与一块铜片未制成一个子弹的相同。为什么要做一个民主国呢？国为做成一个民主国，然后可以把国家主权放在四万万同胞手上，然后使四万万同胞都有管理国家的义务，国家才可以发达，人民才可以安宁。以前推倒满清，现在我们想国家发达，人民安乐，一定要有一个正式的“民主国家”。

一个国家任由一个人管理，是很危险的。因为任由一人独行独断，一定弄到像历年君主国的崩坏情形一般。满清之所以割地赔款给外人，致令我们还要负上很重的债，不能够还清，这样的情形，自然使国家穷困。固定穷困，一定会亡。这是一个国家任由一个人管理的危险情由。如一个国家的权力，不是放在少数人手上，是放在我们四万万同胞手上，国家一定比较安宁。因为国家所以能生存，一定依赖全国人民来把持住，人人知道把持国家，国家自然发达，人民自然安乐，享太平之幸福。但国家的主权在人民，人民必须具有主义、有精神、有远大眼光，国家才能兴盛。不然，国家必归衰弱。把一个国家变为多数人的国家，不是一个人的国家，人民又必须能判是非黑白。一个人民能明白是非黑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识字问题”是最要紧急解决的问题。如被无知识的人来做一个主权者，一定弄到国家陷于崩坏情形，这是亡国兆头。求国家发达，而不解决识字问题，是自相矛盾的。自己没有知识，野心者即可操纵专权，则国家仍然归于少数人手上，国家一定不能兴，反要亡国才了结。国家必先解决识字问题，然后可以得到太平。中国之任由少数人来把持，自私自利，不顾群众幸福，到今日这样情形，这就是中国的乱源。我们的眼光要放远大点，袁世凯的野心想把中国放在他手里，传子继孙都是袁家的天下。这样在普通人眼光看去，岂不是袁世凯个人的罪吗？是的，但是我们要要有远大的眼光观察，才能够看得透彻。我就把袁氏做皇帝来解释下去。我们听见袁世凯做皇帝的时候，他用钱来买无耻的猪仔议员，使他们不反对他做皇帝；又用钱来买各省的督军，不反对他。袁世凯能得到这样多钱买人不反对他，试问袁世凯的钱由何处得来？这个问题非解答不可。中国自满清失败，海禁大开，至今仍是一个财穷势弱的国家，袁世凯自然不能在中国找到钱来买人家不反对他做皇帝，所以他向外国大借特借，他然后可以得钱给过我国的军阀来捣乱。等我们不能得着一块安乐的地方来谋生，我们谋生困难，工业衰弱，国货不能振兴，外人就借此大输洋货

进来，把中国的金钱年年送去他的祖国。这样的侵略，便是叫做“列强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想解决此问题，就要先解决识字问题。一个人能够识字，就有远大的眼光，不像“近视眼者”只能见近不能见远。我们既知道中国延长战争，使我们的兄弟不能谋生计，就是军阀。军阀的可以作恶横行，他们背后就靠列强帝国主义者来扶持。军阀是一傀儡，列强帝国主义者在后拉线。由斯而谈，我们想得到安享太平，丰衣足食，不日日被军阀来压迫，被列强帝国主义来侵略，更莫怪政府抽捐。政府抽捐不是乱源，因为政府要去打倒勾结列强来压迫人民的军阀，政府要去打倒利用军阀来侵略中国的列强，必定用兵去打，用兵就不能无餉，所以就不能不抽捐。我们想得到丰衣足食，又不被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压迫，又一定要明了主义一致去打倒军阀，一致去打倒列强、帝国主义，所以就要解决识字问题。

常有许多记者问兄弟，劳工教育比较义务教育孰为重要？我说：现在义务学校的训育成材，非十年八年不可。而吾侪现在即须为国家做事，等如许光阴，是没有希望的。故此施行义务学校，比较起来，不及提倡劳工学校的重要。各工友不识字，知识就低。想得到知识，不能不读书。如多听演讲，亦未始非求知之一法，唯如此机会是不常的。如以为有留声机就可以，留声机是不普遍而且能力甚微的。故想知识增加，非从多阅书报不可。看书、阅新闻纸的收效，比起留声机收效大得多。人类的思想得到发展，都是借文字的功能，能阅书就可因此得悉前人所遗之教训。倘若不识字，事事都要亲眼见、亲耳闻。然后可以知识增加。但一个人是很难得到许多时候与机会，来给我们亲眼见、亲耳闻。况且世界上把人类各民族的寿平均起来，至高不过四十五岁。童稚之年浑无所知，非在二十岁以上，不能去远的地方来求知识。如不识字，则更属困难，无从得知识。所以一个人的寿命有限，不能去得许多地方，而且还有些不能及的。如果不识字，又不用亲见亲闻，知识就能发达，除非是圣人才可以做到。工友们！圣人是不容易得的。几千几万年都不过一个圣人罢了。我中国想希望产生多几个圣人来救中国的危亡，这是不能救中国的。中国不用求圣人，要求工友们大家一致去想，大家一致去想一个方法来救国。我们大家一致去想，但并不要空想的，大家想的实际方法，才能救国。倘若大家都是空想的，就误事了。大家能识字睇书，把前人已经想过的，继续想下去；前人想不到的想出来。将人家的知识来补自己的不足，切莫将他人曾经想过而且错的实行，莫像那班呆仔成日空想，若如此就差了。一个人能识字，在工作的方面说，亦得许多知识，可以发明新器；在个人上，不被人来压迫；在国家方面，不致财穷势弱。种种的利益幸福都是由解决识字问题得来。刚才厂长所说，兄弟前年为陈永善困于本厂，说工友不明主义，所以不想法营救。以兄弟看来，这一层比较的不要紧。现在世界最紧要的就是肚饿。得到饭食才能生，求生就要食饭。怎样才可以食饭妥当呢？这是要有识字能力才可以解决。求一般人免于肚饿，须先打倒不平的现在社会制度。从消极来讲，何以许多人无饭食、无书读呢？要设学校来补救不足呢？其原因在国家里面，社会的制度不平等，遭军阀的压迫，想做生意又得不到安静的地方，想找工来做又没有。做生意又不能，打工又不可，所以就要挨肚饥，挨冷，想读书来增加知识又更加难。所以我们一定要革命，把目前的不良制度推倒。这个问题，是目前最急需解决的。外人能够解决此问题，全世界只有俄国而已。他现在革命成功，对于工人方面，极力鼓吹识字，还有一间“工人大学”来补救。中国不解决此问题，又无饭食，又无书读，内受军阀的压

迫，外受列强帝国主义侵略。这样的痛苦，不只北京一班武人武客之错，也是满清的错，因为满清已经种下此毒很久了。我国的不能办学补救工友的知识，没有经费来开办，就因为外交失败。同人家打，时时都失败，打败时候，就是割地赔款。我们不是欠人的债，不是借他的钱来兴实业、办教育，不过白白赔给过人家的。还不只此，当袁氏打民党的时候，又向外人借债，借三万万，来做皇帝；乱的时候，再借二万万八千万来打。养兵来残杀人民，所以哪里有钱来办教育呢！我工友没有书读，知识又少，于是日做日穷。国家的市政不好，交通不便，不能令国家发达。有铜、铁、煤等，不能运去别省。卖本国的货物去外国，又要受协定关税的影响。外人输入来的货品税微而成本轻，这就是外货平过国货的原因。本国的货运去外国税重，不能平过外人的货，所以我国工业不能振兴，弄到今日经济破产。外人用经济侵略的手段来侵略，我们想得到饭食，得到安乐，一定要打倒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大家要认识，一个识字问题，是这样的重要。

什么叫做革命军

——1924年6月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时的演讲

孙中山

来宾、教员、学生诸君：

今天是本学校开学的日期。我们为什么有了这个学校呢？为什么一定要开这个学校呢？诸君要知道，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像这样看来，中国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个空名。所以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就是到今天，也还是失败。至于世界上的革命，在我们以后发生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六年之前，有一个邻国，和中国毗连有一万多里，跨欧亚两洲来立国，比中国还要大；在欧战之前，是世界上头一个强国；当欧战期内，便发生革命，他们的革命，后过我们六年。这个邻国是谁呢？就是俄国。俄国革命，虽然是在中国革命的六年之后，但是说到结果，他们的是彻底成功。我们拿两国的历史来比较：就对内一方面说，中国从前革命，是对满清皇帝的威权，到我们革命的时候，已经是很薄弱，政治也是很腐败，当那个时候，满清的国势，是世界上最衰微的国家。比较俄国对他们皇帝革命时候的情形是怎么样呢？俄皇是俄国的教主，在国内的威权是第一，当没有革命的时候，俄罗斯的国势，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像这样比较，可以说，中国是对权势很薄弱的皇帝来革命，俄国是对权势很强盛的皇帝来革命。所以就对内这一方面讲，中国革命是很容易的，俄国革命是很艰难的。就对外一方面说，俄国革命之后，所遇到的障碍是很大的；中国革命之后，毫没有人干涉。在革命之前，外国人虽然有瓜分中国的言论，我们也怕到革命的时候，受列强的干涉；但是发生了革命之后，列强丝毫没有理会。俄国发生了革命之后，遇到外国人的障碍，不只是言论，并且是受兵力的干涉。各国军队侵进俄国境内的，有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和意大利以及其他各小国的军队，外国人集合世界的力量来干涉俄国。像这样看来，我们革命，只在内对付一个很衰弱的政府；俄国革命，在内要对付一个威权很大的政府，在外还要对付全世界的列强。所以更就对外那一方面讲，中国革命也是很容易的，俄国革命也是很艰难的。为什么俄国遭了那样大的艰难，遇了那样多的敌人，还能够在六年之内，把所有的障碍都一概打消，革命是彻底的成功；我们革命的时候，比较俄国要长一半，所遇到的障碍又不及俄国的大，弄到如今，革命还是不能成功呢？由中国和俄国革命的结果不同，推求当中原因，便是我们的一个大教训。因为知道了这个教训，所以有今天这个开学的日期。这个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俄国发生革命的时候，虽然是一般革命党员做先锋，去同俄皇奋斗，但是革命一经成功，就马上组织革命军；后来因为有了革命军做革命党的后援，继续去奋斗，所以就是遇到了许多大障碍，还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大告成功。中国当革命之时，在广东奋斗的党员，最著名的有七十二烈士，在各省舍身奋斗的党员也是不少。因为有了那些先烈的奋斗，所以武昌一经起义，便有各省响应，推倒满清，成立民国；我们的革命，便有一部分的成功。但是后来没有革命军继续革命党的志愿，所以虽然有一部分的成功，到了今天，一般官僚军阀，仍敢明目张胆，更改中华民国的正朔。至于说到民国的基础，一点都没有。这个原因，简单地说，就是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

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所以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什么东西叫做革命军呢？诸君到这个学校来求学，要怎么样立志，才可以做革命军呢？要有什么资格才叫做革命军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可以做革命军，便要拿先烈做模范；要拿先烈做模范，就是要学革命党，要学革命党的奋斗。有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军队，才叫做革命军。中国革命，虽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军队，没有一种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我敢讲一句话，中国在这十三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现在广东同我们革命党奋斗的军队，本来不少，我都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他们这些军队，既是来同我们革命党共事，为什么我还不叫他做革命军呢？我之所以不敢以革命军的名号，加之于这些军队之上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内部的分子，过于复杂，没有经过革命的训练，没有革命的基础。什么是叫做革命的基础呢？就是要有革命先烈那一样的行为，有了那一样的行为，才叫做革命的基础。至于现在广东的这些兵士，对先烈的那些行为，还是莫名其妙，而且中国此刻是民穷财尽，一般都是谋生无路，那些人在没有得志之先，因为生什困难，受了家室之累，都是说要来革命，到了后来稍为得志，便将所服从的什么革命主义，都置之九霄云外，一概不理了。所以在二年之前，竟有号称革命同志的陈炯明军，炮攻观音山，拆南方政府的台。从前叫做革命军，同在一个革命政府之下的军队，因为利害不同，竟会倒戈相向，做敌人所做不到的行为。因此知道不明白革命主义的军队，究竟不能除却自私自利的观念，如果和他们本身的利害相反，马上便靠不住；所以我们的革命，总是失败。我今天到此地来和诸君讲话，是要把以往的成败，当作一场大梦，一概不要回顾它；要从今天起，重新来创造革命的基础，另外成立一种理想上的革命军。诸君不远千里或者数千里的道路，来此校求学，即是已明白了我们的宗旨，要造成一种革命军，一定是富有这种志愿，来做革命的事业。要做革命事业，是从什么地方做起呢？就是要从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所以诸君要在政治上革命，使先要从自己的心中革起；自己能够在心理上革命，将来在政治上的革命，便有希望可以成功。如果自己不能在心理上革命，就是此刻在这样设备完全的军官学校之内，研究军事学，将来还是不能成革命军，做革命军的事业。所以诸君要革命，便先要立革命的志气，此时有了革命的志气，将来便可以当革命军的将领。我们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的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如果不然，就是诸君将来成立军队，打许多胜仗，得许多土地，各人都能够扩充到几万人，还是不能够叫做革命军的。

中国现在不好的军人，可以分成两派：一派是在革命党内的军人，这派军人口头赞成革命，行动都是反对革命，所谓口是心非；一派是在革命党外的军人，这派军人，完全反对革命，只知道升官发财，时时刻刻都想推翻共

和，恢复专制。诸君要将来维持共和，消灭这种军人，现在便要立志，要存心将来成功之后，不做自私自利的师长、旅长和一般横暴无道的军阀。诸君有了这种志气，才可以入革命的第二层门径。什么是革命的第二层门径呢？就是要学革命先烈的行为。革命先烈的行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家奋斗。……用诸君现在的情形和从前的革命党比较：从前的革命党，都没有受过很多的军事教育，诸君现在这个学校之内，至少还有六个月的训练；从前的革命党，只有手枪，诸君现在都有很好的长枪；从前革命党发难，集合在一处地方的，最多不过是两三百人，现在这个学校已经有了五百人。以诸君这样好的根本，如果是真有革命志气，只用这五百人和五百枝枪，便可做一件很大的革命事业。

……我们现在到这地方开办这个军官学校，北方的官僚军阀，老早便办得有保定军官学校和北京陆军大学。用我们这个学校和他们的学校比较：他们学校之成立的时间很久，人数很多，器械又完全；我们这个学校所处的种种地位，都是比他们的差得远。如果专就物质一方面来比较，又照常理论，我们怎么能够改造中国呢？不过北方的将领和兵士，集合在一处，成立军队，不是为升官发财，就是为吃饭穿衣，毫没有救国救民思想和革命的志气；在从前满清的时候，是这一种将士，现在遗留到曹锟、吴佩孚的，也是这一种将士。我们没有军事学识的革命党，从前既是能够消灭满清，将来富有军事学识的革命军，更是能够消灭曹锟、吴佩孚。不过以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要能够消灭曹锟、吴佩孚，根本上还要有革命的精神；若是没有革命的精神，他们的人多械足，我们不但是不能够消灭他们，恐怕反要被他们消灭。

诸君到这个学校来求学，又听过了我今天这一番的讲话，自然立志要做革命军。立志做革命军，先要有什么根本呢？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有了高深学问，才有大胆量，有了大胆量，才可以做革命军。所以做革命军的根本，还是在高深学问。要造就高深学问，是用什么方法呢？造就高深学问的方法，不但是每日在讲堂之内，要学先生所教的学问，还要举一隅而三隅反，自己去推广；在讲堂之外，更须注重自修的工夫，把关于军事学和革命道理的各种书籍及一切杂志报章，都要参考研究。研究有了心得之后，一旦融会贯通，自然可以发扬革命的精神，继续先烈的志愿，舍身流血，造成中华民国的基础，使三民主义完全实现，革命大告成功，像俄国一样，我们中国才可以同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中国的民族才可以永远的生存于世界。假若革命不能成功，中国便要亡，四万万人便要灭种；国亡种灭，都是诸君自身的利害，这是不能不挽救的。要挽救这种危亡，只有革命军，所以我们一定要开这个学校，要造就革命军。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人，诸君都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都担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既是有了救国救民的责任，便要从今天起，先在学问上加倍去奋斗；将来毕业之后，组织革命军，对于共和的障碍，更是要同他们拼命，要能够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

假若我们现在有一万人的革命军，马上便可以平定中国，因为此刻反对革命的全国军队，总共不过一百万人。因为此刻我们没有一万人的革命军，所以那般贪暴无道的军阀，便敢于横行全国，元恶不作，事事要害国，天天要推翻共和。我因为要维持共和，消灭这般贪暴无道的军阀，所以要诸君不怕死，步革命先烈的后尘，更要用这五百人做基础，造成我理想上的革命军。有了这种理想上的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便可以大告成功，中国便可以挽救，四万万人便不至灭亡。所以革命事业，就是救国救民。我一生革命，便是担

负这种责任。诸君都到这个学校内来求学，我要求诸君，便从今天起，共同担负这种责任。

提高妇女地位，实行男女平等
——1924年12月在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

邵力子

各位女士，各位男宾：

鄙人今天代表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到这里来说话，很觉荣幸。国民会议本来可以不分男女，因为国民会议的意义没有两样。照同样道理来说，中华民国最好没有国民会议促成会，假使国民已得了政权，何必还要国民自己促成会议呢？可是中国有特别的情形，中国名为独立国，中国人实是奴隶，尤其一般平民，所以有国民会议促成会。中华民国，到于今十三年了，起初无论男子、妇女，都很为国努力，但是在女子努力的时候，受男子无耻的嘲笑很厉害，所以从此多数昏沉的女子，通通不敢继续的奋斗了。我国人民受两重压迫，我国女子除男子所受的以外，还要受旧礼教压迫。所以中国国民党在其党纲上明白的规定，在社会上、教育上要实行男女平等。这次国民会议，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一定要把这个党纲作为议案提出，所以一定能容许妇女参加。可是他所规定的组织国民会议的九团体中间，是有妇女的，何必还要组织独立的妇女参加呢？这又是因为中国妇女有特别的情形，例如：江苏女教育家很多，而江苏的省教育会议没有女会员，所以妇女有单独组织的必要。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在使国民会议成功，使中国人民脱出双重压迫，并使女界脱出本身的痛苦！今天开会的事很多，不能多说，只把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对于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意见代表说明。

召开国民会议，促进女权发展
——1924年12月在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向警予

今天主席教我来说明本会宗旨，我现在先要说为什么要组织这个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和这个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要做些什么事。

为什么要组织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中国这次政变，一方面顽强的直系军阀完全瓦解，同时一方面战胜的反直军阀不敢摆出他们的真面孔来。这样看来，可知人民政治的潮流日长。我们中国目下，有两个趋势：一个趋势是人民乘势奋斗，成为人民政治；一个趋势就是人民坐失机会，让军阀专政，那么军阀的势力仍复会巩固起来象袁世凯的时候一样。假使第一个趋势成功，自然人民的幸福有希望；不然，那种种的战争杀戮，奸淫掳掠，一样的会要临到我们人民头上来。但是要人民政治成功，先要人民自己努力，所以无论男女，通通要起来奋斗。不过奋斗没有组织和武器不行，国民会议便是这奋斗的组织 and 武器。

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做什么事？国民会议既是人民奋斗的组织 and 武器，我们女子占全国国民二万万，对于国民，也有责任，当然也有利用这组织和武器的必要。本会的目的在促成国民会议，和参加妇女独立的团体于国民会议，并且还要使男女人民团体做国民会议的主体，但是还有疑点——参加后又做什么？

代表全体人民提出政治要求。我们中国的乱源在军阀的专政，所以要废督裁兵。我们中国已经不是个独立国，实在因为前清以来和外国订了一些不平等的条约，所以要废除不平等条约。

代表全体妇女提出本身要求。我们妇女现在的痛苦，真是三年六个月都数不尽。女子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女子没有财产权；女子没有继承权；女子的结婚、离婚不能自由；女子的职业不能和男子平等；女子没有参政权，所以没有法律地位……总而言之，这些举的不过是一点大要——经过这次国民会议，一切不平等法律，通通要废除，重新订立男女平等的法律，并且还要特别助进女权的发展。但是这些事情不是少数人所能办到的。今天来宾很多，希望能够将本会的宗旨和主张竭力宣传。至于在座的诸位姊妹，希望踊跃的来加入，使本会成为轰轰烈烈的组织，促成国民会议，改造中国，使女子成为独立的人，享自由的幸福。

争取中国妇女的自由与平等
——1925年5月在“中国妇女协会”成立会上的演说

向警予

警予以女界一分子参加中国妇女协会成立大会，中国妇女协会中重要领袖皆系贵族妇女，即主席康先生所谓“名闺才媛”之流也。贵族妇女每每只知坐汽车，吃大菜、叉麻雀，逛游戏场，而诸先生能着眼到妇女运动，着眼到社会国家的问题，警予不觉异常感动，以为诸先生是贵族妇女中的特别人物，不揣冒昧，敢向诸先生提出下列两个极诚恳的希望：

（一）诸先生发起的是一个“中国妇女协会”，自然为的中国全体妇女争普遍的利益。要为全体妇女争普遍的利益，但非少数“名闺才媛”所能办到，这是很明显的。我诚恳的希望各位先生不要以为有了几个“名闺才媛”便称满足，要注意群众，时时为群众利益奋斗。并要热切帮助大多数下层最痛苦的工农妇女广大群众。

（二）诸先生要知道，妇女运动是求妇女的自由平等，然而在中国民族未达到自由平等以前，妇女绝对不会单独达到自由平等的。上海租界就是全中国的一个缩影。我们三月十五日女国民大会，便因英国工部局干涉开会不成。如果我们只争女权，不管中国民族的生死存亡，那么任上海租界一直扩大到西门、闸北、南市，及至于全中国的领土都要变成了租界，我们简直要变成了朝鲜，两人偶话都要禁止，还想聚众开会吗？连开会的自由都没有了，还说什么女权运动？所以殖民地如印度、安南、朝鲜等只有民族独立运动，没有女权运动。中国是半殖民地，所以还有妇女运动，然而中国妇女运动的大半已经包含在民族的自由平等运动之中了。因此我极热切希望诸先生协同全国被压迫同胞参加民族运动，以求中国民族自由平等者，求中国妇女全体的自由和平等。

共产国际万岁
——1926年11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
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祝词

邵力子

同志们！请允许我代表国民党在第七次扩大全会开幕的日子，向你们、向各国共产党的代表们致敬！（掌声）

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全部革命斗争史证明了：能拯救人类不受压迫和剥削的，不是帝国主义强国瓜分殖民地国家的工具国际联盟，也不是身为帝国主义国家帮凶的阿姆斯特丹国际，而只能是世界革命的司令部——共产国际。（掌声）

以列宁为奠基人和创始人的共产国际是唯一的核​​心，它团结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人民，它领导着他们为摆脱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剥削而进行斗争。一九二三年在孙中山直接领导下改组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结成了统一战线，为解放被压迫的中国而斗争。国民党必将取得成就，这是因为它正确地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因此，也就可以指望得到共产国际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全面支持。（掌声）

我们确信，只有共产国际才能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东方一切被压迫民族，去达到彻底战胜帝国主义的目的。要以国际无产阶级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统一战线，来对抗世界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掌声）

共产国际万岁！

世界革命胜利万岁！（掌声）

团结起来，帮助国民革命成功
——1927年2月在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开幕时的演讲

方志敏

今天是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的日子。江西自革命军克复以来，江西各阶级的民众都得到了集会结社之自由，同时我们农民也得到了同样的自由。所以，我们农民亦得以组织农民协会。从前我们农民虽占全民众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数量，生产品都由我们创造出来；然而社会上的人们并不把我们农人瞧得上眼，都只看到那些官僚、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我们农民受尽他们的欺凌，不敢同他们反抗。这就足见我们农民没有力量的缘故。为什么没有力量？就是不能团结。我们如能团结，他们要压迫我们，我们就可以赶走他，打倒他。现在，农民已经觉悟了，没有团结，是不行的，所以都来组织农民协会。我们有了农民协会，他人就不敢轻视我们、压迫我们了。现在江西全省的会员已有三十万之多，我们的力量可算很大。今天齐集各地代表来这里开会，就是要把全省农友的力量，团结和集中，设法子起来解除自己的痛苦，这是此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之一。再从我们的工作，有的地方做得很好，有的地方做得很错误的。此次要把各地过去的工作，拿来检查一下，以便我们今后设法纠正，也算是这次代表大会的重大意义。

今天是第一次代表大会。我相信在这次大会之后，我们农友一定能够得到很好的教训与经验，努力帮助国民革命之成功！

读书与革命

——1927年3月在广州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讲

鲁迅

现在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不能不说几句话，可是有许多好的话，以前几位先生已经讲完了，我再没有什么话可讲了。

我想中山大学，并不是今天开学的日子才起始的，三十年前已经有了。中山先生一生致力革命、宣传、运动，失败了又起来，这就是他的讲义。他用这样的讲义教给学生，后来大家发表的成绩，即是现在的中华民国。中山先生给后人的遗嘱上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中山大学就是“努力”的一部分，为要贯彻他的精神，在大学里，就得如那标语所说，“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因为大学是叫青年来读书的。

本来，青年原应该都是革命的。因为在科学上已经证明：人类是进步的。以前有猿人，或者在五十万年以前吧——这是地质学上的事，我不大清楚，好在有地质学专家在这里，问一问便知道，——后来才有了猿人。虽然慢得很，但可见人本来是进化的前进的。前进即革命，故青年人原来方应该是革命的。但后来变做不革命了，这是反乎本性的堕落，倘用了宗教家的话来说，就是：受了魔鬼的诱惑！因此，要回复他的本性，便又另要教育、训练、学习的工作去了。

中山大学不但要把不革命反革命的脾气去掉，还要想法子，引导人回复本性，向前进行到革命的地方。

说革命是要有经验的，所以要读书。但这可很难说了。念书因可以念搭革命，使他有清晰的二十世纪的新见解。但，也可以念成不革命，念成反革命。因为所念的多属于这一类的东西，尤其是中国念古书的特别多。

中山大学在广东革命政府之下，广东是革命青年最好的修养的地方，这不用多说了。至于中山大学同仁应共同负的使命，我想，是在中山大学的名目之下，本着同一的目标，引导许多青年往前进，格外努力。

然而有一层又很困难。这实在是中国青年最吃力的地方了，就是一方要学习，一方又要革命。

有许多早应该做的，古人没有动手做便放下了，于是都压在后人的肩膀上，后人要负担几千年积下来的责任。这重大的事，一时做不成，或者要分几代来做。

因此，青年们要读书不忘革命，的确是很吃苦，很吃力的了。但在现在社会状况之下，又不能不这样。

青年应该放责任在自己身上，向前走，把革命的伟力扩大！

要改革的地方很多：现在地方上的一切还是旧的，这些都尚没有动手改革，我们看，对于军阀，已有黄埔军官学校同学去攻击他，打倒他了。但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没有人向他们开火！

中山大学的青年，应该以从读书得来的东西为武器，向他们进攻——这是中大青年的责任。55

工农兵团结起来，实行土地革命
——1927年11月在海丰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说

彭湃

各位亲爱的工人同志！农民同志！兵士同志！中国自从辛亥革命到现在已十六年了，在这十六年当中，完全是国民党起来领导的，他的口号有：“工农群众起来革命”，“谋工农群众利益”。所以，我革命的工农群众，在他指导底下，已经作了极大的牺牲。如广东杨希閔、刘震寰叛变时候，我工农群众牺牲了无数头颅，才能够把杨刘赶走。去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也靠着工农群众的力量，得以打到长江流域以至黄河流域。这个时候，我们便起来要求减租加薪种种运动，结果，这个要求，反被他们指为叛变，同时并说是共产党作乱，因此他就要来打倒中国的共产党，这简直就是要杀我工人农民罢了！在湖北被他杀了万余人，在湖南、江西、广东也给杀了数万人。到这个时候，国民党的假面具，已揭出来了，我工人农民兵士也觉悟起来了，我们要解除痛苦，惟有团结起来，夺回一切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国民党怎样残杀我工农群众，在远的地方可不必说，我们在海丰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指使民团保安队屠杀革命群众，烧屋抢产，种种行为，实已露出他反革命的真面目，故此我们就应该起来打倒压迫我们的国民党！

我们要能够免受一切痛苦，更要起来拥护中国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因为土地革命，是共产党目前的第一件要紧的工作。我们更要明白土地是天然的，因被地主资本家霸占，所以我们连一点田也没有；他要永久的保护这土地，就组织一个政时——反动政府；他还怕政府不能尽量保护他，他又组织一种军队——军阀；而且他要保护自己的土地，还恐没有证据，又造出一种契约，于是就把土地各人瓜分起来，并划定界限、田壘。共产党对此是明明白白的，知道我工农群众要能够解放，除非把这私有制度打破是不行的，所以领导大家起来打倒反革命政府！打倒反动军队！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把一切契约烧掉！把田壘可以铲去者铲去！这样农民才得着真正的利益。地主资本家打倒后，同时并把一切的工厂归还工人。至于兵士呢？也有很大的利益，因为从前去当兵到年纪老了，被长官赶出来，回到家里没有工做，就要白白去饿死；现在我们夺回土地以后，就可把土地分给退伍的兵士，及其家属，使兵士可以在家里享福。故此兵士尽可去打仗，可无后顾之忧。

现在共产党已命令其党员，于最短时间，应合同工农兵去打倒一切反动政府，杀尽土豪劣绅，去焚烧契约，并怎样的去铲掉田壘。而且现在不是单单要海丰的革命成功，还要使全广东全中国全世界的革命成功！

最后一句话，现在中国反革命派，时时刻刻还想向我们进攻，我们应该起来反攻！

全世界最大力量就是我们工人农民兵士，最后的胜利也是我们的！我们的口号是：工农兵团结起来！打倒大地主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解除反动武装！一切武装交还工农兵！一切政权交还工农兵！土地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保持“左翼”作家的本色

——1930年3月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鲁迅

有许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不必再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Salon”是客厅的意思，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并且在现在，不带点广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作家或艺术家，就是说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应该被虐杀、被剥削的这样的作家或艺术家，是差不多没有了，除非墨索里尼，但墨索里尼并没有写过文艺作品。（当然，这样的作家，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中国的新月派诸文学家，以及所说的墨索里尼所宠爱的邓南遮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蒂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又如毕力涅克和爱伦堡，也都是例子。在我们辛亥革命时也有同样的例子，那时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

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事实上，劳动者大众，只要不是梁实秋所说：“有出息”者，也决不会特别着重知识阶级者的，如我所译的《溃灭》中的美谛克（知识阶级出身），反而常被矿工等所嘲笑。不待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

别例外地优待诗人和文学家的义务。

现在，我说一说我们今后应注意的几点。

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抵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譬如白话文运动，当初旧社会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许白话文底存在，给他一点可怜地位，在报纸的角头等地方可以看见用白话写的文章了，这是因为在旧社会看来，新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并不可怕，所以就让它存在，而新的一面也有满足，以为白话文已得到存在权了。又如一二年来的无产文学运动，也差不多一样，旧社会也容许无产文学，因为无产文学并不厉害，反而他们也来弄无产文学，拿去做装饰，仿佛在客厅里放着许多古董瓷器以外，放一个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别致；而无产文学者呢，他已经在文坛上有个小地位，稿子已经卖得出去了，不必再斗争，批评家也唱着凯旋歌：“无产文学胜利！”但除了个人的胜利，即以无产文学而论，究竟胜利了多少？况且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元产阶级，回到旧社会去罢了。

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学上的战争是有的，但那范围实在大小，一切旧文学旧思想都不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旧派的人倒能够闲舒地在旁边观战。

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因为现在人手实在太少了，譬如我们有好几种杂志，单行本的书也出版得不少，但做文章的总同是这几个人，所以内容就不能不单薄。一个人做事不专，这样弄一点，那样弄一点，既要翻译，又要做小说，还要做批评，并且也要做诗，这怎么弄得好呢？这都因为人太少的缘故。如果人多了，则翻译的可以专翻译，创作的可以专创作，批评的专批评；对敌人应战，也军势雄厚，容易克服。关于这点，我可带便他说一件事。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城计”。那时候我的敌军是专事于吹擂，不务于招兵练将的；攻击我的文章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的，曾经弄过好几个文学团体，不过效果也很小。但我们今后却必须注意这点。

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所谓韧，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门砖”似的办法。前清的八股文，原是“进学”做官的工具，只要能做“起承转合”，借以进了“秀才举人”，便可丢掉八股文，一生中再也用不到它了，所以叫做“敲门砖”，犹之用一块砖敲门，门一敲开，砖就可抛弃了，不必再将它带在身边。这种办法，直到现在，也还有许多人在使用，我们常常看见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诗集或小说集以后，他们便永远不见了，到哪里去了呢？是因为出了一本或两本书，有了一点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别的什么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写诗写小说了，所以永远不见了。这样，所以在中国无论文学或科学都没有东西，

然而在我们是要有东西的，因为这于我们有用。（卢那卡尔斯基是甚至主张保存俄国的农民美术，因为可以造出来卖给外国人，在经济上有帮助。我以为如果我们文学或科学上的东西拿得出去给别人，则甚至于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政治运动上也有帮助。）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

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记得好像曾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反动派且已经有联合战线了，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其实他们也并未有有意的联合战线，只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动就一致，在我们看来就好像联合战线。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关于“苏大”的性质和任务
——1934年4月在苏维埃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张闻天

苏维埃大学在国内战争的环境中开学，每个学生同志都应了解到自己的任务是学习领导革命战争。苏维埃大学学习的中心任务，和红军大学稍有不同，红军大学学生所学习的是领导广大的红色战士和敌人进行武装战斗，而苏大学生却应当学习领导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进行一切战争动员工作，来帮助战争，如动员群众运输红军粮食，组织游击战争等等工作，都要极努力地去学习。第二应该学习改善群众生活问题，学习怎样去保护工人农民的日常生活利益，牺牲地主资本家富农的利益，来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这是苏维埃大学学生应该学习的。苏维埃政权最大的任务就是为了广大群众生活上的改善而斗争。第三，苏维埃干部应该学习怎样管理苏维埃政权，怎样管理自己的国家，这是我们过去没有学习过的。过去我们在地主资本家统治之下，被地主资本家统治剥削，现在我们推翻了地主资本家的统治，建立了我们自己的政权，我们已经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学习管理自己国家的方法，学习乡苏怎样工作，区苏怎样工作，苏维埃怎样领导广大群众进行革命战争。这些讲程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苏维埃大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际课程教育学生同志，希望学生同志努力加紧学习，深刻的了解到在目前战斗的环境中，一分一秒钟也不要浪费，加速度完成自己的功课。

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 ——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幕时的演说

毛泽东

各位参议员先生，各位同志：今天边区参议会开幕，是有重大意义的。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现在的中国不能有别的目的，只能有这个目的。因为现在我们的主要敌人不是国内的，而是日本和德意法西斯主义。现在苏联红军正在为苏联和全人类的命运奋斗，我们则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还在继续侵略，它的目的是要灭亡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共产党的这种主张，是始终一致的。中国人民英勇抗战已有四年多，这个抗战是由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的合作来支持的。但是还没有胜利；还要继续奋斗，还要使革命的三民主义见之实行，才能胜利。

为什么我们要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因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直到现在还没有在全中国实现。为什么我们在现在不要求实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当然是一个更好的制度，这个制度在苏联早已实行了，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实行它的条件，陕甘宁边区所实行的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实际问题的解决，都没有超过革命的三民主义的范围。就目前来说，革命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是要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合力抗日。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我们希望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不但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并且在全国也实行起来。

我们实行这种政策是有成绩的，是得到全国人民赞成的。但是也有缺点。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这就是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有

一条，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就是针对着这一部分还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同志而说的。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同志们，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我想，我们共产党的参议员，在我们这样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参议会中受到很好的锻炼，克服自己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也许到今天还有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说，如果要和别人合作，我们就不干了。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人是极少的。我向各位保证，我党绝大多数的党员是一定能够执行我党中央的路线的。同时也要请各位党外同志了解我们的主张，了解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不是的，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各位参议员先生不辞辛勤，来此开会，我很高兴地庆祝这个盛会，庆祝这个盛会的成功。

坚持和平民主的方针 ——1946年2月在延安庆祝和平民主大会上的演讲

朱德

今天我们开大会，庆祝和平民主。我们中国人民求和平，求民主，已经有很长远的历史了，直到这一次，一月十日，才由蒋主席和毛主席下令国共双方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一月三十一日，才由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改组国民政府委员会，改组行政院，通过修改宪章原则，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确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基础。虽然停战以后，各个地方还有一些个别的零星的冲突发生，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实行起来还会有更多的波折，但是从大局方面来看，国内和平局面是已经确定了，全国民主化的方向也是已经确定了，我们的国家从此已走上和平民主与建设的新阶段。这个事实，已经不能抵抗了，已经不容怀疑了。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个非常伟大的胜利，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庆祝这个伟大的胜利。

同胞们！同志们！今天的这个胜利是怎样得来的？从根本上说来这个胜利是中国人民一百年奋斗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一切民主力量二十五年奋斗的结果，是解放区人民和军队八年奋斗的结果，也就是说，今天到会的每一个人，对于今天的胜利都有贡献，都有功劳。特别应当指出，多年以来，我国无数的志士，无数的先烈，为了和平民主的目的，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不知抛了多少头颅，流了多少鲜血，由于他们的前仆后继，百折不挠，他们的遗志今天已经开始实现了，他们今天可以瞑目了。没有他们的奋斗牺牲，要达到今天的和平民主的局面是不可能的，要开始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使国家走上工业化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就停战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直接原因来说，这是国共两党及民主同盟各党派与全国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共同努力，团结合作，互相互让的结果，这又是美苏英三国政府与人民一致努力，特别是马歇尔将军直接参加国共谈判，他们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共同促成中国和平民主的结果，因此我们应该向国民政府蒋主席致敬！向中国共产党毛主席致敬！向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等先生，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等同志，民主同盟和各位领袖，无党派的社会贤达致敬！向杜鲁门总统、斯大林元帅、阿特里首相致敬！向社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将军致敬！

现在国内和平已经实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化的决议也已经通过，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彻底实现，使民主政治一步步实现，使国内和平一天天巩固，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环境，以使全国人民从事经济建设，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大家都知道，无论什么好决议，既不会自己产生，更不会自己执行。我们过去已经作了极大的努力产生这些决议，今后还要作更大的努力来实现这些决议。蒋主席在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的时候，向全中国全世界作了郑重的诺言，宣布他一定坚决地忠实地执行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坚决地忠实地实行和平建国纲领，我们欢迎蒋主席的这个诺言。我们拥护蒋主席实行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决议，实行和平建国纲领。但是大家知道，在世界上不但有美苏英各国援助中国和平民主的人们，还有日本侵略者的残余势力和其他阴谋破坏中国和平民主的人们；在中国不但有愿意执行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一切

决议的人们，还有日本侵略者的走狗——汉奸、伪军、亲日派、内战挑拨者和其他阴谋破坏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决议的人们。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和国民党、各党派与无党派的民主分子，和国内外一切拥护和平民主的人们，亲密团结，长期合作，来实现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保护和平）促进民主，不让任何人加以破坏。中国共产党已经准备参加政府，以便站在负责的地位来与各党派合作，实现这些决议，保证国家的民主化，我们不但要实行已经通过的这些决议，因为这些决议的实行还只是全国民主化的开端，我们还要和全国人民在一起，继续努力实现进一步的政治改革、军事改革、经济改革与文化改革，使全国的政治彻底民主化，全国的军队彻底国家化，使三民主义彻底实现于全中国，使中国成为近代工业化的国家，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

我们解放区的人民与军队，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要做极重要的工作。我们已经彻底执行了停战令。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和平建国纲领，它们的大部分内容我们都已经执行了。但是我们现在还要根据这个标准来重新检查一次我们各方面的工作，看我们已经实行的是否还不完满，还有缺点，如果还有，就要毫不迟疑的加以克服。那些还没有实现的，我们应当绝对忠实的去贯彻实行。我们解放区的军队，从一开始就是不要钱，不怕死，全心全意服务于国家民族与人民的军队，除此以外，我们的军队不知道任何个人的党派的私利。中国共产党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经过种种艰难的困苦，创造了、发展了一支国家的人民的军队，这就是今天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纵队，现在国家民主化已开始实现，我们的目的已开始达到，这些军队即将成为统一的民主国家的最忠实的服从者与支持者，中国共产党将一如中国国民党一样即将停止在军队中党的组织活动，我们无论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军队国家化方面，在国家经济建设方面，都要力求成为全国的模范。我们一方面要自己加倍努力，把解放区建设得更好，另一方面还要努力参加全国范围内的民主事业与建设事业，推动其迅速前进，把全中国都建设好，我们的责任是双重的。是的，解放区的工作还会遇到很多困难，因为解放区本来是全国经济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又受了战争的最严重的摧残，但是只要我们全体军民团结一致，坚持和平民主的方针，我们就有信心战胜一切的困难，有信心完成我们的双重任务，像过去我们在八年抗战中所做过的一样。解放区在今后和平民主建设的新时代中，将有伟大的发展前途；全中国在今后和平民主建设的新时代中，将有伟大的发展前途。（鼓掌。会场高呼：加强解放区民主建设，推动全国民主化！）

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

巩固和平！实现民主！建设新中国！

国共合作万岁！各党派合作万岁！

中美苏英亲密合作万岁！

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万岁！万万岁！

人民祝你长寿全党祝你永康
——1946年11月为庆贺朱总司令六十大寿时的祝辞

周恩来

亲爱的总司令朱德同志：

你的六十大寿，是全党的喜事，是中国人民的光荣！

我能回到延安亲自向你祝寿，使我万分高兴。我愿代表那反动统治区千千万万见不到你的同志、朋友和人民向你祝寿，这对我更是无上荣幸。

亲爱的总司令，你几十年的奋斗，已使举世人民公认你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劳动群众的先驱，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

亲爱的总司令，你为党为人民真是忠贞不贰，你在革命过程中，经历了艰难曲折，千辛万苦，但你永远高举着革命的火炬，照耀着光明的前途，使千千万万的人民，能够跟着你充满信心向前迈进！

在我们相识的二十五年当中，你是那样平易近人，但又永远坚定不移，这正是你的伟大！对人民你是那样亲切关怀，对敌人你又是那样憎恶仇恨，这更是你的伟大。

全党中你首先和毛泽东同志合作，创造了中国人民的军队，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写下了新的纪录。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之下，你不愧为他的亲密战友，你称得起人民领袖之一。

亲爱的总司令，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生产运动，一直到现在的自卫战争，你是无役不与。你现在六十岁了，仍然这样健壮，相信你会领导中国人民达到民族解放的最后胜利，亲眼看到独裁者的失败，反动力量的灭亡！

你的强健身体，你的快乐精神，象征着中国人民的必然兴旺。

人民祝你长寿！

全党祝你永康！

文艺界大团结万岁
——1949年7月在全国文代会开幕时的演讲

沈钧儒

主席、各位文学家、各位艺术家、各位代表、各位来宾：

今天来参加文化大会开幕典礼，非常荣幸。

出席今天大会的代表，包含了全中国最优秀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文艺批评家、戏剧家、音乐家、画家、艺术家。其中最大部分特别是来自各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都曾经替中国人民出了力，都曾经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立了功。今天革命得到胜利，中国人民得到解放，拿枪杆的战士们，尽力最多，但是拿笔杆的战士们，也同样流了血，流了汗，值得中国人民的感谢。

因此，我代表我们中国民主同盟，特别向各位文艺界战士，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在今天的大会中，我看见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文艺工作已经和人民大众结合起来。第二件事情，全中国文艺界空前的大团结。这两件事都是在中国历史上所不曾有过的。

我自己非常爱好文艺，从幼年时候起，我也曾经做些旧诗，但是我明白，在从前的时代，文人只知道吟风弄月，不然就是粉饰太平，鲁迅先生所谓替统治阶级“帮闲”而已。虽然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一些文学家，为被压迫阶级作不平之鸣，但是一般他说，中国的旧文艺都是和人民大众毫不相干的，是脱离人民的。

“五四”运动以后，我们才有了人民的新文艺，其中鲁迅先生是最伟大的文艺革命导师。鲁迅先生不幸早死了，他却永远活在人民中间。这以后，毛泽东先生在延安发表了著名的文艺座谈会讲话，号召全国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以文艺作为战斗武器，为工农兵服务，这样使文艺工作真正和人民大众结合起来。在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毛泽东主席这一号召的效果，全国文艺工作者今天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脱离了人民，为少数人帮闲。他们大批地进到工厂，进到农村，进到部队，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工作。从此文艺最属于人民的，为人民所创作，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在中国数千年的文艺史中，这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大革命。

在旧时代有一句话，叫做“文人相轻”。自古以来，文人就最不容易团结起来。但在今天，情形也大不相同了。全国文艺工作者，各有历史，各有专长，并且有各种不同的作风，不同的癖好，在今天，却都能团结起来，为着国家与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写作而演奏。单从今天参加大会的人数而论，就超过了北平解放后历次代表大会的人数记录。文艺界像这样的大团结，也是在旧时代所不能梦想的。一向不容易团结的文艺工作者，居然有像今天的大团结，那么，我们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更不成问题了。

记得十三年前，我在上海参与鲁迅先生葬仪的时候，我写了“民族之魂”四个字放在鲁迅先生灵柩上。现在“民族之魂”已经化为无比强大的民族革命力量，震动了全亚洲，震动了全世界。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的领导者，不是别人，就是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先生。毛泽东先生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艺天才。他的一部不朽的杰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相信在场各位文学家、艺术家，应当都和我有同感。

各位文学家，各位艺术家，各位代表，我们大家向伟大天才毛泽东学习，
共同为人民服务，为创造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而努力罢！

敬祝大会成功！

人民文艺万岁！

文艺界大团结万岁！

伟大天才毛主席万岁！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时的演讲

毛泽东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

我们的会议包括六百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指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

这种全国人民大团结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战胜了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英勇的世界上少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有的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反攻和进攻。现在，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的野战军已经打到接近台湾、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和新疆的地区去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已经获得了解放。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援助人民解放军，反对了自己的敌人，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今天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那次会议的唯一收获是给了人民深刻的教育，使人民懂得：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

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

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

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够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庆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

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演讲

刘少奇

各位代表先生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开幕了。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以极端愉快和热烈的心情庆祝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庆祝即将由这个会议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是全国人民实行革命大团结的一种最重要的具体方式。它在今天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之后，并将长期地继续在中国存在，并将在一切必要的地方建立它的地方组织。中国人民在一百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艰苦斗争中深深地懂得：必须实行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才能战胜压在自己头上的强大的敌人，并在战胜这些敌人后巩固胜利的果实，成功地建设新中国。但在过去的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百般阻碍与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没有能够在组织上最后地形成起来，或者初步地形成起来又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所破坏。然而，在今天由于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业已基本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以及人民群众觉悟程度的增高，中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得以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形成起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就是表示这种新的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及其在组织上的最后形成。这种团结的基础十分巩固，团结的规模十分广大，在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虽然仍在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这种团结，但是，我们相信，世界上已经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碍与破坏中国人民的这种革命大团结了。过去被人讥笑为一盘散沙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一旦在正确的领导之下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它的光芒将照耀全世界，它将迅速地肃清一切残敌，克服一切困难，把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而奋斗，在今后，它也一定要继续为这种大团结而奋斗。因此，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及其发展和巩固而进行不懈的努力。中国共产党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其他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一起，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忠诚合作，来决定中国一切重要的问题。凡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并一道通过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将坚决地执行并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将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最高威信而奋斗，不允许任何人来破坏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今后所要采取的态度。我们也希望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以至全国人民，对今天开幕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采取同样的态度。

在今天建立起来的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是有它的坚固的政治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即将由政协筹备会提交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我们认为这个共同纲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端重

要的文献。它说到了我们的一般纲领，确定了我们国家的政权机构和军事制度，决定了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它是如此的坚定明确，清楚地指出了哪些事是应该做而且必须做的，哪些事是不应该做而且不允许做的。这是总结了中国人民在近一百多年来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经验，而制订出来的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这是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这个共同纲领，经过政协全体会议的讨论和通过之后，中国共产党当完全遵守它的一切规定，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在这样的政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及政治协商会议，在世界上将是无敌的。

中国共产党要拥护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为实现它的共同纲领而奋斗，是因为这个共同纲领包括了共产党的全部最低纲领。共产党的当前政策，就是要全部实现自己的最低纲领。这个最低纲领，既已全部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接受，因此，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为实现它的共同纲领而奋斗，乃是当然的事情。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除开自己的最低纲领之外，还有它的最高纲领，而这个最高纲领，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所没有包括进去的。在协商过程中，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还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无疑问，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因为中国工业化的结果，如果不使中国走到社会主义去，就要使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的国家，这是中国人民以至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能允许的。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对于这些事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很可以在将来加以讨论。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到了那时候，中国共产党也一定要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并共同地加以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将来也愿意和一切愿意进入社会主义的人们一道，共同地进入社会主义。我们知道，不独是今天实现新民主主义需要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就是到将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一样地需要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

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万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团结一致，建设祖国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时的演讲

朱德

各位代表先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的工作，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我们全体一致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通过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制定了国旗，决定了国都、国歌和纪年。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符合人民的意志。

在整个会议期间，我们全体代表始终团结一致，和衷共济，这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气象。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

在我们开会的时候，全国广大人民和各国人民团体纷纷来电庆贺我们。这是表明在我们的事业中，支持我们的不但有全国的人民，而且有国际的友人。我们深深地感谢他们的好意，我们也一定不会辜负他们的好意。

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圆满成功！

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毛主席万岁！

让新文艺深入到群众中去

——1949年11月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赵树理

大家都说我是这个家那个家，其实我并不是家——假若一定要说成个家，那我只不过是个热心家。我常到天桥一带去，看见许多小戏园子里，人都满满的，可是表演的却不是我们艺术界的东家。我们号称为人民文艺工作者，很惭愧，因为人民并未接受我们的东家。广大的群众愿意花钱甚至站着去听那些旧东家，可见它是能吸引住人的。它的内容多半是以封建体系为主，表扬“封建君主的尊严”、“某公子中状元”、“青天大老爷救命”、“武侠替天行道”、“神仙托梦”、“一道白光”……等等。这些题材，基本上都是歌颂封建体系的，拿这些很为群众喜爱的文艺形式，却灌输给群众许多封建性的东家，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虽然群众很需要新的文艺作品，而我们也急于把我们的作品深入到群众中去，但两个接不上头，互相结合不起来。就天桥来说，我们的文艺作品很少能卖到天桥去。因此我们感到有组织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必要。我们想组织起这样一个会来发动大家创作，利用或改造旧形式，来表达一些新内容也好，完全创作大众需要的新作品也好，把这些作品打入天桥去，就可以深入到群众中去。

旧文艺界在一些老解放区已经有了进步性的组织，而且得到了相当成绩，但还不够。拿农村来说：已经作过十多年的旧戏曲改革运动，但只要识字的人，就仍存有旧戏本、唱本，由此来看，它远超过我们的新文艺或改造过的东家；在技术上我们也赶不上旧的。我们必须进一步在技术上、内容上努力超过旧的。在这里，现在新旧文艺界都在努力，不过有的还只是开始；解放以来，旧文艺界虽然不写“一道白光”之类的作品了，但写新的还不能掌握政策，所以我们要好好学（每天报纸上的政策和文件，都应好好学习），渐渐学得能掌握政策，才能有好的作品产生。新文艺工作者，应丢掉轻视旧戏剧旧曲艺的观点，要认为它们低级，或觉得很简单容易，随随便便就可以写成，那是不对的。过去农村中，唱戏唱新的，但是不久就又唱旧的了——因为新的太简单，太容易，唱几回就腻了。我们要重视这些东西，要细心研究。为什么许多人愿意花钱去看去听呢？这其中是有道理的。

这里我特别再向旧文艺作者提一件事：旧文艺作家缺乏新观点，怎样建立这个新观点呢？第一要了解政策，前面已经说过了。第二要研究群众：了解群众需要什么、如何表扬模范例子；要了解新老解放区的乡村、城市、工厂等各种群众的情况，想办法使写的东家给群众解决问题，使群众听得舍不得走。我们的作品是否吸引住群众，受群众欢迎是最重要的。旧形式和新内容是否配合，新写的是否比旧的受群众欢迎，都不是简单的问题，我们应该下一番工夫研究——无论形式内容，都要下工夫研究，不能随随便便对付。

我们应该大家做学生、做先生，共同学习讨论。过去文人有一个毛病，就是自己写的东家，别人不能动一笔，实际上让大家一讨论，会有很多的漏洞经过多次修改才能完全。这个认为自己写的作品别人不能修改的包袱是必须丢掉的。我们这个会就是为了使大家互相帮助、学习、创作、研究才成立的。有了作品，要彼此修改、批评建议，再拿到群众中去考验，使其成为真正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文艺作品。

认清形势，总结经验开创上海经济工作新局面
——1949年12月在上海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开幕时的演讲

陈毅

各位代表先生，各位代表同志：

主席团决定我来宣布上海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开幕。

第一届代表会议八月五日闭幕，迄今恰满四个月。当七月间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开始不久，一般对反封建的经济尚不多，当时上海工商业的情况是极其严重的。例如：当时的机器业几乎处于崩溃的境地，纺织业成本高于卖价，百货业销售困难，粮价领导物价而上涨，使广大依靠工薪为生的人员惴惴不安，因而劳资纠纷在七月份二千件以上。上海工商业在当时实际处于难于维持的状态。一部分人士很悲观，认为物价是不能稳定的；工商业被封锁，海口不通，是无前途的。帝国主义分子六、七两月曾不断预言上海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要灭亡。可是经过我们第一届代表会议的集中讨论，细心研究，一致通过中共市委所提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和建设新上海的方针及六大任务。几个月来，上海人民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均一致执行第一届代表会的方针，经过各种曲折与复杂的斗争，经过八、九两月物价稳定，上海工商业的情况开始好转了，市库的收入也开始较前充裕了，市政局部建设与市政修整也开始了。这证明中共市委提交第一届代表会所通过的反封锁方针是正确的，政府与人民的努力不是白费的。敌人的封锁、轰炸、破坏是吓不倒我们的，我们对灾荒水患是有办法对付的。尤其是十月一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伟大的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着伟大友邦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承认新中国，伟大的政治成就配合着四个月来前线军事的神速发展，加上在全国各地恢复经济，克服灾荒的努力，证明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力，打开了光明灿烂的前途。我们上海的经济情况在全国优良的政治军事情况的推动下，也在事实上开始好转了。

四个月来克服困难争取好转的经验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在于政府与人民的亲密团结，是在于人民拥护和执行政府的政策，是在于政府与人民依靠节衣省食、努力生产、自力更生，是在于着重抓到了支援前线、打破封锁的对敌斗争的环节。我们在此指出“人民的上海对于支援前线的作用是很大”。是在于强调团结教育，不怕负担加重。对庞大工薪人员的待遇和工作采取匀饭吃的方针，纠正了某些方面一脚踢开的办法；是在于对投机操纵和不正当营业牟利的活动采取了严厉的惩处与镇压；更在于人民政府手中掌握了相当大的物资，对平抑物价起了积极作用；更在于全国有了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真能统一全国的、真能廉洁奉公的中央人民政府，在他的领导和帮助之下，以上海配合全国，以全国支援上海，便保证了我们上海能渡过七月的难关，而有八、九两月的物价稳定与经济情况好转。我们应该研究上述的经验教训，不要忘记它。

第二届代表会今天开幕，我建议应根据四个月的经验继续作反封锁的努力，不达目的决不休止。我们应着重指出：十月份第二次物价高涨，到十一月份已开始相对的稳定，这业已造成了上海情况会继续好转的极大可能。但同时我们应该指出所谓好转是不充分的，是不全面的，因为目前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困难，如年关迫近，广大工人群众及公教人员的薪给只能勉强维持，

难民倒流，失业现象不能解决，工商业和很多部门虽已日见活跃、日益向前发展（其中许多部门而且是很重要的部门，如机器业、五金业等），但某些部门仍处在极其严重的境地，上述困难是急待克服的。总括说来，上海经济生产情况一部或大部业已走向好转的途径，一部分或某几个重要部门，仍然处境极其困难；生产有停闭的危险。就好转方面来说，我们充满了信心，有一切办法把上海的事逐渐办好；就目前困难的部份来说，尚不容我们盲目乐观，尚不应该放松我们的注意力。这就是我们上海第二届各界代表会目前开幕时面临的上海经济生产情况的具体形势。认清楚这个形势，自然使我们必须采取根据好转的基础，去克服现有困难的自力更生的行动方针。

让我来比较一下七月物价高涨与十月、十一月物价高涨的基本区别。七月物价高涨的原因是：上海初解放，敌人封锁，交通未恢复，农村工作未展开，城乡不交流，国外市场断绝，国内市场亦未打开，福建、华南、西南、西北及华中之大部，尚为敌人所盘踞，上海的当时情况是坐吃山空，有出无进，几乎全部工商业濒临绝境。十月和十一月上海第二次物价上涨的情况，是不是与七月份上述情况相同的呢？显然不是的。因为西南、西北、华南的敌人已赶走，或不久即完全被消灭。国内市场无障碍地打开，交通恢复很快，农村工作展开，城乡通气，上海与各省互相需求增加。因而上海经济生活大大的活跃起来，虽然仍然免不了物价上涨，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战争负担加重，增加了通货的发行。只要残余敌人完全消灭，连带的敌人封锁亦将基本打破。每一个人多加思索，均能明了这个上涨是不可怕的，是可以克服的，是不能阻止我们事业的好转的前途的。最惋惜的，是一部分人们不仅不了解七月与十月、十一月两者物价跳动的区别，尤其不去了解人民政府与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区别，不去了解我们胜利后暂时困难与国民党反动派灭亡时无可挽救的困难的差别，甚至对人民币与伪金银券的区别也不了解，因而失掉头脑，在物价波动的条件下，受了投机商人的愚弄，这倒是应该加强宣传教育的一件大事。即是就投机商人们来说，你们在七月与十月、十一月的两次物价上涨中，你们的估计认为物价一定继续涨，一定不能回跌，是不是与事实符合？你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赚了钱或者赔了本呢？那许多受了人民政府制裁的投机商人，你们心不甘，是否能有悔悟？我提一提这些问题有好处，至少经过检讨可以促进觉悟，可以唤起一些人回头。这里我郑重提出，在人民新中国时代，一切问题正在掀起伟大的改变，许多旧观点、旧作风、旧算盘也应跟着改变，对人对己均有好处的。

我现在想不说如何保持好转的基础，我只想谈一说如何去克服目前的严重困难。这里让我来介绍毛主席新近的指示。毛主席在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说：“我们的情况概括他说来就是：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毛主席这个指示，应该成为我们结束今年迎接明年的克服困难的行动指示。他帮助我们能坚定不移地有信心在最近几年内能争取我们的事业从克服困难走向好转和巨大发展。照我个人的理解，我们的最大困难在于战争负担很重，但是事实上明白指出，残余敌人不久即完全

消灭，这个负担可以逐步减轻。所谓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的理解这是指政府与人民团结一致，采取适当政策，从生产互助，节衣省食，用自力更生的办法去从事经济的恢复。全国人民能积极拥护和争购中央人民政府所发行的胜利折实公债，也是克服困难最重要的办法之一。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加上我们政治清明，自己会搞，这当然是有指望的，办法当然是很多，因而我们希望是无穷的。假如我理解的不会太错，运用到上海目前情况，则目前存在着的局部困难，是可以用人力与政府团结起来用自力更生的办法去克服的。例如纺织业、丝织业、出版业、航业、剧影业以及其他各业的停闭困难，为什么不能用自力更生办法去解决呢？我建议已好转的各业设法协助未好转的各业，已兴旺的企业协助未兴旺的企业，各种面临困难的企业向全体职工说明困难，号召以渡过困难为第一义。全体市民动员全市游资来协助工商业好转，根绝投机牟利的不正当行为。人民政府当一本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来协助解决困难。我相信上海六百万人民具有无限大的潜在经济力量，充分发动起来，很好组织起来，加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全国力量适当协助，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悲观的论调是完全无根据的。我们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应站在毛主席指示之下，为克服目前困难而奋斗，为争取大部好转和全部好转而奋斗。在这里请各位代表细心听取四个月来的市政报告，并加以很好的检讨；细心听取上海财经报告，并加细心的总结和讨论；细心考虑来推选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如果我们代表会把这三个议程做得很好，使我们的会议获得完满的成功，我相信第二届代表会议之后，上海的情况一定更大好转，市政工作一定能提到更新的阶段。

学习和学习方法

——1950年9月在马列学院第二、三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刘少奇

中国革命胜利了。总的来说，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很好，但理论工作却是很薄弱的一环。我们很多干部，甚至是负重要责任的高级干部，斗争经验丰富，可是理论水平不高。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弱点。还有些同志文化水平也不高。因此，首先要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然后再提高理论水平。有经验是一个长处，但受文化和理论水平的限制，就不能有大的发展，碰到问题有的能处理得好，驾驭得了，有的就不能驾驭，处理不好。我们很多干部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再有了文化和理论，就可以担负更多的工作，解决更多的问题。

现在，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这是一项经常性的任务，不可能一下做好，大约要花十年的工夫才能前进一步。缺乏理论是很大的弱点。有的同志对于理论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不愿意做研究理论的工作，这种思想是不对的。我们不仅要有少数人研究理论，而且要有更多的人研究理论，在职干部也要抽出时间去研究理论。只有理论没有实践当然有犯教条主义的危险，但是理论是实际工作的指针，没有理论，工作就是盲目的，没有前途的。没有理论的人容易被“俘虏”，被人家天花乱坠的话所迷惑。掌握了理论才能正确地指导工作。有些人不懂理论，又要站在指挥台上指挥，行吗？不行。现在还有这样的人，他还站在指挥台上；等大家理论水平提高了，他再要站在指挥台上就不行了。

我们党的干部应该重视理论工作。今天，党需要你们去做研究理论的工作，并且决定给你们一些实际问题去研究处理，看是否能运用已学得理论，这对你们是很好的。一般来讲，你们学习校长的时间后，能够学到一些理论知识，将来出去工作，就可以运用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去观察、解释、处理实际问题。运用理论观察、解释、处理实际问题，这就是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你们学习许多东西，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其他一些知识。

但是，仅仅读了几本书，有了一些理论知识，并不等于就有了理论。读了书，增加了一点理论知识，这只是有了运用理论的可能，而处理实际问题不是单靠书本所能解决的。有些人只知道翻书本，中国的国外的他都知道，你说到什么问题，他可以马上把书翻出来。但碰到实际问题，马克思没有讲过，列宁也没有讲过，他自己就不知道怎样分析、处理，这就是不懂得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处理问题。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我们学习马列主义，要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要把马列主义变成教条。你们以后所遇到的、所要处理的问题都是新的问题，许多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讲到的。比如湖南、广东如何土改，他们没有讲过，怎样来处理呢？就得靠你们用所学到的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处理，并且要处理得不错。这样才叫做有了一些理论，才算在马列学院学到了理论。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马克思、列宁讲过了，但是要处理中国的土地、农民问题还要靠我们创造，还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如富农问题，过去是把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征收了，分给贫雇农，现在要保存富农经济。那么，过去的处理是否不对呢？不。过去分富农

的土地对，现在不分也对。现在不保存富农经济就是错误的，因为情况变了。当然富农本身并没有改变。如果说有改变，那么是政治态度有了改变。在战争当中，富农同地主站在一起，反对土改，是不能争取的。今天中国革命胜利了，就有可能争取他们。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他们周围的环境改变了。抗日战争时期不搞土改，只搞减租，解放战争中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财产分给农民，今天则是保存富农经济，这是整个革命形势决定我们这样做的。在战争紧张的时候，即使不那样做，富农也不会拥护我们，也不会站在我们一边。今天战争胜利了，要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就要保存富农经济。对这个问题，虽然有些农民目前不十分满意，但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民是会满意的。这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有些人学习了两年，知道了许多理论知识，但没有真正学到什么马列主义，这是可能的，学习了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还必须对客观材料和实际情况加以分析、整理，才能形成正确的思想。做事情也好，写文章也好，都是这样。当然，书还是要读的，知识总是多一点好，但不能说，只要书读得多就好。多了还要善于运用。书读得多，理论知识多，又能运用，这才是真好。

你们还要学习写文章。文化不高的同志不会写文章，不会组织文章，这是一个弱点。马列学院第一期重视写文章，第二期也要重视写文章。不会的要学会，已会的要练习写比较复杂的文章。写文章也是掌握一种武器，要能够提出问题，解释清楚问题。

在马列学院主要是学习理论，真正练习运用，还是要到实际工作中去。在工作岗位上能够运用理论，独立地处理问题和独立工作，这就是学习马列主义的结果，这就说明学习有了成绩。

理论不够的学理论，文化不够的学文化。此外，党性不强的，思想有毛病的，组织性不好的，也要来学习。要做到既有理论，又有文化，又不骄傲，思想好，作风正派，这样就能到处受人欢迎。有了理论，却很骄傲，看不起人家，动不动给人家扣机会主义大帽子，那人家就不欢迎你。所以，你们虽然快毕业了，也要整顿一下思想。越是有理论有知识的人，越应该感到自己知道的少。要是学了点马列主义，不是更谦虚而是更骄傲了，这就说明马列主义中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学到。学到了东西，增强了信心，能够处理问题，坚持真理，批判错误，这当然不能叫做骄傲。

我们的同志作风要正派，有毛病的要把毛病去掉。自己应该认识到，我们是在党的领导下，一切为了党，一切为了人民。应该彻底地解决这个认识问题。学了马列主义，就要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这些东西克服掉。党支部的工作、学院的工作都应该注意这个问题。这里面也包括怎样正确对待工作分配的问题。马列学院的学生要服从组织分配。无论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是一样的，不能说这个地方不好，这个工作不好，我不去。也不能说我有了理论，比别人高，还给我这个事情做！

有些同志说，做理论研究工作自己能力不够。这固然不是骄傲，但说明信心。怕工作搞不好而兢兢业业，努力搞好，这是进步的表现，可以使工作做好。但是必须有信心。能力今年不够，明年就足够了，明年还不够，再搞几年就够了。没有说能力够了再去担负工作的。

宣传、理论工作是我党很弱的一环，必须加强。列宁主编过《火星报》。我们党最重要的宣传工作是毛泽东同志做的，我也做一些。《人民日报》很多社论稿我们都亲自看。宣传工作是光荣的岗位，不愿做宣传工作是不对的，

从马列学院毕业出来的不能做宣传工作是没有理由的。宣传不是讲空话，而是要讲实际问题。宣传工作可以碰到很多问题，要你们说话，要你们写文章，要你们作解释，这正需要运用你们学到的马列主义理论。在学校里学习，做宣传工作是实习。学习一个时期，做一个时期的宣传工作，以后再担负别的工作就更好了。我们党要有很多做理论研究工作的。中国党如果没有很多的理论干部，就不可能领导这样大的国家达到社会主义。

推动中国妇女完全解放

——1953年4月在庆贺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召开时的讲话

宋庆龄

亲爱的姐妹们：

我趁这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开会的机会，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我祝愿你们胜利成功，完成这个重要会议的目的和进一步推动中国妇女的完全解放。

这是一个最适当的时机来把全国各阶层各地区的妇女代表们聚集一堂。我们已经是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各种改造运动，并且开始了工业化的时期。在我们生活中，抗美援朝仍然是主要任务之一，我们正在把这个斗争发展到新的高度。由于我们的政权是巩固地掌握在男女劳动人民的手中，我们将要举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首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公布我们的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宪法。

你们知道，这一系列都不是平凡的事件。显然的要使我们的计划和方案获得成果，我们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每一个人都需要发挥空前的创造性并在各方面建立起新的标准。这个要求对于妇女当然也是不能例外的。

我们的中央人民政府的领袖们很了解我们的历史。他们知道，没有一个革命运动是没有妇女参加而能成功的。他们知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广大的劳动妇女积极参加”是不可能的。他们知道，除非信赖大多数的妇女群众积极地发挥她们的全部能力，我们革命的目标就不可能不完成。

今天在我们的国家里，法律已确认妇女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事实上，妇女已经享受到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给予的权利。我们在铲除男女不平等的封建关系方面已有了伟大的进步，这特别是由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的活动使法律得以广为传播并得以贯彻的结果。不过我们也知道，中国妇女还没有完全解放，还需要作更大的努力。

首先就男尊女卑的观点来说，它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在思想行动之中随时会表现出来。这种缺点需要反复不断地教育来改正，而不是立刻可以根绝的。

其次，妇女们到处都受到家庭繁重工作的束缚。不仅使她们无法参加生产，甚至阻碍了她们的的发展，使她们既不能随着社会的前进而前进，又不能依照社会对于公民的要求来使自己前进。

这些都是最主要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保卫整个人民共和国的利益是关键性的问题。除非中国的妇女大量参加工、农和文化工作，把人口中的一半劳动力完全解放出来就不容易按照必须和可能的速度推动我们国家的前进。妇女能够而且必须成为技师、经理、教员、拖拉机手、工程师、科学家和各种熟练的工人。我们已经是向着这个方向在走，但是，使这个运动具有群众性才真是我们的目标。

因此，关于妇女将来的工作计划，我建议对如下数点加以考虑：

一、我们必须继续教育人民群众重视保护妇女的权利，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而且她们也要得到她们的特殊权利。

二、我们必须提供更多的产科医院、托儿所、学校等设备，以便逐步地把妇女从家庭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

三、我们必须加紧扫盲工作，并多设训练机构，使妇女能够自由选择职业。

四、我们必须提高妇女的政治水平和加强她们的组织联系，保证她们尽量地积极地参加国家的政治活动。

中国妇女的完全解放意味着我们国家的稳固坚强。一个强大的，生气勃勃的，和苏联、人民民主国家以及所有进步人类紧密地携手前进的中国就是全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3年7月在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发表的谈话

彭德怀

朝鲜停战协定已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在板门店签字。自协定签字后十二小时起，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已经完全停止，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朝鲜停战现在已经实现了。

三年之前，英雄的朝鲜人民，为了捍卫自己的独立自由，英勇地展开了光荣的抵抗侵略、保卫和平的自卫战争。三年以来，朝鲜人民以巨大的牺牲，抗拒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保卫了自己祖国的土地。这次战争证明，一个觉醒了的爱好自由的民族，当它为祖国的光荣和独立而奋起战斗的时候，是不可战胜的。

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就再三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和建议。但是，美国政府不顾中国人民的警告，无视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一意孤行，不仅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就侵占了我台湾，而且命令它的军队越过了三八线，向我东北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进攻，造成了对我国安全的严重而直接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祖国的安全和平建设，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为了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才毅然决然地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组成了自己的志愿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经过了两年零九个月的英勇战斗，我们不仅击退了敌人的进犯，稳定了三八线附近的战线，而且已经进行了多次的胜利的反击。

朝中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其目的原在于争取条件，使朝鲜问题得以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获得和平解决。所以，朝中人民和政府战局稳定之后，不仅仍然继续提出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而且完全接受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苏联政府所提出的关于谈判停火与休战的和平建议，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与联合国军方面开始了朝鲜停战谈判。这个谈判经过了两年迂回曲折的过程，由于朝中人民坚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政策，由于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为了和平事业而作的巨大努力，谈判双方最后才达成了光荣协议，并在昨天签订了停战协定。

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严格履行停战协定的义务。中国人民志愿军愿和朝鲜人民军一道，保证遵守并履行停战协定的一切规定。但是，朝中人民和世界人民不能不严重注意到联合国军方面还有一部分好战分子尤其是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反对停战协定的签订，并且在协定签字之前已采取了破坏协定的挑衅行动。因此，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一道将不会忘记应有的警惕，并将以最大的决心为保障停战协定的彻底实现而坚决奋斗。

现在所签订的停战协定，是属军事性质的，还只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一切外国军队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撤出朝鲜，朝鲜问题在朝鲜人自己处理自己问题的精神下的和平解决，一个统一、民主、和平、独立的新朝鲜的建立，尚有待于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去协商。中国人民是一贯主张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中国人民愿意为和平解决国际问题作坚强的后盾。

现在，我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向在金日成元帅领导下的英勇的朝鲜人民

和朝鲜人民军致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作战期间，受到了朝鲜人民衷心的爱护和热情的支援，这些爱护和支援使得我们两国人民和军队在同生死、共患难的高度国际主义精神之下，团结得更紧密了。祝我们两国人民在反侵略战斗中以鲜血结成的亲密友谊更加巩固和发展。

现在，我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向热烈支援前线的祖国同胞致谢。这些无限忠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支援，大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战斗意志，增强了我们的战斗力量。

现在，我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向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国家致敬。由于他们的屡次倡议和不懈努力，朝鲜停战才终于实现。

现在，我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表示庆贺。显然，朝鲜停战的实现将促进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有利于远东及世界的和平。任何好战分子，特别是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如果敢于继续他们的破坏朝鲜停战的罪恶活动，他们的阴谋必将遭受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坚强反对而归于可耻的失败。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和平胜利万岁！

发扬集体英雄主义精神加速铁道建设事业
——1954年5月在铁道兵第三次庆功大会上的讲话

朱德

同志们：

你们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立下了功劳，成为人民的功臣、模范和英雄。今天，我来参加你们的庆功大会，向你们祝贺。

铁道兵部队建立五年多以来，完成了抢修、恢复和新建铁路的工程任务。从东北南下一直到广东、广西和其他各地，你们所完成的工程任务，无论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和战争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你们的成绩是很大的。

铁道兵是我军的技术兵种，是现代化国防军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全军走向现代化、正规化的实践中，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加紧部队建设，使自己成为一支坚强的能够保卫祖国、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这就是说，你们的技术要学得很好，本领要练得很大，平时积极参加祖国铁路建设，战时担负抢修任务，保证军事运输。在现代化战争中，没有铁路的支援，就不能很快地把部队运到前线去，就难以使用大兵团作战。所以你们的任务，不论在战时或平时都是艰巨的、光荣的。同志们，你们的工作刚刚开始，将来有更多、更艰巨的工作要你们去做，希望你们能够完成党和祖国人民给予你们的艰巨任务。

铁道兵是经过战争考验、有组织有训练的部队，所以，党把你们放在重要的地方，让你们担负困难最多的工程任务。你们所担负的任务是，有一些是世界上都少有的艰巨工程。将来修建四川到云南、甘肃到新疆、江西到福建的铁路时，有一些艰巨的任务也要交给你们。党和人民相信你们有这个力量、也有这个胆量能够完成的很好。党和人民对你们的这种信任，也是你们的光荣。当然，你们要完成这些艰巨任务，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就以修建宝成路来说吧，同志们在野外、在大山里劳动，没有房子，要搭茅草棚，要开石头洞，睡不好，吃不好，这就是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比起战争时期的困难就不在话下了。我们的军队有不怕劳苦、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又有广大人民的支援，所以任何困难对于我们都算不了什么。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大家都热爱我们的祖国。记得长征时候，我们到过很多人烟稀少的荒凉地方，那些地方当然比不过东北，比不过上海，可是也是好地方、有用的地方，就是草地，就是很远的西藏，也是好地方，我们中国的土地没有一块不是好地方。既然是好地方，我们也就要保卫它、建设它。像西藏这样的地方，离我们很远，将来要不要修建一条铁路到那里去呢？一定要。我们如果只是贪图在繁华的地方过舒适的日子，把兄弟民族和边疆地区都忘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就不容易建设起来。所以，全体参加祖国建设的部队都要努力，铁道兵更要加倍努力，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美好，使祖国的人民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为了建设祖国，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政治、文化和技术。我们的劳动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祖国和人民，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有了这样的政治觉悟，有了这样的政治信仰，就能够不怕任何困难，不讲究个人的享受，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心中想到的只有祖国建设的伟大事业和美好前景。我们所讲的政治就是以这些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我们需要学习的也正是这样的政

治。我们还要学习文化，技术兵种的指战员没有文化是不行的。没有文化，有了书报不能看，有了新式的机器不会用。有了文化，就可以学习各种科学技术。我们的社会是天天进步的，我们也应该天天进步。这就需要学习，不学习就会落后，就不能跟社会一道前进。

为了建设祖国，我们还要加强军内外的团结。我们有团结一致的光荣传统，过去在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战斗，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今后还要在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团结战斗，争取更大的胜利。你们首先要同当地人民团结好，保持军民团结的光荣传统，依靠人民的帮助，取得各项工作的胜利。同时，你们部队同部队之间要团结好，同铁道工程局、铁道建筑工程队也要团结好。参加铁路的部队同地方职工要互相竞赛、互相鼓励，把铁路修建好。

同志们！你们过去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事业中，表现了伟大的集体英雄主义精神，今后还要继续发扬这种集体英雄主义精神。我们军队里有千千万万的英雄和模范，这些英雄和模范体现的是集体英雄主义，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是我们反对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离开了群众的支持能够做出什么事情来的。历史的伪造者所宣传的那些脱离群众的“伟大的英雄”，都不过是骗人的谎话，事实上并不存在。古时候有一些人崇拜那些“英雄”，那是因为他们受了剥削阶级的蒙骗，不大了解这个真理。我们的英雄同那些“英雄”不一样，我们的英雄、模范都是依靠集体的力量和广大群众的力量完成了任务，才成为英雄、模范的。比如打仗，当然要有好的领导、好的指挥员，可是，如果没有每个连队、每个战士团结一致地英勇战斗，那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如果天天打败仗，那还有什么英雄呢？我们军队所以能够打胜仗，就是大家团结一致、集体努力的结果。所以我们反对个人英雄主义，提倡集体英雄主义。

同志们！你们当了英雄、模范以后，千万不要忘记别人的功劳。假如忘记了别人的功劳，把所有的劳动都记在自己帐上，就会骄傲起来，走到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道路上去。

我们这个集体出了英雄是光荣的，我们的英雄越多越好。别的单位出了英雄我们应当同样欢迎，同样高兴。社会主义单靠几个人怎能建设成功呢？到处的人们都努力劳动，到处都涌现出英雄、模范，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就会加快。

同志们！我们祖国的国土是非常广阔的，铁路还不多，必须修建更多的铁路，才能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是一个长期、艰苦而又光荣的事业，大家要下决心在铁道兵部队长期工作，把铁道建设当作终身事业，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全体英雄、模范、功臣同志们！希望你们在这伟大的事业中起带头作用、模范作用，继续保持你们的光荣，争取在今后的工作中得到更大的光荣。祝你们的会议成功，祝你们的事业成功。

拥护宪法，才能当家做主，过上幸福生活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丁玲

当我走进了会场，当我站起来讲话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心在战抖，在压制不住地激动。我要向大家，向全世界倾诉出我的比高山途重、比海洋还深的感受。这是多少年的辛酸，多少年的血泪，多少革命者献身的结果啊！许多熟悉的面孔在我的脑中涌现，许多熟悉的声音在我耳旁回旋。我看见农民，笑脸上挂着泪珠，沉重地说：“我做了几十年的牛马，现在才做上了‘人’。”工人们挥着拳头说：“我们再也不是臭工人，再也听不到老板骂我们：‘我能让你们活，就能治你们死。’我们已经是中国的主人。”老大娘告诉我：“打倒了地主，我翻了一个身，男女平等算又翻了个身，现在只差学好文化，翻第三个身啦。”还有白胡子老汉，他们住在休养所，他们说：“多奇怪的事啊！我们不能想的，不敢想的幸福都有了，哪一个夜晚，我都舒服地睡着了，可是又从梦里笑醒了。”我看见青年人，他们充满着欢欣，唱着“我们要和时间赛跑”，谈着怎样改革技术，提高产量、质量，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他们充满了劳动创造的信心。我们听到那守卫在遥远的祖国边疆的战士们的宣誓，他们全心全意地保卫着我们，保卫祖国的建设，保卫全世界人民所要求的和平。那些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也歌唱不尽，他们唱着：“天上星星颗颗亮，宪法条条记在心，民族一律都平等，团结成个大家庭。……”我看见湘西的一个苗民老太太，她宁愿自己担负家庭的主要劳动，把独生儿子送到民族中学去念书，她同我说：“要当家理事呀，没有文化行么？”中国少年儿童剧团的山青同志写了最动人的诗，他说：“……我开始读那些没有画的画，我开始想象一幅美丽的图画，在这幅画里，我们穷孩子穿上了新衣，在这幅画里，我们身旁坐着微笑的妈妈。终于一个伟大的人使我看见了，可是他并不是一幅纸上的画呀，它比我想象的画要美上千倍百倍，它就是我们正在建设的国家。……”这首诗替许多妈妈、孩子，替千万人说出了心中的话。这一切欢呼、赞颂，和坚定的誓言，都只为了一件事，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诞生。这是人民的宪法，它给人以尊严，给人以道德的标准，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崇高的感情，人在这里充实了，武装了，提高了，人懂得为什么去斗争。宪法是斗争的果实，但并不是表示斗争的结束。我们的争取新生活、反对旧生活的斗争是永远不能结束的。就在不久以前，我记得，在安徽黄山有一个摸山的老头，他是同悬崖绝壁、深山野林打了三十多年交道的人，牙齿都掉完了，他同我说：“共产党好，毛主席好，政府好，村里大家都过好了，可是咱们村上还有一个坏干部，是地主的走狗，混进了共产党，他不准我拆自己的房子，他欺压老百姓，他的余粮比谁的也多，可是卖给国家的很少。”也是在最近，在河北省一个村子里的我一个老熟人，他把写了几年的也不敢发的匿名信交给我，他说：“为什么杀了我兄弟的还乡团还在村子上洋洋得意呢？”同志们！这样沉痛的事情在我们国土上还有不少，我们得坦白地承认。人人有权利，人人就有义务。我是一个普通的作家，我同大家一样，同人人一样，都负有神圣的责任。我们拥护我们的宪法，我们就要遵守它，宣传它，和宪法所不允许有的东西作坚决的斗争。让我们大家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人民，为我们的宪法的实现，献出我们一切的力量吧！

人民的宪法万岁！中国人民的领导者—共产党、毛主席万岁！

为社会主义而奋斗
——1956年4月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的祝词

刘少奇

同志们：

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向出席和没有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中国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贺！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在我国农村中兴起了巨大的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接着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进入了高潮。这就是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着的极为广阔极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现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和文化事业的高涨。大家知道，全国的农民在农业生产战线上正在进行着空前未有的努力，为逐步地实现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的伟大计划而奋斗。在他们中间，出现了大批的农业劳动模范，他们团结着广大的农民群众，成为农业战线上的中坚。同样，在工人阶级中间，在工业战线以及其他经济战线和文化战线上，在各个工作部门的工作岗位上，也出现了空前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出现了大批的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他们发起了先进生产者运动，领导着广大的工人群众和知识分子群众，为又多又好又快又省地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而奋斗。你们就是工人阶级中间这些优秀分子的代表。

我国人民的共同目的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有强大的工业和农业、有高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和科学、文化、技术状况还是很落后的。因此，我们必须动员各方面一切可能动员的积极因素，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才能逐步地改变我们的落后状况，实现我们的伟大的历史任务。目前我国各个生产战线上的先进生产者，各个工作部门中的先进工作者，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种最积极的因素。这种因素应当受到我们最大的重视。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结底，是生产的历史，是生产者的历史。生产是永远处在发展变动的状态中的，新的生产技术不断地代替着旧的生产技术。因此，在任何时代，在任何生产部门中，总是有少数比较先进的生产者，他们采用着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创造着比较先进的生产定额。随后，就有愈来愈多的生产者学会了他们的技术，达到了他们的定额，直到最后，原来是少数先进分子的生产水平就成为全社会的生产水平，社会生产就提高了。如果有重大的生产技术的发明，就要引起生产技术的重大改革，带来生产的巨大高涨。因此，先进生产者是人类经济生活向前发展的先驱，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先驱。

但是先进生产者在旧的时代并不是经常受到社会重视的。恰恰相反，剥削阶级一般地是贱视生产者的。当先进生产者的创造有利于剥削者的时候，剥削者才利用这种创造。但是仍然常常为着“专利”而限制别人学习和利用这种创造，而当先进生产者的创造不利于剥削者，或者剥削者由于愚昧，而不能了解这种创造的价值的时候，这种创造和创造者就常常受到打击，受到压制。因此，在旧社会中，先进生产者的先进经验和各种发明创造的利用发展，总是受到各种限制的。社会主义社会跟过去的旧社会相反，它的主人不

是剥削者，而是生产的劳动者自己。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人禁止学习和利用先进生产者的先进经验，相反，它要求先进生产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要求其他的生产者认真地学习和利用他们的先进经验，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是同先进生产者的利益一致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解决这种矛盾的基本方法，就是通过劳动群众的自觉的努力，通过教育和批评的方式，不断地把落后提高到先进的水平。千百万劳动者在先进生产者率领下为消除落后而斗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前进的一种动力。正因为这样，先进生产者在我们的时代里才能发展成为如此强大的群众性的运动，才能在社会生活中居于如此光荣的地位。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劳动模范有三种作用，即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这就是说，在人民民主制度的条件下，先进生产者不但是人民群众的先驱，而且成了人民群众的核心，成了国家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重要纽带。先进生产者是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没有先进生产者，也就不可能有完全正确的领导。

同志们！你们聚集在这里举行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你们的会议受到党和政府的极大的重视，这个事实就是表示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在各条生产战线上的创造，支持全国的先进生产者运动；就是表示我们坚决同你们站在一起，要求全体工人阶级像你们一样地劳动；就是表示我们决心克服一切障碍，为把你们所已经达到的先进的生产水平迅速地变为全社会的生产水平，并且为继续前进到更高的生产水平而斗争。

为了发展先进生产者运动，为了使先进生产者运动达到这样的目的，需要先进生产者、普通生产者和生产的领导者三方面的共同努力。

每一个先进生产者应当坚持自己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生产定额，应当为普及自己的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定额而斗争。先进生产者不只是为了要保持自己的先进，而且要努力促进别人由落后达到先进。因此，先进生产者必须用一切方法帮助和教会别人，并且不断地争取更加先进。仅仅依靠一时的先进不能保持永远的光荣，而骄傲自满只能促成自己的退步。唯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努力，才有可能不断地前进。

每一个普通生产者应当向先进生产者学习，向先进生产者看齐，迅速地把一般的生产水平提高到先进分子的水平。这是完全可以做到而且是必须做到的。试问，既然是先进生产者已经做到的事，具有同样条件的别的生产者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既然是先进的单位已经做到的事，具有同样条件的别的单位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很明显，拒绝向先进生产者看齐的人们没有什么理由可讲，有的只是一种得过且过的惰性，这种惰性的实质不是别的，就是要保持生产的落后状态，保持我们国家的落后状态。因此，我们必须批评那种不积极赶上先进者、用种种借口替自己的落后辩护的人们，我们必须要求他们切实地改变这种态度。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尽快地把先进生产者的水平变为全社会的一般水平，从而尽快地把全社会的生产推向前进。

每一个生产的领导者应当坚决地支持先进生产者的运动，支持每一个有实际意义的先进经验和创造。这就是说，第一，他必须详细地鉴定、研究和总结先进生产者的先进经验，以便确定它是可以推广和应当推广的，并且找出推广的有效的方法。第二，他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技术措施和组织措施，例如组织先进操作的表演、传授和训练、改进原有的设备、劳动组织和操作规程，研究人们不愿意学习先进经验的经济上、技术上和思想上的原因，并

且加以消除，等等，以便实际地而不是空谈地推广这种先进生产者的经验。谁做的这些实际工作愈多、愈好，他在推广先进生产者运动方面所得的成绩也就愈大。诚然，这是一个艰苦的、细致的工作，但是一个害怕做艰苦细致工作的人，是不能够成为一个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的。

可惜在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中，这样的一种领导者还是有的，这些人具有我们所说的官僚主义的倾向。为了发展先进生产者运动，必须跟这种官僚主义倾向作斗争。

妨碍先进生产者运动的官僚主义倾向有几种形式。有一种人是实际上不满意或者反对先进生产者运动的。他们安于落后，把落后的技术和落后的定额当作先进的东西，或者是当作不能更改、至少是目前不能更改的东西。我们的不少的先进生产者已经跟这种人进行了斗争，用事实批判了他们的错误观点，使他们受到了教育，我们今后还需要继续反对这种倾向。还有另一种形式的官僚主义倾向。有这种倾向的人，口头上甚至主观上不但不反对先进生产者运动，而且是热烈支持的，但是他们满足于空喊，满足于一般号召，满足于给先进生产者发奖旗，写访问记，满足于让先进生产者当这种或者那种代表。他们很少认真地为先进生产者创造条件，使之不断前进；很少认真地研究先进生产者的经验，认真地推广这些经验，他们不努力使先进生产者运动由个别的先进生产者前进到整个的先进的车间，由个别的先进的车间前进到整个的先进的工厂，由个别的先进的工厂前进到整个的先进的行业，反而使先进生产者有忙于应酬、脱离群众、不能继续提高、渐渐变为落后生产者的危险。我们必须纠正这种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

官僚主义倾向还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表现，就是不关心职工群众的切身生活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和劳动者个人的利益应当是一致的，其中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合作社营企业的工人，国家机关中和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合作社的农民，他们的劳动是为着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同时是直接为着他们个人的利益。而国家的利益则是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是每个劳动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当然，把个人的利益跟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对立起来，离开生产的发展而追求生活的改善，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但是只注意增加生产，增加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而不注意增加劳动者个人的利益，也是不正确的。要求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个人的收入，改善个人的生活，这是完全正当的和必要的。只有这样，劳动者的积极性才会不断提高，先进生产者运动才能获得巩固的基础。但是现在有些企业和机关的领导者只是片面地注意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生产，却不注意按照可能和必要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改善劳动者个人的生活，对于在生产上、工作上有卓越成就的人们，也不注意给予充分的奖励。这种倾向，无疑是必须坚决纠正的。

只有坚决依靠先进生产者、普通生产者和生产领导者的共同努力，只有坚决克服领导工作中的各种官僚主义倾向，并且正确地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把它们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使先进生产者运动得到普遍的持久的发展，才能使我国的生产水平和科学、文化、技术水平在这一基础上不断地提高。

同志们！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制度的国家，在我们的国家里，一切工作都必须贯彻执行依靠群众的路线，都必须依靠由上而下的方法和由下而上的方法相结合。离开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离开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任何

少数人的领导都不会是正确的、有效的和巩固的。反过来说，只要我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中密切地依靠群众，我们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在我们的前面摆着一个最困难的任务，这就是要把一个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很落后的六亿人口的大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完成这个任务，就会使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极大地加强起来，就会使世界和平极大地巩固起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们全体先进生产者代表和我们同样担负着巨大的、光荣的责任。我们希望你们每一位代表，你们所代表的每一位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以及农民、手工业者、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和其他爱国人民中的每一位先进分子，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都能够密切地联系群众，带领群众不断地向先进的水平看齐，不断地前进再前进，那么，我们大家就一定能够完成我们共同的历史任务。

我们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胜利万岁！

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中国工人阶级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全国青年团结起来，用艰苦的劳动建设伟大的祖国
——1957年5月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邓小平

亲爱的代表同志们：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从一九四九年成立以来，到这次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已经八年了。这八年当中，青年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我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积极参加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青年团在自己的工作中，表现得不愧为祖国的优秀儿女的旗帜，不愧为党在各个战线上的有力的助手。现在，我们的祖国，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青年运动也将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作为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的一项标志，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将要在现在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你们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用共产主义青年团来作为我们这支青年先进队伍的名称，不只是给全体青年团员带来了巨大的光荣，而且也在中国青年的肩上放上了更为繁重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一代，团结全体青年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以便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同志们，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长时期的任务。这个任务绝不比过去的革命任务来得容易和轻松一些，必须了解，我们国家原来的经济落后，广大人民的生活还是贫苦的，而帝国主义还在包围着我们，我们的困难还是很多的。我们如果不能把全国人民都团结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最充分地发挥起来，克勤克俭，艰苦奋斗，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在这个艰巨的任务面前，我们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一定要以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同党一起站在这个伟大斗争的最前列，密切联系全体人民群众和青年群众，在不同的岗位上进行长时期的艰苦的奋斗。

同志们，为了创造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没有极艰苦的劳动，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参加劳动，特别要积极参加工农业生产的体力劳动，因为体力劳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最大多数人民都要担负的光荣义务，轻视体力劳动的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是我们的新社会前进的障碍物。我们的青年团员要不愧成为共产主义的先进战士，就一定要向轻视劳动，特别是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作斗争，而且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带动广大青年群众投身到体力劳动的战线上去。我们要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战线上一支值得人民信任的突击力量。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里向工农业生产战线上的全体青年男女表示敬意。他们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急先锋，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创造者。我们希望他们用更大的努力增产节约，希望他们更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们希望全国的青年学生努力学习，积极准确参加建设祖国的生产劳动，首先是体力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青年，也应该经过一段时间的体力劳动，这对于他们的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发展是必要的。青年团的干部如果没有必要脱离生产，就应该不脱离生产；如果是必须脱离生产的，也应该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体力劳动，这对于联系群众和锻炼自己，都有很大的益处。

为了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全体团员，就需要不断地努力学习。我们要结合建设祖国的实践，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克服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其他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我们要努力学习各种劳动的本领，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青年团员必须带动广大青年，尊敬年长的一代，从他们那里学会各种有用的本领。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助手，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还必须学会怎样把最广大青年群众团结起来一道前进。我们不只要善于团结先进的青年，而且还要善于把一切爱国的青年、包括还不赞成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爱国青年，都团结起来，共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共产主义青年团应该克服自己队伍中任何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的倾向，努力使自己成为中国全体爱国青年的知心朋友和核心力量。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特别提倡谦虚，反对骄傲自大，就要要求每一个青年团员努力去帮助别人，而不要怕自己吃亏。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同志们，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虽然是十分艰巨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深信，青年团员和中国全体青年必然能够克服自己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光荣任务。这是因为，中国青年不仅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爱国人士的关怀，而且有自己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斗争和近年来的建设工作中，中国青年已经有了良好的表现。他们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吃苦，热爱劳动，遵守纪律。我们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不仅要把这个光荣传统继承下来，而且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它大大地加以发扬。应该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的顺利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一代，是朝气蓬勃的，但是也有弱点。这就是他们中间不少人往往把事情看得很容易，往往害怕困难，不愿吃苦耐劳，或者在改善物质条件方面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但是，这不能责备青年，而在于党和团对他们的工作还做得不充分。只要我们在今后进一步改善对青年的思想工作，把国家的真实情况和达到美好的将来的必由之路清楚地告诉他们，在全体青年中间发扬艰苦奋斗的正气，反对自私自利的歪风，并且努力纠正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帮助广大青年自觉地克服自己的弱点，勇敢地、愉快地迎接自己的战斗任务。

同志们，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在这个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中，青年团员的模范行动和创造精神将起重大的作用。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史上写下青年们的光辉的一页，我们就一定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戒骄戒躁，克勤克俭，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用艰苦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学习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经验，我们要学习世界各国人民的长处。我们要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人民团结在一起，我们要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团结在一起。

用艰苦的劳动建设我们的祖国！

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科学和文化！

全中国的青年大团结万岁！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青年大团结万岁！

继续献身现代科学
——1957年12月在诺贝尔奖庆贺会上的演讲

杨振宁

陛下，殿下，
女士们和先生们：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诺贝尔基金会和瑞典科学院对我和我夫人的热情款待。我还要特别感谢卡尔格恩教授，他的引述和他引用的一段中文使我听了感到格外亲切。

诺贝尔奖是一九〇一年设置的。就在同年发生了另一件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这个事件后来时我个人的生活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并有助于联系到我现在参加一九五七年诺贝尔盛会。承蒙诸位惠允，我将花几分钟讲一下这个事件。

上世纪后半叶，在西方日益扩大的经济和文化影响的冲击下，中国面临一场激烈的论战。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到底应该吸收多少西方文明。然后，争论尚未得出结论，感情便代替了理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人们结伙办起了义和团，英文叫做 Box-ers，他们声称能以血肉之躯抵挡住现代武器的攻击。他们采取了盲目和不理智的举动反对在中国的西方人，并成为一九

零一年欧洲多国和美国军队入侵北京的导火线。这就是义和团战争，一场野蛮杀戮和无耻掠夺的战争。归根结底，这个事件是由于在遭受到外部日益加深的压迫和内部日趋衰落腐败的情况下，自尊的中国人民愤怒而无奈情感的爆发所引起的。从历史上看，这一事件也一劳永逸地平息于关于中国应该吸收多少西方文明的争论。

那场战争于一九〇一年结束，当时签订了一个条约，条约中有一款规定中国要向列强赔偿共约五亿盎司的白银，这在当时是笔惊人的数目。大约十年以后，作为典型的美国式的友善表示，美国决定把自己的那一份退还给中国，用这笔钱设立一个基金，由基金拨款筹建一所大学，就是清华大学，并为去美国深造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我是这两项计划的直接受益者。我父亲任清华大学教授，我就生长在这幽僻的、学术空气浓厚的清华园里，愉快地度过了我宁静的童年。这是绝大多数我这一代中国人不幸所不能享有的。后来在这同一所大学里，我受了二年极好的研究生教育，尔后又得到上述基金提供的奖学金，去美国继续深造。

今天，当我站在这里和大家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深深地意识到，广义来说，我是既调和又抵触的中西方文化的产物。我愿意说，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同样，我为能致力于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源出于西方的现代科学而感到自豪。我已献身于现代科学，并将竭诚工作，为之继续奋斗。

怎样办好学校

——1960年2月在暨南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陶铸

大家热烈欢迎我，我又高兴，又耽心，耽心如何办好学校，不禁涌现两种心情。

这所设在广东的大学叫暨南大学，主要收华侨学生，沿用以前的名字。过去它设在上海，是华侨办的。现在暨大的学生，有华侨、侨眷、港澳同胞，也有国内各阶层的子弟。

为什么要我做校长，我是这所大学的支持人。决定办这所大学是党的决定，我是省委书记，任校长主要是挂名，但是一定要把暨大办好。

怎样把学校办好？

办好学校要在两方面努力：一方面是领导和教职员；一方面是学生。把学校办好，大家都有责任。我认为学校一定会办得好，因为我们有比旧社会办得好的重要条件。当然，我们是新办学校，困难很多，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帮助学校来克服困难，困难就容易克服和解决。

关于学校方向问题。暨大是综合大学，文理并重。初步计划到一九六二年要有四千学生，达到这样便初具规模。师资从各校再支援些，主要是靠自力更生。

要办好学校，首先，就要把书教好。学生要学好，师资要强，光是老先生不行，因为老先生虽有经验，但没有这么多，因此要提拔新生先，新的有新的好处，容易吸取经验，年轻力壮。因此教书要教得好，一面靠老，一面靠新，两方面结合。不管是新的老的，谁教得好，便是好教师，要名副其实。不管黄猫还是黑猫，只要能吃老鼠便是好猫。从这次检查教学质量情况看，有些学校对教学质量好坏是不关心的，认为只要参加劳动就行了。学校应当以教学为主，给学生以一定知识。大学就要有大学的程度，要完成大学的课程，而且要学得好。理发店不理发，怎么叫理发店？学校不把学生教好，怎么叫学校？学生学习不好，怎么叫学生？因此，学校主要应把教学搞好，很好地完成学校课程，质量要高。从学校领导来讲，应把学生教好。从学生来讲，主要靠自学，因为大家都是大学生，都是高中毕业。年龄大些，理解能力强些，应有相当的自学能力。这也是两方面结合。从学生自己方面来讲，先生讲得不够，可以通过讨论来解决，可以多看看书，多做些实验，精力集中些。过去我们读书真不容易，担心学费问题。劳动人民的子弟要读大学真困难，现在大学有助学金。过去读大学是一边读书一边到处找工作，毕业就是失业，现在你们只要努力把书读好就行。学校办不好，学生质量差，就不是好学校，因此，学生学好，教师教好，完成学校的课程，质量较高，是很重要的。这是决定学校办得好不好的首要问题。

培养好的作风也很重要。特别是新办校，首先要建立好的作风。好的作风便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学校办得好，有好的校风，学生不仅学习好，而且思想觉悟高，政治觉悟高，到了社会上就受欢迎。这样，大家都会爱惜这种荣誉，就会形成无形的力量，无形的监督，使得差的也被迫向好的看齐。要树立这种作风，便要大家有崇高的理想。理想不是幻想，不是野心，是为社会主义作番事业，多发一分热，多发一分光。我们要有抱负，眼光要远，能

吃苦，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献出力量。人有了伟大的理想，有了奋斗的目标，生活才有意义。特别是每个青年人都应有崇高的理想。最可怕的是暮气沉沉，计较个人生活，失去远大目标。物质生活会不断改善，但不要斤斤计较物质生活，天天为物质生活苦恼，当物质的奴隶。我们应该相信，社会生产提高了，个人生活水平就会提高。在目前，我们可以吃饱、穿暖，在这种条件下，展开我们广阔的丰富的精神生活。这样，有了理想，就朝气蓬勃。如斤斤计较，就不开朗。我们国家在一天天前进，但还落后，大家还要吃点苦。现在猪肉少，一定会多起来的，会有一天吃不完。我们每个青年不要为困难所吓倒和苦恼，心情开朗比每天吃半斤猪肉还重要。我们国家是要考虑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物质是第一的，我们要驾驭物质，要支配物质，不当物质的奴隶，不为个人生活而苦恼。只要有远大理想，一切都能解决。我们社会没有剥削，只要把工作搞好，生产搞好，物质生活就一定能够提高。许多先烈牺牲，就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邓中夏家里很富有，但他坚决为革命献出生命。看一个人品德高不高，主要是看他自私不自私，主要是看他如何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如果一个人始终考虑集体的利益，不为个人打算，这个人的品德就是高尚的。什么人才是伟大的？就是那些能全心全意为了集体，为了工人阶级，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把个人利益压到最低程度的人。我们说的理想就是要建筑在这上面，我们这所大学，要用这种崇高的理想来武装学生，讲清道理，领导要以身作则，老的学生要为新同学做出榜样。每个人有了崇高理想，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心情是开朗的，活泼的，朝气蓬勃的，身体是好的，那我们学习就有了保证。同时伙食要搞好。一方面，要有理想，要有丰富的精神生活，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另一方面，伙食要搞好，卫生也要搞好。要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总之，学校要培养学生有远大、崇高的理想，丰富的精神生活。考虑大的问题。我们六亿人民都有这个理想。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就一定能实现。

开展少数民族文艺活动，促进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
——1964年11月在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上的讲话

陆定一

同志们，朋友们：

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今天开幕了。参加这次演出的，有五十三个少数民族。这样的观摩演出，全国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我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祝贺这次观摩演出的开幕，并向各民族业余演员同志们和群众业余文化工作者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们同来自边疆和內地的五十三个少数民族的文艺工作者们聚会一堂，不能不引起我们想想过去，想想将来。

过去，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压在我们头上的，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那时候，汉族的劳动人民，过着牛马一般的苦日子，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过的日子更苦。

帝国主义为了达到侵略我国的目的，企图把东北、内蒙、新疆、西藏、台湾等从我国分裂出去，利用少数民族里的败类当他们的傀儡。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少数民族，又采取绝灭人性的剿灭政策。例如，黑龙江的赫哲族，原来有三千人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十多年，只剩下三百多人了，如果不是全国解放，赫哲族很难免于绝灭。

蒋介石国民党，根本不承认我国的少数民族，公然宣布汉族以外的各民族只是不同的“宗族”，或者不同的“宗教”。蒋介石国民党、汉族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对少数民族实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在这种反动的统治之下，少数民族处于无权地位，有的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

在少数民族内部，阶级压迫也是很残酷的。例如四川凉山彝族，过去是奴隶制度的社会，西藏，过去是农奴制度的社会，那里的奴隶主、农奴主，对劳动人民实行非常残暴的统治，他们有权任意杀死劳动者，有权把劳动者当作牲口一样出卖或者赠送给别人，另外有些少数民族，如佤族、独龙族、怒族、鄂伦春族等，解放以前还有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生产力很低。

一九四九年，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汉族和一切兄弟民族的劳动人民，才得到了解放，得到了新生。

解放以后，我国少数民族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充分享受了民族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成了国家的主人。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民主革命运动，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农奴主阶级，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彻底废除了封建和奴隶制度，废除了宗教中封建压迫剥削制度和封建特权。在民族改革胜利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到现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除了西藏以外，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辉煌成就。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内蒙古、新疆、宁夏等自治区的粮食生产几年来一年比一年增长，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以来，连续六年大丰收。不少地方的粮食产量比民主改革以前增长了一倍到几倍。少数民族地区牧业生产一直是稳定增长，内蒙古自治区牲畜总头数为三千九百九十二万

头，比一九四七年底的八百多万头增加了将近四倍。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工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国家在内蒙古地区建立了包头钢铁联合企业，在新疆建立了克拉玛依油田。中小型工业企业遍布各地。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大大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公路四通八达，有些地区通了火车，还有些地区开辟了航空线。少数民族工人阶级队伍和干部队伍都迅速成长起来了。随着各项生产的发展，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也有了显著的改善和提高。少数民族人口也兴旺起来。像赫哲族，从解放到现在，人口已增加了一倍多。文化艺术，也遵循着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逐步发展起来，专业和业余的文化活动都有不同程度的开展。它们配合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任务，在团结、教育少数民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胜利，奠定了少数民族繁荣昌盛的基础。各民族平等团结、友爱互助、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民族关系，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也形成和发展起来。“不想过去苦，哪知今日甜”，新旧两种社会、两种制度的鲜明对比，更加清楚地看出，十五年来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民族工作的伟大成就，是史无前例的。这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的优越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

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有阶级斗争的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同民主革命不同。民主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一点，我们已经做到了。社会主义革命，也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但是，这个革命的主要任务，是要反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剥削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首先就要在思想上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

现在，我们正在文化战线上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资产阶级思想正在腐蚀着我们，有些人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倒退到资本主义制度去。但是，事实上，在我国实现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倒退的结果，只能是把中国各民族人民拖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里去，把我国少数民族人民拖回到封建主、农奴主、奴隶主反动统治的深渊里去。国内外的敌对势力都希望在思想上溶化我们，希望在我国出现资本主义的复辟。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还会长期进行下去。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还是不够的，还要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经济战线上取得了胜利，还不够，还要进行文化革命，在文艺战线、思想战线、教育战线等方面，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文化革命的主要内容，就是劳动人民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劳动化。

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各有不同的情况。不少地区，已经进到社会主义制度，那里的任务，就是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另外一些地区，民主革命还没有彻底完成，那里的任务，就是要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然后前进到社会主义。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处于同帝国主义、国内外反动势力斗争的前哨，斗争是很尖锐很复杂的。这种阶级斗争，不能不强烈地反映到少数民族的文化工作、少数民族的群众业余文化活动中来。

少数民族的旧文化旧艺术中，有反映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劳动等积极健康的精华部分，也有反映奴隶主、农奴主、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糟粕部分。有些地区还有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方面来的

反动、腐朽文化的影响。反动的文化艺术，是国内外阶级敌人利用来毒害少数民族人民，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封建制度甚至奴隶制度复辟的工具。因此，在全国进行文化革命的运动中，少数民族的文化革命运动也必须积极开展起来。少数民族的文化革命，也是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劳动化；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进行阶级斗争，通过斗争，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使文化艺术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这就要求少数民族地区的一切文化艺术活动，包括业余文化活动在内，必须具有革命的思想内容。文化艺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上层建筑要适合经济基础。少数民族人民迫切要求具有新思想、新内容的革命的文化艺术。各族文艺工作者，应当适应这一要求，努力发展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新文艺。

少数民族的革命的文化艺术，必须注意运用民族形式，这样就更能对少数民族人民所接受。各民族的文化艺术，在内容上都必须是健康的，爱国的，热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这个大家庭。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一致，只能一致。但是，在民族形式、民族风格、民族特点这一类问题上，各民族又是各不相同的，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不一致，也不必一致。当然，在社会主义祖国里，各民族的文化又应当互相吸收，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使它们成为祖国各民族的共同财富。这次观摩演出，就是各民族文艺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大会。

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活动，大量都是业余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优点，应当保持和发扬。参加这次会演的文艺工作者，自己本身又是劳动者，这种又会劳动又会从事文艺活动的人，是最好的文艺工作者，这个优点，也要保持下去。毛主席告诉我们，人民的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用自己的文学艺术的武器，为工农兵服务，同时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现在我们专业的文学艺术队伍中最难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而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艺。你们是业余的文艺活动积极分子，不脱离生产劳动，不脱离人民群众，既是普通劳动者，又是群众艺术家，和劳动人民生活、劳动、斗争在一起，和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这个根本方面，你们比那些专业的文学家艺术家要高明得多。将来的文学家艺术家就应当是你们这样的人。这当然不是说专业文化事业建设不重要。不是的。专业文化事业，应该发展的仍然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但是专业文化事业，也应当面向广大劳动人民。专业的文化工作者，应当革命化，应当劳动化。

文化革命，必须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依靠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文化艺术这个阶段斗争的武器，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就可以发挥出巨大的革命力量。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坚决贯彻党和毛主席所制定的社会主义的文艺方针。我们从事文艺活动的人，一定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千条万条，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条”。有了这一条，少数民族革命的文化艺术一定能够开出茂盛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

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全国各族专业和业余文化艺术工作者紧密团结起来，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沿着毛主席所指示的方向，把我

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我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祝观摩演出大会成功！

祝同志们身体健康！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邓小平

同志们：

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我们大家感到非常高兴，全国人民感到非常高兴。今天能够举行这样一个在我国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就清楚地说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科学技术工作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怀。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积极开展科学实验活动。青少年中，出现了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的新风尚。一个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正在全国迅猛兴起。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光明灿烂的前景。

出席这次全国科学大会的，有来自各条战线的优秀科学技术工作者，技术革新能手，科学种田的模范，忠诚于党的科学事业的干部。你们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科学技术的进步，辛勤劳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代表中共中央向你们表示感谢和敬意。

同志们！

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围绕着要不要四个现代化，我们曾经同“四人帮”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四人帮”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他们真是要搞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吗？不，完全相反，正是在他们势力最猖狂的一些地方，社会主义遭到严重破坏。“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从反面使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到，在无产阶级的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我们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越是现代化，我们同破坏社会主义的势力作斗争就越加有力量，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越加得到人民的拥护。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才能更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付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和颠覆，也才能比较有保证地逐步创造物质条件，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前进。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党中央决定召开这次全国科学大会，目的就是动员全党全国重视科学技术，制订规划，表彰先进，研究加速发展科学技术的措施。今天，我就有关的几个问题讲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对科学技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四人帮”曾经喧嚣一时，颠倒是非，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

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大家知道，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科学技术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什么关系呢？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我们常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人们使用的生产工具，掌握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都大不相同。今天，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生产设备的更新，生产工艺的变革，都非常迅速。许多产品，往往不要几年的时间就有新一代的产品来代替。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我们的社会里，广大劳动者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自觉地刻苦钻研，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从而必将在生产中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连带要答复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么，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

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脑力劳动者。有些人是完全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们同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处在对立的地位。但就在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如同列宁所说，尽管浸透了资产阶级偏见，但是他们本人并不是资本家，而是学者。他们的劳动成果为剥削者所利用，这一般是社会制度决定的，并不是出于他们的自由选择。他们同那些绞尽脑汁直接为反动统治阶级出谋划策的政客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曾经指出，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这就是说，他们也是受资本家剥削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与历史上的剥削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同了。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过，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一个依附在哪张“皮”上的问题。在

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中，只要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知识分子就需要注意解决是否坚持工人阶级立场的问题。但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四个现代化的进展，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将逐步被机器所代替，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体力劳动会不断减少，脑力劳动会不断增加，并且，越来越要求有更多的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四人帮”把今天我们社会里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歪曲成为阶级对立，正是为了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破坏社会生产力，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我们既然承认了这两个前提，那么，我们要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大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当然就不能不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和科学教育事业，大力发扬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科学技术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在旧中国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这个伟大成就是谁也不能否定，谁也无法否定的。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还很大，科学技术力量还很薄弱，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耽误了我们很多时间。

我们现在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什么状况？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在这方面不用说落后一二十年，即使落后八年十年，甚至三年五年，都是很大的差距。

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在科学技术方面，我国古代，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成就，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进步起了伟大作用。但是我们祖先的成就，只能用来坚定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心，而不能用来安慰我们现实的落后。我们现在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造，同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

如实地指明这种落后状况，会不会使人们失去信心呢？这种人也可能有。这种人是连半点马克思主义气味也没有的。对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认真地去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才能够正确制订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才能够更加激励我们奋发图强，尽快改变这种情况；也才能动员人们虚心学习，迅速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

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中国的革命，吸引着世界各国革命人民，与之共呼吸。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已得到并且必将进一步更广泛地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和支持。我们要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科学界的友好往来和合作关系。对于一切在科学技术上帮助过我们的国际朋友，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

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

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又红又专要有正确的理解，合理的要求。

“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典型。这种是非关系、敌我关系的颠倒，一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

毛泽东同志提倡知识分子又红又专，鼓励大家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我们的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

二十八年来，我们的科学技术队伍，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确有很大的进步。绝大多数科学技术人员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努力同工农兵相结合，满腔热情地对待自己从事的科学技术工作，做出了成绩。甚至在林彪、“四人帮”那样迫害和摧残知识分子的时候，广大科学技术人员也没有动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科学技术工作。许多人在同“四人帮”斗争中表现出很高的觉悟。“四人帮”被粉碎后，他们迸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衷心拥护党中央，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更加奋发努力工作。这样的队伍，多么难能可贵！这样的队伍，就整个说来，不愧是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

我们作这样一个估计，当然并不是说，科学技术人员政治思想觉悟都很高了，在思想上、作风上、工作上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了。而是说，从政治立场这个基本方面来看，绝大多数科学技术人员应该说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的力量。当然，他们不应该自满，不能就此停步不前，而要继续努力，在政治上、业务上都要不断求得新的进步。至于他们身上还存在着的缺点错误，那是教育、帮助的问题，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没有缺点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我们这些人，我们的政治工作干部，我们参加党几十年的老干部，不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吗？为什么对这些业务干部、技术专家却要特别苛求呢！对于科学技术人员中出身不好、历史上犯过错误或家庭、社会关系有问题的人，我们应当着重看他们自己的基本政治态度，看他们自己的现实表现，看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贡献。

在科学技术人员中，也有一部分人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

或者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比较深，在尖锐、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常常摇摆不定。对于他们，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也要团结教育他们，发挥他们的专长，尊重他们的劳动，关心和热情帮助他们进步。毛泽东同志向来主张革命队伍的人越多越好，向来主张尊重那些有知识、有专长、有贡献的人，向来主张对犯过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而不是嫌弃他们。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实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教导。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都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没有转过的人来说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不断改造，研究新问题，接受新事物，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更好地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科学技术人员应当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工作上去。我们说至少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也就是说这是最低的限度，能有更多的时间更好。如果为了科学上和生产上的必要，有人连续奋战七天七夜，那正是他们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忘我精神的崇高表现，我们对于他们只能够学习、表扬和鼓励。无数的事实说明，只有把全副身心投入进去，专心致志，精益求精，不畏劳苦，百折不回，才有可能攀登科学高峰。我们不能要求科学技术工作者，至少是绝大多数科学技术工作者，读很多政治理论书籍，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开很多与业务无关的会议。林彪、“四人帮”动不动就用“脱离政治”的罪名来打击科学技术人员，谁要是努力钻研业务，就会被扣上“白专”帽子。白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怎么能把努力钻研业务和白扯到一起呢！即使是思想上作风上有这样那样毛病的科学技术人员，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不能称为白。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为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辛勤劳动，怎么是脱离政治呢？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分工的，各行各业的同志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的条件下，努力做好自己的岗位工作，这不但不是脱离政治，而且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前几年，林彪、“四人帮”搞得工人不能做工，农民不能种地，解放军不能练兵，学生不能学习，科学技术人员不能钻研业务，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多么重大的损失！这个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我们还要在努力提高现有科学技术队伍的水平、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的同时，大力培养新的科学技术人才。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们的科学技术队伍发生了青黄不接的现象，这就使加速培养年轻一代的科学技术人才的任务更加迫切了。

我们培养、选拔人才，有广阔的源泉，有巨大的潜力。最近，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发现了一批勤奋努力的、有才华的优秀青少年。看到他们的优异成绩，我们都感到高兴。尽管“四人帮”猖獗一时，但是，他们没有能够扑灭广大青少年的学习热情，没有能够扼杀广大教师为党为人民精心培育下一代的革命积极性。今天，党中央这样关注科学和教育事业，这样着力于培养选拔人才，我们可以预见，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科学的未来在于青年。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

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我们要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端正方向，真正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大的提高。教育事业，决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来支持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人民教师是培养革命后

代的园丁。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应该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要确实保证教师的的教学活动时间，要关心他们的政治生活、工作条件和业务学习。对于在教学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应该给以表扬和奖励。

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这是被“四人帮”搞乱了一个重大问题。他们把有贡献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诬蔑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把我们党和国家培养成长的优秀中年青年科学技术人员，诬蔑为修正主义苗子。我们要彻底清除“四人帮”的流毒，把尽快地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作为我们科学、教育战线的重要任务。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就说过：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革命事业需要有一批杰出的革命家，科学事业同样需要有一批杰出科学家。我们工人阶级的杰出人才，是来自人民的，又是为人民服务的。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才能不断涌现出杰出人才。也只有有了成批的杰出人才，才能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

我们的科学家、教师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就是对国家的贡献。在科学史上可以看到，发现一个真正有才能的人，对科学事业可以起多么大的作用！世界上有的科学家，把发现和培养新的人才，看作是自己毕生科学工作中的最大成就。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的国家现在一些杰出的数学家，也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被老一辈数学家发现和帮助他们成长起来的。尽管有些新人在科学成就上超过了老师，他们老师的功绩还是不可磨灭的。

第三个问题，讲讲在科学技术部门的各个研究所中，怎样实现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

能不能把我国的科学技术尽快地搞上去，关键在于我们党是不是善于领导科学技术工作。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工作作风都应该有相应的转变。各级党委要真正做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一起抓。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做到在技术上、生产上不断有新创造和新纪录。全国有几十万个企业、几十万个生产大队，只有每个企业和生产大队都来大搞技术改造，大搞科学实验，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广泛地在工农业中得到应用，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同时，又要大力抓好专业科学研究机构的工作。专业的科学研究队伍，是科学工作的骨干力量。没有一支强大的高水平的专业科学研究队伍，就难以攀登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峰，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也难以持久深入地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我们一定要把专业队伍同群众队伍结合起来。

中央规定，科学研究机构要建立技术责任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这是重要的组织措施。它既有利于加强党委的领导，又有利于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

科学研究机构的基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要出又多又好的科学技术成果，出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人才。衡量一个科学研究机构党委的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准，也应当是看它能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个基本任务。只有很好地完成这个基本任务，才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真正尽了自己的责任。

要完成这个基本任务，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不可能所有这些事情都

由党委去抓，都由党委去解决。应当老老实实在地承认，在科学技术工作中，我们有许多东西还不懂。即使懂得，也不能事事都由党委来办。要有分工负责，要从上到下建立岗位责任制。这样，工作才能有秩序，有效率，才能职责分清，赏罚分明，不致拖延推诿，互相妨碍。

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同时，是通过计划来领导，要抓好科学研究计划，要知人善任，把力量组织好。为了实现科学研究计划，为了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还必须做好后勤保证工作，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这也是党委的工作内容。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愿意同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科学技术的业务领导工作，应当放手让所长、副所长分工去做。不论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专家，担负了行政职务，党委就应当支持他们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真正做到有职有权有责。他们同样也是党和国家的干部，决不应该见外，党委应该了解和检查他们的工作，但是不能包办代替。

许多事情，比如对学术论文的评价，科学技术人员业务水平的考核，研究计划的制订，研究成果的鉴定，等等，都应该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广泛倾听有关科学技术人员的意见。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自由的讨论。在科学技术工作中，认真听取专家的意见，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是使我们少犯错误、做好工作所必需的。这是我们科学研究机构党委实行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强调科学技术人员集中精力搞好科学技术工作，是不是减轻了政治工作的任务，降低了政治工作的要求呢？不是的。这是要求我们提高政治工作的水平，改进政治工作的方法，抛弃形式主义的东西，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认真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凡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要求和创议，就应该给以支持。对于那些追求个人私利，互相封锁，不搞协作，甚至垄断、剽窃等等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错误思想和作风，应该进行批评教育。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就应该是使每个科学技术人员都了解他所从事的科学技术工作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的关系，鼓舞和动员他们以革命的精神，和衷共济，大力协同，努力攻克科学堡垒，攀登科学高峰。

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虽然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应该承认，怎样科学地组织管理和领导好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事业，我们面前还有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不改变这种情况，就很难取得大的成就，就不会有主动权。毛泽东同志曾教导我们，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能长期安于当外行，要钻进去，逐渐成为内行。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政治水平，又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研究和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客观规律，全面地正确在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我们党能够领导人民推翻剥削制度，改造社会，也一定能够掌握科学技术工作规律，领导我国人民攀登世界科学高峰。

路线是非基本澄清了，规划制订了，措施提出来了，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现在，摆在我们各级党组织面前的事情，就是要鼓实劲，要切实解决问题，要踏踏实实地工作。一句话，就是要落在实处。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

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

同志们！

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相继召开，充分显示了全党的大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我们这次全国科学大会也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党中央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朝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祝科学兴旺发达！祝大会圆满成功！

创作需要民主

——1979年1月在粉碎“四人帮”后
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诗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艾青

我已经多年没有出席过这么隆重的会了。像这么一种阵势不得不使我感到紧张。我有一个朋友叫胡明树，他也是二十多年没出席会议了，一开始就兴奋，就紧张，当时就昏倒了，马上送到医院，很快就死了。

今天，有这么多诗人出席这次座谈会，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到会的诗人中从“五四”到如今，老、中、青三代齐聚一堂，我听了大家的发言，受到了多方面的启发。我想每一个带听觉来的人，都会感到有收益。

前几天我在会上已讲了一些话，那么，今天大会发言就可能有些重复。本来，大家让我讲讲形象思维。大家都是诗人，讲形象思维是班门弄斧。我倒想讲讲创作民主的问题。这或许是当务之急。

总理在一九六一年讲咱们民主作风不够。这个问题提得好。当然，今天的民主作风和一九六一年相比，已有了进步。

总理还提到，只使一人言，不便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吗？这句话，百分之百正确。我认为：天下绝不应有此事。蓝色苍穹之下，绝无此理。

几年来，有一种做法：被认为说错一句话，就有人打棍子，似乎有一种固定的框框。我并不一般地反对框框，办任何事总要有个框框，但不能随便打棍子。还有人爱抓辫子，诗人是激情的“白发三千丈”，抓辫子太容易了。也有人爱扣帽子。帽子不能不戴，但不能乱戴。应当有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空气。

搞创作，不能有划一的格式。因为文艺创作是一种形象思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路，不能强求一律。过去，有时一个人说了算，说什么：“我不喜欢。”那么，我可不可问你：“你算老几？！”这话不好听，但很纯朴。

讲了半天百花齐放，“文革”期间却一花独放。一些条条框框把人们束缚住了。我主张要有创作自由，也要有批评自由，但不能用政治代替艺术。少数人不能独霸文坛。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批评家比作家好当，似乎只要摇摇头，一个动作，就够了。有时一个人摇摇头，就造成十分紧张的气氛，这很不正常。要大家敢于讲话，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只在不违反基本原则。

周总理讲话快二十年了。十八年前发出的呼声，但这么多年，没照这样去做，却执行康生那一套，执行林彪、“四人帮”那一套，二十年过去了，多少人流了血，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我今天深感幸福，能站在这里讲话，我没想到。甚至我没想到过要离开新疆。我那时确实有终老在新疆的想法。

人民是疾苦的，这用不着隐瞒。许多地方生活很苦，受过痛苦的人，更懂得哪里有真理，什么是真理。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新诗。新诗创作有自己的历史。我是一九一年出生，九岁那年赶上“五四”运动，念小学时，就读“五四”时期的作品，如蔡元培、梁启超、孙中山的文章。还读过胡适的《尝试集》。他写的白话诗，那时影响很大。今天读起来淡而无味，有的诗比儿童诗还幼稚。当然，像孩子似的，从爬行到站起来并不容易。当时俞平伯、康白清也写诗。那时郭沫若的诗影响很大，我读他的《女神》、《凤凰涅槃》；我还读他的《瓶》，

这是一首充满感情的诗，重复句子很多。重复，无非是为了强调，有什么“一切的一，一的一切”。这是诗的历史，任何事物都有自己发展的轨迹。

我从小写诗，写了这么多年，有人说我的诗好，有人说是“大白话”。大白话没什么不好。说大白话比说“大右派”好。有的人写的诗四不像，古不古，洋不洋，帮腔帮气，主题先行。新年到了，要写新年献词；春节到了，要写春节献词；这算什么诗？

我们的新诗有一个传统——反帝、反封建。当然，还应看到，反了这么多年，还有买卖婚姻，结婚还要陪送几大件。

《天安门诗抄》选得很好，这些诗十分感人。读了这些诗，我曾说：我们没理由悲观。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诗竟起了那么大的作用，不知古往今来有没有？如没这些诗，“四人帮”会不会倒得那么快？也很难说。“四人帮”手中有权，张牙舞爪，你要虎口拔牙，谈何容易？有了诗，可看、可听。这也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结合，视觉与听觉相补充。总之，《天安门诗抄》为我们提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诗人要对当代提出问题，要与人民共思考，多提几个为什么。当然有危险，睡觉不危险，可平安无事，但你又要做事，又图平安，那怎么行？都像三十年代一些人“今天天气哈哈”，这绝对平安无事，但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自己的诗人称号。

我认为一个人要有敏感性，也要有主见。生活在世界上，处处充满矛盾。没政治敏感性不行。有人凭“天气预报”搞得手忙脚乱，谁上来就捧谁，谁下来就打谁。总之，要有政治上的坚定性，不要像投机商那样。应当和亿万人民站在一起，和人民一起思考，大事上不会错。如果连人民都不相信了，那就没办法了。

卞之琳想写建设性的诗，却挨了多少人骂。卞之琳经常像祥林嫂那样说：“我真傻。”这些年，搞得人们想干点好事总要担惊受怕。有人写《天安门四重奏》受了伤害，普天之下受伤害的人有多少啊！一些人简单地结束了生命，可是他们却找到了一个永久安全之处。

什么叫野心家？什么叫阴谋家？应有一个罪恶史陈列馆，可以把林彪、陈伯达以及“四人帮”的罪证都陈列在那里。康生他手上鲜血更多，全身可泡在血里，血染浴池。由于他们这些人搞文字狱，株连人之多，至今也没办法弄清。人太多了，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因读我的诗而判刑的已发现有五、六人。像康生这样的人，良心应受到审判！

诗人，应当讲真话，冯至发言中也谈到要讲真话，我很同意，但讲真话有危险。讲假话可以不出事，可以升官、发财，何乐而不为？

前几年是不能讲真话的。正派人讲了真话，说你是怪话，是放毒！是黑话。

前几年，人们都变聪明了。你问这话哪里听来的？答：上厕所听来的。而且从隔壁的妇女口中听来的。人的聪明，可适应各种场合、各种环境，可随遇而安。

一个人讲了错话，批评批评本是好事，可是前几年，批评变成判决。一个人，有一段时间没见报，人们就认为他出问题了。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问题，似乎关键是见报与否，只要见报，这个人就没问题，哪怕出席一次追悼会也行。

这些年，一个人倒霉，株连九族，一受批判又不容申辩。我这些年，一直在劳动改造。“劳动”、“改造”这两个词都是好词，但一合并就成了“劳

动改造”，就麻烦了。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在劳动改造，中央 55 号文件也不传达，水落石不出，各地有各地的土政策，各取所需，许多政策不能及时落到实处，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人类发展到今天，发展到十年动乱这个样子，可算是登峰造极了。从一九五七年开始，不敢讲真话，直到如今。开始的时间可能还要早些，这一段历史教训应当总结。

有人问我为什么是右派？可我向谁去问呢？什么叫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老婆问我：“你不承认是右派，为什么签字？”当时不签字就成了极右。极右，武装押送，武装看守。总算有幸，始终没有拿我当最顽固的敌人。我那时把老婆孩子接走，长期在农场安家落户。经受了三年自然灾害。一九六一年，摘掉右派帽子，但仍被称为“摘帽右派”，到一九六六年，突然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那时，到医院看病，医生不敢给看。医生要给右派看病，也被视为右派，右派也传染。当时说我是大右派，真不知是因为罪大，还是年龄大？我天天打扫厕所，一共打扫了六年。冬天，累得棉衣都湿透了，医生心疼我，给我出主意说：“你隔一天干一次吧。”我说：“我休息一天，人家屁股可不休息。”我隔一天干一天，干得更多更累，我才不上那个当呢。今天，反正是漫谈，漫无边际地谈。想到哪，谈到哪儿。

记得那时到医院看病是坐拖拉机去的。医生问：“你是艾青？什么病？”

“小肠疝气。”

一位女医生说：“疝气？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说：“我查过《辞源》，疝气疼痛时如女人分娩，你们二三年生一次，我们天天如分娩。”后来动了外科手术，开了刀。林彪下台后，才允许我回北京看病。事到如今，我的户口还在新疆。可是，这儿的领导们十分关心我，还拿购货本借给我，让我买肉。

经过十年动乱我们看到“专制”是多么可怕。人民民主是多么可贵。而在专制下，人民身上的担子又有多么沉重。可姚文元还说民主给得太多了！

我们进行艺术创作首先要有政治民主。如元民主，心有余悸，事先感到害怕，如同鸟笼子的门开着，鸟看着笼子门，心想是出去好还是不出去好？作家不敢写，编辑不敢登，都怕再有康生式的人物。他如一个混世魔王，使得小鸟都害怕。

我认为今天形势很好。今天已允许讲真话。真话是苦药，但不是毒药。苦药是治病，毒药是害人。要民主，也要讲法制。以后，我相信不会再蛮不讲理了。蛮不讲理将一去不再复返。

春天来了，春天已经来了！这很好，但还应看到沼泽地带，还有泥浆路。

我今天就谈这些。

我参加革命五十年了。每当想到在中途牺牲的人，我就感到难过。要有一种精神，有一种干劲！今后，有斗争，不奇怪，无斗争，不可恩议。

坚持“双百”方针，繁荣文艺事业
——1979年10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

邓小平

各位代表，各位同志：

今天，我国各民族的文学家、戏剧家、美术家、音乐家、表演艺术家、电影工作者和其他文艺工作者的代表欢聚一堂，共同总结三十年来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商讨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繁荣文艺事业，这是一件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情。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五四”时期就投入新文化运动的老一辈文艺家；有“五四”以后，在我国革命的不同阶段，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文艺家；有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文艺家。也有在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文艺家。参加这次大会的，还有台湾同胞、港澳同胞中的文艺家。这次大会，标志着全国文艺工作者的空前团结。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所谓“黑线专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诬蔑。在林彪、“四人帮”猖獗作乱的十年里，大批优秀作品遭到禁锢，广大文艺工作者受到诬陷和迫害。在那个时期，文艺界的许多同志和朋友，正气凛然地对他们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在我们党和人民战胜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文艺工作者作出了令人钦佩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在这里，向大家表示亲切的慰问。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文艺界已经和正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到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新和人民见面。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和谬论，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了积极的作用。回顾三年来的工作，我认为，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文艺工作者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爱护和尊敬。斗争风雨的严峻考验证明，从总体来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有这样一支文艺队伍，我们党和人民是感到十分高兴的。

代表们，同志们！

我们的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各条战线上的群众和干部，都要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安定团结的促进派、维护祖国统一的促进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促进派。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

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积极的贡献。

在这个崇高的事业中，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

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坚韧不拔，有智慧，有理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顾大局，守纪律。几千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来，他们满怀信心，艰苦奋斗，排除一切阻力，一次又一次地写下了我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任何强大的敌人没有把他们压倒。任何严重的困难没有把他们挡住。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中和建设中、在同各级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

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

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 and 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

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列宁说过，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文艺创作思想、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采，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林彪“四人帮”过去用反动的、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腐蚀人们灵魂，毒化社会空气，使我们的革命传统和优良风尚遭到极大的破坏。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通过自己的创作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继续同林

彪、“四人帮”的恶劣影响进行坚决斗争。对于来自“左”的和右的，总想用各种形式搞动乱，破坏安定团结局面，违背绝大多数人利益和意愿的错误倾向，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运用文艺创作，同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工作紧密配合，造成全社会范围的强大舆论，引导人民提高觉悟，认识这些倾向的危害性，团结起来，抵制、谴责和反对这些错误倾向。

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我们相信，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会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前进。

文艺工作者还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只有不畏艰难、勤学苦练、勇于探索的文艺工作者，才能攀登上艺术的高峰。

我们衷心祝愿文艺队伍更加团结壮大。不论是专业的或是业余的文艺工作者，一切社会主义的和爱国的文艺工作者，一切维护祖国统一的文艺工作者，都要更好地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把全部精力集中于文艺的创作、研究或评论。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虚心倾听各方面的批评，接受有益的意见，常常是艺术家不断进步、不断提高的动力。在文艺队伍内部，在各种类、各流派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在从事创作与从事文艺批评的同志之间，在文艺家与广大读者之间，都要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老一代文艺工作者，在发现和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方面负有重要的责任。青年文艺工作者年富力强，思想敏锐，是我们文艺事业的未来，应当热情帮助并严格要求他们，使他们既不脱离生活，又能在思想上、艺术上不断进步。中年文艺工作者是我们文艺队伍的骨干力量，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必须十分重视文艺人才的培养。在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里，杰出的文艺家实在太少了。这种状况与我们时代很不相称。我们不仅要从思想上，而且要从工作制度上创造有利于杰出人才涌现和成长的必要条件。

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当前，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党员作家应当以自己的创作成就起模范作用，团结和吸引广大文艺工作者一道前进。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

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三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荒谬做法，破坏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扼杀了文艺的生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各位代表，各位同志！

毛泽东同志早在开国的时候就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经过艰苦的斗争，克服重重困难，我们粉碎了“四人帮”，扫除了前进的道路上的最大障碍。现在，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这种形势的出现已经为期不远；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马克思主义方针的条件，也在日益成熟。我国文学艺术蓬勃繁荣、争奇斗艳的新阶段，必将通过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次大会，是全国文艺工作者的新长征中的第一次盛会。同志们是带着自己的丰硕成果来出席大会的。我们相信，大会以后，同志们一定会拿出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艺术成果，向祖国和人民汇报。

谨祝大会圆满成功！

思想解放与作品质量

——1979年11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时的讲话

夏衍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各协会的代表大会，在党中央的关怀下，经过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已经完成了它预定的议程，会议取得了成功，今天就要闭幕了。在这次会议中，有些问题还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今后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议程规定，要我作一个闭幕词。过了十月，我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这次代表大会，可能是我所能参加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因此惜这个机会，仿照茅盾同志的办法，讲几点漫谈式的个人意见。不妥当之处请代表同志批评。

第一，关于思想解放的问题。

在邓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茅盾同志、周扬同志的报告中都讲了这个问题，而且讲得很好。我想讲的是，在文联和各协会的会议上，没有一个人公开反对文艺界必须解放思想，但是，对解放思想持有疑虑、害怕乃至反对的人，我认为还是有的。这正是文艺界去年以来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进行得不够深入的原因，也是对林彪、江青炮制的那个《纪要》没有认真批判的原因。我这样说，是因为不久前文艺界曾经吹过一阵“冷风”，有人把思想解放、文艺民主和“四个坚持”对立起来，有的人甚至把社会上一些小撮坏人和元政府主义者所造成的社会不安，也归罪于思想解放过了头。我认为，这些看法是极端有害的。第一，因为它不符合文艺界的实际情况，在文艺界，思想解放不是过了头，而只是露了一点头，离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文艺民主还有一段距离；第二，因为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五四运动虽则也反对孔孟礼教，提倡个性解放，但并没有把整个盘根错节的封建思想体系彻底摧毁。实践证明，由于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在中国还有广泛的影响，加上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长期推行的那条极左路线，和旧教条主义的束缚，中国文艺界要真正解放思想，决不是一个短时期所能解决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过来人，是有一些切身体验的。从辛亥革命的剪辫子，到五四运动以后写文章用白话，加标点，这一类小事也都经过了时间不短的激烈斗争。而在今天，在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的时刻，人们的思想也必然要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马克思曾经说过：“‘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马、恩和列宁多次引用过歌德的一句名言，叫做“亲爱的朋友，生命之树常青，而理论是灰色的”。这句话说得真好。它说明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说明了生活是理论的源泉。生活之树是常青的，理论呢？是从属于生活的。这并不是对理论的贬低，而是揭示了它们的内在关系。我以为，这一句话也适用于马列主义这个伟大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建马克思主义，已经一百多年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一定要被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这些都是经受了各方面的实践检验已经证明和正在证明着的真理。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十九世纪，他们所能看到的生产关系，是垄断前的资本主义，他们所能看到的生产力，主要是用蒸气机推动的火车、轮船和皮带传动的机器，他们没有看到过广泛大量利用电力乃至原子动力来发展生产力的现实。列宁看到了发电机和电力传动体系，因

此，他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很明显，如果要求马克思当年讲这句话是不可能的；相反，如果今天再有人讲这句话，那显然也是不很贴切的。假如列宁今天还在，他也许会讲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子计算机了。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要兴起，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经过什么途径，用什么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在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也只能是一种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六十多年的实践证明，直到如今，不论在苏联、在中国、在东欧，以至其他国家，都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成功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因此，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根据当前的实际而进行不断的调整。这种例子是很多的。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国家对农民先实行了军事共产主义，后来改行新经济政策，斗争是非常艰苦的。我们党接受了苏联的经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一开始就采取了通过变工队、互助组、合作社的办法，在农村生活没有太大变动，生产没有下降的情况下，很快地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这正是我们党对马列主义的发展，而不是违反了马列主义。马列主义理论要保持它对实际生活的巨大指导作用，就必须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发展。

近年来，不少人出国考察，对于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工业技术的迅速发展感到惊异。这使我想起了马克思的一段话：“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在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制度碰上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恐慌，那时，我们都认为，这个“垂死的”社会制度的确在阻碍着它的生产力的发展了。可是很奇怪，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尽管有循环不断的经济萧条，但从六十年代中叶到现在，却不仅没有造成生产力的巨大倒退，反而由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而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出现了一个工业生产迅猛发展的局面。帝国主义国家的这种新的情况，给马列主义理论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世界在变，社会在变，人的思想也必须适应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变化。文学艺术工作者必须正视我国当前迅速变化的实际，来考察我们过去用惯了的文学理论，而不能“刻舟求剑”。在我们这次大会中接触到的必须研究的理论问题是很多的，例如：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问题；文艺是否从属于政治的问题；文艺是否能仅仅概括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问题；一切意识形态是否都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方法问题（即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以及在题材多样化中有关反对封建特权、官僚主义的问题等等。我认为都有大胆地正视现实而又认真地、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的必要。

全国解放后，我们常说我国已经彻底地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三十年来，在文艺领域中很少强调反封建的任务。过去我们往往把“百家争鸣”实际上只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的争鸣。但三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两家之外的封建主义这一家，却一直在顽固地妨碍着我国社会的前进。因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扫清道路，我认为，反对一切形式的封建主义，如家长制、特殊化、一言堂、裙带风、官僚主义等等，同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派性一样，都应该归入我们文艺创作的重要任务之列。当然反映这些题材的作品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和恰当的表现形式。文学和新闻都有它们特有的敏感性，这里有一个安定和顾全大局的问题。因为，在今天，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人民，有利于

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第二，关于安定团结的问题。

谈到安定团结，文艺界也的确有一个加强团结的问题。我们这支革命的文艺队伍，不论在抗战前、抗战中、解放后，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分歧，在总的方向上应该说是团结得很好的。但是，林彪、康生、“四人帮”这批恶棍，拉帮结伙，制造派性，破坏了我们这支队伍的团结。经过三年来的“拨乱反正”，清理积案，情况已经有了一些好转。但是，我们的队伍中还有个人恩怨、宗派情绪——特别是林彪、“四人帮”蓄意扶植起的严重的个人主义，排座次、争名位、要待遇的习气还没有根除。我们希望这次代表大会以后，能够将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恩怨抛入东洋大海，彻底清除一切妨碍团结的因素，把我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到艺术创作上、理论研究上，使我们这支队伍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成为一支坚强不屈的钢铁队伍。

今年五月，胡耀邦同志在文化部召开的五个专业座谈会上讲过：林彪、“四人帮”把中国这条大船弄到濒于沉没和触礁的危境，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这条船才免于沉没。这使我想起了“风雨同舟”、“同舟共济”这两句古话，因此，在这里，我还要讲一下顾全大局的问题。大家知道，一九七一年，林彪、“四人帮”已经把我们的国民经济破坏到濒于崩溃的边缘。经济上如此，文化上也是如此。经过三年的努力，这艘载着九亿人民的伤痕累累的大船，不仅已经免于沉没，而且经过紧急而稳妥的措施，已经开始在风浪中前进。但是，由于破坏的严重，整修完好还需要有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快速前进是不适当的。从打倒“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做了大量的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冤案、错案，同时还对文化、教育、科学等方面进行了调整、强化。我们每一个“同舟”的人都应该有互谅互助——也就是“共济”的责任。今天，我们还有内部和外部的敌人。这些人，对于我们的内部不安定是很有趣的。西方世界的一些宣传机构，对于我们内部闹事和暂时困难，总是不厌其详地反复报道；而对于我们内部的巩固和成就，却常常保持沉默，甚至连国庆三十周年叶副主席讲话这样的大事，也只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而不作实质性的报道。这些情况，不是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吗？在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方面，不应该有任何禁区。但是，我相信，一个爱国作家、进步作家，特别是共产党员作家，在对他感到兴趣的题材、事件、人物进行创作之前，必然会考虑到怎样使之有益于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提高人们的道德和审美水平，必然会感到自己对祖国和人民肩负的重大责任。

第三，我还想提一下文艺作品的质量问题。

三年以来，我国的文艺创作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就，特别是在短篇小说、话剧、诗歌等方面，成绩比较显著。我不在这里列举周扬同志报告中所提到的那些作品了。应该承认，那些作品都能解放思想，突破旧的清规戒律，不少作品博得了广大读者和观众的欢迎。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包括最受欢迎的作品在内，文艺技巧、技术方面都还有不少的缺点。这当然和作者的思想水平与生活积累有关系。但是，不可否认地，也和作者的文化素养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我竹不能责怪现在的青年乃至中年作家，一个四、五十岁的作家，正处于创作的盛年，但在全国解放时，才是个十几、二十岁的青年，本来这是他们一生中潜心学习、积累知识的重要阶段，可是，他们

的青春年月却是在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的兵荒马乱的动荡时期度过的。因此，除少数人外，他们没有得到文艺创作上打好基础的机会。我们的作家，特别是中、青年作家，应当继续深入生活，同时加紧提高文艺修养。我很同意茅盾同志在十一月三日讲话中所说的：“现也的青年和中年作家，既要在继承和借鉴两个方面补课，在本国历史、世界各国的历史两个方面补课，又要吸取上述的国际政治、经济、现代科学的知识。”否则，要在不久的时期内产生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这样的作家是不可能的。在年龄上，我和茅盾同志只差几岁，但是在文化修养方面却有一段很大的差距。茅盾同志在二十岁左右已经读过先秦诸子的著作，能写很好的骈体文，还能从英文翻译文学名著，而我在中学时期虽也读过一些古籍，但是，十九岁那年碰上了“五四”运动，来了一个“全盘西化”，于是，我就泡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和俄罗斯文学的“染缸”里去了。这一点，我没有反悔，因为，这一泡使我得到了欧洲和俄国文学的粗浅知识。正由于这样，我对本国文学的传统，包括从《诗经》起到唐诗、宋词、元曲以及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必不可少的本国文学的理论，如诗论、文化、剧论等等，在解放前，几乎是一无所知。我学习这些中国文学的珍贵财富，是在解放以后，因工作的逼迫而开始的。这就是一个“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一个安定团结的时期，文艺工作者再不需要提心吊胆地害怕像五七年那样的政治运动了。对中年作家，面临着一个补课的问题，对青年作家，则是一个时不可失的学习机会。我高兴地看到，在我们的中青年作家中已经有了不少既解放思想，又有文艺才华，同时还具备着一定的文化素养的同志。我希望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后，文联和各协会能迅速地采取措施，制定规划，在文艺界普遍地造成一种好学深思、勤学苦练的空气。那么，十年、二十年之后，也就是说，当我们祖国四个现代化实现的时候，我们文学艺术界也能够产生出许多无愧于祖国和时代的优秀作品。

最后，我受大会委托，向为胜利地完成这次大会的任务而给予我们热情帮助的中央、国务院和直属机关，北京市和解放军等有关单位，以及为大会的顺利进行而废寝忘食的各方面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发展中加关系，维护世界和平
——1981年5月在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
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仪式上的讲话

宋庆龄

尊敬的维多利亚大学校长佩奇先生，
加拿大大使高文阁下，
朋友们，同志们：

我为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博士学位感到荣幸。

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作是你们对中国人民的尊敬和友谊的象征，看成是你们对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和在建设我们人民共和国的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的敬慕和友好的象征。同时，我也是把它看作是中、加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的悠久而牢固的友谊的象征。

我们两国在太平洋两岸隔海相望。很久以前就有许多中国人在加拿大工作，他们在许多方面为加拿大的兴旺发达作出了贡献，受到当地其他血统的加拿大人的尊敬。他们一贯是加拿大的好公民。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祖先的故土，也从未停止过对故土进步事业的支援。在孙中山在世时，他们曾是孙中山事业的坚决支持者，孙中山本人也在他们中间生活了很长时间。他们不只是在财力上帮助孙中山的事业，而且还加入到他的行列。其中还有不少人返回中国，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后来，在反抗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及至在以后的建立和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斗争中，他们继续给予了坚定的支持。

在加拿大人当中，站在我们一边的不只是这些人。无论是在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帝制的革命中，还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中国人民都得到了酷爱正义的欧裔加拿大人的帮助。他们最杰出的代表、最崇高的象征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大夫于1939年在中国最艰苦的前线——解放区游击战前线，为抢救伤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由于毛泽东主席著名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中颂扬了白求恩大夫，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他的名字。中国人民把他看作是在进步和正义事业中各国同甘共苦的最光辉的典范。全中国的男女老少，甚至我们辽阔国土的最偏僻地区的儿童，只要听到加拿大一词，他们就会想到白求恩；而听到白求恩的名字，又会想到他的故乡加拿大。白求恩大夫的遗骨，安葬在中国的土地上，他的名字深深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他将使中国和加拿大千秋万代连结在一起。从广义上讲，一个加拿大人能够在中国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为反对一切企图奴役别人的人而团结战斗的国际性榜样，这是我们两国的光荣。

总的说来，无数加拿大人——政府官员、教育界人士和其他各界人士，一直对中国争取和平和独立的斗争采取友好态度。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尤为突出，那时我们两国是反抗法西斯轴心国的同盟军。今天仍然是如此。我愿在许多老朋友中特别提一下切斯特·朗宁和文幼章博士，像他们这样的老朋友还有很多很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中加两国人民友谊之桥更加稳固、宽广和坚实。它包括我们两国良好的国家关系，互利的对外贸易以及学术和其他友好交流。

我们现在如同过去一样，不仅在继续发展我们的友谊方面，而且特别在

维护世界和平的努力中有着共同的利益。中国人和加拿大人都从历史的经验中懂得了，保卫和平必须采取明确立场，反对一国对另一国的一切侵略行为，反对超级大国扩张主义者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任何企图。

正像三十年代一样，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两种抉择是严峻而明确的。一条是历史早已给我们留下痛苦教训的、导致世界大战的道路，这就是幻想、怯懦、不协调和绥靖的道路。这只能怂恿和加速侵略者推行其全救霸权的步伐。另一条是现实主义的道路，也就是密切合作，决心抗击和阻止这种扩张势头的道路。目前，国际形势更加动荡和紧张，世界和平受到严重的威胁，其根本原因是霸权主义的扩张和侵略所致，因此我们应当坚定地面对这一现实，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对待当前危急的国际形势。

孙中山在他的遗嘱中号召我们，在我们国家要“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他又写道“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人民空前觉醒。在这种基础上，中国坚信，她能够完成不断进步的任务。这种任务集中体现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上。为达此目的，我们同样需要和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加拿大和加拿大民族就是这样一种民族。

让我们一起来赞颂、培育和发展中加两国源远流长的友谊，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愉快地接受你们的授赠学位。

立足小分子纵情大宇宙
——1986年10月在诺贝尔奖庆贺大会上的演讲

李远哲

我必须先把一个事情说清楚。今天的科学研究已不是个人的行为了。最近四五十年来的科学研究与一百年前的科学很不一样，一百年前的科研常常是一二个很有思想的人躲在地下室日夜努力，采取所谓的 Longwolf 式的（孤独的）研究方式，常是个人的行为。但是近代科学的研究已是一个很庞大的社会活动，物理、化学、生物和其他各种研究，很少是一个人可以作出很多科学实验的工作的。——不管他才能多大，智商多高。现代科学活动是集合很多人的专长及才智，彼此互相帮助，再经政府机构的财力支持，才可作出一点东西。我研究的化学动态学也是一样，从一九五五年一些人开始研究到现在，牵涉到的人和经费大多了。诺贝尔基金会挑选我们三个人只是作为榜样而已，实际上是奖励大家在过去二十多年来对化学动态学作出的贡献。

在科学的研究上也像其他事情一样，一个人的成败系于最艰难的处境中，有些人能继续努力，有些人承受不了。你如果问我为什么做得比别人好，大抵我比较会坚持吧。

我在台湾念书时不是大家认为的“好学生”。所以我可以比较放开地阅读我比较喜欢的读物，培养我较喜欢的兴趣。我中学时代读了居里夫人的自传，受到很大感动，对我的启发也很大。她的影响至今仍在，我看居里夫人时，不是看到她的成功，不是羡慕她的名声，而是欣赏她的理想主义。人生活在世上从事各种不同行业，但作为一个科学家能像居里夫人有这么美好的生命，我觉得十分羡慕。人家问她为什么不申请专利赚钱，她说：“人类的知识属于全人类所有，我不想把我研究的成果作为一个人的私产。”我想这个人真是有理想的人啊！

一般而言，今天很多大学的科学教育只是训练一些技术员，但这也有一些不得已的苦衷。原因是今天的科研的确也很需要技术性的工作。一个好的技术员是重要的。可是要在科学领域打开新的局面，做些尖端的、有创意的科学工作的话，光有技术就不一定行得通了。因此只得到技术的训练，一个学生还没有达到很好的科学教育的目的。据我所知，比较好的学校或实验室，为了解决一个新的科学问题，学生都有很广泛的训练，不仅是他专业的东西，科学哲学、科学史或科学社会学也非常重要。这样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

全世界与我们从事同样工作的就有几十个人，我们为什么做得比较成功呢？这是因为我们花了很多心血反复地在每一步每一步的小地方上下功夫。如果有一百步的话，我一步比别人做好5%的话，这是一点零五的100次方，这样就有很大的差别了。

把我的成功看成是我个人的表现是根本不对的。这是很遗憾的事。我的研究经费都来自社会，人家不给钱，我什么也做不成。何况我的研究也只是继承很多早期的大师，他们给我很多的启发和帮助。因此，把我当作标兵或当作个人成功的例子来看是不对的。

人家问我怎样才能做好一个科学家，我就用一句我常常规劝台湾年轻人的话作答：要做好一个科学家，一定要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因此，在现实社

会里很容易妥协的人一定不会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生活上容易妥协的人绝对不会成为很好的科学家，即便他读了不少书，花了许多时间在实验室，也没有多大用处。另外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必须养成尊重别人的习惯，这一点不做好的话，也很难成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所以我觉得民主的观念对科学家的培养非常重要。

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
——1933年9月在上海召开的世界反对帝国主义
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上的演讲

宋庆龄

同志们和朋友们：

如果没有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当局的恐怖和干涉，而我们能够公开举行一个会议的话，那就会有成千成万的代表，为中国亿万被剥削人民发出他们的呼声。虽然出席这个会议的代表人数为了明显的理由不得受限制，可是这个较小的集会仍然充分地代表劳苦大众的利益，代表着他们抗议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屠杀战争。

我不想笼统地、全面地讲那日益增长的战争危险。可以说，中国早就在战争中，而且侵略中国的战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的烈火，只不过是短暂的时间问题了。

目前是资本主义制度垂死时代。资本主义正不顾一切地寻求出路，解决自身的矛盾，资本主义者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并准备进行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新战争。资本主义制度陷入混乱中，越陷越深。日趋衰亡的资本主义的全部特征是：经济制度崩溃，帝国主义对立尖锐化，法西斯主义抬头，民族沙文主义的最野蛮的表现登峰造极，对劳苦大众及其领导者施用了最残酷的压迫、酷刑和残杀，使文化与生产的进步停滞。

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毁灭它自己的阶级——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凭着它在生产上所占的地位和明确的阶级利益，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意识，而且今天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领导着全世界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工人和农民从事斗争。

因此，目前的时代标志了一个新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因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阶级利益与阶级势力妨碍了社会向更高的形式和平地发展，因为如果生产与分配的工具仍然掌握在少数剥削者手里，群众便不能生活下去，所以无产阶级革命便成为我们这一时代最迫切的社会需要了。

资本主义者在战争中寻求自己的生路，劳苦大众必须在革命中寻求自己的生路。

历史很明显地指示我们：战争的破坏性必然一次比一次厉害，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必然一次比一次惨重，战争中间相隔的时间必然一次比一次缩短。但同时战争并不能解决而只能加深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随着一次次的战争，革命势力积聚了力量，壮大了自己，更加走近它们最后的胜利。

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战争产生了巴黎公社；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加速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战大大地推进了全世界的革命运动，而且使俄国工农革命获得胜利，奠定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

很明显的，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首的瓜分中国的运动，将加速整个亚洲、中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势力的发展。

我很想在这里说明我自己对于各种不同形式的战争的态度。战争是一种政治工具，是用以实施一种特定政策的工具。多数的战争是为了要征服土地和民族、占领新的市场以及夺取新的原料来源而发生的。所有这些战争都是

反人民的。这些战争给终生勤劳的人们带来无穷的忧患和无比的苦痛。战争如不导向革命，便使工人农民遭受更深的奴役。这些战争以及战后的“和平条约”往往增加规模更大的新战争危机。因此，以自己全部的力量来反对这样的帝国主义战争，“把战争变成内战以推翻资产阶级”，以摧毁统治阶级的政权，便成为广大群众的任务了。

现在，帝国主义者为了克服那分裂它们日益尖锐化的矛盾，正竭力企图以重新分割中国和发动反苏的干涉战争来取得暂时的妥协。侵略并不从日本对中国的强盗战争开始。远在日本夺取台湾以前，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早已控制了中国的一切战略要地，强迫中国人民吸食鸦片，支配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并利用中国的军阀和其他反动分子作他们的爪牙，来达到各帝国主义不同的目标。

孙中山谋求中国独立的努力已经被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所破坏。国民党背叛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群众运动，并且自那时起，一贯地采取屠杀工农、敌视苏联、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的政策。正因为国民党采取了政策，才使日本帝国主义能够顺利无阻地侵略中国，夺取东北，深入控制华北，而且现在正野心勃勃地向南窥伺，图谋攫取全中国。

也正是这种政策，鼓励并帮助了英帝国主义者窥伺川西边界。也正是这种政策，帮助了法帝国主义蓄意侵略云南。也正是这种政策，帮助了美国在中国建立财政和政治霸权；帮助了国际联盟（英国和法国）更进一步实施帝国主义共管中国的恶毒计谋。目前还看不到侵略的终结。这还不过是帝国主义在国民党继续不断的卖国行为的帮助下，从事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的开始而已。如果人民大众不起来阻止帝国主义列强和他们的国民党傀儡的罪恶行为，中国一定会全部被瓜分，中国人民也将遭受更惨重的奴役。

不仅如此。帝国主义列强将来一定还要以中国人民为牺牲来从事彼此间的相互厮杀。战争将继续不断地发展，而在这些战争中，帝国主义列强将利用中国的人力和物力来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今天，中国东北的人民已经在替日本帝国主义当炮灰了；将来，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的帮助之下，将被迫给各帝国主义者充当炮灰。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把东北建造成将来反苏战争的根据地。它并且在企图扩大它的根据地，想先控制黄河以北的土地，然后加以占领，再进一步侵略内蒙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最后征服全中国。至于英帝国主义，它和美国有尖锐的矛盾，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冲突也在增加，对印度革命怀着畏惧，并吵苏联怀抱仇恨；它正在拼命设法组织欧洲帝国主义者的反苏集团，以图延缓帝国主义强盗间不可避免战争。

这是目前局势的真相，希望从任何帝国主义者或国际联盟那里取得帮助是犯了叛国之罪。希望从国民党的政策中获得生路，简直是愚蠢。国民党今天正在更有意识地、缜密地计划着向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作全部的、无条件的投降。国民党的领袖只有一个要求和希望，那就是希望帝国主义者允许他们继续执掌政权，以便分得一份由蹂躏和榨取中国人民而得来的利益。

只有从人民大众本身才能获得帮助和生路。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不可抗拒的。

亿万工人和农民已经在进行这个斗争了。广大的苏维埃区域已经在中国

存在了许多年，这个事实便是广大的中国人民将走上这同一条道路的希望、诺言和保证。

只有从这些斗争中才能发展出权力和力量，来解放中国，统一中国，驱逐帝国主义，收回东北和其他失地，给中国人民以土地、粮食和自由，并给各个民族以生存、发展的自由。

只有这些斗争，才能把中国从连年战争的无穷苦难与长期资本主义剥削的残暴行为之中解救出来。只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土地革命与反帝革命，才可以建立使中国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基础。

帝国主义的支持者问我们：“你们既然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白色恐怖，那么为什么不反对革命中使用武力呢？”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明白地回答：“革命阶级为反抗压迫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有理由的。被压迫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两种情形之下，武装斗争是必需的，因为反动势力永远不会自动放弃它们的权力。”

帝国主义战争、军阀战争、干涉苏维埃中国或是干涉苏联的战争、对民众的压迫和恐怖行动，这一切都是为了反动的目的。反动的武力只能以革命武力来对抗。只有在这样的立场上，我们才可以明了目前中国民族革命危机中我们的任务。我们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会直接受帝国主义者的利用，帮助他们来解除中国人民在目前和将来的斗争中的武装。我们是拥护中国的武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

只有在人民千百万地奋起的时候，中国才能获得解放。法国人民的大革命中反对优势的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俄罗斯的工农击退一切帝国主义者的联合武力的斗争，这种历史的先例指示了中国人民的出路。

现在有句很流行的问话：“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如何能够与这样强大的敌人作斗争而获得胜利呢？”可是，我们祖国的历史不是已经给我们一个回答了吗？北伐战争教导我们：革命的武力远胜于反动的武力，而且能够以寡胜众。中国的工农红军屡次与十倍于自己力量的军队作战，而且取得了胜利。武装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思想意识也有其作用的。

当然，有力的革命意识和精良的武装配合在一起，是战胜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最好保证。很明显的，东北英勇的义勇军长期间的抗日斗争现在还在继续，假如不是惨遭反动政权罪恶地加以破坏，早就达到更高的程度了。

除却蒋介石政府方面的破坏，还有另一个因素阻挠这运动的进展。抗日义勇军的领袖们畏惧群众，解除了群众的武装，只武装了以地主、豪绅和资本家的阶级观点看来认为“稳健”的分子。东北的工人农民不得不拿起武器来反对这些义勇军的领袖如马占山、李杜之流，同时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就不可能迅速成功了。

中国人民在击败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强大的军事机构之前，首先便要从中国的军阀、地方和资本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国民党还在削弱我们的广大劳动群众的抵抗力。国民党对于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任何形式的运动，都予以镇压。国民党以最残酷的方法镇压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它的统治区域里的义勇军。国民党动员了一切可用的武力，来大规模地进攻苏区。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商谈秘密条件，将东北和华北奉送给日本，而把其余的中国领土贬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民党向外国乞求援助：金钱、武器和子弹，来和中国的人民作战，因此就更加完全依赖

帝国主义者。这不是生路，这是中国民族的死路。

我们在进行着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同时，必须为建立真正的中国人民政府而斗争。这样的政府只能由工人农民自己来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给中国劳动人民指出了出路。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愿与任何军队订立军事协定，抵抗日本帝国主义（附加的条件是武装人民和给人民以民主权利），这提议指明苏维埃政府准备与帝国主义作战的认真态度。这些呼吁虽然获得了群众和兵士的同情，但至今还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响应。这表明各军事单位的长官要不是亲帝的、国民党的工具，便是没有进行真正斗争的勇气。

总而言之，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我们拥护武装人民的发展革命战争。只有这样的战争才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也只有民众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了自己的工农政府之后（像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做到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胜利完成。

我们坚决反对中国的军阀战争。各派军阀不断地为争夺地盘进行战争。国民党内的各系派不顾民众的利益，不断地为争权夺利而动武。帝国主义各集团则利用军阀来扩张自身的利益，并削弱中国。这些战争给中国广大人民和兵士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害。很明显的，这些依附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中国军阀，必须消灭净尽。

最后，我们对全体中国人民，对劳苦大众还有一个呼吁，呼吁大家在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即在争取中国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团结一致！让我们团结起来，向那些背叛国家，把我们的国土一省一省地出卖给帝国主义者的人们作斗争！让我们团结起来，用我们最大的力量来保卫那已经由帝国主义统治和封建剥削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工人和农民，他们现在正受着国民党军队第五次而且是最大规模的进攻。这次进攻直接受到美国贷与蒋介石政府的五千万美元中一千六百万美元的帮助，受到美国的飞机、炸弹和飞行教练的帮助，受到日、英、美、法的军舰对国民党的全力帮助，受到帝国主义各色各样物质的与精神的帮助。

让我们联合起来保卫苏联，反对干涉苏联的战争！让我们在整个远东，尤其在中国，发动一个强有力的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中国走向民主的途中
——1937年10月在上海为动员抗日发表的演讲

宋庆龄

中国已发动抗战，抗拒惨无人道的侵略者，我们的非战斗员惨遭屠杀，对这种不仅威胁中国且威胁全世界文明的公敌，谁还能保持消极态度？所谓日本开明的首相，竟说“日本唯一的方法是鞭撻中国，使之屈膝，使之不再有战斗的精神”。日本其他外交家亦诡辩着，他们所要求的只是中国应充分了解他们的“合作”建议。抗日思想应排除尽净。他们的野蛮行为，应该由我们解释为奉天承命的神圣事迹。这是怎样荒诞的事！目前日本虽仅威胁中国，但谁能保证到了某种时候，不会从行动上危害其他民族呢？

几十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略中国，攫取我们的土地，最近六年来，日本的侵略现已发展为进攻华北、上海，达到中国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可是白利安凯洛非战公约和九国公约签字国，却坐视条约被签字国之一的日本撕毁，不加阻止。被日本军阀认为“圣经”的田中奏折，是日本征服全亚洲的既定计划，世人对这一点，是否还需要我们来提醒？中国为什么贫弱，日本为什么能在中国领土内横行，扼要说来，十几年来，中国的虚弱无力，是由于内部的摩擦与自相残杀所致。日本想更进一步的侵略，可是它失败了。中国人民以勇武的决心与血肉之躯，抵抗侵略者的飞机大炮，不管日本军阀是怎样的疯狂，必定在我们的领土上遭遇灭亡，中国人都准备以最后牺牲，来保卫祖国。

过去三年中，反日运动的力量大增，内战早已终止了，一切内部的磨擦已消除，势不两立的蒋委员长与朱德将军也已言归于好。这次日本的新进攻，竟成了结合全中国一切资源和力量以抵抗暴敌的媒介。

如果必要，我们自然当以自己的力量来抗拒侵略者，可是我们已听到全世界的同情之声，因之庆幸我们并不孤立。我深信美国对我国争取自由独立的奋斗，必然同情。我们的抗争，不单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护自由民主的人们。

你们自发地愿意抵制一切日货，这对于我们还有许多迫切的要求，请你们不要让任何一只船从美国开往日本去，因为日本可以把你们的出产物改造，来对付我们。金钱上的帮助对我们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请你们源源不断地输送军火来充实我们的军队。美国是用不着参加战争来毁灭这远东的法西斯威胁的。罗斯福总统的演词说出了全世界对国际恶棍的暴行都加以谴责，请你们拥护他的演说，使他的话能够付诸行动，趁残酷的火焰尚未延烧到全世界之前将它扑灭。我吁请美国人士起来领导这个神圣的十字军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6年8月在接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时的谈话

毛泽东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问（以下简称“问”）：你对于美国是否可能进行反苏战争如何看法？

毛泽东答（以下简称“答”）：关于反苏战争的宣传，包括两个方面。在一方面，美国帝国主义确是在准备着反苏战争的，目前的反苏战争宣传和其他的反苏宣传就是对于反苏战争的政治准备；在另一方面，这种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这些矛盾就是美国反动派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你知道，希特勒和他的伙伴日本军阀在一个长时期中都曾经把反苏的口号作为奴役本国人民和侵略其他国家的托辞，现在美国反动派的做法也正是这样。

美国反动派要掀动战争，首先必须进攻美国人民。他们已经在进攻美国人民了，他们从政治上、经济上压迫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准备在美国实行法西斯主义。美国人民应当起来抵抗美国反动派的进攻，我相信他们是会这样做的。

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现在美国在太平洋控制了比英国过去的全部势力范围还要多的地方，它控制着日本、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半个朝鲜和南太平洋；它早已控制着中南美；它还想控制整个大英帝国和西欧。美国在各种借口之下，在许多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布置，建立军事基地。美国反动派说，他们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和准备建立的一切海军基地，都是为着反对苏联的。不错，这些军事基地是指向苏联。但是，在现时，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我相信，不要很久，这些国家将会认识到真正压迫它们的谁，是苏联还是美国。美国反动派终有一天将会发现他们自己是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中。

当然，我不是说，美国反动派不想进攻苏联。苏联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是阻碍美国反动派建立世界霸权的强大的因素，有了苏联，美国和世界反动派的野心就根本不能实现；因此，美国反动派非常痛恨苏联，确实梦想消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时候，美国反动派如此大吹大擂地强调美苏战争，闹得乌烟瘴气，就使人不能不来看看他们的实际目的。原来他们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疯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

问：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是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呢？如果美国从冰岛、冲绳岛以及中国的基地轰炸苏联呢？

答：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

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在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前，俄国国内究竟哪一方面拥有真正的力量呢？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吹走了。归根结底，俄国的力量是在工农兵苏维埃这方面。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希特勒不是曾经被人们看作很有力量的吗？但是历史证明了他是一只纸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相反的，苏联以及各国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民的力量，却是比人们所预料的强大得多。

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强大得不得了，中国的反动派正是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在美国，另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这就是美国人民。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人民能够扭转局势 ——1952年12月在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上的发言

宋庆龄

主席、各位代表、亲爱的朋友们：

我给各位带来了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的衷心祝贺。我给各位带来了中国人民的愿望，期望这次大会胜利达成把所有要求国际合作的人们团结起来的任务，我们刚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现在我们以更坚强的决心，来此和你们一道，拯救和平。

我们所有来此集会的人们，是代表着世界人民中间的极大多数。我们是受了这极大多数人的委托，来此开会的。事实上，我们来到此地，是为了扭转局势，保卫和平。

我们在此集会的时刻，可以说是在历史上的一个三叉路口。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走向战争与毁灭；另一条走向和平进步，以及一个较长时期的或者永远的避免战争的可能。

历史常常给人类提出一个这样的选择。特别是在近代，人类常常站在两条路口，必须作出决定。每次人类都是被迫着走上了战争的道路。每次都是那一小撮拥有垄断企业、从大规模毁灭中获取暴利的战争制造者，代替整个人类作出了决定，或者我们应当说，违反了人类的意志而作出决定。

今天，当我们站在这个三叉路口的时候，又是人类中这批残酷无情的少数，在企图像过去一样，迫使我们不走正当的道路。然而在目前时代，这样的决定已经不是他们所能单独包办而不考虑大多数人的愿望的了。不仅止此，现在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作出决定了，因为人类中多数与少数力量的关系，正在发生急速的变化。世界情势的发展，已经使要求世界和平的人与为了私利而要求战争的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基本的转变。有伟大的苏联人民站在最前列的世界和平运动已经非常壮大。我们已临到历史发展中的一点：这是第一次，人类中的大多数已经能够突破一切困难，明确地根据本身的利益而作出选择。现在，人类已有力量来选择和平了。

这种力量的本质，就是人类中的大多数已采取明确的立场，来解决当前国际紧张局势，普遍要求阻止战争，并以协商办法解决一切分歧。这种力量的基础，就是人们日益认识到，只有人民拿出勇气和坚持的精神来努力追求，才能得到世界的安宁。每天有更多的人认识了这种力量，而这种力量就在他们自己手里。每天有更多的人认识到他们的福利受到了威胁，发现了这种威胁的来源，看到了情势的紧急，准备采取行动来保卫和平。参加这样行列的人越来越多了。结果，在许多地方，人民对于造成朝鲜的苦难的垄断资本家，表示深恶痛绝。许多被战争制造者控制了它的经济的地方，那里的人民对于捐税的增加，食物的减少，学校、医院与房屋的缺少，正在发出抗议，表示不满。目前，在许多被他人奴役的国家，人民起来激烈地争取真正的民族独立。这种争取民族独立的行动与保卫和平的斗争是密切联系着的。

当然，我们对于整个情势，也必须有所估计。我们知道人民要求和平的意志是何等强大。我们这次盛大的会议，就是这个要求和平的意志如何广阔与壮大的一个准确的指标。但是我们也知道，人民力量的某些部分，现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特别是在西方的若干地区。我们也知道，虽然我们的进

展是很显著的，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有些重要的脱节。虽然我们对于和平战胜战争的胜利的信心非常坚定，绝不动摇，但是我们还必须以积极行动，争取这个胜利。我们必须再接再厉，表示我们的勇气，同时团结任何相信协商而不愿诉诸武力的人，来证明我们的真诚。

因此，我们对于和平的力量，并不估计不足，对于战争的威胁，也不估计过低，我们见到战争制造者的影响范围缩小下来了。我们读到和听到他们自己的发言人的悲鸣，说他们正在失去全世界的好感了。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这些同盟国之间关于战争政策所发生的矛盾，由于人民中间对于战争的厌恶的日益增长，他们本身的分崩离析和走向孤立的发展过程，也加速了。但是我们也见到，战争制造者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他们利用各种各样的宣传工具，进行大规模的颠倒黑白的宣传，在“保卫自由与集体安全”的掩饰之下鼓吹武力与强暴。只要这种情况继续存在，这个世界，你们和我们以及我们亲爱的人们，还是受着战争的威胁。我们绝不能松懈我们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努力。相反的，我们必须把我们努力提到新的高度。

我是从亚洲来的。亚洲人民正为现在正在这个大洲上进行的战争所苦，他正在积极努力，要求停止这些强加于他们的战争和解除所有的战争的威胁。不久以前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就充分表现了我们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十六亿人民的这种决心和努力方向。

中东、近东和北非的人民极愿获得独立和自由，并利用他们的丰富资源来经营他们的和平生活。但是有人要在这些地区组织侵略战争集团，不许他们获得独立自主。

在西欧，北大西洋侵略集团，正像一团凶恶的黑云笼罩着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及北欧等国家的人民，特别是西德的人民。他们仅仅从一场可怕的大战脱离了不过几年，现在又被人把沉重的扩军备战的负担强压在他们身上。不用说，他们是不会对这种压力屈服的。他们这几年来为了摆脱这种压力，谋求和平，曾经作了勇敢的努力，现在他们正在作更大的努力。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希望美国人民对于这一重要的工作，能担起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不是指那些已经参加和平运动的人们；这些朋友，不管压力多大，是会继续加强工作的。我是向那些美国人，大多数的美国人讲话，他们心中向往着和平，可是没有采取一点行动。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幸福和将来的前途，同美国军队在朝鲜投掷凝固汽油弹、狂轰滥炸以及其他罪恶行为，同美国政客们在欧亚各地所进行的阴谋活动，是有密切关联的。

很可能，你们对于今天世界其余的人们对美国的态度，会有些惶惑。你们会奇怪，你们自以为已经作了牺牲，而世界人民并不感激你们，反而憎恨你们。你们一定会想，你们付了许多税，实际工资在减少下去，你们的儿子被征服兵役，这一切你们都以为是为了正当的目的。但是实际上你们并没有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你们也没有真正去调查，不知道你们的钱是被用在什么地方和怎样用的。你们并没有追究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共同安全法以及在朝鲜的所谓“警察行动”等等的真实意义。你们也许不知道，你们的政府领袖今天已不得不承认：那亿万的金圆和宝贵的生命，全然白费了。它们只给你们国内和国外造成许多灾难，因为它们并不带给人民以最需要的东西——食粮、家园与和平。

事实是这样，你们让战争制造者包办了美国人民的一切事情。他们把你们的金钱和你们的儿子完全用于他们的目的。他们只知准备战争；他们花钱

只为最后转入他们的荷包，这数目在一九五一年达到了四百一十八亿美元。他们这样自己胡作妄为，借口是你们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实际上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只希望能让他们过自己的生活。但是战争制造者把这种威胁说得若有其事，结果你们被骗了，而他们的荷包装满了。这样就产生了那些侵略公约、“防御”集团、作战师团以及西德和日本的重新武装和朝鲜的实际战争。

这样已经发展到如何境地呢？正如你们许多重要的商人、工会领袖、教会领袖和学者们所指出的，它把美国带上了灾难的道路，同时对其余世界造成了空前的威胁。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威胁是无法对付的；绝对有办法对付，如果有必要的话。它真正的意义是：美国的政治、军事领袖在准备着一个大毁灭，连美国人民自己甜美的家庭和亲爱的人们都包括在内，而你们并未设法加以阻止。他们在囤积军火与物资，那对他们是绝无好处的，既不能吃，也不能穿。他们疏远了所有欧洲、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人民。他们甚至在西德和日本也得不到支持，因为那里的人民和青年不要军火，也不要军事训练。

请你们注意这些都是用了你们的名义在于着的。最近你们选出了一个将军来管理你们的国家。当然，你们的选举是你们自己的事。这与我们并不相干。但是请记住，这个将军曾经说，用亚洲人来打亚洲人。他大概认为亚洲人的生命比美国人的生命不值钱些。你们选出来的人既然这样说，而且他的政策就是以这种思想为基础，那就成了我们自己的事了。他所讲到的是我们的儿子和女儿。他讲的是要继续蹂躏我们的土地、资源和文化。他讲的是要继续在朝鲜、越南和马来亚的战争。那你们得知道，最近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人民一致要求这些以及一切战争必须立即停止。

美国人民不能说他们对此没有责任。你们的选票把这样一个人放在你们国家的最高职位上。他是要继续他前任者的政策的，只是在执行上更为加紧并采取更危险的方式。

这次大会给美国人民以一个最好的机会，正如对于我们一样，来了解今天人类所面对的问题以及他们所应担当的责任。我们希望，它会成为一种推动力，唤起大家广泛地寻求真理，激起对于代表美国人民来这里参加和平会议的代表们，加以广泛的支持。我们希望，美国人民对于美国政府所执行的政策，任意侵犯别国人民的民族独立与国家权利的行动，能起来加以制止。

在这个对于和平运动如此重要的斗争中，美国人民决不是孤独的。他们应该经常记着，保卫和平的斗争有着全人类中决定多数的人民作后盾，这个斗争是一定不会失败的。美国的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曾经在一个艰困的时候告诉美国人民，除了恐惧本身以外，他们不用有什么恐惧。这一种思想曾经鼓舞了美国全国人民。现在应当把它再提出来，使它再一次发生作用。它应当鼓舞美国人民起来反抗战争制造者，要求把工厂恢复到和平生产。要求把国际合作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并断然拒绝从事侵略战争。如果美国人民能作这样的贡献，世界就能更早地获得和平，而一切不同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国家定能和平共处。

为了扭转局势，保卫和平，我认为我们大家都要积极地担负起下列几项任务：

我们要求停止一切现有的战争，特别是朝鲜、越南与马来亚的战争。美国人民应该要求艾森豪威尔把他向美国人民所提出解决朝鲜战争的诺言兑

现，这个诺言是促成了他当选为美国总统的。我们要求，解决的方案应以停火；遣返全部战俘、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为基础，让朝鲜人民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按照艾森豪威尔“用亚洲人和亚洲人作战”的恶毒政策，利用其他军队来代替美国军队。

我们要求停止一切的战争准备，立即地和切实地裁减军备，立即停止西德和日本的重新军国主义化，把所有的金钱和物资用以解决各国的急迫需要，特别是人民福利的需要。还有，我们要求各方面以共同的努力，解除一切其他的国际紧张情况，包括撤消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障碍在内。

我们要求缔结五大国的和平公约，这是中国人民的意愿，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求联合国执行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以恢复世界人民对于联合国已失去的信心；我们要求严格禁止原子武器、细菌武器、化学武器以及其他一切大规模毁灭人类的武器。

我们要求一国不得干涉他国的内政，也不侵犯他国领土或对他国施用政治压力。一切关系必须以平等为基础。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任务已经很明确了。我们见到，我们是有着几万万人民的力量作后盾的。但是，还有几万万人是我們所需要而且能够争取到和平运动中来的，因为事实上和平正是他们心中所向往的。有许多人现在没有发言，有许多人尚未组织起来。我们必须设法使他们参加我们的运动，让他们讲出话来。他们有的会完全同意我们的纲领，有的只会同意一部分或者仅仅一点——就是世界必须保持和平。让我们和大家保持密切的接触。我们要向他们证明，我们所主张的，一定会实行。我们要和他们协商并共同决定怎样能使我们最好地合作，把世界和平运动推向前进。联合起来了，人民就能扭转局势，走向和平。

我从中国来，知道我们的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一朝获得了安宁以后已经得到如何可惊的进步。所以我对于得到了和平的世界的看法，真正像人间出现了天堂一样。这不是仅仅对于我们儿女提出的一个愿望，而是一旦在我们的时代把它建筑起来之后，我们自己就能享受的东西。

让我们向和平前进，走向光明的新世界！

亚非人民团结起来
——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周恩来

主席、各位代表先生：

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已经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能与与会的各国代表团一起在这个会议上讨论我们亚非国家的共同问题，感到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在这里会晤，首先要感谢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家的倡议和努力，我们还应感谢这次会议的主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为会议作了很好的安排。

亚非两洲有这么多的国家在一起举行会议，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我们亚非两洲的土地上生活着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人民。亚非人民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近代以来，亚非两洲的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殖民主义者的掠夺和压迫，以致被迫处于贫困和落后的停滞状态。我们的呼声受到抑制，我们的愿望受到摧残，我们的命运被旁人摆布，因此我们不得不起而反对殖民主义。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受到的灾难和为了同样的目的而进行的斗争，使我们亚非各国人民容易互相了解，并在长期以来就深切地互相同情和关怀。

现在亚非地区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摆脱了或正在摆脱殖民主义的束缚。殖民国家已经不能用过去那样的方式来进行掠夺和压迫。今天的亚洲和非洲已经不是昨天的亚洲和非洲。亚非两洲的许多国家，经过长期的努力，已经把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的会议反映了这一深刻的历史变化。

虽然如此，殖民主义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结束，而且新的殖民主义者正在谋取旧的殖民主义的地位而代之。不少亚非人民还在过着殖民地的奴隶生活，不少亚非人民还在受着种族歧视，他们的人权遭受着摧残。

我们亚非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过程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争取和巩固各自的自由和独立的意志是一致的。不管我们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如何不同，我们大多数国家都需要克服殖民主义统治所造成的落后状态，我们都应该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按照我们各国人民的意志，使我们各自的国家获得独立的发展。

亚非人民曾经长期遭受侵略和战争的苦难。许多亚非地区的人民曾经被殖民主义者强迫充当进行侵略战争的炮灰。亚非人民不能不痛恨侵略战争。他们知道，新的战争威胁不仅危害到他们国家的独立发展，而且还要加强殖民主义的奴役。因此，我们亚非人民更加深切地感觉到世界和平和民族独立的可贵。

基于这些情况，保障世界和平、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并为此目的而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就不能不是亚非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接着朝鲜停战之后，日内瓦会议曾经在尊重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得到科伦坡五国会议的支持，达成了印度支那的停战。当时，国际的紧张局势确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给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亚洲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

跟着而来的国际形势的发展却和人民的希望相反。无论在东方和西方，战争危机都在增加。朝鲜人民和德国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受到阻挠，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协议有被破坏的危险，美国在台湾地区继续制造紧张局势。亚非以外国家在亚非地区建立的军事基地越来越多。他们公开鼓吹原子弹武器是常规武器，准备原子战争。亚洲人民不能忘记第一颗原子弹是落在亚洲的土地上，第一个死在氢弹试验下的是亚洲人。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一样，不能不关切日益增长的战争威胁。

但是进行侵略、准备战争的人究竟是极少数。世界上不论是生活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中的绝大多数人民都要求和平，反对战争。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运动有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发展。他们要求终止扩军备战的竞赛，首先各大国应该就裁减军备达成协议。他们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和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他们要求将原子能用于和平用途，为人类创造幸福。他们的呼声已经不能被忽视，侵略和战争的政策已经日益不得人心。战争策划者日益频繁地诉之于战争威胁，作为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但是，战争威胁是吓不倒任何具有抵抗决心的人的，它只能使威胁者自己陷于更加孤立和更加混乱的地位。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同世界上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决心维护和平，和平是有可能维护得住的。

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由于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经济上还很落后。因此，我们不仅要求政治独立，同时还要求经济上的独立。当然，我们要求政治独立并不是要对亚非地区以外的国家采取排斥的政策。但是，西方国家控制我们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亚非国家的命运应该由亚非各国人民自己掌握。我们要努力实现各国的经济独立，这也并不是要排斥同亚非地区以外的国家经济合作。但是，我们要求改变西方殖民国家对东方落后国家的剥削状态，我们要求发展亚非各国独立自主的经济。争取完全独立是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和人民长期奋斗的目标。

在中国，自从人民作了自己国家的主人以后，我们的一切努力就是要消除长期的半殖民地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状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五年以来，我们恢复了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并且从一九五三年起开始了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这些努力，我们在各个主要生产部门，例如钢铁、棉布、粮食的生产量，都已经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但是，这些成就比之于我们的实际需要还微小得很，比之于工业高度发展的国家，我们还落后得很。正像其他亚洲国家一样，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经济。

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的亚非国家更加珍视自己的民族权利。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在国际关系中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而不应遭受迫害和屠杀。各族人民不分种族和肤色都应该享有基本人权，而不应该受到任何虐待和歧视。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对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其他争取独立的附属国人民的暴力镇压还没有停止；在南非联邦和其他地区进行着的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的迫害还没有制止；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问题还没有解决。

现在，应该说，反对种族歧视、要求基本人权，反对殖民主义、要求民族独立，坚决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已经是觉醒了的亚非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要求。埃及人民为收复苏伊士运河地区的主权和伊朗人民为收复石油主权而进行的斗争，印度对果阿和印度尼西亚对西伊里安岛恢复领土权

利的要求，获得了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同情。同样，中国解放自己领土台湾的要求也获得了亚非地区一切具有正义感的人民的支持。这证明我们亚非各国人民的互相了解、互相同情和互相关切的。

只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才有保障，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主权和领土的侵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内政的干涉，都不可避免地要危及和平。如果各国保证互不侵犯，就可以在各国的关系中创造和平共处的条件；如果各国保证互不干涉内政，各国人民就有可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选择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就是在有关各方保证尊重印度支那各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对其内政不予任何干涉的基础上达成的。据此，日内瓦会议并规定，印度支那各国不参加军事同盟和建立外国军事基地。这就是为什么日内瓦会议能够为建立和平地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在日内瓦会议之后，我们却看到了一种相反的情况在发展，这是不利印度支那各国人的利益的，也是不利于和平的。我们认为，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应该严格地和忠实地予以履行，任何方面不得加以干涉和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问题也应该按照同样的原则予以解决。

我们亚非国家需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合作，以便有助于消除我们在殖民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压迫下所造成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我们亚非国家之间的合作应该以平等互利为基础，而不应该附有任何特权条件。我们相互之间贸易来往和经济合作应该以促进各国独立经济发展为目的，而不应该使任何一方单纯地成为原料产地和消费品的销售市场。我们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应该尊重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不抹煞任何一国的特长和优点，以便互相学习和观摩。

在我们亚非地区的各国人民日益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今天，即使在目前经济和文化合作规模还不可能很大，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合作是有远大发展前途的。我们深信，随着我们亚非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各国间贸易关系中人为的外来的障碍的消除，我们亚非各国间的贸易来往和经济合作将会日益增进，文化交流也将日益频繁。

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在保证实施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国际间的争端没有理由不能够协商解决。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处境大致相同的亚非国家首先应该友好合作，实现和平共处。过去殖民统治在亚非国家间所造成的不和和隔阂，不应该继续存在。我们应该互相尊重，消除互相间可能存在的疑虑和恐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同意南亚五国总理在茂物会议联合公报中所确定的关于亚非会议的目的。我们并认为，为了对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作出贡献，亚非各国应该首先根据共同的利益，谋求相互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友好的睦邻的关系。印度、缅甸和中国曾经确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原则。这些原则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支持。本着这些原则，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关于两国侨民国籍问题的初步谈判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结果。在日内瓦会议时，中国也曾表示愿意在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印度支那各国发展友好的关系。根据这五项原则，中国同泰国、菲律宾等邻国的关系没有理由不能获得改善。中国愿以严格遵守这些原则作为它同亚非其他国家

建立正常关系的基础，并愿促进中国和日本关系的正常化。为了增进我们亚非各国间的相互了解和合作，我们建议亚非各国的政府、国会和民间团体实行互相的友好访问。

主席，各位先生，任意摆布亚非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决心维护世界和平，就没有人能够把我们拖入战争；如果我们决心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就没有人能够继续奴役我们；如果我们决心友好合作，就没有人能够分裂我们。

我们亚非国家所需要的是和平和独立，我们并无意于使亚非国家同其他地区的国家对立，我们同样需要同其他地区的国家建立和平合作的关系。

我们的会晤是难得的。尽管我们中间存在着许多不同意见，但是这不应该影响我们所具有的共同愿望。我们的会议应该对于我们的共同愿望有所表示，使它成为亚非历史值得珍贵的一页。同时，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建立起来的接触应该继续保持，以便我们对于世界和平能够作出更大的贡献。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阁下说得对，我们亚非人民必须团结起来。

让我们预祝会议成功。

求同存异，加强团结共同进行反帝反殖斗争 ——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上的补充发言

周恩来

主席，各位代表：

我的主要发言现在印发给大家了。在听到了许多代表团团长的一些发言之后，我愿补充说几句话。

中国代表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然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所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五国总理茂物会议所宣布的关于亚非会议的四项目的，而不另提建议。

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如同苏联所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谋求解决的议案，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要求是正义的，这就完全是内政和行使自己的主权，并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我们也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去年，科伦坡五国总理会议，还有亚非其他国家，都曾经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地位；而且，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现在，我首先谈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第二次大战后，亚非两洲兴起的许多独立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前一类国家并不多。但是某些人所不喜欢的，就是六亿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政治制度，而不再为帝国主义所统治了。后一类国家很多，像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亚非许多国家都是。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我们亚非国家，中国也在内，不论在经济上或文化上都落后。我们亚非会议既然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

次之，我要谈有无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所共同承认的原则。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

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有七百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这些情况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为什么在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就不能将有宗教信仰的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呢？挑起宗教纷争的时代应该过去了，因为从挑起那种纷争中得到利益的并不是我们中间的人。

第三，我要谈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中国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所进行的斗争超过一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也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艰难困苦的过程，才终于达到了成功。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蒋介石统治下所受的苦难是数也数不尽的，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取得胜利的，决不是从外输入的，这一点连不喜欢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也不能否认。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有人说，中国在国外有一千多万华侨，可能利用它们的双重国籍来进行颠覆活动。但是，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蒋介石至今还在利用极少数的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活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又有人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威胁了别人。中国境内有几十种少数民族共四千多万人。其中傣族和相同系统的壮族将近千万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好像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在中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自治区。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行自治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去颠覆别人的政府，倒是有人在中国的周围建立进行颠覆中国政府的据点。比如在缅甸边境就存在着蒋介石集团的残余武装分子，对中缅两国进行破坏。因为中缅友好，我们一直尊重缅甸的主权，信任缅甸政府去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人民选择和拥护自己的政府，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决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相反的，中国正在受着美国政府公言不讳地进行颠覆活动的害处。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十六亿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万隆精神和亚非人民之间的团结 ——1956年8月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电台上发表的演说

宋庆龄

我以特别愉快的心情访问了你们这个美丽的、爱好和平的国家。现在我也以同样的心情向这个美丽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告别。亲爱的印度尼西亚朋友们，我在你们国家已经逗留了大约十天。在这十天中，由于苏加诺总统和你们的政府的出色的安排，我能够访问了雅加达、万隆和日惹等名城及峇里岛，并且同勤劳的勇敢的印度尼西亚人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你们人民的勤劳和勇敢，你们全国人民一致对于自由的热爱，你们祖国物产的丰富和山河的壮丽，特别是到处给予我的热烈欢迎，都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请允许我利用这个机会对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再一次表示感谢。

访问印度尼西亚，使我更加亲切地体会到万隆精神的伟大。一年以前，在你们的名城万隆，二十九个亚非国家的代表第一次作为有自主权和平等的国家聚会一堂，这些国家中有许多是最近才从殖民主义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民为在这样伟大的事件中也起了一份作用而感到自豪。这次会议使亚非人民得以充分表达他们的民族愿望，并且大大推进了维护亚非和世界和平的斗争。

在回想起亚非会议的筹备工作和会议的进行情况时，人们就必须对五个发起国家，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下同）表示感谢，感谢它们的倡议和远大的理想。人们还必须感谢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感谢他们为会议作了良好的布置，提供了适当的气氛。特别出色的是苏加诺总统的开幕词，这篇演说词确定了会议整个进程的气氛，同样出色的是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老练的领导了这样一个复杂的会议，完成了对全部议程的讨论。加上其他与会者的卓越贡献和其他许多人民和国家的热烈支持，亚非会议获得了伟大的成就。

一年多以前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显示出在亚非两洲已经开始的一个新纪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短短十年中，这两个地区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在这个时期，十二亿以上的人摆脱了殖民压迫，得到了解放，并且开始重新建设他们的国家。

亚非会议表明，这一变化已经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一度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后备力量和基础的旧殖民主义制度，正在从舞台上消失。事实上，帝国主义分子可以对亚非人民发号施令，把他们当作战争、掠夺和种族歧视政策的工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亚非会议表明，这样众多的人民已经根据自己的权利作为一支力量出现，他们决心彻底清除恶毒的殖民主义制度，并且决心为各国之间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而努力。这种在趋向上的转变，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亚非会议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当代这一重大政治事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毕竟，参加会议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制度上是极为不同的，他们的宗教和政治信仰差别很大。但是会议却显示出，各国之间的团结一致超越了这些分歧，使大家可以集中全力来对付这些地区和这个时代的最迫切的问题：独立、和平和进步。理由很简单，那就是，把这些国家团结在一起的因素超过了分裂它们的因素，而它们都有过遭受殖民主义压迫和同殖民主义压迫作斗争的共

同历史，就是其中主要的因素。连那些怀着不同的意图到万隆去的人，也发现这一点是这个会议的主流，最后的结果是全体一致通过草拟的各项决议。这就进一步大大促进了亚非人民的团结，这种团结虽然还在茁长，可是已经在地区性和全世界的事务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人们把亚非会议上所获得的历史性成就叫做“万隆精神”。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亚非两洲人民在过去一年内，在反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自己的独立的斗争中，获得了许多胜利。

苏丹、突尼斯和摩洛哥已经摆脱了外国的控制。阿尔及利亚爱国者正在为争取民族自决的权利而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战斗。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已经采取了步骤，来保卫它们的主权和挫败帝国主义者把他们拖进侵略性军事联盟的各种阴谋。今天，埃及已经完全独立。它在七十年来第一次完全摆脱了外国军队的占领，这是埃及人民的一个伟大的胜利，值得我们最热切地祝贺。最近埃及宣布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是主权国家所采取的正当行动，我们完全支持这一行动。

在印度尼西亚，你们已经通过了法案，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并且在西伊里安设省。在日本，争取使日本摆脱美国控制的运动正日益高涨和壮大。日本人民大众已经表示了要同他们的两个邻邦中国和苏联建立正常关系的愿望。

今天，在中东和东南亚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是各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国家所策动的军事集团的坚决反抗。最近几个月来，东方和西方都有不只一个政治家由于没有看到这一点而成为后悔不及的人。甚至在那些已经参加了这些集团的东方国家中，万隆精神也在发生作用。在这些国家里，人们对于他们的国家被引导走上道路是否明智越来越公开表示怀疑。时间和事实已经揭穿这样一种饰词，那就是，这些集团是为了防御所谓颠覆和侵略；这些集团现在已经被看穿是把亚非人民的鲜血输送给垂死的殖民主义制度的阴谋。东方人民谁也不愿明知故犯地参与这种阴谋。

这些事实和许多其他事实表明，亚非人民的一致见解和团结行动，对于在继续进行中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已经成为决定性的力量。今天，没有一个有关这些地区的重大问题可以没有亚非国家的参加而得到解决，以前没有发言权的人已经争回了他们的发言权。我们利用这种发言权，齐声疾呼，反对外来势力对我们之中任何人所造成的损害。这就说明了，印度收回果阿的全国性运动，印度尼西亚要求收回西伊里安，中国要求收回台湾和其他岛屿等自己的领土，马来亚和其他人民争取自己的独立，为什么得到了普遍一致的支持。

亚非人民的团结使他们的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第十届联合国大会上看得很清楚，当时亚非国家的行动一致发挥了空前卓越的作用。在亚非会员国家的倡议下，对殖民主义提出尖锐抗议的议题列入了议程，尽管殖民国家及其支持者激烈地反对。在人权公约草案中，同样不顾殖民主义者的反对而列入了一项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条款。殖民国家不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对于他们所托管的领土给以帮助，这种情况在联合国托管理事会得到充分的揭露。某些国家所以要剥夺中国在联合国各机构中的合法地位，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们六万万人民的声音，这一点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而我们是一定会支持联合国亚非集团的这种活动，协助暴露殖民主义的罪行，并且激起人民对它们的义愤。

由万隆精神表现出来的亚非人民团结也以别的种种方式对世界事务发挥它的影响。证明这一点的是，作为亚洲对当前世界各项问题的答案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一致同意的十项原则，得到了各国人民的广泛拥护。这些原则是我们之间日益发展的诚挚关系和合作的基础。它们对于促进远在亚非以外的地方的和平和友好关系也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许多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更为广泛的各阶层人民承认这些原则，并且付诸实施。应该提到，在最近苏英领导人员和苏法领导人员分别发表的会谈公报中，都包含了五项原则的实质内容。对苏联来说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但是这肯定是几个西方大国第一次在双边文件中正式承认把这些和平共处的原则当作国际行为的规范。当然，这是应该欢迎的。我们并且希望这种趋势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希望西方国家在他们同东方国家的关系中能够有这种发展。

许多亚非国家自从得到解放以后，采取了独立于任何类型的集团之外的立场。这些国家的政治领袖们正确地拒绝参加帝国主义国家所扶植的军事联盟，他们谴责这种联盟。指责它们是扩大殖民侵略和企图扩大军备竞赛，从而使亚非人民遭受这一可怕的重担的祸害。由于采取了这种正义的立场，这些国家就替某些人布下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些人试图利用世界上政治和经济的制度的差别，以便在地区性和世界性问题上起破坏的作用。作为对策，这些亚非国家在对外关系中，强调那些使各国可以撇开分歧并且根据平等互利的条件实行合作的因素。今天，这种独立自主的立场已经成为亚非亿万人民的政策。这种立场既然具有这样大的力量，就必然对国际局势产生了影响。事实上，这种立场已经成为了在全世界促使和平情绪普遍滋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立场已经取得了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一切国家都非对它表明态度不可。

大家知道，从社会制度来说，我们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拥护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既然如此，也许我们对于独立自主立场这个问题的看法会使你们感到兴趣。

让我直截了当地说明，由于我们相信，达到我们所向往的和平和正义的目标的道路不只一条，我们完全理解某些亚非国家的看法，他们觉得他们从不参加任何一方的立场上可以在这个斗争中发挥他们最大的作用，这里并没有矛盾。我们大家之所以都追求同样的目标，那是这些地区的历史条件所规定的逻辑发展，至于我们追求这种目标时所走的道路之所以不同，也是各个国家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逻辑发展。有一些共同的思想支配着我们东方人的全部生活，这里列举其中的几种表现：一方面，我们坚持主张停止外来力量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另一方面，我们集中精力从事建设我们国家的艰巨工作，而要进行建设，和平就是一个根本前提。我们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目标，使我们可以恰当地看待我们之间的分歧，从而把这些分歧缩小到恰如其分的程度，并且为了在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保持正常和有益的关系而在我们之间实行高度的合作。

然而，有些地方却有人抨击某些亚非国家所采取的独立自主的立场。他们说这是“过时的”、“不道德的”。他们声称这种立场不是遵循“不讨好任何一方”的路线的。他们推论说，如果一个国家保持这种立场，它就是“对别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在这些人士中间，对于这个概念的解释和要求，看来是有些混乱的。有些人认为如果要有中立的话，那么这种中立是没有实践的，而在行动上却对他们方面当然有利。但是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这种抨击

和混乱的真正内容吧！令这些人士生气的是，连那些保持独立立场的人也公开表示，他们讨厌那些干涉其他国家事务的危险的军事“公约狂”和“实力地位”政策。令这些人士不高兴的是，东方人民认为殖民主义是主要的危险，并且把帝国主义所策动的军事公约同殖民主义等量齐观。令这些人士不安的是，那些采取独立立场的人竟然同时积极地主张人人均应享有正义并且积极地维护和平。事实上，他们所抨击的，主要是这一点。

我们中国对于某些亚非国家的独立自主的立场并没有什么混乱的看法，也不感到生气、不高兴或者不安。我们不抨击这种立场。我们极为赞赏这种立场，因为它有助于实现一切亚非人民的愿望，并且扩大了世界和平的可能性。我们认识到，尽管我们的社会制度各有不同，但是这不妨碍我们互相尊重别人的意愿，而且我们的关系可以是最友好和最合作的关系。

我想，我们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一点，特别在万隆会议以后。中国是首创五项原则的国家之一，自从制定了这些原则以来，我们一直信守这些原则。我们曾经积极努力来把五项原则的影响扩大到世界其他各地去。我们也支持亚非会议上所制定的十项原则。中国一贯努力于巩固已经建立的友好关系，并且在友好的关系还不够或者还缺乏的地方努力为友好的关系创造条件，而不问政治经济制度怎样不同，也不问国家是大是小，是近是远。我们已经大大扩大了我们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并且努力争取进一步的扩大。最重要的是，我们一贯同情并且支持一切为民族自决和建设国家而奋斗的人民。中国人民就是这样同亚非全体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在一起的。

我想用不着我多说，刚才我所说的一切都直接表现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现存的良好关系上。不过请让我补充一句，这种关系是使中国人民感到极为高兴的一件事。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改善并且加强我们同你们的联系，我们保证在这方面尽最大的努力。

我们也希望同所有的亚非姊妹国家保持这种亲切的关系。因为我们坚信，我们的历史明确地教导了我们，只有加强我们之间的团结和合作，只有忠实地坚持万隆精神，我们大家才能在消除我们经济文化落后状态在历史性工作中得到进步并且互相帮助。同时，只有坚持这条进步的道路，我们才能在维护世界和平的重大斗争中充分发挥我们的作用。

我们认识到万隆精神并不单单适用于亚非两洲。反之，它有助于在最广大的地区促进协商和解、友好合作的思想。在这方面，中国随时准备尽力来解决同某些国家的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到现在为止不能说是最好的。这特别是适用于我们同美国的关系。一年多以前，我国周恩来总理在万隆声明，我们准备同美国政府的高级代表会晤，以便解决我们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从而为改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局势提供良好的气氛。中美两国大使在日内瓦的会谈曾使我们感到有些高兴，但是现在大家都很清楚，要得到根本的结果就得举行真正的高级会议。为了这个目的，我愿再一次提出中国人民和政府的这一建议，希望现在它会得到美国方面的适当响应。

朋友们，由于亚非会议的召开和它所显示出来的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的团结一致，你们的国家和你们的人民已经为创造历史建立了卓越的功绩。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的前进，并且由于我们必须迎击殖民主义者破坏我们团结的新的进攻和阴谋，就需要我们每天创造新的历史。我们必须进一步努力，来扩大我们已经得到的伟大胜利，并且表明被压迫人民和国家的觉醒是能够扫清

一切障碍并且继续获得更大胜利的一支力量。

中国人民将永远在这个令人鼓舞的事业上同其他亚非人民站在一起。我们欢迎一切有助于促进这个事业的行动。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最近建议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符合国际气氛的条件下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可能性，我们欢迎这个建议。我们愿意尽一切可能来加强我们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同他们团结起来为我们本国人民的幸福和繁荣，为亚洲、非洲和世界的和平而共同奋斗。

愿亚非所有国家得到独立和自由！

亚非人民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和国际合作万岁！

团结起来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1964年2月在锡兰（斯里兰卡旧称）斯里帕里学院的演讲

宋庆龄

我应邀来参加帕里讲演会，并且同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和诗人、中国人民的朋友泰戈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感到很荣幸。

我能够来增进锡中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从而表达我们之间日益发展的友谊，也感到很荣幸。

我认为，我们应该尽一切力量通过密切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来进一步发展这种友谊。更重要的是，作为新兴力量的成员，我们面对着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才能保障我们的独立，才能创造我们所需要的和平环境来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很明显的，锡兰和中国之间虽然远隔高山重洋，却有许多因素使我们两国人民真正成为兄弟姊妹。

我们今天的世界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我们的诗人泰戈尔所歌咏的时期。在封建主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旧世界正在崩溃，但还没有临到末日。旧制度发挥过它们的历史作用，现在已经没有用处了，再也不能解决人类的迫切问题，再也不能给人们所需要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安全了。像在历史上做过的那样，人类已经着手缔造一个新的世界，一个能够提供旧世界所不能提供的新世界。

这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醒。他们正在摆脱迷信，摆脱那种以为旧秩序是不可改变的想法。以新的观点武装起来的人民，决心要从生活中消除压迫、剥削和战争的根源。他们决心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这是通向和平世界的道路。

这种伟大政治觉醒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民认识到帝国主义是实现这样一个新世界的主要障碍。旧世界虽然正在走向死亡，但是还没有消灭。有些人想在人民面前掩盖这一事实，企图使人民在政治上解除武装，但是帝国主义本身却并不为这个大骗局帮忙。帝国主义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对人民的不断进攻，使我们认识到它依然存在，依然是人类进步的最凶恶的敌人，是今天世界上战争的唯一来源。

因此，处在过渡中的世界有两支巨大的力量在搏斗，一边是占绝大多数的人民，另一边是帝国主义。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逃避的事实。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应当怎么办？

在作出这个抉择时，必须首先决定站在哪一边。你是站在人民这一边，努力满足他们的物质和精神要求呢？还是站在剥夺人民权利那一边而只给人民带来失望、贫困和苦难呢？作出这个抉择必须是有原则的。我们知道，每件事都有两个方面，但是只有一个方面是正确的。究竟哪一方面正确，要由事实来证明。因此，问题就在于知道和理解这些事实，并且利用事实来制订行动的原则。

在一个以实用主义哲学为依据的制度里，在一个少数人掠夺和腐蚀大多数人而饱其私囊的制度里，是不可能有这样原则的。维护自由和人民民主事业，反对剥削阶级独裁统治的人，才有原则。维护经济和社会进步的事业反

对加深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人，才有原则。维护国与国之间友爱关系、互利与和平的事业，反对民族奴役，反对分而治之的策略，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任何不屈服于他们的压力之下的人民不断进行战争——这样的人才有原则。

对于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来说，没有什么可以抉择的。由于他们在旧社会中的低人一等的地位，他们不得不把自由、民主、民族解放、社会正义和世界和平作为他们的原则。通过他们自己的生活，对自己所处地位的感性认识就会加深和发展成为理性认识，从而了解他们所面临的局势。了解到谁是他们的主要敌人，了解到对敌人绝对必须进行彻底的、不懈的斗争。

二十世纪的伟大经验是：只要人民在思想上目标明确，紧密团结自己的队伍和团结同盟军，勇敢地同压迫者进行战斗，他们就能够赢得胜利。人民在战斗开始时，可能在各方面处于不利地位。敌人可能在一切物质方面都占绝对优势。但是，人民能够赢得而且确实赢得了最后胜利，力量日益壮大，而敌人则逐渐衰弱。

伟大列宁所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人民用小米加步枪先后抗击了日本侵略者、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者的坦克加飞机也说明了这一点。阿尔及利亚装备很差的游击队抗击了法帝国主义的八十万正规军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就是在今天，越南人民武装反对帝国主义的无人道的“特种战争”正在接连取得胜利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斗争的确是艰巨的、激烈的，代价确实是巨大的。但是，没有斗争就不可能有胜利。最大的痛苦莫过于遭受民族压迫和奴役，不管主人是用鞭子，还是用工资奴役制度的皮条。在斗争中付出的代价究竟比长期压迫和剥削下所遭受的损失要小得多。

全世界人民群众，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群众，就是具有这样的战斗情绪。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都切身感到这是他们国家的当务之急。因此，这是不可阻挡的汹涌澎湃的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无数次的人民胜利证明了这一点。并且清楚地表明革命的过程还远没有结束，相反地，正处于发展的高峰。

必须指出，这些胜利用这种史无前例的高度政治觉悟和永不衰退的革命意志，是在武装到牙齿和拥有破坏力空前巨大的武器的帝国主义敌人面前取得和表现出来的。这个简单的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团结起来的人民力量要比任何武器大好多倍，它说明决定人类命运的是人民而不是武器。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为了完成人民正义事业而进行斗争是正确的。因此，让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尽快地消灭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消灭压迫和一切形式的剥削，制止帝国主义所挑起的战争！

要取得胜利必须知己知彼，这是斗争的规律。在压迫者和剥削者的统治下，他们的“敲骨吸髓大学”提供了反面教材，使人民认识到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掠夺本性。但是，帝国主义者为了在人民的运动面前耍花招，不得不隐藏他们真正的意图，采取多种多样的手法。过去的粗暴做法再也行不通了。他们不得不考虑到人民的愿望，但是只是歪曲和利用这些愿望，在群众思想上制造混乱，使群众相信他们的死敌会真正关心他们的利益。这就使对敌人的了解更加复杂了。但是，归根到底，帝国主义者总是按帝国主义者的方式行事，而不会是按别的方式。不管他们怎样伪装，不管为他们服务的人如何美化他们，人民的雪亮的眼睛总会看穿他们的真面目。

有的国家也可能得到名义上的独立，但是经济枷锁会使它们受到帝国主

义更严密控制。新老殖民主义者都可能这样做。试图打破这些枷锁的爱国者立即被杀害了。英勇的卢蒙巴的典型例子是令人难忘的。民主可以大谈特谈，但是帝国主义扶植最反动的官吏来执政并且用武力来维护他们的地位。在越南和南朝鲜就存在着彻头彻尾的法西斯政权的典型例子。帝国主义者可以大声喧嚷，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但是只要你稍离开了一点他们的狗咬狗的生活概念，你的制度就会被他们用各种各样的公开的和隐蔽的方式所颠覆。我们看到这样的典型例子：美帝国主义不断侵扰古巴，声称在拉丁美洲社会主义制度是既不能接受也不能谈判的。帝国主义者还大谈和平，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者却每年用六百多亿美元在这里或那里挑起战争，并且准备把世界投入一场核大火之中。

事实就是这样。这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但最奇怪的是，有些人决心不看事实，甚至背弃自己过去讲过的话。这些人要我们相信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已经死亡。他们想使人民陷入危险的麻痹大意的精神状态。他们要人民相信没有必要对一个仍然是危险的敌人保持警惕，只要等待别人用银盘子把美好的日子送来就行了；同时，也没有必要进行斗争，人民能够同压迫他们的人和平共处。现在敌人被描绘成“明智”、“谅解”和“爱好和平”的人。这些人指责人民群众的行动“轻率”，他们想通过几个国家首脑之间的私用的“热线”来解决世界上的一切问题，而不管世界人民认为什么是适当的解决办法。在国际事务中，他们愿意迎合帝国主义者，在使别国的主权和安全遭到风险的情况下，同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他们把兄弟看做敌人，把敌人看做兄弟。

这些人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世界局势变了。但是，他们不能提出丝毫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证据。实际情况是，我们正处在过渡时期。人民还是人民，帝国主义还是帝国主义；他们并没有调换位置，他们之间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如果泰戈尔今天还活在我们中间的话，这位诗人一定会强烈地抗议目前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实行的分而治之的政策。

这个过渡时期正好发生在科学时代了。科学也对世界的政治生活发生影响，因此我们能够确切地了解起作用的各种势力和估计它们的力量对比。我们通过科学分析知道，特别是由于过去二十年来的人民斗争出现了新的力量组合，民主解放的力量正在胜过资本主义的力量。人民要求和平的意志正在变得比帝国主义想靠战争发财的欲望更有力量。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的本性，也丝毫没有减弱它一心要扭转整个历史潮流的愿望。世界上的一切主观愿望都不能抹煞帝国主义者自己的行为。看来，那些由于吓破了胆而抛弃原则、拥抱帝国主义者的人，每次得到的都是一记响亮的耳光。他们不管怎样投降也满足不了他们想讨好的人。这是不足为奇的，帝国主义者也想把他们全部从地球上消灭掉！

人们在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和目前的局势以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曾经鼓舞全世界被压迫者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的那些革命理论今天仍然有效，在它们的逻辑和道理面前，一切企图篡改它们的卑鄙勾当都是无能为力的。

近几年来，在捍卫我们时代的真理的人和抛弃这些真理的人之间发生了尖锐的争论。抛弃这些真理的人迫不及待地同帝国主义者勾结，背弃本国人民的利益，背弃仍然在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的利益，背弃正在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利益。他们在帝国主义核威胁面前仓皇退却，他们以

和平的名义作交易，使战争危险突然加剧。当这些无耻的行为被揭露时，他们就不惜进行种种诬蔑和恶毒的捏造，包括最反动的种族主义辱骂，来反对那些拒绝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的人。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对真理、对一个国家及其人民发动这样规模的诽谤运动，是现代史上所罕见。他们企图把中国争取和平的坚定立场和愿意在原则的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一切问题的态度说成是好战的态度。他们企图把中国对所有反对压迫和剥削的人们所给予的真挚同情和支持，歪曲为疯狂地希望把世界化为灰烬。他们企图把中国坚持原则的立场，诋毁为对世界抱着盲目的教条主义的观点。

这些人颠倒黑白，在道德上堕落到如此地步，的确是可悲的。但是，同样令人感到震惊的是，他们竟如此泰然自若地抛弃自己的朋友，并且如此轻率地作出可能使全世界人民大众遭受无穷苦难的决定。当然必须揭露和驳斥这些人。生活的真理处在危险之中。由于中国站在这个斗争的最前线，中国成了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遭受集中攻击的目标。构成真正的国际主义的一个要素的爱国主义，曾经使泰戈尔能够真正理解他的邻国的问题。他在一九一六年去日本访问的途中经过新加坡时，对中国码头工人的熟练劳动有特别深刻的印象。因此他预言，一旦中国人民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们飞速前进。他还说，中华民族越是前进，一些自私的大国就会越起劲地反对它，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它。泰戈尔对于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性质和必要性是非常了解的。

头号帝国主义者想吓唬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屈服。他们把许多沉重的负担加在我们身上，以为这样就可以把我们压倒，使我们屈膝。但是，一个人毕竟必须过一种无愧于自己的生活，正直的人是不可能过一种存心说谎和骗人的生活的，特别是在涉及全人类的安全、幸福和进步的时候。除了挺起腰杆，勇敢地把担子挑起来以外，没有别的出路。

古话说：“真金不怕火烧。”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真理是不怕诽谤和不义之火的。保卫真理也总是要经历同样的进展过程，从取得少数人的支持到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目前，有些人可能弄不清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主张是什么，但是这只能是暂时的。时间是对真理有利的，是对维护人民权利、坚决反对把人民的权利出卖给人民死敌的人们有利的。

企图孤立中国的人们自己正在被孤立，这一点一刻比一刻更清楚了。人民自己会发现，这些人已经出卖了自己的革命传统，来换取帝国主义的一大堆永远不能兑现的支票。中国人民知道自己的朋友遍天下，因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民的钢铁般的联系，是在反对共同敌人的共同斗争中铸造成的。

中国人民相信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感到自己是同时代合拍的，我们同其他国家的人民是心连心的。如果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斗争，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我们肩并肩地互相帮助，就可以走向一个所有国家都是独立平等、各国人民都享有民主和社会正义的世界，走向体现人类以及文化团结的和平世界。

答中外记者问 ——1965年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答词

陈毅

英国和香港当局让美国利用香港作为侵略越南的一个据点，使香港居民感到不安。中国政府认为，问题不仅是把香港作为侵略越南的据点，而且是准备把香港将来作为侵略中国的据点。中国政府对此坚决反对。英国政府这种做法是最愚蠢的，希望它为了自己的利益采取比较聪明的作法。否则，到必要时，中国要采取措施。

美国肆意扩大侵越战争，英国关于“马来西亚”的做法，所有这些当然不仅是对付越南，对付印度尼西亚，他们的目标也是对付中国。美国帝国主义从来不掩饰它的全球战略是要称霸全世界。美军不是简单地到香港去度假。英国首相威尔逊先生也宣布过英国不放弃苏伊士运河以东的任何一个据点和军事基地。英帝国主义在越南战争的一些具体做法上，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对于巩固全世界的殖民主义制度，他们没有什么根本分歧。美国有可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大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有什么理由认为，英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不会回到它们原来的亚洲、非洲的殖民地呢？所以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斗争，都是一个整体。全世界人民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在这个斗争中互相支援。

越南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不单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而是对全世界反帝反殖的斗争做出贡献。如果战争扩大到中国，中国要坚决抵抗，一定要打败美国主义。

中国不只是看到一个台湾问题、一个香港问题、一个澳门问题，我们看到的是美帝的全球战略。要准备一场全世界的战斗，才能打败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能够允许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有安全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很相信美帝国主义的话，总有一天他们要上当的。

赫鲁晓夫说，中国自己不解放香港和澳门，而让亚洲人非洲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让他们为中国火中取栗。这是恶意的挑拨。赫鲁晓夫想指挥中国的政策。我们回答说，中国的政策要由中国决定，不能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决定。

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中，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今天美国是否要同中国进行大战，这要美国总统和五角大楼决定。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不存在任何幻想。为了反对美国侵略，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不会准许他们的领导作出这样罪恶的决定。究竟是美帝国主义灭亡，还是全世界人民灭亡？肯定是美帝国主义灭亡，全世界人民大翻身。中国有一句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要反对美帝国主义，不下最后决心而始终处于动动摇摇的状态，这只会失败，不可能胜利。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同朝中人民进行过较量，现在正同英雄的越南人民进行较量。美国承认这种较量对它很不利。对我们来说，对全世界人民来说，

这种较量大有好处，它把全越南人民团结起来了，把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了，把全世界反帝反殖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请记者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他欺负中国人、朝鲜人、越南人、高棉人、老挝人、印度尼西亚人、刚果人、多米尼加人。连它的盟友法国也受它的欺侮。受它欺侮的人起来反对它，变为中国的朋友，这是美国造成的。

如果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大陆，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打败它。那时，战争就没有界线了。界线是美国打破的，不是中国打破的。我们愿意遵守界线，而美国却恣意打破界线，横冲直撞。打败了美帝之后，在全世界真正结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时代就会到来。世界真正变为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大家庭的美好前景，一定要到来。为这个伟大目的，中国准备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中国决不采取现代修正主义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

现在的问题是，或者按照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把殖民主义的枷锁重新加在各国人民的身上，使各国人民遭受奴役，遭受宰割；或者按照敢于斗争、敢于反帝的人民的意志，坚决进行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结束殖民主义制度，使全世界能够真正实现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这两条道路，人们只能选择一条。现代修正主义者苟且偷安的办法，是绝对行不通的。中国愿意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美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1972年2月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宴会上的致辞

周恩来

首先，我高兴地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向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以及其他的美客人表示欢迎。

同时，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

尼克松总统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二十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目前，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争取缓和紧张局势，已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强烈的愿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人民这种共同愿望，总有一天是要实现的。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中国政府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公开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这是我们一贯奉行的方针。我们注意到尼克松总统在来华前的讲话中也谈到，“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1982年9月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的讲话

邓小平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三十二年，再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所以，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

中国宣布这个决策，从大的方面来讲，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地结束殖民统治时代，在世界公论面前会得到好评。所以英国政府应该赞成中国的这个决策。中英两国应该合作，共同来处理香港问题。

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我们要同香港各界人士广泛交换意见，制定我们在十五年中的方针政策以及十五年后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就应该不仅是香港人民可接受的，而且在香港的其他投资者首先是英国也能够接受，因为对他们也有好处。我们希望中英两国政府就此进行友好的磋商，我们将非常高兴地听取英国政府对我们提出的建议。这些都需要时间。为什么还要等一、二年才正式宣布收回香港呢？就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同各方面进行磋商。

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就会影响中国的四化建设。我认为，影响不能说没有，但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人们还议论香港外资撤走的问题。只要我们的政策适当，走了还会回来的。所以，我们在宣布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同时，还要宣布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所实行的制度和政策。

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一九九七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

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再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希望从夫人这次访问开始，两国政府官员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很好的磋商，讨论如何避免这种灾难。我相信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不担心这一点。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制造混乱是很容易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两国政府，而且包括政府要约束厂商及各行各业，要不作妨碍香港繁荣的事。不仅在这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不要发生大的波动，一九九七年中国接管以后还要管理得更好。

我们建议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解决今后十五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十五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

中国决不会沦亡

——1905年8月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讲

孙中山

兄弟此次东来，蒙诸君如此热心欢迎，兄弟实感佩莫名。窃恐无以副诸君欢迎盛意，然不得不献兄弟见闻所及，与诸君商定救国之方针，当亦诸君所乐闻者。兄弟由西至东，中间至米国（即美国，下同）圣路易斯观博览会，此会为新球开辟以来的一大会。后又由米至英、至德、至法，乃至日本。离东二年，论时不久，见东方一切事皆大变局，兄弟料不到如此，又料不到今日与诸君相会于此。近来我中国人的思想议论，都是大声疾呼，怕中国沦为非、澳。前两年还没有这等的风潮，从此看来，我们中国不是亡国了。这都由我国文明的进步日进一日，民族思想日长一日，所以有这样的影响。从此看来，我们中国一定没有沦亡的道理。

今日试就我游历过各国的情形，与诸君言之。

日本与中国不同者有二件：第一件是日本的旧文明皆由中国输入。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故皆具有独立尚武的精神，以成此拯救四千五百万人于水火中之大功。我中国人则反抱其素养的实力，以赴媚异种，故中国的文明遂至落于日本之后。第二件如日本衣、食、住的文明乃由中国人者，我中国已改从满制。则是我中国的文明已失之日本了。后来又有种种的文明由西洋输入。是中国文明的开化虽先于日本，究竟无大裨益于我同胞。

渡太平洋而东至米国，见米国之人物皆新。论米人不过由四百年前哥伦布开辟以来，世人渐知有米国；而于今的文明，即欧洲列强亦不能及。去年圣路易斯的博览会为世界最盛之会，盖法人手中将圣路易斯买来之后，特以此会为纪念。米国从前乃一片洪荒之土，于今四十余州的盛况，皆非中国所能及。兄弟又由米至英、至法、至德、见各洲从前极文明者，如罗马、埃及、希腊、雅典等皆败，极野蛮者如条顿民族等皆兴。中国的文明已有数千年，西人不过数百年，中国人又不能由过代之文明变而为近世的文明；所以人皆说中国最守旧，其积弱的缘由也在于此。殊不知不然。不过我们中国现在的人物皆元用，将来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力强，易旧为新。盖兄弟自至西方则见新物，至东方则见旧物，我们中国若能渐渐发明，则一切旧物又何难均变为新物？如英国伦敦，先无电车而用马车，百年后方用自行车而仍不用电车。日本去年尚无电车，至今而始盛。中国不过误于从前不变，若如现在的一切思想议论，其进步又何可思议！又皆说中国为幼稚时代，殊不知不然。中国盖实当老迈时代。中国从前之不变，因人皆不知改革之幸福，以为我中国的文明极盛，如斯已足，他何所求。于今因游学志士见各国种种的文明，渐觉得自己的太旧了，故改革的风潮日烈，思想日高，文明的进步日速。如此看来，将来我中国的国力能凌驾全球，也是不可预料的。所以各志士知道我们中国不得了，人家要瓜分中国，日日言救中国。倘若是中国人如此能将一切野蛮的法制改变起来，比米国还要强几分的。何以见之？米国无此好基础。虽西欧英、法、德、意皆不能及。我们试与诸君就各国与中国比较而言之：

日本不过我中国四川一省之大，至今一跃而为头等强国；

米国土地虽有清国版图之大，而人口不过八千万，于今米人极强，即欧人亦畏之；

英国不过区区海上三岛，其余都是星散的属地；

德、法、意诸国虽称强于欧西，土地人口均不如我国：俄现被挫于日本，土地虽大于我，人口终不如我。

则是中国土地人口，世界莫及。我们生在中国，实在幸福。各国贤豪皆羡慕此英雄用武之地，而不可得。我们生在中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反而都是沉沉默默，让异族儿据我上游，而不知利用此一片好山河，鼓吹民族主义，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以执全球的牛耳，实为可叹！

所以西人知中国不能利用此土地也，于是占旅顺、占大连、占九龙等处，谓中国人怕他。殊不知我们自己能立志恢复，他还是要怕我的。即现在中国与米国禁约的风潮起，不独米国人心惶恐，欧西各国亦莫不震惊。此不过我国民小举动耳，各国则震动若是，倘有什么大举动，则各国还了得吗？

所以现在中国要由我们四万万国民兴起。今天我们是最先兴起一日，从今后要用尽我们的力量，提起这件改革的事情来。我们放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

即如日本，当维新时代，志士很少，国民尚未大醒，他们人人担当国家义务，所以不到三十年，能把他的国家弄到为全球六大强国之一。若是我们人人担当国家义务，将中国强起来，虽地球上六个强国，我们比他还要大一倍。所以我们万不可存一点退志。日本维新须经营三十余年，我们中国不过二十年就可以。盖日本维新的时候，各国的文物，他们国人一点都不知道；我们中国此时，人家的好处人人皆知道，我们可以择而用之。他们不过是天然的进步，我们这方才是人力的进步。

又有说中国此时的政治幼稚、思想幼稚、学术幼稚，不能猝学极等文明。殊不知又不然。他们不过见中国此时器物皆旧，盖此等功夫，如欧洲著名各大家用数十余年之功发明一机器，而后世学者不过学数年即能造作，不能谓其蹭等也。

又有说欧米共和的政治，我们中国此时尚不能合用的。盖由野蛮而专制的，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这是天然顺序，不可躁进的；我们中国的改革是宜于君主立宪，万不能共和。殊不知此说大谬。我们中国的前途如修铁路，然此时若修铁路，还是用最初发明的汽车，还是用近日改良最利便之汽车，此虽妇孺亦明其利钝。所以君主立宪之不合用于中国，不待智者而后决。

又有说中国人民的程度，此时还不能共和。殊不知又不然。我们人民的程度比各国还要高些。兄弟由日本过太平洋到米国，路经檀香山，此地百年前不过一野蛮地方，有一英人至此，土人还要食他，后来与外人交通，由野蛮一跃而为共和。我们中国人的程度岂反比不上檀香山的土民吗？后至米国南七省，此地因养黑奴，北米人心不服，势颇骚然，因而交战五六年，南败北胜，放黑奴二百万为自由民。我们中国人的程度又反不如米国的黑奴吗？我们清夜自思，不把我们中国造起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来，是将自己连檀香山的土民、南米的黑奴都看做不如其了，这岂是我们同志诸君所期望的吗？

所以我们决不能说我们同胞不能共和，如说不能，是不知世界的进步，不知世界的真文明，不知享这共和幸福的蠢动物了。若使我们中国人人己能

知此，大家已担承这个责任起来，我们这一份人还稍可以安乐，若今日之中国，我们是万不能安乐的，是一定要劳苦代我四万万同胞求这共和幸福的。

若创造这立宪共和二等的政体，不是在别的缘故上分判，总在志士的经营。百姓无所知，要在志士的提倡；志士的思想高，则百姓的程度高。所以我们为志士的，总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最优秀的人格来待我们四万万同胞。

若单说立宪，此时全国的大权都落在人家手里，我们要立宪，也是要从人家手里夺来。与其能夺来成立宪国，又何必不夺来成共和国呢？

又有人说，中国此时改革事事取法于人，自己无一点独立的学说，是事先我不能培养起国民独立的性格来，后来还望国民有独立的资格吗？此说诚然。但是此时异族政府禁端百出，又从何处发行这独立的学说？又从何处培养起国民独立的性格？盖一变则全国人心动摇，动摇则进化自速，不过十数年后，这“独立”两字自然印入国民的脑中。所以中国此时的改革，虽事事取法于人，将来他们各国定要在中国来取法的。如米国之文明仅百年耳，先皆由英国取法去，于今为世界共和的祖国；倘是仍旧不变，于今能享这地球上最优的幸福不能呢？

若我们今日改革的思想不取法乎上，则不过徒救一时，是万不能永久太平的。盖这一变更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中国先是误于说我中国四千年来的文明很好，不肯改革，于今也都晓得不能用，定要取法于人。若此时不取法他现世最文明的，还取法他那文明过渡时代以前的吗？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其进步方速。兄弟愿诸君救中国，要从高尚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

宗教、国粹与国民道德和爱国热肠
——1906年7月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讲

章太炎

今日承诸君高谊，开会欢迎，实在愧不克当；况且自顾生平，并没有一长可恃，愈觉惭愧。只就兄弟平生的历史，与近日办事的方法，略讲给诸君听听。

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什么学理。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当时对着朋友，说这逐满独立的话，总是摇头，也有说是疯颠的，也有说是叛逆的，也有说是自取杀身之祸的。但兄弟是凭他说个疯颠，我还守我疯颠的念头。

壬寅春天，来到日本，见着中山，那时留学诸公，在中山那边往来，可称志同道合的，不过一两个人。其中偶然来往的，总是觉得中山奇怪，要来看看古董，并没有热心救汉的心思，暗想我这疯颠的希望，毕竟是难遂的了，就想披起袈裟，做个和尚，不与那学界政界的人再通问讯。不料监禁三年以后，再到此地，留学生中助我张目的人，较从前增加百倍，才晓得人心进化，是实有的。以前排满复汉的心肠，也是人人都有，不过潜在胸中，到今日才得发现。自己以前所说的话，只比得那“鹤知夜半，鸡知天明”。夜半天明，本不是那只鹤、那只鸡所能办得到的，但是得气之先，一声胶胶喔喔的高啼，叫人起来做事，也不是可有可无。到了今日，诸君所说民族主义的学理，圆满精致，真是后来居上，兄弟岂敢自居先辈吗？只是兄弟今日还有一件要说的事，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颠，断然不肯承认，除那笑傲山水诗豪画伯的一流人，又做别论，其余总是一样。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颠，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颠，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什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诸君且看那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可不是有神经病的么？那提出民权自由的路索，为追一狗，跳过河去，这也实在是神经病。……像我汉人，明朝熊廷弼的兵略，古来无二，然而看他《气性传》说，熊廷弼简直是个疯子。近代左宗棠的为人，保护满奴，残杀同类，原是不足道的。但他那出奇制胜的方略，毕竟令人佩服。这左宗棠少年在岳麓书院的事，种种奇怪，想是人人共知。更有德毕士马克，曾经在旅馆里头，叫唤堂官，没有答应，便就开起枪来，这是何等性情呢？仔细看来，那六人才典功业，都是神经病里流出来的。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现面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什么气候。兄弟尝这毒剂，是最多的。算来自戊戌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

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别事株连，或是普拿新党，不专为我一人；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但兄弟在这艰难困苦的大漩涡里头，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凭你什么毒剂，这神经病总治不好。或者诸君推重，也未必不由于此。若有人说，假如人人有神经病，办事必定紊乱，怎得有个条理？但兄弟所说的神经病，并不是粗豪卤莽，乱打乱跳，要把那细针密缕的思想，装载在神经病里。譬如思想是个货物，神经病是个汽船，没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经病，必无实济；没有神经病，这思想可能自动的么？以上所说，是略讲兄弟平生的历史。

至于近日办事的方法，一切政治、法律、战术等项，这都是诸君已经研究的，不必提起。依兄弟看，第一要在感情，没有感情，凭你有百千万亿的拿破仑、华盛顿，总是人各一心，不能团结。当初柏拉图说：“人的感情，原是一种醉病”，这仍是归于神经的了。要成就这感情，有两件事是最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先说宗教。近来像宾丹、斯宾塞尔那一流入崇拜功利，看得宗教都是漠然。但若没有宗教，这道德必不得增进，生存竞争，专为一己，就要团结起来，譬如一碗的干麸子，怎能团得成面？欧、美各国的宗教，只奉耶稣基督，……若没有这基督教，也断不能到今日的地位。那伽得《社会学》中，已把斯宾塞尔的话，驳辩一过。只是我们中国的宗教，应该用哪一件？若说孔教，原有好到极处的。就是各种宗教，都有神秘难知的话杂在里头，惟有孔教，还算干净，但他也有极坏的。因为孔子当时，原是贵族用事的时代，一班平民，是没有官做的，孔子心里，要与贵族竞争，就教化起三千弟子，使他成就做官的材料。从此以后，果然平民有官做了。但孔子最是胆小，虽要与贵族竞争，却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他《春秋》上虽有“非世卿”的话，只是口诛笔伐，并不敢实行的，所以他教弟子，总是依人作嫁，最上是帝师王佐的资格，总不敢觊觎帝位。及到最下一级，便是委吏乘田，也将就去做了。诸君看孔子生平，当时摄行相事的时候，只是依傍鲁君，到得七十二国周游数次，日暮途穷，回家养老，那时并且依傍季氏，他的志气，岂不一日短一日么？所以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自汉武帝专尊孔教以后，这热衷于富贵利禄的人，总是日多一日。我们今日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像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若说那基督教，西人用了，原是有益；中国用了，却是无益。因中国人的信仰基督，并不是崇拜上帝，实是崇拜西帝。最上一流，是借此学些英文、法文，可以自命不凡；其次就是饥寒无告，要借此混日子的；最下是凭仗教会的势力，去鱼肉乡愚，陵轹同类。……孔教、基督教，既然必不可用，究竟用何教呢？我们中国，本称为佛教国。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但今日通行的佛教，也有许多的杂质，与他本教不同，必须设法改良，才可用得。……

有的说中国佛教，已经行了二千年，为甚没有效果？这是有一要点。大概各教可以分为三项：一是多神教，二是一神教，三是无神教。也如政体分为三项：一是贵族政体，二是君主政体，三是共和政体。必要经过君主政体的阶级，方得渐入共和政体；若从这贵族政体，一时变成共和政体，那共和政体必带种种贵族的杂质。必要经过一神教的阶级，方得渐入无神教，若从

这多神教一时变成无神教，那无神教必带种种多神教的杂质。中国古代的道教，这就是多神教。后来佛教进来，这就是元神教，中间未经一神教的阶级，以致世人看佛，也是一种鬼神，与那道教的种种鬼神，融化为一。就是刚才所说的烧纸、拜忏、化笔、扶箕等类，是袁了凡、袁尺木、罗台山诸人所主张的。一般社会，没有一人不堕这坑中，所以佛教并无效果。如令基督教来，崇拜一神，借摧陷廓清的力，把多神教已经打破，所以再行佛教，必有效果可见的了。

有的说佛教看一切众生，皆是平等，就不应生民族思想，也不应说逐满复汉。殊不知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满洲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且如婆罗门教分出四性阶级，在佛教中最所痛恨。如今清人待我汉人，比那刹帝利种虐待首陀更要利害十倍。照佛教说，逐满复汉，正是分内的事。又且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都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又说：“杀了一人，能救众人，这就是菩萨行。”其余经论，王贼两项，都是并举。所以佛是王子，出家为僧，他看做王就与做贼一样，这更与恢复民权的话相合。所以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上起见，固是最要；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亦是最要。总望诸君同发大愿，勇猛无畏。我们所最热心的事，就可以干得起来了。

次说国粹。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兄弟这话，并不像做《格致古微》的人，将中国同欧洲的事，牵强附会起来；又不像公羊学派的人，说什么三世就是进化，九旨就是进夷狄为中国，去仰攀欧洲最浅最陋的学说，只是就我中国特别的长处，略提一二：

先说语言文字。因为中国文字，与地球各国绝异，每一个字，有他的本义，又有引申之义。若在他国，引申之义，必有语尾变化，不得同是一字，含有数义。中国文字，却是不然。且如一个天字，本是苍苍的天，引申为最尊的称呼，再引申为自然的称呼。三义不同，总只一个天字。所以有《说文》、《尔雅》、《释名》等书，说那转注、假借的道理。又因中国的话，处处不同，也有同是一字，彼此声音不同的；也有同是一物，彼此名号不同的。所以《尔雅》以外，更有《方言》，说那同义异文的道理。这一种学问，中国称为“小学”，与那欧洲“比较语言”的学，范围不同，性质也有数分相近。但是更有一事，是从来小学家所未说的，因为造字时代先后不同，有古文大篆没有的字，独是小篆有的；有小篆没有的字，独是隶书有的；有汉时隶书没有的字，独是《玉篇》、《广韵》有的；有《玉篇》、《广韵》没有的字，独是《集韵》、《类篇》有的。因造字的先后，就可以推见建置事物的先后。且如《说文》兄、弟两字，都是转注，并非本义，就可见古人造字的时代，还没有兄弟的名称。又如君字，古人只作尹字，与那父字，都是从手执杖，就可见古人造字的时代，专是家族政体，父权君权，并无差别。其余此类，一时不能尽说。发明这种学问，也是社会学的一部。若不是略知小学，史书所记，断断不能尽的。近来学者，常说新事新物，逐渐增多，必须增造新字，才得应用，这自然是最要，但非略通小学，造出字来，必定不合六书规则。

至于和合两字，造成一个名词，若非深通小学的人，总是不能妥当。又且文辞的本根，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学，所以文章优美，能动感情。两宋以后，小学渐衰，一切名词术语，都是乱搅乱用，也没有丝毫可以动人之处。究竟什么国土的人，必看什么国土的文，方觉有趣。像他们希腊、梨俱的诗，不知较我家的屈原、杜工部优劣如何？但由我们看去，自然本种的文辞，方为优美。可惜小学日衰，文辞也不成个样子。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

第二要说典章制度。我们中国政治，总是君权专制，本没有什么可贵，但是官制为什么要这样建置？州郡为什么要这样分划？军队为什么要这样编制？赋税为什么要这样征调？都有一定的理由，不好将专制政府所行的事，一概抹杀。就是将来建设政府，哪项须要改良？哪项须要复古？必得胸有成竹，才可以见诸施行。至于中国特别优秀的事，欧、美各国所万不能及的，就是均田一事，合于社会主义。不说三代井田，便从魏晋至唐，都是行这均田制度。所以贫富不甚悬绝，地方政治容易施行。请看唐代以前的政治，两宋至今，哪能仿佛万一。这还是最大最繁的事，其余中国一切典章制度，总是近于社会主义，就是极不好的事，也还近于社会主义。兄弟今天，略举两项：一项是刑名法律。中国法律，虽然近于酷烈，但是东汉定律，直到如今，没有罚钱赎罪的事，惟有职官妇女，偶犯笞杖等刑，可以收赎。除那样人之外，凭你有陶朱、猗顿的家财，到得受刑，总与贫人一样。一项是科场选举。这科举原是最恶劣的，不消说了，但为甚隋、唐以后，只用科举，不用学校？因为隋、唐以后，书籍渐多，必不能像两汉的简单。若要入学购置书籍，必得要无数金钱。又且功课繁多，那做工营农的事，只可搁起一边，不能像两汉的人，可以带经而锄的。惟有律赋诗文，只要花费一二两的纹银，就把程墨可以统统买到，随口咿唔，就像唱曲一般，这做工营农的事，也还可以并行不悖，必得如此，贫人才有做官的希望。若不如此，求学入官，不能不专让富人，贫民是沉沦海底，永无参预政权的日子了。这两件事，本是极不好的，尚且带几分社会主义的性质，况且那好的么？我们今日崇拜中国的典章制度，只是崇拜我的社会主义。那不好的，虽要改良；那好的，必定应该顶礼膜拜，这又是感情上所必要的。

第三要说人物事迹。中国人物，那建功立业的，各有功罪，自不必说，但那俊伟刚严的气魄，我们不可不追步后尘。与其学步欧、美，总是不能像的；何如学步中国旧人，还是本来面目。其中最可崇拜的，有两个人：一是晋未受禅的刘裕，一是南宋伐金的岳飞，都是用南方兵士，打胜胡人，可使我们壮气。至于学问上的人物，这就多了。中国科学不兴，惟有哲学，就不能甘居人下。但是程、朱、陆、王的哲学，却也无甚关系。最有学问的人，就是周秦诸子，比那欧洲、印度，或者难有定论；比那日本的物茂卿、太宰纯辈，就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了。日本今日维新，那物茂卿，太宰纯辈，还是称颂弗衰，何况我们庄周、荀卿的思想，岂可置之脑后？近代还有一人，这便是徽州休宁县人姓戴名震，称为东原先生，他虽专讲儒教，却是不服宋儒，常说“法律杀人，还是可救；理学杀人，便无可救”，因这位东原先生，生在满洲雍正之末，那满洲雍正所作朱批上谕，责备臣下，并不用法律上的说话，总说“你的天良何在？你自己问心可以无愧的么？”只这几句宋儒理学的话，就可以任意杀人。世人总说雍正待人最为酷虐，却不晓是理学助成的。因此那个东原先生，痛哭流涕，做了一本小小册子，他的书上，并没有明骂

满洲，但看见他这本书，没有不深恨满洲。这一件事，恐怕诸君不甚明了，特为提出。照前所说，若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这是最紧要的。就是没有相干的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当初顾亭林要想排斥满洲，却无兵力，就到各处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也是此意。

以上所说，是近日办事的方法，全在宗教、国粹两项，兄弟今天，不过与诸君略谈，自己可以尽力的，总不出此两事。所望于诸君的，也便在此两事。总之，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更传染与四万万的人。至于民族主义的学理，诸君今日，已有余裕；发行论说刊刻报章的事，兄弟是要诸君代劳的了。

推倒专制，建设共和
——1912年8月在蒙自绅商学三界欢迎会上的演讲

蔡锷

今日承绅、商、学三界欢迎，使鄙人得与父老子弟相见于一堂，不可无一言以答诸君之雅意，藉以展鄙人之愚忱。诸君亦知吾辈倡言改革，必推倒专制，建设共和，其目的之所在乎？缘专制国以君主为神圣不可侵犯，土地视为私产，人民视为奴隶。故挥霍财产，有如泥沙；草菅人命，有如牛马；恣睢暴戾，听其所为，人民不得而干涉之、抵抗之。以此，人民之无国家观念，理乱置之不闻。而对国家负责任者，厥唯君主一人。下此仅有少数臣工，仰其鼻息，代君主而负担之。此种国家，在锁港时代，犹堪闭关自雄。一旦与欧美文明国遇，如摧枯拉朽，岌岌不能终日。前清晚季所以削弱而不能自存者，职是故也。共和国则不然，人民即一国之主体，凡制定宪法，推举总统，选任议员，皆出自一班人民之公意。故人民对于国家，立于最高无上之地位，即对于国家负无穷之义务，担无限之责任。上下一体，万众一心，乃能共济艰难，匡扶大局。美、法今日所以擅雄世界，职此之由。吾国自去秋武汉倡义以来，不数月而掀翻专制，得与美、法列强相见于二十世纪之大舞台，何幸如之！他日制定宪法，自当采其所长，弃其所短，以收折衷尽善之益。至于内力之充实，须视人民自治之能力以为衡。如美之中央政府，仅总揽外交、军政、用人诸大权，即总统之权限亦仅在乎此。各州之分政府，号有特权，其实不过将关于集权之事，间接递之中央，其中坚而饶有势力者，则最下级之自治团体也。如教育、实业、交通以及卫生、慈善诸要政，皆地方自治团体负完全责任，而无事中央及各州分政府之过问，稍闻国政者所共知也。自治发达，则内力自然充实，然后可言对外。一旦国际有伤平和，取决武力，亦非难事。况事事展布于平日，即可以保武装之平和。如滇地多山，富于矿产，多方开采，货不弃地，外人自无从垂涎。交通不便，便广兴路政，使铁道、电车、马路次第发达，即可以戢战列强铁道政策之野心，而已失之路矿权亦可徐图收回，作亡羊补牢之计。再进而推广学校，以谋教育之普及；改良警察，以保地方之安宁。岂第自治之能事已毕，即折冲御侮之宏谟，具于是矣。虽逼处强邻，夫何畏哉！孟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又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明训昭然，可深长思，愿与诸君共勉之！

团结就是力量 ——1912年8月在蒙自军政警

蔡锷

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讲鄙人今日辱承军、政、警三界欢迎，并进以祝词，奖饰溢量。自问无以副诸君之厚望，殊增惶悚。鄙人此次巡阅南防，不能不经过蒙自一次者，诚以今日之蒙自，非前此闭关时代之蒙自所可同日语。考诸蒙自之隶版图，始于元宪宗七年立蒙自千户；至元十三年改为县，隶临安路。唐、宋以前尚荒裔无稽。自前清辟为商埠，株守一隅之蒙自，一变而为商业竞争之蒙自。自滇越铁道告成，商业竞争之蒙自，再进而为国防重要之蒙自。故蒙自之安危，直接为一省之关系，间接则一国之关系也。去岁反正，虽小有变动，如天之福，不日敕平，尚未贻误大局。此皆军、政、警竭力弹压之功，用能保卫安宁，维持秩序。此后内政、外交，尤当力求进步，勿仅以回复原状为能事已毕。此则鄙人所希望于诸君者也。抑更有进者：吾辈之实行革命，宁牺牲巨万之生命、财产而不顾者，原为改良腐败之政府计，故破坏为建设而破坏也。破坏而不能建设，不第不为功之首，且为罪之魁矣。虽然，破坏固易言之，建设则难言矣。譬之改造房宇，焚毁推倒，一举手可以奏功；至大启尔宇，始而庀木，继而鸠工，非惨淡经营，永无大厦落成之日。溯自武汉倡义，以至南北政府统一之日，相距仅数阅月，同时达政治、种族革命之两目的。视美之血战六年，法之流血八十年所仅得之者，吾国则以最短之时间，最廉之代价购之，此足为破坏最易之征。德意志联邦毕士麦竭毕生之心力，始克统一完成。加富尔之于意大利，其力任巨艰，与毕士麦同，而迭经波折，不获永其天年，至今国势犹未达圆满之域。即以吾国而论，自政府统一而后，南北隔阂，意见未消，政党勃兴，竞争剧烈。内则兵变频闻，外则风云日亟。内阁迭更，国务院如暂住之大旅馆；舆论未张，参议院如新制之留声器。此皆民国前途之悲观，亦建设维艰之一般也。然吾辈既任破坏于前，自当力任建设于后。进行之法，惟永矢忠贞，和衷共济而已。夫共和以人民为主体，譬之一家之主人翁也。为公家服务者，则为公仆。仆从而负主人之委托，不克称职，是为不忠。从而家道衰微，不陷主人翁于流离失所之惨境不止，仆之罪不胜诛矣。公仆之对于国家，何以异是？和衷共济，为共和国之真精神。譬之肩舆然，前者唱许，后者唱邪，则进步自促，无中途竭蹶之虞。廉、葡相下，则秦兵不前；洪、杨交哄，而大业以坠。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区区之私，愿与诸君共勉之！

道德心和责任心
——1912年9月在北京国民党欢迎大会上的演讲

黄兴

鄙人前在上海接电，知五党合并为一大政党，极非常盼望。今日能与各党员相见，欢慰之情，欲言不尽。鄙人对于国民党未尽丝毫之力，蒙诸君推为理事，且感且惭。惟以民国成立之要素，端赖政党。然政党之组织，则当因乎时势。中国今日虽已成立，而各国尚未正式承认，即不能算完全成立。夫国家既未完全成立，则国民党亦不得为完全成立。处今日危险时代，内忧外患相逼而来，政党之责任尤为重大。凡我党员，对于民国前途，应改革者，当如何改革；当恢复者，应如何恢复？方不失为政党。日本维新不过三十年，今为世界头等国，声势震于环球者，即本于政党之力。其初，政党亦是流派纷歧，以后逐渐合并，故有今日之势力。我辈今对于民国，亦当合无数小党以成为一大政党。政党之政策，尤须规其大者远者。如日本政党政策之所定，有在百年以后者，卒能进行者，确乎政党所定之政策不错也。其政党维新何？即所谓政友会是也。中华民国今日尚未完全成立，尤当有极大之政党以维持之。国民党于此时能大加扩张，成立一极大政党，使国家日趋于巩固，是则鄙人之所最希望者也。惟有此希望，则有当注意者二事。第一，重道德心。一党有一党之道德，道德不完，则希望即不能达。权利心重，义务心即消亡于不觉。我辈今日当提倡人人除权利心，以国家为前提。党德既高，则希望可达。然党德者，又不仅本党应有之，无论何党亦当保而有之也。第二，重责任心。此后民国建设，手续甚繁，凡我党员，均应共负责任，照党纲所定次序办法，人人尽力之所能为，以巩固中国，即以巩固政党，乃不失政党之本义。因以成立之大政党，对于内政，复极力研究，以求平靖，对于国际，极力辑睦，以求平和。人人均以此责任为天职，而又保守道德，则破坏与大建设之目的以达，能享真正共和之幸福。此非独本党一党之幸，实中华民国之幸，亦实世界各国之幸。鄙人所抱持之主义如是，诸君深明之。若能对于他党极力贡献斯者，使各党同遵一轨，是尤鄙人所希望者。

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
——1912年9月在北京社会党欢迎大会上的演讲

黄兴

今日承诸君欢迎，实在感激。我国此次革命，非但种族上革命，非但政治上革命，其结果乃是社会上革命。从前专制时代，社会上受种种压制之苦，兄弟很为之悲恻。大凡富贵贫贱不平之等级，皆由政治上所造的恶。今政治上既已革命，我们当将眼界看宽，化除私心，将富贵贫贱各阶级一律打破，使全国人人得享完全幸福。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尚未十分发达，即如法、美二大共和国，社会上有资本家与劳动家之异。美洲之资本家，其一人之财产可敌全国之富。劳动家每因资本家之虐待，常有冲突之事，将来社会革命在所不免。兄弟愿诸君将社会革命包在政治革命之内，抱定国家社会主义，免去欧洲将来社会革命之事。提倡土地国有，使多数国民皆无空乏之虑。盖一国之地有限，人民则生生不穷。土地为生财之源，应供一般人民受用。然财产倘为少数人所垄断，则必如欧美之资本家，实足为社会上之恶。必须财产归公，不使少数人垄断。财产归公之后，又必广设学校，使人民教育发达，致一般社会子弟，自幼至成人，吸纳一种高上知识于脑海，脱离依赖性质，具一种独立经营性质。从此社会一切不平等之事铲削无遗，是我中华民国为世界社会革命之先导，而为各国社党之所欢迎也。兄弟于诸君有无穷之希望焉。

服从、朴素、静穆
——1912年10月在北京大学欢迎会上的演讲

梁启超

鄙人今日承本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校之欢迎，无任荣幸。适马校长所言鄙人与大学校之关系一节，当年诚有其事。今请略述一二，以告诸君。

时在乙未之岁，鄙人与诸先辈，感国事之危殆，非兴学不足以救亡，乃共谋设立学校，以输入欧美之学术于国中。惟当时社会嫉新学如仇，一言办学，即视同叛逆，迫害无所不至。是以诸先辈不能公然设立正式之学校，而组织一强学会，备置图书仪器，邀人来观，冀输入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且于讲学之外，谋政治之改革。盖强学会之性质，实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焉。在今日固视为幼稚之团体，然在当时风气未开之际，有闻强学会之名者，莫不惊骇而疑有非常之举。此幼稚之强学会，遂能战胜数千年旧习惯，而一新当时耳目，具革新中国社会之功，实亦不可轻视之也。至创设此会之诸先辈，今日存者，已寥若晨星，袁大总统即最尽力于此会之一人焉。厥后谣琢频兴，强学会之势力愈强，而政府嫉恶强学会之心亦愈甚。迄乙未之末，为步军统领所封禁，所有书籍仪器，尽括而去。其中至可感慨者，为一世界地图。盖当购此图时，曾在京师费一二月之久，遍求而不得。后辗转托人，始从上海购来。图至之后，会中人视同拱壁，日出求人来看。偶得一人来看，即欣喜无量。乃此图当时封禁，亦被步军统领衙门抄去，今不知辗转落在何处矣。及至戊戌之岁，朝政大有革新之望。孙寿州先生本强学会会员，与同人谋，请之枢府，将所查抄强学会之书籍仪器发出，改为官书局。嗣后此官书局，即改为大学校。故言及鄙人与大学校之关系，即以大学校之前身为官书局，官书局之前身为强学会，则鄙人固可为有关系之人。然大学校之有今日，实诸先辈及历任校长与教师之力。谓鄙人为创设大学校之发动人，则不敢当。

鄙人在十五年前，实不能料及今日有如是规模宏大之大学校，鄙人不能不倾佩历任校长教师与学生诸君之努力，且当为国家感谢者也。惟以今日之大学校，与欧美日本之大学校相较，则程度之相去尚远。此则鄙人于倾佩之外，不能不责望大学校之校长教师之勉为尽力，而更不能不责望大学校学生诸君之愈益努力者也。盖大学校之发达，校长教师与国家社会，虽同负其责，然与大学校有至密之关系者，实在学生诸君。诸君设不自行勉力，则大学校安能发达？敬祈诸君勉力为中国之学问争光荣。鄙人今请进数言，聊为诸君他山之助。

普通学校目的，在养成健全之人格，与其生存发展于社会之能力。此为全教育系统之精神，大学校之目的，固亦不外乎是。然大学校之所以异于普通学校而为全国最高之学府者，则因于普通目的以外，尚有特别之目的在，固不仅其程度有等差而已。特别之目的为何？曰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之文明是焉。是以施普通教育之学校，其所授之智识，为人类生活上社会上日用所必具之智识；所训练之能力，为人类生活上社会上日用所必具之能力，如是而已。而大学校之所授者，则不仅人类生活上社会上日用寻常所必具之智识能力，而为一切现象之法则，所谓科学家是焉。此不独大学校与普通学校之分在是，而大学校与专门学校之别亦全在此。盖专门学校之学科，强半与大学校相同，往往有人误视为具体而微之大学，殊

不知二者之间，固显有区别在焉。专门学校之目的，在养成社会上技术之士；而大学之目地，则在养成学问之士。故专门学校之所授，虽多科学之原理，而所重者在术，不过因学以致用；大学校之所授，虽亦有技术之智识，而所重者在学，不过因术以明学。我国往往学术连用，漫无区别；殊不知二者遇不相同，固不能连而为一者也。盖所谓学者，推究一切现象之原理原则，以说明一切之现象，于推究原理原则说明现象之外，别不另设方途以求致用；而所谓术者，则应用学理之方法、技能而已，与推究原理原则以说明现象之学，实判然不能相同者也。故科学之分类，以现象为标准：有自然之现象，即有自然之科学；有人类之现象，即有人类之科学；有社会之现象，即有社会之科学。固自然有种种之现象，亦即有自然之种种科学；因人类有种种之现象，亦即有人类之种种科学；因社会有种种之现象，亦即有社会之种种科学。若夫技术，则以人类社会实用之目的，为其分类之标准：或合人类之需要，或应社会之要求，或按国家之机关，而有种种之技术。此实为学与术根本相异之处。而大学校与专门学校之区别，亦于是而分焉。是以同一法律科目，专门学校之目的，在于养成学生法官辩护士之能力；而在大学，则惟使学生能知法律现象之原理原则，至于学生毕业以后，为法官，抑为辩护士，则非大学之第一目的矣。其他科目，莫不如是。简言之：专门学校之精神，在实际之应用；而大学校之精神，则在研究与发明。故凡人类间具有系统之智识，大学校莫不列为学科，固不问其按切实用与否也。譬如西洋大学有希腊、罗马古典之学，北京大学亦有经训考证之科，以言实用，邈乎远矣，而大学校亦不得不列之为为一科。夫大学校之目的，既在研究高深之学理，大学校之学课，又复网罗人类一切之系统智识，则大学校不仅为一国高等教育之总机关，实一国学问生命之所在，而可视之为为一学问之国家者也。且学问为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国之大学，即为一国文明幸福之根源，其地位之尊严，责任之重大，抑岂我人言语所能尽欤！诸君受学于此最尊严之大学，负研究学问之大任，鄙人所欲进一言为诸君勉者，亦唯祈诸君能保持大学之尊严，努力于学问事业而已。

抑我又有言者，则前清学制之弊，至今犹令人痛恨不已。其误国最甚者，莫如奖励出身之制。以官制为学生受学之报酬，遂使学生以得官为求学之目的，以求学为得官之手段。其在学校之日，所希望者，为毕业之分数与得官之等差；及毕业以后，即抛弃学业而勉力作官矣。即以海外之留学生日浸染于外国之学风者而言，当留学之时，固多以学问为目的，而勉力求学；然毕业以后，足迹甫履中国，亦即沾染此恶风，抛弃其数年克苦所得之学问，而努力作官矣。故中国兴学十余年，不仅学问不发达，而通国学生，且不知学问为何物。前清学制之害，庸可胜言耶！是以鄙人今所更欲为诸君勉者，则望诸君以学问为目的，不当以学问为手段。盖大学力研究学问之地，学问为神圣之事业。诸君当为学问而求学，于学问目的之外，别无他种目的，庶不愧为大学生。若于学问目的之外，别有他种目的，则读学问之神圣，伤大学之尊严，尚能谓之研究学问乎？诸君勉之！努力问学之事业，以发挥我中国之文明，使他日中国握世界学问之牛耳，为世界文明之导师，责任匪轻。诸君其勉力为我中国文明争光荣！鄙人今尚欲进数言于诸君之前者，则为今日之学风问题。夫今日学风之坏，人所同慨。鄙人所欲言者，亦非仅指大学一校。惟以大学为全国最高之学府，大学学风足为全国学风之表率，是则鄙人所不能不以此责望于我大学生诸君，祈有以表率我全国之学风，而改善我全

国之学风者也。语时或有开罪之处，尚望诸君谅之焉。

（一）服从。言今日学风之坏，莫过于学生缺乏服从之德。不服教师之训导，不受校长之约束，放恣乱为，动起风潮，遂致德无由进，业无由成，我可敬可爱之青年学生，几成为可鄙可贱之无业游民。言念及此，易胜浩叹！诸君闻此言，或且有谓鄙人谬悖，欲以奴隶之行，责之共和国之大学生者矣。此在不以服从为然者，必谓学生当有自由，校长教师，等是同类，安有服从之可言？服从二字，乃奴隶之所受，詎可加之于我学生之身？然学生以德之未修，学之未成，始入学校求学，则在学校之中，自当服从校长教师之训导；不然，又安名为学生？学生中有言启由者，实不学误之也。且一国之中，一切皆可言自由，唯军队与学生，乃不能言自由。军队言自由，则不仅全军瓦解，不能成军，且足以扰乱秩序，其危险莫可名状。学生言自由，亦不仅学业无成，教育无效，其影响于社会国家，所关殊非浅鲜。故欧美先进之国，其学生莫不谨守服从之德。当退校之时，或多与教师从容谈笑；若在校中，则虽年高德尊若我马校长其人者，苟为学生，亦严格整肃，谨听校长教师之训导而毋敢或违。鄙人前游美洲大陆，曾遍观其学校，见其学生之谨守服从，至足感人。而尤足奇异者，则美之学生，不仅对于校长教师，守服从之德，下级学生之于上级学生，亦尽服从之责。上级学生苟有所命，下级学生莫不心悦诚服而为之。此其故何哉，诚以共和之国，人人有自由，即当人人能服从。不然，势成人人相抗之象，秩序危殆，国将不国。而欲养成此服从之德，在共和之国，舍教育以外，殊无他途可言。固不若专制之国，以威力胁迫人民服从，不问人民之能服从与否也。故专制国之学生，不必养成其服从之德；而共和国之学生，设不于其受教育之日，训练其能守服从之德，则国基危殆，害莫胜言矣。此鄙人之所以以服从之德望大学生诸君，有以矫正我全国学风也。

（二）朴素。孔子有言：“君子食元求饱，居无求安。”此在今日，虽不足奉为我人处世之道，然学生在求学之时，则不可不具此精神。欧美学生自小学而中学，中学而大学，非历二十年之久，不能成业；且学费之巨，亦非中下之产所能任。故学生之能毕业于大学者，百中实不得一二，惟能克苦之学生，始能毕业。至若日本，则能毕业于中学以上之学校者，大抵皆苦学之士，积十余年困苦艰难之学生生活，始克学成而为世用。今日彼国知名之士，若一谈其苦学之经历，则恐我国学生皆当愧死矣。我国学生，本亦寒素之士居多，惟近年来则纨绔之风大盛，衣食惟求精美，居处惟求安适。其最堪痛心者，则莫如求学之青年，奢侈放纵，既伤其德性，复害其学业。设此风不革，则中国教育之前途，尚堪问乎？此鄙人之所以祈望大学生诸君，力倡朴素之风，以改革我全国之学风也。

（三）静穆。鄙人非谓学生不当发扬蹈厉，人固贵有发扬蹈厉之精神，而后始能在社会任事。惟发扬蹈厉之精神，当用之于做事之时，不能用之于求学之时。学生在求学时代，当善养其发扬蹈厉之精神，则他日学成以后，庶能发挥此精神于事业。孟子所谓“养我浩然之气”者是也。若在学生时代，而误用之于校长教师，是为不守规则之学生，非所谓发扬蹈厉之精神也。且天下惟有学问有修养之士，乃能真有发扬蹈厉之精神；无学问无修养者，仅能谓之狂躁，谓之轻率，以之办事，无一事可成也。故学生若不于学生时代，以静穆之风，善养其发扬蹈厉之精神，则他日必成为狂躁之士、轻率之士，终身将不能成一事，可不勉乎哉！况学问之业，非有冷静之头脑，不能得益。

学生若以浮躁之心受学，则不仅不能深入学问之道，我恐即有善教之教师，亦不能有丝毫之得益。故学生若不于求学之时，养成冷静之头脑，则于学问之业，日相去而日远矣。静穆之风，可不贵哉！简言之：静穆之风，一则以成冷静之头脑，一则以养发皇之精神。在学校之日，以之修业而进德；卒业之后，则赖之以任事而成功。此为学生至可宝贵之学风，鄙人深望大学生诸君有以提倡此风也。

关于学风问题，鄙人所欲言者，不仅此三事，惟以此三者为最要，故特举以告诸君耳。愿诸君勉之，为我中国学问之前途争光荣！

建设之初亟当推广女子教育
——1912年12月在松江清华女校欢迎会上的演说

孙中山

民国未成立时，贵校对于革命事业，极有关系，因松部党员，常藉贵校为交通机关。兄弟今日到此，躬逢盛会，且见贵校发达情形，心甚喜悦。此次革命，女界亦与有功。现在破坏方终，建设伊始，诸君当思腐败之政府既由吾辈推翻，建设之事亦当由吾辈担任。此后男女两界均应协力同心，以全副精神，组成一伟大之中华民国。此革命之初心，亦贵校诸同志之所同情也。以世界大势论，地球上只有五、六强国，比较人口，我中华民国最占多数，所缺乏者教育耳。今在建设之初，吾辈亟当致力于社会，多办学校。贵校于女子教育既有此基础，务望力事推广，成松江女学之模范，中国女学之模范，则兄弟有厚望焉。

责任与国家

——1913年1月在国民党湘支部欢迎会上的演说

宋教仁

今日承本党诸君欢迎，鄙人实不敢当。惟党员须常常相见，以便交换知识，故兄弟此次回乡，极欲与诸君接洽，今得聚此，甚为欣幸。顷部长谓今日建设未能完善，实非革命初心，兄弟极以为然。今且将本党责任与国家关系略为诸君述之。

现在民国未经各国承认，于国际上非可谓之成立，然其原因，则内部未能整理之故也。国民党为同盟会所改组。同盟会成立于乙巳年，时在东京。黄克强先生主张实行，故有广东、云南等处之起事；然因财政困难，屡次失败。自从广东兵变之后，渐知新军可用，故广州之役欲联新军。然仓卒之间，死事者多，咸谓当改变方法，乃在上海设立中部同盟会，谭君石屏、陈君英士及兄弟主持其事。鉴于前此之失败，乃共筹三策：一为中央革命运动，推倒政府，使全国瓦解，此为上策，然同志都在南方，北京无从着手，此非可易言者；一在长江流域同时大举，隔断南北，使两方交通断绝，制政府命脉，此为中策，然此等大举，布置不易；一在边省起事，徐图中原，然前此用之失败，斯为下策。三策之中，将谁适从？则新军如可为用，财政有人接济，中策自属可行。故阴历去岁筹款南洋，运动鄂军，遂能集事。恐满政府之倾北兵以至，则在山西布置，以牵掣之，守武胜关、断黄河铁桥，以梗塞之；恐势力单薄，则南联湘省，东联宁军，以左右之。原拟预完善，方在武昌发难，因黄先生病在香港，乃派谭先生与兄弟往鄂。适鄂省炸弹轰裂，事机败露，不得已而仓卒举事。时孙武炸伤，居正乃推黎副总统主持一切。然因布置未善，北军卷地而来，遂至屡挫。幸湖南首先响应，得为后援。然汉阳之失，外人讥诮，心已北倾。南京光复之后，民军始振，顾其时出师援应者，仅有湘粤两省。幸袁总统深明时局，方能刻期统一。

今民国虽成立，然破坏未极，人心上之旧习未能乘势革除，譬犹疮毒尚存，速投以生肌之药，必不能全愈也。现在外交、内政均无可言。以言内政，则第一财政困难，拟借外债，财政又被监督。所有一切行政，在湖南尚好，社会安宁，军队亦已退伍；他省军队犹然林立，据陆军部调查，较前清时增至七八倍。此等军队不独难以征蒙，且多有害地方者。又民间产业凋敝，出口货少。种种现象，言不能尽，如此而欲富强，不綦难乎？以言外交，则俄蒙协约之问题不能解决，将无宁日。然其原因实因内政不能进行，以致险象环生，群思剖割。

为今之计，须亟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选举事若得势力，自然成一国民党政府。兄弟非小视他党，因恐他党不能胜任，故不得不责之国民党员。国民党之党纲，第一，统一政治。今当谋国家统一，毋使外人讥为十八国。第二，地方自治。第三，种族同化。今五族内程度文野不齐，……欲求开化，非国民党不为功。第四，民主主义。曩者他党多讥为动富济贫，此大误也。夫民生主义，在欲使贫者亦富，如能行之，即国家社会政策，不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致有劳动家与资本家之冲突也。第五，维持国际和平。方今民国初立，创痍未瘳，以言剧战，实非易事。……总之，今之要务，在整理内政，为党员者均当负责。孔子曰：“当

仁不让于师。”况湖南人作事勇往为各省冠。此次选举，须求胜利，然后一切大计划皆可施行。此兄弟之所希望于本党诸君者也。

民国建设

——1913年2月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节录）

孙中山

今日中华民国留东全体学生诸君开此大会，欢迎兄弟，兄弟实为欢喜！数年前，兄弟屡次到东京，时常蒙学生诸君热心欢迎。但今日诸君之欢迎，与从前之欢迎，其心理上大有不同之点。从前所以欢迎兄弟之心理，都是愤恨满洲政府种种压制，种种腐败，欲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以图推翻满清腐败政府，造成革命事业，以建设完全美满之中华民国，与世界列强对峙。所抱持的纯是一种牺牲的主义，本欢迎革命之精神，推而欢迎兄弟。现在，从前诸君之志愿，已经达到。此次兄弟到东，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兄弟从前提倡革命的时候，一般学生诸君，大半热心赞助革命。究竟革命事业能成功不能成功，那时非所料及的。彼时学生诸君，前途绝无希望。国家前途，甚为危险。未光复之先，我辈均受制于专制政府之下，非我族类，横暴不堪。处此极端压制，民权不克伸张，俯首帖耳，任人摧残，刀俎听命，鱼肉听命。从实质上观察之，我辈不过是亡国之遗民，我汉族实无国家存在于亚东大陆上。而外忧日迫，瓜分豆剖之危机，在昔不过虚言恫喝，近且见之实行。满清政府又服膺“宁赠朋友，不予家奴”之格言，对外则一味恭顺，对内则万般防遏，我辈几不免二次亡国之惨。所以大家志士，都不惜牺牲性命，以求急切之改革，而还我自由之幸福。今日满清政府既经推倒，革命事业已告成功。民国初基已粗称底定，我国之前途实大有希望。但破坏之后必须建设，恢复秩序，巩固邦基。学生诸君必要为中华民国妥筹健全之方法，担负建设的责任，以措国家于磐石之安，方不负从前革命的一种伟大志愿。盖破坏固宜急进的，建设亦宜急进的。破坏之事业并不甚难，只要持极端的牺牲主义，坚忍做去，即能收效。欲筹建设，虽无破坏时代的危险，仍必与破坏时具同一之精神。

建设事业，不仅要与破坏时代持同一之牺牲主义，并且要一绝大学问。欲求此种建设的学问，必须假以时期，或十年，或六七年之苦心研究，方能应用。不比破坏事业，只要不顾身命，冒险做去，即可以办得到的。所以从前学生之责任，与现在诸君之责任，大有悬殊。从前诸君，是求急切的破坏的；今日诸君，是要求急切的建设的。从前因汉族沦亡，我辈憔悴虐政，无立足之余地，纵有绝大学问，无处可见之实用。即为满洲政府所罗致以供奔走，亦不过一种奴隶学问，究竟不能发抒其长。故彼时一般有志之士，均不愿专心求学，以为异族之用。一心从事于革命事业，奔走呼号，不畏斧钺，都是因为救国心的热度比较求学心的热度更高的缘故。

彼时学生诸君当初来东时之志愿，未尝不是想求大学问，但爱国爱同胞之心，人所共有，一到东京，即受熏陶。又感于外界之种种刺激，因国家危险之景象，日益迫切，不忍死心塌地，消磨锐气于学问上，只得将求学之心，暂行抛开，专坚持铁血主义，练习冒险精神。希望将满清政府推倒之后，再求学问，以遂初心，而为建设新国家之用。故宁肯弃学问而不顾，专图革命的进行。此次革命成功，抛弃学问热心救国之学生诸君的勋劳，实居多数。

今日幸民国成立已有二年，大概规模粗具，然政治上之设施，千头万绪，纷如乱丝。我们试想一下，成立虽将二年，内政外交，究竟有一件可称为完

备的吗？此种原因，都是因为缺乏人才的弊病。处此时代，急要精进学问，以图根本上之改良。诸君在东京留学，应该立定一绝大志愿，研究学问。不比从前学生有革命的事业纷扰其心志，不能专心致志于学业。诸君今日求学之机会，比较从前学生求学之机会，实优万倍。务望矢志求学，如从前学生愿牺牲性命，以做革命事业的一种坚忍心，百折不挠，将来必能求得优美专门学问，以福祖国。这是兄弟所期望的！

中国今日之现象，如拆屋改造，旧者已经破坏，新者尚未健全，庶政繁多，动需时日。试观吾国历史，每一朝代之更替，必经三四代之设备，始得稍稍完全。破坏事业与建设事业，成就于一人之手者，实所罕见。今日民国成立已历二年，种种设施虽不甚完备，然求之历史上，已经是收效最速的了。我辈不可谓中国不可为。我辈抱如何之希望，思如何之幸福，必须矢志求之，以贖吾人之希望，以购吾人之幸福。

今日吾国工商各界，均限于艰难恐慌之现象。一般平民心理上，多谓革命党从前所说的，革命后人民有多少之幸福，不革命有如何的危险，都是一种骗人的话。今日既经革命，我们生计反一日不如一日，实不及未革命的时候，尚能得过且过。此等言论，究竟是昧于大势，将革命事业，看得太容易了。

纵观古代革命的历史，成功最速者，莫如姬周。尔时不过京畿地方，归天子直辖，其余悉归诸侯统治，整理尚自易易。然必至成王定鼎洛纳，始克底平。其后暴秦元道，陈胜、吴广之徒起而推翻之，后演成六国分立，楚汉战争之恶剧，生灵遭其涂炭者，不知凡几。历许久时间，始得统一，而内政之整顿，犹必待之文景。自是厥后，历代莫不皆然。迨至明朝，驱逐元胡，创种族革命，亦经过多年战争。建设事业，亦历数代，始具规模。即此可见革命之不易，建设之尤难。我国此次革命，不过数月即告成功，吾民之幸福，实在保全不少。惟建设事业，历二年之久尚无头绪，实因从前未培养人才之故。

现在欲维持中华民国，必人人负建设之责任。建设事业，必须学问，实所赖于学生诸君！诸君在此留学，须要认真研究学问，不可同从前留学生一样。从前的留学生，大概分为两派：其一派鉴于祖国之危亡，异族之凭陵，废弃学业，奔走革命；其又一派，既不能与革命诸志士一致进行，又不能研究实学，只想弄一个方法，混一纸文凭，以夸耀乡里。这也难怪他们。此辈人见中国事已不可救，革命事业，自己扪心揣度，又做不来，求了学问，又无用处，无法可想，只好鬼混一辈子。将来中国不幸瓜分，横竖中国是已经亡过一次的，随便做哪一国的顺民，哪一国的奴隶，都是元甚紧要的，只要有一个吃饭的所在就是了。

今日诸君，不可如前日之分为二派。当此建设之始，需才孔急，量才器用，各尽其长。大才有大用，小才有小用，只要有真正学问，不愁没用处的。况且破坏事业已告成功，从前希望均已达到，将来之希望，即是建设事业。正好安心在日本留学，用数年功夫，求数年学问，以为建设之用。在此留学诸君，须要立一种决心，就是从前学生，一种牺牲性命的心。此种决心求学，将来成就正未可量。迫学成学问，为中华民国求幸福，非为一人求幸福，必须存牺牲自己个人之幸福，以求国家之幸福的心志，社会始可改良。诸君现在之地位，在中华民国四万万之上，将来做成事业，必也要在四万万之上，方不愧今日之地位！

学问志愿，两种并行。有学问而无志愿，不徒无益，而反有害。诸君志愿，须求大家之利益，办大家之事业，不必计较私人之利害。究竟大家享幸福，大家得利益，则我一人之幸福之利益，自然包括其中。此之谓人道主义、社会主义。

从前学说，准物质进化之原则，阐发物竞生存之学理。野蛮时代，野兽与人类相争，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弱者劣者，自然归于天演淘汰之例。故古来学说，只求一人之利益，不顾大家之利益。今世界日进文明，此种学理，都成野蛮时代之陈谈，不能适用于今日。今日进于社会主义，注重人道，故不重相争，而重相助，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有世界。

近日社会学说，虽大昌明，而国家界限尚严。国与国之间，不能无争。道德家必愿世界大同，永无争战之一日。我辈亦须存此心理，感受此学说。将来世界上总有和平之望，总有大同之一日，此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思想。

吾中华民国，为世界最伟大之国。土地人民，为诸国冠。不过因近二百年受制异族，文明退步，国势凌夷。外国遂谓中国为野蛮，实属大谬。今日革命成功，祖国前途，大有可为。各国相待，亦异往昔。盖我中国以最短促之时间，成就最伟大之事业，为地球上亘古所未有。而我中国国民，从前本来无国家思想，忽然发生此种事业，建设共和国家。自外人眼光观之，很觉奇怪，究竟不晓得是真共和，是假共和。这种心理，实在是把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忘记了。中国此次之革命，就是恢复数千年历史上之文明。从前中国文化，限于亚东一小部分，不能扩张。今日得一种高尚完全之政体，政体既改良，人民道德亦必随之改良，方可表示共和政体之真象。

勤工俭学是学主自立的基础
——1919年12月在欢送第八届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上的演说

向警予

中国今日之种种事业，其希望均在学生；而学生中分子不能完全，希望学生界此后宜渐趋纯粹。寰球中国学生会实指导学生入正轨之绝好机关。所最钦佩者，会内办事诸君均有真实之诚意，对于吾人之扶助不遗余力，虽琐碎之事莫不详为指导，令人敬慕无已！

今日到会者，均系勤工俭学学生，比较普通学生略有不同。处今日之世界，应各有自立之能力。勤工俭学即自立之实习，亦即自立之基础。此去应各振精神，以谋各个人自立之职业。且吾人之求学，宜抱贡献于人群之宗旨，以谋振刷东方民族之精神，亦吾人应注意也。

出国缘由和临别赠言
——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话别会上的演说

蔡元培

我到大学校，已有三年，中间因事离校多月，现在又要远行了。诸君牺牲了许多时间的功课，开会送我，我实在抱歉之至！

我这次出去，若是于本校不免发生困难，我一定不去。但是现在校中组织很周密，职员办事很能和衷，职员与学生间也都是开诚布公。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事了。

我出去的意思有好几层：

本校自民国元年到现在，可算是在试验时代中。近几年校里都有些改革了。就是大战之后，各国大学也有一番改革，大都将少数人所受的高等教育，求他普及，如平民大学、劳动大学等。其余专讲“国家主义”的，守旧的大学校，也不能不改革了。我很愿意知道他们改革的状况。我大约先到法国，再到比国，然后再到德、意等国。凡有可以参考的材料，临时由书信传达。

近几年，国内学术界觉得人才不足，是无可讳言的。我这次要实在的去考查专门学问用功研究的留学生，想法帮助他们，预约他们深造，留待将来校中聘请。一方面也想请外国的教习。从前我们请的外国教习，都是随便由使馆里私人关系请来的，或者所教非所学，或者一意敷衍。这次出去，都要请各大学里大学问家负责替我们介绍。且现代各国学者，如杜威、罗素诸先生，大都很愿到中国来。因为他们关于本国本洲材料，已经搜尽了；都觉得远东风习，很有参考的价值。所以有多少名人要到中国考察，住居一、二年的，我遇见时，都可以预订行期。

本校仪器尚未完备，本可写信到外国去买，但我这次亲自去采办，也觉得好些。现在全国没有一样关于美术的东西，说到美学、美术，我们都不敢开讲。这些材料，无论真本或摹本，我都要采集一点。

本校图书馆甚不完全。蒋先生筹划在第一院空地建筑一所大图书馆。但是经费不够，政府不能应给，只好向各方面募捐。华侨方面，时常有信来，要我到南洋去，并且他们也有好些子弟到此地来旁听的。所以我想在回来时，一到英属、荷属……各处去看看，顺便募点捐款。

退还庚子赔款，各国都很有此意，不过因经济关系，他们好多已经列入预算。美国和中国的日亲一日，多半因为退还赔款，开办清华的缘故。前回李石曾先生、陶孟和先生和南京高师的郭秉文先生，在各国曾经谈起过了。我们倘能收回，一面可以扩充国内的高等教育，一面也可以培植留学的人才。他们教我亲自和各国政府再商量商量，这也是我要做的。

里昂中国大学办宿舍和预科，且预备请章太炎先生出去，内里一切情形，他们也教我去看看。比国见了法国这样，也拨了一所房子，给中国人住，与工艺大学甚近；我们正好利用，使一辈勤工俭学的人，又能生活，又能求知识。其他如鲁番大学的恢复，国际大学的建设，都在比国；我也想去考察一番。德国大战之后，教育很有改革，我要再去一回。英、美我尚未到过，这次回来时候，必定从英、美经过，打南洋回国。自今天起，至我回来之日止，这个期内，所有职务已请蒋梦麟先生代理，诸位可以同他接洽。现在要到湖南去，也许还要回到北京一次。

我对诸位的临行赠言，也不过几句“老生常谈”。第一，望大家要特别注意体育。我们收了体育费，愿望让大家自由去运动的，可是二年来尚少效果。诸位何必要做成“书痴”相，弄得曲背弯腰呢，这一层愿大家各就所好，多多运动。历年华北运动会，通知到我们，都没有法子。论人数北京大学最多，为什么一个都没有加入呢？虽然我们并不要在比赛场上出风头，但是有益的运动，我们决不可不练习。

次之，“五四”而后，大家很热心群众运动、示威运动。……“五四”后的惟一好结果，是平民教育。乘我们用功的余暇办些学校，教育那些失学的人，就是牺牲光阴，也是值得的。这种事也是脚踏实地的初步。即如现在的调查灾区，也是服务社会的要端。此等事很望不断的做下去！

其次自治。本校学生的自治近来比从前好多了。但是宿舍里、公寓里，也还免不了闹笑话。校外说我们的人很多。即如从前学生会里闹意见，往往丢了正文，两下打笔墨官司，种种揭帖，教人看了难受。要是看的人信了他们的话，那对面的人几乎不能做人了！设身处地，又当如何？我们见了别人的过失，总要用怜爱的意思劝告他，不可骤加攻击。我希望此后诸同学均互相亲爱，厚于责己，薄于责人。

我希望在回来时，得见诸位比现在更有进步，并且谢诸位开会送我的盛意。

做学问的方法

——1923年1月在东南大学课毕时的告别演讲

梁启超

诸君！我在这边讲学半年，大家朝夕在一块儿相处，我很觉得快乐。并且因为我任有一定的功课，也催逼着我把这部十万余言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著成；不然，恐怕要等到十年或十余年之后。中间不幸身体染有小病，即今还未十分复原，我常常恐怕不能完课；如今幸得讲完了！这半年以来，听讲的诸君，无论是正式选课或是旁听，都是始终不曾旷课，可以证明诸君对于我所讲有十分兴味。今当分别，彼此实在很觉得依恋难舍。因为着我们这半年来，彼此人格上的交感不少。最可惜者，因为时间短促，以致仅有片面的讲授，没有相互的讨论，所谓教学相长，未能如愿做到！今天为这回最末的一次讲演，当作与诸君告别之辞！

诸君千万不要误解，说梁某人是到这边来贩卖知识，我自计知识之能贡献于诸君者实少。知识之为物，实在是元量的广漠，谁也不能说他能给谁以绝对不易的知识；顶多，亦只承认他有相对的价值。即如讲奈端罢，从前总算是众口同词的认为可靠，但是现在，安斯坦又几乎完全将他推倒。专门的知识，尚且如此，何况像我这种泛滥杂博的人并没有一种专门名家的学问呢？所以切盼诸君，不要说我有一艺之长，讲的话便句句可靠。最多，我想，亦只叫诸君知道我自己做学问的方法。譬如诸君看书，平素或多忽略不经意的地方，必要寻着这个做学问的方法，乃能事半功倍。真正做学问，乃是找着方法去自求，不是仅看人家研究所得的结果。因为人家研究所得的结果，终是人家的，况且所得的，也未必都对。讲到此处，我有一个笑话告诉诸君：记得在某一本小说里，说：“吕纯阳下山觅人传道，又不晓得谁是可传，他就设法来试验。有一次，在某地方，遇着一个人，吕纯阳登时将手一指，点石成金，就问那个人要否。那人只摇着头，说不要。吕纯阳再点一块大的试他，那人仍是不为所动。吕纯阳心里便十分欢喜，以为道有可传的人了；但是还恐怕靠不住，再以更大的金块试他，那人果然仍是不要。吕纯阳便问他不要的原因，满心承望他答复一个热心向道。那晓得那人不然！他说：我不要你点成了的金块，我是要你那点金的指头，盖有了这只指头，便可以自由点用。”这虽是个笑话，但却很有意思。所以很盼诸君，要得着这个点石成金的指头——做学问的方法，那么，以后才可以自由探讨，并可以辨正师傅的是否。教拳术的教师最少要希望徒弟能与他对敌，学者亦当悬此为鹄。最好是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若仅仅是看前人研究所得，而不自行探讨，那么，得一便不能知其二。且取法乎上，得仅在中，这样，学术岂不是要一天退化一天吗？人类知识进步，乃是要后人超过前人。后人应用前人的治学方法，而复从旧方法中，开发出新方法来，方法一天一天的增多，便一天一天的改善。拿着改善的新方法去治学，自然会优于前代。我个人的治学方法，或可以说是不错，我自己应用来也有些成效。可惜这次全部书中所说的，仍为知识的居多，还未谈做学问的方法。倘若诸君细心去看，也可以寻找得出来。既经找出，再循着这方法做去，或者更能发现我的错误，或是来批评我，那就是我最欢喜的。

我今天演讲，不是关于知识方面的问题。诚然，知识在人生地位上，也

是非常紧要，我从来并未将他看轻；不过，若是偏重知识，而轻忽其他人生重要之部，也是不行的。现在中国的学校，简直可说是贩卖知识的杂货店，文哲工商，各有经理，一般来求学的，也完全以顾客自命。固然欧美也同坐此病，不过病的深浅，略有不同。我以为长此以往，一定会发生不好的现象。中国现今政治上的腐败，何尝不是前二十年教育不良的结果？盖二十年前的教育，全采用日德的军队式；并且仅能袭取皮毛，以至造成今日一般无自动能力的人！现在哩，教育是完全换了路了，美国式代日式德式而兴，不出数年，我敢说是全部要变成美国化，或许我们这里——东南大学——就是推行美化的大本营。美国式的教育，诚然是比德国式日本式的好；但是毛病还很多，不是我们理想之鹄。英人罗素回国后，颇艳称中国的文化，发表的文字很多，他非常盼望我们这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特殊民族，不要变成了美国的“丑化”。这一点可说是他看得很清楚。美国人确实敏捷，诚然是他们的长处；但是中国人即使全部将他移植过来，使纯粹变成了一个东方的美国，漫讲没有这种可能，即能，我不知道诸君怎样，我是不愿的。因为倘若果然如此，那真是罗素所说的，把这有特质的民族，变成了丑化了。我们看得很清楚，今后的世界，决非美国式的教育所能域领。现在多数美国的青年，而且是好的青年，所作何事？不过是一生到死，急急忙忙的，不任一件事放过：忙进学校，忙上课，忙考试，忙升学，忙毕业，忙得文凭，忙谋事，忙花钱，忙快乐，忙恋爱，忙结婚，忙养儿女，还有最后一忙，——忙死。他们的少数学者，如詹姆士之流，固然总想为他们别开生面；但是大部分已经是积重难返。像在这种人生观底下过活，那么，千千万万人，前脚接后脚的来这世界上走一趟，住几十年，干些什么哩？唯一无二的目的，岂不是来做消耗面包的机器吗？或是怕那宇宙间的物质运动的大轮子，缺了发动力，特自来供给他燃料？果真这样，人生还有一毫意味吗？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现在全世界的青年，都因此无限的凄惶失望，知识愈多，沉闷愈苦。中国的青年，尤为利害，因为政治社会不安宁，家国之累，较他人为甚，环顾宇内，精神无可寄托。从前西人唯一维系内心之具，厥为基督教。但是科学昌明后，第一个致命伤，便是宗教。从前在苦无可诉的时候，还可远远望着冥冥的天堂。现在呢，知道了，人类不是什么上帝创造，天堂更渺不可凭，这种宗教的麻醉剂，已是无法存在。讲到哲学吗，西方的哲人，素来只是高谈玄妙，不得真际，所足恃为人类安身立命之具，也是没有。再如讲到文学吗，似乎应该少可慰藉；但是欧美现代的文学，完全是刺激品，不过叫人稍醒麻木。但一切耳目口鼻所接，都足陷人于疲敝，刺激一次，疲麻的程度又增加一次；如吃辣椒然，浸假而使舌端麻木到极点，势非取用极辣的胡椒来刺激不可。这种刺激的功用，简直如有烟癖的人，把鸦片或吗啡提精神一般。虽精神或可暂时振起，但是这种精神，不是鸦片和吗啡带得来的，是预支将来的精神。所以说一次预支，一回减少，一番刺激，一度疲麻。现在他们的文学，只有短篇的最合胃口；小诗两句或三句；戏剧要独幕的好。至于荷马、但丁，屈原、宋玉，那种长篇的作品，可说是不曾理会。因为他们碌碌于舟车中，时间来不及，目的只不过取那种片时的刺激，大大小小，都陷于这种病的状态中，所以他们一般有先见的人，都在遑遑求所以疗治之法。我们把这看了，那么，虽说我们在学校应求西学，而取舍自当有择；若是不问好歹，必无条件的移植过来，岂非人家饮鸩，你也随着服毒，可怜可笑孰甚！

近来国中青年界很习闻的一句话，就是“智识饥荒”。却不晓得还有一

个顶要紧的“精神饥荒”在那边。中国这种饥荒，都闹到极点。但是只要我们知道饥荒所在，自可想方法来补救。现在精神饥荒，闹到如此，而人多不自知，岂非危险！一般教导者，也不注意在这方面提倡，只天天设法怎样将知识去装青年的脑袋子。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而后多的知识才是有用；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装一点为好。因为无精神生活的人，知识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领也增多。例如黄包车夫，知识粗浅，他决没有有知识的青年这样的烦闷；并且作恶的机会也很少。大奸恶的卖国贼，都是知识阶级的人做的。由此可见没有精神生活的人，有知识实在危险。盖人苟无安身立命之具，生活便无所指归，生理心理，并呈病态。试略分别言之：就生理言，阳刚者必至发狂自杀；阴柔者自必委靡沉溺。再就心理言，阳刚者便悍然无顾，充分的恣求物质上的享乐。然而欲望与物质的增加率，相竞腾升，故虽有妻妾宫室之奉，仍不觉得快乐。阴柔者便日趋消极，成了一个竞争场上的落伍的人；凄惶失望，更为痛苦。故谓精神生活不全，为社会，为个人，都是知识少点的为好。因此我可以说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饥荒。

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的——中国与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东方的人生观，无论中国印度，皆认物质生活为第二位；第一，就是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仅视为补助精神生活的一种工具，求能保持肉体生存为已足；最要，在求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精神生活，贵能对物质界宣告独立；至少，要不受其牵制。如吃珍味，全是献媚于舌，并非精神上的需要。劳苦许久，仅为一寸软肉的奴隶，此即精神不自由。以身体全部论，吃面包亦何尝不可以饱？甘为肉体的奴隶，即精神为所束缚。必能不承认舌——一寸软肉为我，方为精神独立。东方的学问道德，几全部是教人如何方能将精神生活对客观的物质或己身的肉体宣告独立。佛家所谓解脱，近日所谓解放，亦即此意。客观物质的解放尚易；最难的为自身——耳目口鼻……的解放。西方言解放，尚不及此，所以就东方先哲的眼光看去，可以说是浅薄的，不彻底的。东方的主要精神，即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

求精神生活绝对自由的方法，中国印度不同。印度有大乘小乘不同：中国有儒墨道各家不同。就讲儒家，又有孟荀朱陆的不同。任各人性质机缘之异，而各择一条路走去。所以具体的方法，很难讲出。且我用的方法，也未见真是对的，更不能强诸君从同。但我自觉烦闷时少，自二十余岁到现在，不敢说精神已解脱，然所以烦闷少，也是靠此一条路，以为精神上的安慰。至于先哲教人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约有两条：

（一）裁抑物质生活，使不得猖獗，然后保持精神生活的圆满。如先平盗贼，然后组织强固的政府。印度小乘教，即用此法。中国墨家、道家的大部，以及儒家程朱，皆是如此。以程朱为例：他们说的持敬制欲，注重在应事接物上裁抑物质生活，以求达精神自由的境界。

（二）先立高尚美满的人生观，自己认清楚将精神生活确定，靠其势力以压抑物质生活。如此，不必细心检点，用拘谨功夫，自能达到精神生活绝对自由的目的。此法可谓积极的，即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不主张一件一件去对付。且不必如此，先组织强固的政府，则地方自安；即有小丑跳梁，不必去管，自会消灭；如雪花飞近大火，早已自化

了。此法佛家大乘教，儒家孟子陆王皆用之。所谓“浩然之气”，即是此意。

以上二法，我不过介绍与诸君，并非主张诸君一定要取某种方法。两种方法虽异，而认清精神要解脱这一点却同。不过说青年时代应用的，现代所适用的，我以为采积极的方法较好。就是先立定美满的人生观，然后应用之以处世。至于如何的人生观方为美满，我却不敢说。因为我的人生观，未见得真是对的；恐怕能认清最美满的人生观，只有孔子、释迦牟尼有此功夫。我现在将我的人生观讲一讲，对不对，好不好，另为一问题。

我自己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从佛经及儒书中领略得来。我确信儒家佛教有两大相同点：

（一）宇宙是不圆满的，正在创造之中，待人类去努力，所以天天流动不息，常为缺陷，故为未济。若是先已造成，——既济的，那就死了，固定了。正因其在创造中，乃如儿童时代，生理上时时变化。这种变化，即人类之努力；除人类活动以外，无所谓宇宙。现在的宇宙，离光明处还远，不过走一步比前好一步；想立刻圆满，不会有的。最好的境域，——天堂、大同、极乐世界——不知在几千万年之后，决非我们几十年生命所能做到的。能了解此理，则作事自觉快慰。以前为个人为社会做事，不成功或做坏了，常感烦闷。明乎此，知做事不成功，是不足忧的，世界离光明尚远，在人类努力中，或偶有退步，不过是一现相。譬如登山，虽有时下，但以全部看仍是向上走。青年人烦闷，多因希望太过；知政治之不良，以为经一次改革，即行完满；及屡试而仍有缺陷，于是不免失望。不知宇宙的缺陷正多，岂是一步可升天的？失望之因，即根据于奢望过甚。《易经》说：“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此言甚精彩。人要能如此看，方知人生不能不活动；而有活动，却不必往结果处想；最要不可有奢望。我相信孔子即是此人生观，所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又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天天快活，无一点烦闷气象。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

（二）人不能单独存在。说世界上那一部分是我；很不对的。所以孔子“毋我”，佛家亦在主张“无我”。所谓无我，并不是将固有的我压下或抛弃，乃根本就找不出我来。如说几十斤的肉体是我，那么，科学发明，证明我身体上的原质，也在诸君身上，也在树身上。如说精神的某部分是我，我敢说今天我讲演，我已跑入诸君精神里去了。常住学校中许多精神，变为我的一部分。读孔子的书及佛经，孔佛的精神，又有许多变为我的一部分。再就社会方面说，我与我的父母妻子，究竟有若干区别？许多人——不必尽是纯孝——看父母比自己还重要，此即我父母将我身之我压小。又如夫妇之爱，有妻视其夫，或夫视其妻，比己身更重要的。然而何为我呢？男子为我，抑女子为我？实不易分。故彻底认清我之界限，是不可能的事，（此理佛家讲得最精，惜不能多说。）世界上本无我之存在。能体会此意，则自己作事，成败得失，根本没有。佛说：“有一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至理名言，洞若观火。孔子也说：“诚者非但诚己而已也。……”将为我的私心扫除，即将许多无谓的计较扫除。如此，可以做到“仁者不忧”的境域。有忧时，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为人类——如父母、妻子、朋友、国家、世界——而痛苦，免除私忧，即所以免烦恼。

我认东方宇宙未济人类无我之说，并非论理学的认识；实在如此。我用功虽少，但时时能看清此点，此即我的信仰。我常觉快乐，悲愁不足扰我，

即此信仰之光明所照。我现已年老，而趣味淋漓，精神不衰，亦靠此人生观。至于我的人生观，对不对，好不好，或与诸君的病合不合，都是另外一问题。我在此讲学，并非对于诸君有知识上的贡献；有呢，就在这一点。好不好，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诸君要知道自己的精神饥荒，要我方法医治。我吃此药，觉得有效，因此贡献诸君采择。世界的将来，要靠诸君努力！

各尽其职，国事育望
——1924年12月在北京大学欢迎会上的演说

张学良

今日幸得与诸君共聚一堂。良素无所畏，即吴佩孚之大敌当前，良亦不觉有何可畏，此为诸君亦深知。但今与诸君相聚，不觉有所畏惧，此良一无学识、二无经验、三无功劳，以良此三者与诸君较，仅足供诸君奔走之役，何敢与诸君同座。良不过一军人，自己但知军事，他无所学。良决不愿为军阀。军人所以成阀，固不仅问分内事，且干预分外诸政。良意但作苦事，不争权利，以免为大军阀。望诸君对良多教训，良不愿受他人之推戴，诸君皆学者，良虽欲有言，实不敢以贡献于诸君。良知教育界年来甚苦，自己当尽力为诸君财政权之友，及转为段执政、总司令等言之。此本个人良心之主张，非为求名，亦非为诸君欢迎故。良私意以为军人与教育界皆当各问自己分内事，各尽其职，勿问政事，国事或可有望。吴佩孚为一好军人，惟以干政故，致失败。中国唯一希望在青年，青年之根本，在教育。不出风头，各尽其职，良所愿与诸君共勉者。青年求学时代，最好不必干涉政治。此良之愚见，此言或诸君不爱听者。此皆良本诸良心之言，诸君爱听与否，所不敢计。

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的主要力量

——1926年1月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欢迎国民党全国代表时的演讲

邓中夏

刚才承各位代表赐教一切，我们是非常之感谢的。我们一定遵照各位赐教的，更加去努力奋斗。

在各位代表演说之中，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说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的主要力量。

是的，这一点，我们一年以前曾经这样说了。不过那时还只是一个理论，没有事实证明。所以一般大学教授听了此种说话，无不嗤之以鼻，说是工人阶级自己吹牛。现在经过刘杨战争、“五卅”运动，种种实际的争斗，果然证得明明白白了，事实还是事实，事实是任何人都不能够加以抹杀的。所以一般大学教授在反帝国主义斗争紧急的时候，也变更态度，说工人不错，工人很有力量，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的主要力量，他们也不能不在事实上很恭顺地加以承认了。

既然如此，既然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的主要力量，刚才有几位代表提到国民革命不应反对阶级斗争，使我们联想到一块，发生一个深切的感想，也不能不略为说说。

国民党中有一位负过盛名的先生另创新说，劝工人阶级不要“为了阶级斗争，打破国民革命”。我们对于这位先生说话，只有表示惋惜，表示遗憾。为什么？我们既不站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就是站在国民革命的观念上，认为这位先生的话，是太欠考虑，大欠明了。国民革命原是要联合各阶级的力量，共同战斗，但是事实上今日中国社会各阶级因为经济地位的关系，不是妥协性极重，便是战斗力极弱。中国不言国民革命则已，若言国民革命，只有靠革命的工人阶级提携着农民阶级加入战争，才有成功的可能。

大凡一个军队，都要给养，才能作战。既然要工人阶级这一支军队加入国民革命的战线，做国民革命的主力队伍，岂可不善其给养，即提高其地位，改善其生活？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是如何？痛苦或是舒泰？大家都是知道的。枵腹露体是可以作战的吗？只有容许改善经济条件的阶级斗争，可以使工人运动更加进展，工人组织力与战斗力更加雄厚，就是说使国民革命的势力，更加强旺。阶级斗争是妨碍国民革命的吗？今乃反对工人阶级为稍稍改善经济条件，增加其组织力、战斗力的阶级斗争，老实说就是不愿意工人运动之发展；不愿意工人运动之发展，老实说，便是破坏国民革命的力量。国民党中那位先生说“为了阶级斗争，打破了国民革命”。我们得了一相反的结论，却是“为了反对阶级斗争，打破了国民革命”。

但是那位先生的反阶级斗争论，工人阶级决不受其欺骗与迷惑，这是可以担保的。工人阶级很明白他自己历史的使命。对于此种破坏国民革命的说话，只有表示惋惜，表示遗憾。他并且很明白决不因国民党中那位先生个人破坏国民革命的说话，而减少他对国民党之同情与帮助。工人阶级的态度是鲜明的，只要国民党是革命的，他必同情到底和帮助到底。不堪闻的痛苦，能奋斗八九月，试问哪一位大人先生能够做到呢？况我们是为着各阶级而奋斗，这样看来，可算世界上最奋斗最牺牲的革命分子了。自经这次罢工后，能把自己的地位抬高起来，使到各界都知道我们工人的力量，我们的胜利就

近目前了。

现在我们对面的敌人帝国主义又强硬起来，但我们群众已受恐吓多次，受了残杀多次，无论怎样横蛮的强硬，我们都不怕了。现帝国主义之强硬，换句话说用，即是“人将死的那时，都要把脚儿一伸”而已。但现在用了这等伎俩，即是表现求解决罢工的意思。我们要知道，不理他什么狡猾的伎俩，我们都不要着急；只可帝国主义强硬一分，我们团结十分，如果帝国主义强硬十分，我们团结百分，就不能不将帝国主义打倒啊！我们欢迎工友们的意义，可分几点：一是欢迎打倒帝国主义为民族解放的先锋队；二是欢迎我们罢工工友一致奋斗到底，表示工农联合向帝国主义进攻之意了。望罢工工友能够把我们革命的精神，更勇敢一点，把香港帝国主义致于死地统一中国。

我们必须打倒帝国主义

——1926年2月在欢迎省港罢工工友代表大会上的演讲

恽代英

各位工友，各位同志，今天得与各位叙会，兄弟是非常欢喜的，现趁此机会表示一些意见为工友们参考。今天为什么开这个会，就是欢迎罢工工友，也可说是欢迎我们兄弟，也可说是欢迎能实行本党政策而反帝国主义的战士，欢迎你们，就是表示亲爱你们。但我们为什么反对帝国主义呢，第一点，帝国主义自侵略到了中国，常常用兵力压迫我们，还要我们赔偿兵费，有一次要赔二万万五千万万元，这笔巨款现在尚未还清。而这款是从何而来呢，都是吸我们人民膏血而来的。帝国主义以兵力压迫我们后，还要我们赔偿兵费，这种行为不啻盗贼掳人勒赎一样。我们痛苦极了，我们非打倒帝国主义不可。第二点，帝国主义等助北洋官僚、军阀以压迫我国人民，如袁世凯及段祺瑞当国之时，则借款与他压迫残杀人民，甚至借款与袁世凯称帝。现在我国负债有十万万元之巨，这种债初是由帝国主义借款与军阀官僚来压迫我们，那要我们人民赔偿，所以我们非打倒帝国主义不可。第三点，以兵力强占地如九龙、广州湾等处之租借地，沙面、上海、汉口等处之租界，用使馆来管治中国人民，收容军阀土匪以捣乱国家，残杀人民，所以我们非打倒帝国主义不可。第四点，帝国主义占据我们海关，强迫协定关税，洋货税率甚轻，而土货税率反重，遂至洋货价廉，商人均贩运洋货，土货因之滞销，使我国实业不能发展，而工人、农民失业日多，由游民而变为匪，国内穷乱所由而生，所以我们也非打倒帝国主义不可。

除此外，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事实非常之多，不能于短时间所能尽述。但还有一重的，即帝国主义在我国自由开设工厂，以微资招集我们工友人厂工作，其待遇非常之苛，工友之惨痛非常，而帝国主义每年都括去了一宗宗大款，这尤要我们非打倒帝国主义不可。工友们，我相信我的感觉与你们是一样的，我在上海的时候多，我常见早晨马路上—队队工友进去上工，夜晚—队队的下工，大多数是衣服褴褛，其生活痛苦可想而知。但马路汽车上下亦是很多，十分之八是外国人所乘，还有是那些发洋财的阔人坐的。我们一天做工很多，还是穿破衣走路，有时还受他们打骂，甚至要常常遭他们辗毙在路上。这种情形，我相信香港也是如此，这是如何不平等呀！所以我们真是除了打倒帝国主义没有别的生路。我们知道，孙先生为什么创造国民党，孙先生并不是因为想做大总统，而是为要打倒帝国主义而入党。我党同志以全国计算有一百万之多，应该要一齐“反帝”。但帝国主义船坚炮利，很不容易打倒的。帝国主义在上海、天津、广州杀了许多工人、学生，他们只为我们一起来反抗，便实行大屠杀，但我们决不会因此就害怕了他们。我们因为他们无理压迫、惨杀，所以反抗他们，他们实行这种惨杀，我们惟有继续奋斗与他们拼命死战。

当上海惨杀案发生后，我们遂尽力宣传于民众，所以上海工人、商人、学生一律罢市、罢课、罢工，此时我们正希望反帝空气普遍全国，而乘机打倒帝国主义。当时罢工工人有二十万及许多学生、商人，力量本来不少，为什么不能打倒帝国主义，而卒归失败，其原因有数点，我希望省港罢工工友晓得上海罢工失败情形，以供参考，得一方法以打倒帝国主义。第一点有军

为破坏之，如张学良当惨案发生到来上海，初则扬言援助罢工“反帝”，不久他到了英领事馆要与帝国主义磋商，要助他在长江发展势力，遂不惜破坏罢工为条件，而商人亦勾结帝国主义开市了。在省港罢工则有国民政府援助罢工，所以我们知道，国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第二点有买办阶级以破坏罢工。他们不愿意罢工，因罢工对他们有损失，故与帝国主义勾结而破坏罢工。当罢工时要巨款接济，上海大商不肯拿钱接济，使罢工坐归失败。第三点知识阶级也有破坏罢工的，如教职员等他们不愿意罢课以援助罢工，老早就把学校放了假，同时要学生家长阻止学生援助罢工。还有一点我们非常痛心的，即本党里反动的分子，他们要做官，所以勾结帝国主义以谋助他升官发财，致罢工风潮发生，他们都说为过激党指使，而同时暗通帝国主义捉拿罢工活动的人。这种反对罢工的反动分子，不特在上海如是，他们还跑到北京开西山会议，反抗国民政府。以上所述，我们知道罢工失败原因，是受帝国主义走狗买办阶级、反动派之破坏所致。

然罢工同志仍然坚持，但经数月后，他们压迫愈利害，稍活动的同志，都为他们摧残。至于罢工失败结果，是非常惨痛的。当失败上工时，外国资本家要工友签字，此后不准反抗，故当时上工后，还有一部分工友，再欲罢工。但情形已不同了。从前租界与华界划分的，外国人不能越界捕人的，及罢工失败后，则华界与租界打通了一片，无论租界华界可以随时捕人，其用心欲把革命党人一网打尽，所以不能再次罢工。但是罢工虽然失败，而反帝运动，没有一些停止，非打倒帝国主义不可。各位工友，我们罢工回粤，都是痛苦之极，而比较起来还要好一点。我们坚持数月，有党及政府极力援助，其他各界人士也能尽力援助，如现在举行各界援助罢工周。我们希望反帝战士继续奋斗；希望党及政府要继续孙总理遗嘱“反帝”到底，以达到罢工完全胜利。

组织起来，解放自己
——1927年3月在欢迎湖北农民代表会上的演讲

恽代英

中国四千多年，占重要地位的只有农民。整个的国家里穿衣吃饭，都是在靠农民。古昔皇帝的三宫六院，以及大官阔富的房屋田地，极小的差役胥吏，穿的吃的，哪一件不是从农民身上剥削来的么？好像一座高大房子，农民就是最下的一层，受着重重的压迫，至痛苦极深的时候，不知自救解放，只是希望真命天子出世。其实真命天子登基，亦不过减少一二次钱粮，农民身上的压迫，还是有加无已！比如农民常常纪念的乾隆皇帝，何尝解放过农民！农民的地位，向来是极下低而痛苦，近来加上帝国主义种种侵略，农村中很少有做房子的，除了贪官污吏劣绅是有田产的，其余好多农人，都是无田种的。现在我们要解除自己的痛苦，究竟要靠谁呢？读书人可靠吗？他们是皇帝养下来做封建势力的，他们平常是帮助帝国主义来压迫我们。但是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大变动，外国反抗资本家的工人，已在俄国建立了新的国家，法国、德国都起了革命，这个时候共产党更一天一天的扩大，快要打倒帝国主义了。如果有人说我们没有飞机大炮，怎么能打倒帝国主义？但是我们确实是有了把握，就是有了全世界帮助我们的共产党。况且是本国大多数觉悟的农民工人群众，一致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早晚一定是要实现出来了。革命军在广州出发的时候，兵力器械不及吴佩孚，然而一路打胜仗，这就是得到世界的帮助与战地农工的帮助。现在我们是已经得到一部分的胜利，我们对于有力量帮助自己的农民，要怎么样来解放他呢？不是贴出几个好标语，印刷几张好议决案，便算是农民得到利益了。现在我们有点怀疑了，苛税杂捐，没有减免，恐怕还要加重。军队所过地方，恐怕不少奸淫掳掠事情。农民上了当，只是不敢说。有人说我们是欺骗民众，我们应该怎样答复他呢？现在要我们的党，来替农民做事，还是要我们的党，变成为农民的党。还是要我们自己起来，拿中国国民党，切切实实，为自己做事。若是说靠人家——洋学生、文学家，为我们求解放，总怕是行不通的。真命天子欺骗我们农民，已经好几千年。……总而言之，还是要靠自己，不要再被人家欺骗。中国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农工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我们今天的会，是希望各位代表回到乡下去，组织起来，解放自己。

革命的根本问题

——1927年4月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欢迎会上的演讲

蔡和森

此次回湘所见所闻，较三年以前之湖南不同，现在的湖南已注意到社会革命基础，这是各位同志努力所致。兄弟对于各位革命领袖，非常表示敬礼。现在革命发展，第一当注重的是农运问题；农运是整个革命根本问题。就历史言，中国历代政变，无不是由农民问题发生，如秦，如元，如明之灭亡，均是农民问题之影响。前清如太平天国，如义和团，均是农民运动之表现。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即可以得天下。现在农民问题，较秦以来尤为重要。国民革命如不将此根本问题解决，证之历史，可断定不能成功。贵党中央执委会及湖南省政府省党部对于农民问题已经制定出许多政策，不过实行起来，在贵党及整个革命运动中将起分化，因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地主，惧怕农运，心存破坏，此时若恐分化，即停止农运进行，与右派妥协。相信左派的革命领袖决不牺牲农民利益，而与右派妥协；因妥协即无异宣布全部政治的死刑。第二当注重者，革命的社会基础。全民革命是一种理论，革命必于全社会中找到一个基础，对于各方，自不能面面俱到。现在革命的社会基础有两方面：（一）农民。（二）资产者。国民党保护资产者抑保护农民，这个路的分歧，关系革命的成败。孙总理、廖仲恺、汪精卫各领袖均重农运；右派分子如蒋介石辈注重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时有斗争，革命愈进展，斗争愈剧烈。贵党左派领袖，应当注意这革命基础。惟有占全国人民百分八十以上的农民是革命的中心军队。第三当注意同盟军。革命基础改建筑在农民上面，究以何种力量为同盟军队，此亦有二：一为资产阶级，一为工人阶级。右派代表资产阶级，左派应选择工人阶级；因工人方是真正的同盟军，资产阶级是压迫工农的，不能领导革命。第四注重者为革命武装问题。现在受国民政府指挥之军队在四十军以上，目下军事虽然胜利，但军队非完全的武装基础，因军事领袖随时有向后转之可能，彼可携带武装加入，也可携带武装遁逃，辛亥往事，可为殷鉴。根本问题在武装农民起来。武汉政治会议与湖南省政府省党部已筹备农民武装，希望中央委员会与湖南省党部在总理主张下充分使农民得到武装，革命基础方不致动摇。第五应注重的是革命中的经济问题。革命不仅使政治变化，且要使经济变化；不仅俄国社会革命须使经济变化，即民主政治亦须注重此问题。法国革命，除改革政治后，亦推翻大地主与没收反革命财产，民主革命方能成功。现在革命不仅在打倒军阀与土豪劣绅，起政治上之变化；经济方面，如第一点所说之农民问题，即土地问题，亦即吃饭问题，生活不能解决，革命断难成功。解决经济问题，即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二十世纪为世界革命时期，即苏俄社会革命时期。我们的民生主义，当然不能采私人资本方法，这无须多说。又财政问题亦为革命根本问题之一，现在财政成为最普遍、最困难问题，财政问题不是仅言整理可以解决。广东财政整理后每月收入增至一千余万，不过开源节流清除积弊之技术问题。财政为革命基础，法国革命，国家没收僧侣及外人财产并收殷户捐与发公债，因此法国革命全国农民均踊跃参加，因财有来源，非取于苛捐杂税之故。此次中央会议及湖南新政纲虽有决定，尚属萌芽，希望全国领袖对于财政政策具体规定，不仅消极的清源节流，并须筹备大宗的收入，

又不加重一般人民的负担，以为革命基础。又理论问题，亦当注重。左派分子认为中国革命或湖南已经成功，其实尚在开始时期，左派分子要达到三民主义，发展工农运动，右派即谓为破坏革命，不知农民要求减租，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是无办法中之办法。右派理论谓国民革命不是社会革命，是三民主义的革命；工农运动是共产党做的，非三民主义之所应做的。如此立论，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分而为二，以为要三民主义成功，即须打倒共产主义；打倒共产主义，即须破坏农工运动。不知要国民革命成功，须扶助农工，基础方能巩固；要扶助农工，即须与共产党合作。且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其结果即是共产主义。如须包括资本主义，应为四民主义。如谓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同，则须除去民生主义，应为二民主义。希望各同志拥护总理遗下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以纠正右派理论。观于总理与列宁可以合作，可以断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仅现在即将来亦可合作。

不要抛弃学问
——1929年在中国公学学生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胡适

诸位毕业同学：

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既为吃饭计，学问也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生活问题急须解决，哪有工夫去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做学问？”

我要对你们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撙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

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读十一万页书。

诸位，十一万页书足可以使你成为一个学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

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已。

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

对毕业主之六大希望
——1929年7月在东北大学首次毕业生典礼上的演讲

张学良

今日为诸君毕业之期，得共会一堂，不胜荣幸。以吾个人视之，今日得与诸君相会，恐怕为最后一次，故今日所云者，可谓临别赠言，然依依之情，何能自己。

吾人从事社会事业，应尽之义务无穷，而互相之希望亦无已。今后之希望于诸君者，约有六端：

一、勿自满。满招损，谦受益——至理名言，无庸喋喋。盖存自满之心，作骄必败，诸君勉之。

二、学与德俱进，勿懈怠。世间无处无学问，诸君勿以为毕业后而学足矣，因之懈怠。仍希望努力前进。

三、打破恶劣环境，努力奋斗。青年人心理纯洁，一人社会，往往变改常态。希望诸君出校改造社会，勿被社会改造。

四、做事有恒。青年人遇事务，始则极其热烈，终则意冷心灰。希望诸君要永久保持适宜温度，成则不喜，败则勿馁。

五、本良乙做事，为社会服务。

六、为东大争光荣，具百折不挠之精神。诸君为东大天字第一号之先锋，希望好好打开出路，领导后起同学，为东大创一块有荣誉之招牌。

最后并希望诸君勿忘母校，精神勿涣散，感情永存在，双方互相期望，努力救国。

坚定信仰，为民族解放而奋斗
——1937年8月在出狱欢迎会上的演说

邹韬奋

诸位：

刚才几位先生已有很好的报告，兄弟的意见，不过说一说自己所要说的话。

兄弟在苏州，常常承蒙朋友来访，他们常问我两句话：（一）你在看守所内有什么感想？（二）以后态度如何？兄弟对这两句话的答复：

（一）在看守所内心安理得；（二）兄弟有坚定之信仰。

就是各人能努力于大众所要求的事情，无论力之大小，最后一定能取得胜利。兄弟每自反省，自己好不好？所做皆大众所要做的事吗？自问无错，所以是心安理得。兄弟常想，个人可受委屈；但大众的事，应顾到大众方面，非如个人可以随便，所以在看守所内感想是什么？个人都不要紧，可牺牲，可抛弃一切，但不能出卖大众，违反良心做事。个人尽可杀即杀，打即打，心中满不在乎。而兄弟又很想早些出来，和大众做一些事。一切不求个人胜利，亦没恨人的心。个人心目中，惟大众的事，务须和大众有益，以前一切皆可以不管，但愿今后能合作。

今天看到诸位，知道救国工作，并未因七人被捕而受到影响。简言之，就是七人死了，诸位对于救国工作亦会更努力。兄弟是心安理得，生一日，努力一日，和诸位做到民族解放的一步。

认清形剪，坚持抗战，奋斗到底
——1943年8月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

周恩来

同志们：

感谢大家的欢迎。我这三年在外，做的事实在太少了。可是在这三年中间，国际的国内的变化，我们党内进步，却特别的多，特别的大，我们在外边也看得格外分明。

在国际方面，我们从法兰西投降后欧陆所遭受的法西斯浩劫起，看到希特勒德国对于苏联所进行的背信弃义的疯狂进攻，一而再，再而三；看到太平洋上日本强盗对于英美所进行的闪击；看到全世界除苏联外都有法西斯第五纵队的猖獗活动。同时，我们看到苏联红军和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之下奋起抵抗希特勒进攻的英勇战绩和生产热忱；从列宁格勒、莫斯科保卫战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从两年的冬季反攻到今年的夏季反攻，获得了举世称赞的辉煌战绩。我们也看到同盟国抵抗法西斯侵略的阵线的形成和进步：从罗斯福、丘吉尔大西洋宪章的公布到苏英同盟、苏美协定的缔结，到十六国公约在华盛顿的签字；从英美盟军在北非的反攻和胜利直到西西里的登陆。我们又看到全世界反法西斯统治的斗争的兴起和扩大：从欧陆被侵占国中反法西斯游击战争的发展到德意国内反法西斯的罢工示威和游行的兴起；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合作到“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的建立；从美国、印度共产党合法地位的恢复或被承认到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同志的来延。三年来，同盟国反法西斯的解放战争是由危而安，转败为胜，由被动的作战转为主动的进攻。这种变化主要地倚靠于苏联红军和人民的两年抵抗和三次反攻，同时，也倚靠于英美同盟军在北非的胜利和在南太平洋的积极行动，倚靠于美国的巨大生产和盟国的战争动员，倚靠于中国抗战的坚持，尤其是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

现在，墨索里尼倒台了，意大利法西斯党解散了，世界法西斯统治在其最薄弱的一处开始崩溃了，世界法西斯主义正走向死亡。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曙光已现，曾经猖獗一时的法西斯党徒及其第五纵队的死期是一天一天逼近了。不看见意大利法西斯党员的末路么？不看见德国第五纵队在意大利的抱头鼠窜么？这就是世界法西斯主义信徒的活榜样！这就是中国法西斯主义信徒的活榜样！

在国内方面，这三年来，我们依然是处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三年来，有人以为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既已先后发生，日寇今后不攻印必攻苏，决元余暇余力来打中国，于是便以消极抗战来暗示日寇不打中国，以积极反共来推动日寇移兵攻苏。可惜此计虽巧，日寇并不完全听话。日寇有日寇的国策。他虽赞成你消极抗战，毕竟你还未投降，而且武装也未解除，所以一有间隙，一有必要，他就要打到中国头上来了。他虽更赞成你积极反共，可是你尚未全面“剿共”，而且也无法“灭共”，所以日寇还得以其在华半数以上的兵力在敌后进行“治安强化运动”，自己来“扫荡”八路军和新四军。

三年来，又有人以为太平洋战争既起，美英若不是很快地打败日寇，便要大力来援助中国，如此，中国便可坐享其成。殊不知美英不能很快地战胜日寇，已为事实所证明。而美英援助中国，固为我们大家所切望，但他们

生产不易，他们首先要援助那直接参战的部队和作战有效的地方，若作战迟疑、心怀二用的部队，必然会成为他们慎重考虑的对象。而且自从吴开先由宁奔渝，两方特务勾勾搭搭，直到昨日寇广播竟公开地提出条件诱降，更不能不使同盟友邦有所顾虑。

三年来，还有人以为抗战只要能拖，就可拖到胜利。殊不知你要拖，敌人却不让你拖。敌人要在希特勒垮台以前，至迟要在太平洋决战以前，解决中国问题，这是很明显的，而这次公开诱降，主要的就是由于墨索里尼倒台所引起。不仅敌人不让你拖，就是国内情形也不会让你拖。许多军队不开到前线，不积极作战，士气能提高么？兵役制度不改善，军队待遇不提高，战斗力能加强么？财政经济政策不改变，官僚资本不打倒，贪污腐化不惩办，囤积居奇不肃清，财政经济的破产能避免么？人民自由不取得，人民生活不改善，劳动生产力不提高，官僚政治不肃清，排除异己的压迫政策不取消，抗战后方能够安定么？这些现象不改变或消灭，中国抗战的局面能拖到胜利么？我们的回答：要胜利，不是拖而是打！要胜利，不是消极的抗战而是积极的抗战！要胜利，不是国内的分裂而是国内的团结！要胜利，不是政治的压迫而是政治的民主！

三年来，更有人认为内政虽坏，只要特务统治加强，便可维持抗战局面到胜利。殊不知抗战是要争取民族解放、民主政治的胜利，决不是为的法西斯化的特务制度的胜利。如果特务统治加强，那只是为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统治开道路，决不是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开道路。

照这样，三年来，国民党当局中这些想法既都错了，那么，要争取中国抗战的胜利，还有没有办法呢？我们回答：有办法！办法就出在陕甘宁边区！办法就出在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办法就出在中国人民的身上！办法就出在真正抗日的党派和军队中间！办法就在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的手中！

谈到抗战，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三年来没有外来枪弹的补充，没有外来粮服的供给，没有外来医药器材的接济，全凭人民和自力更生，终年打仗，支持着这抗日的战略根据地，吸引着半数以上的在华敌人。八路军、新四军有了这种抗战成绩，就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最坚强最可怕的抗日力量。这种抗日力量，难道还不值得全国其他愿意抗日的军队照样学么？凡是要想进攻和取消这种抗日力量的人，难道还不是亲日的第五纵队么？

谈到民主，三年来，我们党在边区抗日根据地，宣布施政纲领，实行人民普选的“三三制”，实行保护人权财权政权的民主法令，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和合理负担的农村政策，实行十小时工作制，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劳动政策，实行志愿兵制和民兵制度，实行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并允许任何外人在尊重主权、遵守法令的原则下，可在边区参加抗日工作，进行实业、文化和宗教的活动，由此做到各根据地的自给自足直到丰衣足食的地步。这种边区，这种抗日根据地，难道还不值得全国真正愿意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地方照样学么？凡是要想进攻和取消这种边区、这种根据地的人，难道还不是反民主、反三民主义的法西斯么？所以凡是真正抗日的党派和军队，凡是爱国的同胞，必定会不满意于现在国民党当局中对抗战的摇摆政策，对内政的错误政策，尤其是又抗战又反共的两面政策；必定会愿意同八路军、新四军做朋友结同盟，从边区根据地采取民主政治的经验，尤其会愿意同中国共产党结成真正的统

一战线。

所以这三年中，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在全世界同盟国家面前，我们中国究竟哪个是抗战积极的军队？哪个是抗战消极的军队？哪里是民主政治的区域，哪里是反民主政治的区域？大家心里明白。而且不仅在心里，国内外的舆论，也已经表现出来了。

说到这里，我们就必须提到我们党在这三年来的伟大进步。我们党在这三年做了比过去二十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对全国说，我们党两度制止了内战的危机（皖南事变和这次进攻边区的阴谋的揭露），坚持了敌后最艰苦的游击战争，坚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撑持。因此稳定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情绪和意志，维系了大后方对抗战前途的信心和希望。对国际说，我们党不仅预见三年来的国际事变而指出世界法西斯主义必趋死亡民主国家必然胜利的前途，并且也使同盟国家认识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才是真正反攻大陆日寇心脏的力量和基地。对全党全军全边区说，我们党领导的整风运动，收获了从来没有的思想上改造的成绩；精兵简政，收获了力量上巩固的成绩；统一领导，收获了政治上一致的成绩；拥政爱民，收获了党政军民联成一体的成绩；发展生产，树立了真正自力更生的楷模；最后，审查干部，使我们党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这一成绩，是怎样得到的呢？是全党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是全党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得到的！尤其有决定意义的，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

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

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同志们，我们有了这样的党，不应该骄傲么？我们有了这样的领袖，不应该骄傲么？但是国内有些反共分子，竟敢无耻高叫取消中国共产党，解散中国共产党，难道他们还不是日寇汉奸的第五纵队么？他们早不提迟不提，偏偏在现在公开提出。他们故意说共产国际解散了，共产主义便不适用于中国，中国共产党便失掉靠山，中国共产党内部便要分裂了。他们这种鬼话，有人相信么？

共产主义是不适用于中国么？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可以适用于全人类，可以改造全世界，为什么中国会独独除外？反共分子所以要这样胡说，就是因为他们最怕我们用马列主义的照妖镜，在中国人民面前，照出他们第五纵队的原形。反共分子所以要这样胡说，就是因为他们最怕我们用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在中国人民面前，解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诸现象，指出中国革命的真正道理。我们敢正告反共分子：共产主义不但适用于中国，而且它经过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运用和发展，已经和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而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共产主义了。谁要想来摇撼它，谁就会自趋死亡。

中国共产党是失掉了靠山么？不错，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

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从中国劳动人民中生长起来的，它是存在在中国人民中间。我们党是群众的党，在今天，已有了八十万的党员，五十万的军队，并与近万万的群众在实际的战争的生活中血肉相连起来了。中国民族需要它，中国的人民需要它，谁能取消它、解散它？我们敢正告反共分子：中国共产党不仅不会取消，而且要永久地存在下去！在世界法西斯主义走向死亡的道路，应该取消、应该解散的倒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那些法西斯化的中国特务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是要分裂么？反共分子一年到头日以继夜地梦想我们党会象他们一样，分成许多派系，于是遂制造许多谰言蜚语，想来中伤我们。殊不知我们党的组织是统一的，是基于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觉悟和革命的锻炼的，并有自觉的纪律来巩固它，决不同于国民党可以派别分歧，毫不统一。不错，我们党内曾经有过不少的错误，有过不少犯错误的分子，但是我们党正是在反对和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中成长起来，党的思想才趋于一致，党的组织才趋于巩固。犯错误而肯改的人，自然会与党的正确路线复归一致。屡犯而不肯改的人，自然会被党所唾弃。陈独秀、张国焘还不是中共的创始者么？但当他们怙恶不俊，为党所开除的时候，他们何尝能分裂党，反而使党更加巩固了。这三年，我们全党的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整风学习到干部审查，已达到空前巩固的程度。我们敢正告反共分子：中国共产党不仅不会因为你们的造谣中伤而分裂，反而会因为你们的阴谋破坏而更加警觉，更加团结，更加巩固起来！我们想，抗战愈艰难，革命愈向前发展，分裂的倒不会是中国共产党，而会别有所在，并且这种例子，历史已不止一次重复了。

共产国际解散，有一事却须要特别说明，即是中国共产党将要更负责地更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我们是坚持抗战到底的。我们认为只有用自己的力量才能将日寇赶出中国去！消极的抗战，两面的政策，必致半途而废，有招致投降妥协的危险。并且只有积极的抗战，才配争取外援，才能协同盟国取得战争的胜利。

我们是坚持国内团结的。我们仍然准备与国民党继续进行协商，共同消灭内战的危机，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但这种协商必须是真诚的平等的互让的，而不应一面谈判一面磨擦，一面信使往还一面调兵遣将，一面讲团结一面又要取消解散我们。若国民党有人将国共合作看作国共合一，以为非逼不能就范，这就是内战的动机，决非团结的道理。

我们是坚持民主进步的。我们仍然希望国民党当局改变内政的错误政策，真正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们也愿意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与其他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力量进行合作，以坚持抗战，以推动进步。

这就是我们党的方针！

同志们！我现在回来了。我要为这个方针，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努力，奋斗到底！

和平胜利万岁

——1953年8月21日在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归国大会上的演讲

郭沫若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各位凯旋的同志：

你们从朝鲜前线胜利归来了，我们代表全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诚恳的欢迎。

你们执行了中国人民的意志，率领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的正义战争中，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保障了邻邦的独立、祖国的安全、亚洲的和平与世界的和平。全中国的人民都感谢你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感谢你们。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英勇作战，打乱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时间表，揭穿了它的外强中干的本质，鼓舞了世界人民和平战胜战争的信心。

你们的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是和平的胜利、民主的胜利、正义的胜利。

以苏联为首的全世界民主和平阵营的力量是越来越壮大了。和这相反，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由于侵朝战争的失败，是越来越遭受到诅咒。

全世界人民都在要求：以协商的办法解决一切的国际争端，把美帝国主义所一手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缓和下来。

你们在被美帝国主义拖延了两年之久的停战谈判中，又提供了协商谈判的典型示范，使停战协定终于签订了，使世界人民所渴望的朝鲜停战终于实现了。这不仅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开辟出了道路，并为和平解决一切国际问题也开辟出了道路。

你们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中国人民的模范。我们要长远地向你们学习，要长远地使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教育普及而深入。我们知道被迫停战的帝国主义者是不肯甘心的。美国的战争贩子们依然在操纵着李承晚傀儡，企图破坏政治会议，恢复战争。我们要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要继续不断地支持朝鲜人民，使朝鲜问题得到真正的和平解决。我们要继续帮助朝鲜人民医治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而带来的战争创伤，迅速恢复其和平幸福的生活。

由于祖国的安全得到你们的保障，祖国的和平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成就，目前已经走上计划建设的阶段了。我们要继续不断地努力，保证建设计划的完成，认真地学习苏联，把中国建设成像苏联一样的和平堡垒，使民主和平阵营愈加壮大。

光荣属于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高度实践者！

光荣属于战胜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英雄！

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中朝两国人民永远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和平胜利万岁！

伟大的祖国万岁

——1953年8月11日在抗美援朝胜利归国欢迎大会上的答词

彭德怀

各位代表、各界同胞、各位同志：

我抱着无限的兴奋和感激，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向分别了两年多的伟大的祖国人民致敬！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致敬！

三年来，中国人民志愿军，执行祖国人民的意志，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一道，抗拒美国侵略者。经过了严重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光荣的胜利。这个胜利和光荣应该归功于英雄的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归功于我们伟大的祖国人民！归功于以苏联为首的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

三年来，祖国人民一面进行着经济、国防、文化的建设工作，一面进行着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给予志愿军以无比热烈的支援，使我们获得了源源不绝的物质上的供应和精神上的鼓舞，使我们得以顺利地打击侵略者，直到今天的胜利。我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同志，向全力支援我们的祖国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现在朝鲜已经停战了。我们热烈欢迎停战，并将坚决执行停战协定的一切规定，因为这是我们奋斗得来的结果。但这只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联合国军中的好战分子，尤其是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可能随时破坏停战协定。全世界人民必须以高度的警惕监视着他们的阴谋活动。中国人民志愿军现在正继续与朝鲜人民在一起，坚守自己光荣的岗位，为保障朝鲜停战协定的彻底实现，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奋斗。我们相信，如果敌人敢于背信弃义破坏停战协定，再一次发动侵略，即将遭到更可耻的失败。

和平胜利万岁！

中朝人民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万岁！

我们伟大的祖国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总结经验争创一流

——1959年10月在接见广东省参加第一届全运会代表团时的讲话

陶铸

这次广东省体育代表团到北京参加全国运动会比赛，创造了良好的成绩，为全省人民争得了荣誉，胜利地完成任务归来。

在全运会上，有些项目成绩比较好，得到了冠军；有些项目成绩还不够理想。但是总的来说是有进步的，成绩是良好的。全体同志要认真总结经验，每一个项目都要进行总结，从中得到教益。希望大家要继续鼓干劲，很好地锻炼身体，同时要认真提高文化水平。作为一个运动员，不仅要有坚强的体魄，而且还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初中文化程度的运动员，要到体育学校去进修，高中文化程度的要到体育学院进修，安心搞好体育工作，在一定期间内提高到高中或大学的文化水平。

广东是有体育传统的，要争取更大成绩。既得的成绩要保持下来，加以发扬；有的项目失败了，也不要灰心，要抬起头来急起直追。胜利了不骄傲，失败了则要吸取教训。要全面提高各个项目的水平，力争在第二届全国运动会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劳动者底觉悟

——1902年5月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上的演说

陈独秀

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这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吃的粮食，是那种田的人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穿的衣服，是裁缝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住的房屋，是木匠瓦匠小工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坐的各种车船，都是木匠铁匠漆匠做的；还有许多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才能把我们的货物和我们自己送到远方，这都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的功劳。这世界上若是没有种田的，裁缝，木匠，瓦匠，小工，铁匠，漆匠，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我们便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屋住，没有车坐，没有船坐。可见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有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如此，人类社会，岂不是要倒塌吗？我所以说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但是现在人的思想，都不是这样，他们总觉得做工的人最无用、最下贱；反是那不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我们现在一方面盼望不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元用的下贱；一方面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有用、贵重。

世界劳动者底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现在欧、美各国劳动者底觉悟，已经是第二步，东方各国像日本和中国劳动者底觉悟远不过第一步。

在表面上看起来，欧、美、日本的劳动者，都在那里大吹大擂的运动；其实日本劳动者底觉悟和欧、美大不相同。因为他们觉悟后所要求的，有第一步第二步的分别。第一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劳动者对于国家资本家，要求待遇改良（像减少时间，增加工价，改良卫生，保险教育等事）；第二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要求做工的人自身站在国家资本家地位，是要求做工的人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和第一步觉悟时仅仅要求不做工的人对于做工的人待遇改良大不相同。第一步要求还是讨饭吃，必须到了自己有饭吃的时候，油盐柴米菜蔬锅灶碗碟等，都拿在自己手里，做工的人底权利，才算稳固。否则无论如何待遇改良，终是别人底恩惠，赏饭。

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

各国劳动者第二步觉悟，第二步要求，并没有别的奢望，不过是要求做工的劳力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要求那不做工的劳心者居于治于人的地位。

我们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第一步觉悟还没有，怎说得到第二步呢？不过我望我们国里底做工的人，一方面要晓得做工的人觉悟确有第二步境界，就是眼前办不到，也不妨作此想；一方面要晓得劳动运动才萌芽的时候，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意，便不去运动。

演说的好处

——1904年就演说问题发表的演讲

秋瑾

演说一事，在世界上大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不能不注意。我国把演说看得很轻，以为口里说说，有什么大不了，何必是要去练习他；到了演说的地方，当作家常话，随便说说，无关正事，不足动人，这还可以算得演说吗？然却怪不得，都因为从前不曾练习的缘故。为什么演说一事，在世界上大有关系呢？因为开化人的知识，感动人的心思，非演说不可。然而我却常常听人说道：“这如今岂不有报纸吗？有了报纸，岂不能开化民智，为何要演说呢？”唉！这话可就差了。如今看报纸的人，可以分做四等：一等就是官场；一等是商家；一等是闲荡的人；一等是平常读书的人。读书人看报。亦有爱新议论的；亦有爱看顽固议论的。闲荡的人看的报，又与别不同，不过看些笑林报、花月报、戏园中那几个开演，书场中那几个登台。商人看报，不过看看报纸的反面：钱米各业的行情，可以用他居奇的方法。那官场看的报更觉可笑：不过看一种《申报》，因为《申报》上都是恭维他们的话，所以官场中人除了《申报》，别种报都不要看。

现在我们中国，把做官当做最上等的生涯，这种最上等的人，腐败不堪：今日迎官，明日拜客；遇着有势力的，又要去拍马屁；撞着了有银钱的，又要去烧财神；吃花酒，逛窑子，揣上意，望升官；种种想头，还忙个不了，哪里还有工夫用心在报纸上呢？并且报上的话，与他水火不相投，为什么要去看他呢？中等的人，做做生意，亦没有看报纸的思想，那些下等的人，更不消说了。一万里头，能有几个认得字呢？既然不认得字，拿了报还不知是横看竖看呢；况且他们亦不晓得报中的好处。就是有认得几个字的人，报中议论亦解不透，何苦月月花钱去买报看呢？所以开化人的知识，非演说不可。并且演说有种种利益：第一样好处是随便什么地方，都可随时演说。第二样好处：不要钱，听得人必多。第三样好处：人人都能听得懂，虽是不识字的妇女、小孩子，都可听的。第四样好处：只须三寸不烂的舌头，又不要兴师动众，捐什么钱。第五样好处：天下的事情，都可以晓得，西洋各国，演说亦为一种学问，岂非因演说一事，世界上大有关系吗？如今我国在日本的留学生，晓得演说的要紧，所以立了一个演说练习会；又把演说的话刻了出来，把大家看了，可以晓得些世界上的世情、学界上的学说。唉！列位不要把这个演说会看轻了，唤醒国民开化知识，就可以算得这个演说会开端的了。

“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
——1919年9月就理想中的“新中国”发表的演饼

李大钊

我们的理想，是在创造一个“少年中国”。

“少年中国”能不能创造成立，全看我们的“少年运动”如何。

我们“少年中国”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创造；不是铸定的偶像，是活动的生活。我想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人人理想中必定都有一个他自己所欲创造而且正在创造的“少年中国”。你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和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不必相同；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又和他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未必一致。可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朋友，毕竟都在携手同行，沿着那一线清新的曙光，向光明方面走。那光明里一定有我们的“少年中国”在。我们各个不同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里成一个结晶，那就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少年中国”。仿佛像一部洁白未曾写过的历史空页，我们大家你写一页，我写一页，才完成了这一部“少年中国”史。

我现在只说我自己理想中的“少年中国”。

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

为创造我们理想的“少年中国”，我很希望这一班与我们理想相同的少年好友，大家都把自己的少年精神拿出来，努力去作我们的“少年运动”。我们“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要作两种的文化运动：一个是精神改造的运动，一个是物质改造的运动。

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把那占据的冲动，变为创造的冲动；把那残杀的生活，变为友爱的生活；把那侵夺的习惯，变为同劳的习惯；把那私营的心理，变为公善的心理。这个精神的改造，实在是要与物质的改造一致进行，而在物质的改造开始的时期，更是要紧。因为人类在马克思所谓“前史”的期间，习染恶性很深，物质的改造虽然成功，人心内部的恶，若不剔除净尽，他在新社会新生活里依然还要复萌，这改造的社会组织，终于受他的害，保持不住。

物质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性、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那劳工的生活，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人人都须作工，作工的人都能吃饭。因为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很难成功。在从前的经济组织里，何尝没有人讲过“博爱”、“互助”的道理，不过这表面构造（就是一切文化的构造）的力量，到底比不上基础构造（就是经济构造）的力量大。你只管讲你的道理，他时时从根本上破坏你的道理，使你永远不能实现。

“少年中国”的少年好友呵！我们的一生生涯，是向“少年中国”进行的一条长路程。我们为达到这条路程的终点，应该把这两种文化运动，当作车的两轮，鸟的双翼，用全生涯的努力鼓舞着向前进行，向前飞跃。

“少年中国”的少年好友呵！我们要作这两种文化运动，不该常常漂泊在这都市上，在工作社会以外作一种文化的游民；应该投身到山林里村落里

去，在那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做那些辛苦劳农的伴侣。吸烟休息的时间，田间篱下的场所，都有我们开发他们，慰安他们的机会。须知“劳工神圣”的话，断断不配那一点不做手足劳动的人讲的。中国今日的情形，都市和村落完全打成两橛，几乎是两个世界一样。都市上所发生的问题，所传播的文化，村落里的人，毫不发生一点关系；村落里的生活，都市上的人，大概也是漠不关心，或者全不知道他是什么状况。这全是交通阻塞的缘故。交通阻塞的意义，有两种解释：一是物质的交通阻塞，用邮电舟车可以救济的；一是文化的交通阻塞，非用一种文化的交通机关不能救济的。在文化较高的国家，一般劳农容受文化的质量多，只要物质的交通没有阻塞，出版物可以传递，文化的传播，就能达到这个地方；而在文化较低的国家，全仗自觉少年的宣传运动，在这个地方，文化的交通机关，就是在山林里村落里与那些劳农共同劳动自觉的少年。只要山林里村落里有了我们的足迹，那精神改造的种子，因为得了洁美的自然，深厚的土壤，自然可以发育起来。那些天天和自然界相接的农民，自然都成了人道主义的信徒。不但在共同劳作的生活里可以感化传播于无形，就是在都市上产生的文化利器——出版物类——也必随着少年的足迹，尽量输入到山林里村落里去。我们应该学那闲暇的时候就来都市里著书，农忙的时候就在田间工作的陶士泰（按：托尔斯泰）先生，文化的空气才能与山林里村落里的树影炊烟联成一气，那些静沉沉的老村落才能变成活泼泼的新村落。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

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好友啊！我们既然是二十世纪的少年，就该把眼光放的远些，不要受腐败家庭的束缚，不要受狭隘爱国心的拘牵。我们的新生活，小到完成我的个性，大到企图世界的幸福。我们的家庭范围，已经扩充到全世界了，其余都是进化轨道上的遗迹，都该打破，我们应该拿世界的生活做家庭的生活，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我们的“少年中国”观，决不是要把中国这个国家，作少年的舞台，去在列国竞争场里争个胜负，乃是要把中国这个地域，当作世界的一部分，由我们居住这个地域的少年朋友们下手改造，以尽我们对于世界改造一部分的责任。我们“少年运动”的范围，决不止于中国：有时与其他亚细亚的少年握手，作亚细亚少年的共同运动；有时与世界的少年握手，作世界少年的共同运动，也都是我们“少年中国主义”分内的事。

总结几句话，就是：

我所希望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物心两面改造的运动，是灵肉一致改造的运动，是打破知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是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织的运动，是以世界为家庭扩充大联合的运动。

少年中国的少年呵！少年中国的运动，就是世界改造的运动，少年中国的少年，都应该是世界的少年。

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

——1920年4月在中国公学第二次演讲会上的演讲

陈独秀

如若有人问“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大概的答词必然是爱国救国。我以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受了日本和本国政府的两种压迫而成的，自然不能说不是爱国运动。但是我们的爱国运动，远史不必说，即以近代而论，前清末年，也曾发生过爱国运动，而且上海有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校。十年前就有标榜爱国主义的运动。何以社会上对于“五四”运动无论是赞美、反对或不满足，都有一种新的和前者爱国运动不同的感想呢？他们所以感想不同的缘故，是“五四”运动的精神，的确比前者爱国运动有不同的地方。这不同的地方，就是“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的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符，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清末革命的时候，人人都以为从此安宁了，不料袁世凯秉政结果，反而不好。袁世凯死的时候，人人又以为从此可以安宁了，不料现在的段祺瑞、徐世昌执政，国事更加不好。这个时候，中国人因为对于各方面的失望，大有坐以待毙的现象。自从德国大败，俄国革命以后，世界上的人思想多变。于是，中国人也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五四”运动遂应运而生。一般工商界所以信仰学生，所以对于“五四”运动有新的和前次爱国运动不同的感想，就是因为学生运动是直接行动，不是依赖特殊势力和代议员的卑劣运动呵。中国人最大的病根，是人人都想用很小的努力牺牲，得很大的效果。这病不改，中国永远没有希望。社会上对于“五四”运动，与以前的爱国运动的感想不同，也是因为有无牺牲的精神的缘故。

如何才是正当的人生
——1921年1月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演讲

陈独秀

今天本来预定三点钟来的，因为有些小事情，所以稍迟了。我本来没有什么高深学说，贡献于诸君。今天各位所定的题目，范围广大，又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完，现在将简略说说，这是很抱歉了。这题大约有两种观念：第一种是精神上的，第二种是物质上的。我以为精神上的人生，没有什么标准。人说善则善，人说恶则恶，人说苦则苦，人说乐则乐。譬如中国妇女的生活，有时明明是很痛苦的，因为旧道德支配着，也觉得自己是无上光荣，是无上快乐；还有好些快乐生活的人，有时也觉得是很痛苦的，所以在精神上讲来，很难辨别人生正当不正当啊。

如果就物质上说，较为有点标准，然而非两三句说话就可以说明，古来的解说也很多。我的意思，以为物质上的生活，能够做到平等、自由，便是正当的人生。因为人人都是人类，不应该受他人的压迫。如果我压迫人，或人压迫我，都是不正当的人生。

历史上的人生，到今还未曾发见。真正的中国的人生，自古都是很不正当的，不是这一个压迫那一个，就是那一个压迫这一个。在封建制度的时代，有两种阶级：一是诸侯和地主，一是农奴。诸侯压迫农奴，农奴要受诸侯、地主的压迫。

如今封建时代已经过去，进入资本制度的时代了。又发现两种阶级：代诸侯和地主阶级而起，是政府和资本家，从前的农奴，就是今日的劳动者。资本家能压迫劳动者，劳动者就要受资本家压迫。这种情形，不独中国如此，各国都是一样。又如中国的习惯，男子常是压迫女子的，这是甚么原故的？难道女子就不是人？应该受男子压迫吗？中国的古训所谓女子有三从之义：在未婚的时候，服从父母，既婚之后，服从丈夫，丈夫死了，还要服从所生的孩子。你们想还有甚么道理来压迫我们呢。以上所讲的，都是不正当的人生。男子受政府、资本家的压迫，女子们除了政府、资本家压迫之外，更要受男子压迫。然而女子阶级之中，还有些同类上的压迫，好像中国的家庭，家姑压迫媳妇，小姑压迫嫂嫂的事情，非常之多。还有做奴婢的人，被主妇压迫，也是十分惨痛的。兄弟到广东来，看见这样的现象，格外繁多。所以中国的人生，都是一层一层压迫人家和被人压迫的。男子受的压迫是政府、资本家，女子所受的压迫有政府，有资本家，有男子，还有他同类的妇女。故此我以为从前人生，完全是不正当啊。

我如今论压迫他人，和受他人压迫，不是说男女问题，是说人类的问题。总之人类是不应压迫人家和受人家压迫的。如果说到压字，却是最不正当的。换一句说，正当的人，就是不施压于人，亦不受人所压。我现在所说的，不晓得诸位以为对不对。

新教育是什么

——1921年1月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

陈独秀

今天讨论的问题是“新教育是什么”。新教育底对面就是旧教育。新教育和旧教育有什么分别呢？

或者有人说：新教育是学校，旧教育是科举。其实这个分别不过是形式的分别；科举时代所贵的是功名，是做官；现在学校所贵的还是有文凭，也是去做官，精神差不多是一样。

或者又有人说：旧教育是习经、史、子、集，新教育是习科学。其实这个分别也不过是教材上的分别，不能够当做新旧教育绝对不同的鸿沟。况且讲哲学可以取材于经书及诸子，讲文学可以取材于《诗经》以下古代诗文，讲历史学及社会学，更是离不开古书底考证，可见即以教材而论，也没有新旧底分别。经史子集和科学都是一种教材，我们若是用研究科学底方法研究经史子集，我们便不能说经史子集这种教材绝对的无价值；我们若是用村学究读经史子集底方法习科学，徒然死记几个数理化底公式和一些动植矿物底名称，我们不知道这种教材底价值能比经史子集高得多少？

旧教育——科举形式的不同 新教育——学校

经史子集科学教材种类的不同照上表看起来，科学和学校只是形式的不同，经史子集和科学只是教材种类不同，不能说科举和经史子集是旧教育，也不能说学校和科学便是新教育，我们必须另外找出新旧教育分别的地方是什么。在我说明之先，我请各位想想到底什么是新教育，什么是旧教育？

新旧教育不同的地方，各位一定有许多意见，但现在没有机会可以和诸君各个讨论，只好拿我的意见告诉各位。我以为：

旧教育——主观的教育主义——个人的教授方法——教训的新教育——
客观的教育主义——社会的教授方法——启发的旧教育的主义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不是这样，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我们现在批评这两种教育主义的好歹，应该先讨论社会和个人的力量哪样较大。我以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个人远甚，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

各位对于这个意见，一定很怀疑，以为中国民族受孔子的影响何等伟大，印度民族受释迦牟尼的影响何等伟大，欧洲民族受耶稣的影响又何等伟大，支配世界的这三大民族完全为三个伟大的个人之精神所支配，怎么说个人不能支配社会，反说社会能够支配个人呢？

其实，诸位细想：世界各民族思想固然为这几个伟大的个人所支配，但我们要想想中国为什么有孔子？孔子的学说思想何以不发生在印度或欧洲，而发生在中国？反之，释迦、耶稣的学说思想何以发生在印度、欧洲，而不发生在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的气候土地适于农业，农业发达的结果，家族主义随之而发达；孔子的学说思想，和孔子所祖述的尧、舜思想，都是完全根据家族主义，所谓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君臣，与未教孝祭祀，无一非家族主义的特征。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学说思想决不是他自己个人发明的，孔子的学说思想所以发生在中国也决非偶然之事，乃是中国的土地气候造成中国的产业状况，中国的产业状况造成中国的社会组织，中国的社会组

织造成孔子以前及孔子的伦理观念：这完全是中国的社会才产生孔子的学说，决不是有孔子的学说才产生中国的社会。又如印度地在热带，人民抵抗不起天然压迫，素具悲观性质，所以释迦牟尼以前的乌婆尼沙陀各派，释迦牟尼以后的小乘大乘各派，通印度全民族的思想，对于现世界无一不是彻头彻尾的悲观；释迦牟尼佛正是这种悲观民族的产物，并不是因为有了释迦牟尼佛印度人的悲观思想才发生的。至于耶稣不重宗教不尚悲观，也是地多临海便于贸易往来富于自由迁徙勇于进取的社会造成的。我相信耶稣若生在中国，也必然主张夫妇父子君臣的伦理道德，孔子若生在印度，也必然是一个悲观厌世的宗教家，释迦牟尼若生在欧洲，也必然是一个主张自由进取的伟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在的社会都有支配他们思想的力量。

世界各民族中个人的伟大像这三大人物尚且是社会的产物，其他便不须讨论了。

又如非洲蛮人以斩杀仇人为道德，印度女子以自杀或自焚殉夫为道德，像这种个人的道德，他们自己必以为是他们个人的伟大，其实是社会一种恶俗造成他们个人的盲目行动。

又如一个城市里面公共卫生极不讲究，个人无论如何注意，在防疫底效果上总是力量很小。

又如现在的广州有许多很明白的人也坐轿，我敢说日后道路修好了，交通方便了，就是不明白的人也不肯坐轿。

又如现代就是教育程度极低的人也知道奴隶制度不好，但是在蓄奴社会的古代希腊，个人伟大的亚里士多德竟主张奴隶制度不可废。

像这种个人必然受社会支配的例也不知是多少。前代的隐者，现代的新村运动及暗杀，都是个人主义教育结果底表现。前二者是想拿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做改革社会底先驱或模范，后者是想除去社会上恶的一部分好达到改良社会底目的。其实都是妄想，他们都不明白社会支配个人的力量十分伟大。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增加一两个善的分子，不能够使社会变为善良；除去一两个恶的分子，也不能够使社会变为不恶。反之，在善良社会里面，天资中等的人都能勉力为善；在恶社会里面，天资很高的人也往往习于作恶。譬如我们现在生存在这资本制度之下，无论如何道德高尚的人，他的生活能够不受资本主义支配吗？社会差不多是个人底模型，个人在社会里，方圆大小都随着模型变，所以我敢说如果社会不善，而个人能够独善，乃是欺人的话。

我所以反复说明社会支配个人的力量比个人支配社会的力量大，并不是主张个人只要跟着社会走不须努力；不过在教育方面着想，我们既然不能否认社会的力量比个人大，我们便应当知道改革教育底重点在社会不在个人了。

因为人类的精力不可滥用，必须用得很经济；比方用十分精力去注重社会得十分效力，如注重个人不过得两三分效力，就是能得七八分效力，我们的精力也用得不经济了。

精力用得不经济，减少教育的效力，这是旧教育个人主义底第一个缺点。

旧教育个人主义底第二个缺点，就是减少训练的效力。从实际经验上看起来：

(1) 可见之于家庭教师底成绩。在家庭教师之下受教育的儿童，学科上或较优于学校的儿童，然对于社会的知识及秩序与公共观念之训练完全缺

乏，最好的结果不过养成一个文弱的乖僻不解事的书痴。

(2)可见之于学校儿童的成绩。我们往往看见小学生在学校受训练时，颇为活泼，守秩序，能合群，一人家庭社会，即与学校环境相反，在学校所受短时间的训练遂不发生效力。

(3)可见之于专门以上学生之成绩。我知道有许多学生，在学校读书时，品行很纯洁，志趣很高尚，很是一个有希望的青年。一旦出了学校，入了社会，马上就变成一个胸中无主的人，在社会里混久了，会变成一个毫无希望的恶人。这都因为个人主义的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分离了，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致使训练失了效力。

旧教育个人主义底第三个缺点，就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教育本是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个人主义的旧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分为两件事，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学生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阶级，学校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事业。社会上一般人眼中的学生学校，都是一种奢侈品装饰品，不是他们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此种弊病，社会固应该负责任，而教育家至少也要负一半责任。农学生只知道读讲义，未曾种一亩地给农民看；工学生只知道在讲堂上画图，未曾在机械上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需要；学矿物的记了许多外国名词，见了本地的动植物茫然不解；学经济学的懂得一些理论，抄下一些外国经济的统计，对于本地的经济状况毫无所知。像这等离开社会的教育，是不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因此社会上不感得教育之需要，不相信教育。教育家是不是应该负责任？救济这个弊病，惟有把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会底需要上面，不建设在造成个人的伟大底上面；无论设立农工何项学校以及农工学校的何种科目，都必须适应学校所在地社会底需要以及产业交通原料各种状况。即以广东教育论，广州附近丝业颇盛，即应设立蚕桑学校；潮惠富于海物及渔业，即应设立水产学校；北江多森林，即应设立森林学校。倘然把森林学校设在潮惠沿海地方，水产学校设在北江，那便违反了社会需要的原则，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了。

第四个缺点就是旧教育的个人主义减少文化普及的效力。古时“纯粹的个人主义”之教育，不但是贵族的，而且是神秘的；一般著书立说的学者文人务以藏之名山传诸后世造成个人名誉为目的，专以玄秘难解为高贵，通俗易解为浅陋；现时有许多学问很好的留学生不肯著书译书恐怕坏了自己的名誉，正是承受了这种古代文人的陋习。现代“学校的个人主义”之教育，仍然不脱贵族的神秘的旧习惯；此种旧习惯底精神，完全可以由学校门首挂的“学校重地闲人免进”的虎头牌表示出来。新教育对于一切学校底观念，都是为社会设立的，不是仅仅为一部学生设立的；自大学以至幼稚园，凡属图书馆，试验场，博物院，都应该公开，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必如此才能够将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必如此才能够使社会就是一个大的学校，学校就是一个小的社会；必如此才能够造成社会化的学校，学校化的社会。现在各学校门首大书特书的“学校重地闲人免进”，明明白白地是要把学校与社会截为两段，明明白白地是“学校的个人主义”，明明白白地是教育界的闭关主义。这种教育减少了文化普及底效力，也是明明白白的事。

以下再就教授方法下点批评，也可以看出新旧教育底根本不同及其好歹：

现在欧、美教育界有几句很流行的话：前代的教育是先生教学生，现代的教育是学生教先生。这话初听很觉奇怪，其实大有道理，是教训式的教授

法和启发式的教授法不同底界说，是新教育底精神所在。现在在座各位不是教师就是师范生及热心教育的人，关于这点很望诸君注意！

医生诊病，必须详察病人底病状病源才能开方，服药后底经过状况也是一毫都不能忽略的；若只凭主观的想象，补药多吃不但不能治病，恐怕还要杀人哩。哺养小儿也是这样，依照大人底意思来哺养小儿是不成的，全靠检查小儿底体温、血液需要、消化机能，来做大人底指导；并且大人在此指导之下学得许多实际的知识，好过从书本上得来的。先生可以从学生得到许多经验、知识，且必须从学生学得充分的经验、知识才能够教学生，也和医生诊病大人哺养小儿一样。

旧教育是教学生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完全是教训的意味，不问学生理会不理会，总是这样教训下去，这正是先生教学生。新教育是要研究学生何以如何如何，何以不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不如何如何，完全是启发的意味，是很要虚心去研究儿童心理，注重受教育者之反应。譬如在实验室试验理化，用什么方法，得什么反应，全靠对象底反应教我们知识；若试验者不注意反应，全凭主观的理想妄下方法，不但徒劳无功，而且在化学的试验上还要发生危险。启发式的新教育也是这样，事事须由学生之反应供给先生教授法之知识，这不是学生教先生吗？

教训式的教授法和启发式的教授法之不同及好歹，大概我们可以明白了。

但我不是说中国的古代的教授方法一概都是教训式的，旧的；不是说欧、美各国的现代的教授方法一概都是启发式的，新的。中国古代教授方法也有是启发的，例如孔子答弟子问孝问仁没有一个相同，这不是他滑头，也不是他胸无定见，正是他因材利导启发式的教授方法。现代欧、美各国底教育还是教训式的居多；就是实验心理学新教授法最发达的美国，杜威式纯粹的启发教授法也有一部分人在那里试办。所以新旧教育底区别，只是采取的主义和方法不同，并不是空间（国界）或时间（时代）底不同。

杜威先生曾说，中国的教育比日本更有希望，因为中国的教育方才着手，可以采用最新的方法，不像日本的教育制度已凝固，不易改用新法。杜威先生这话是中国主持教育的人都应该十分注意的！按照新的教授方法，我们学校有许多学科要大加改革：

（一）伦理。伦理这科是教人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完全是教训式教育底代表，完全是没有效果的。人冷了才知道穿衣底必要，饿了才知道吃饭底必要，他若不觉得冷和饿，我们无论如何花言巧语劝他去穿衣吃饭，都完全是没有效果的。教训式的伦理科应该废除，在游戏体操以及对人接物时，采用实际的训练方法，使儿童感觉道德之必要，使儿童道德的本能渐渐发展，这才真是伦理教育。

（二）历史。历史教员拿着一本历史教科书，走上讲台，口中念念有词，什么蚩尤、黄帝、唐尧、虞舜、夏商周，小学生听了，真莫名其妙，惟有死记几个名词，备先生考问，毫无益处，毫无趣味；还不若叫他们去看戏，指着那个红花脸是黄帝，那个黑花脸是蚩尤，他们倒还有点兴趣。所以历史一科在小学校应该废去。就是教历史，也只能教最小范围的乡土史，不应该教国史。

（三）地理。天天向小学生说什么伦敦，巴黎，柏林，北京，青海，他

们懂得是什么？所以小学校只能教乡土地理，而乡土地理底第一课，就应该从本校讲堂教起，一间讲堂内有几许长，几许阔，几许高，几个窗，有些什么东西，这都是最好的材料最好的教法。因为发展小儿观物推理力底程序，只能够由已知推到未知，很难有凭空超越的机会。学生在学校得了讲堂底长短高低实际的观察方法，他们一出学校，便会自己推广到沿途所见及他们家里房屋底状况。这种实际观察的教授方法，比教学生死读教科书怎么样？比教学生死记一些元从养成小儿实际观察力的地名怎么样？

（四）理科。理科各科目不用说更是要注重实物经验的了，但是小学的理科还要注重乡土的教材。各省的物产不同，各省小学的教材便不能一样。譬如在广州教理科，说到冰雪这两件东西，我就不知道那位先生怎样能够解释得明白。广州有二十多年没下雪，香港有活着八十几岁没见过雪的人说雪像玻璃一样，大人尚且冰雪不分，何况小儿？先生若被学生质问怎样叫做冰，怎样叫做雪，我想那位先生除了叫学生牢记着冰雪两个字不必问，或是令学生快去睡觉以外，恐怕没有第三个方法来圆满答复。

（五）图画手工。我见过许多学校陈列出好些很精致的手工和图画底成绩品，装满学校底门面；内中有些教员代学生做成骗人的固然不值得批评，就真是学生自己做的，在外行看起来，必以为成绩很好，在懂得教育的人看起来，便不敢恭维了。因为教育品和美术品有很大的分别，我们不当把教育品看做美术品，若是教育品做成了美术品，便算是手工图画底教育大失败，还说什么成绩呢？因为教育儿童直接的目的，不是马上要教他成一个圣贤学者，所以不用教伦理道德及历史地理等知识；也不是马上要教他成一个艺术家，所以不用教他习美术品的手工图画。教育儿童直接的目的，是要寻种种机会，用种种方法，训练儿童心身各种感官，使他各种器官及观察力创造力想象力道德情感等本能渐渐的自由生长发育。游戏体操手工图画正是用做生长发育这些本能的工具，所以小学底游戏体操不专是发育体力的，兼且是发育各种器官肢体之感觉神经及运动神经反应的本能和道德情感的。所以小学底手工图画不是教成艺术家的，是用他发育儿童观察力创造力想象力的。因为手工图画底目的专在发育观察力创造力想象力，最好是听凭儿童喜欢做什么做什么，喜欢画什么画什么，使他观察创造想象的天才得以自由发展。若由先生底意思教他造成美术品时只算是先生自己的成绩，于儿童教育无关，这种教育可以叫做“填谱的”教育；一切“填谱”教育都适以限制受教育者底智识自由活动而使其固定，且造成机械的盲从的习惯。戕贼人类最可贵的创造天才，不单是在手工图画教育如此。

（六）唱歌。唱歌是发育儿童美的感想；合唱比单唱好听，可以养成儿童共同协作的精神；按节拍比不按节拍好听，可以养成儿童遵守规律的习惯。惟选用歌词不可文雅，哥哥妹妹，小猫小狗，树著花，蝴蝶飞，这些眼前事像都是歌词底好材料。现在有许多小学底唱歌中，填满了国家，人群，社会，互助，平等，自由，博爱，牺牲，种种抽象名词，这班人对于小学教育完全是门外汉，完全是迷信教训式的教育之结果。

由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新教育底两个特点：

（一）新教育底主义和方法都和旧教育完全不同。

（二）新教育底效力大过旧教育。

提倡研究美学

——1921年5月在英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演讲

蔡元培

今日与诸君聚会，甚为欢乐。更感激诸君厚意。此次出来的时候，本想在英国多住几天，因为英国教育与别国不同，苏格兰与英格兰又不同。爱丁堡风景著名，大学校更著名，地方清静，气候温和，旅费比较的节省，所以中国留学生在此处很多。从前吾在德国时，就知道此地有学生会，似名苏学会，曾见过两次的会报，是用胶板印的。大约在清季，或民国初年间。今日来此，仍有学生会，更有学术研究会。风景既佳，学校又好，大家联合起来，安心求学，比较在伦敦、柏林、巴黎更佳。所以吾在仓卒间，必要到此一游。但是今日又须到丹麦，不能久住。且喜得与诸君聚会；又看过大学校，美术专门，博物馆，古堡，旧皇宫等地。更蒙诸君郑重的招待，何等欣幸！兹奉临别数语，望大家注意。

今日会中有学术研究会，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求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和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中国羡慕外人的：第一次是见其枪炮，就知道他的枪炮比吾们的好。以后又见其器物，知道他的工艺也好。又看外国医生能治病，知道他的医术也好。有人说：外国技术虽好，但是政治上只有霸道，不及中国仁政。后来才知道外国的宪法行政法等，都比中国进步。于是学他们的法学、政治学，但是疑他们道学很差。以后详细考查，又知道他们的哲学，亦很有研究的价值。他们的好处都知道了，于是出洋留学生，日多一日；各种学术都有人研究了。然而留学生中，专为回国后占地位谋金钱的也很多。所以学工业，预备作技师。学法律，预备作法官，或当律师。学医学，预备行医。只从狭义做去，不问深的理由。中国固然要有好的技师、医生、法官、律师等等。但要在中国养成许多好的技师、医生等，必须有熟练技能而又深通学理的人，回去经营，不是依样画葫芦的留学生做得到的。譬如吃饭的时候，问小儿饭从哪里来的？最浅的答复是说出在饭桶里；进一步，说是出在锅里；再进一步，说是出在谷仓里；必要知道探原到农田上，才是能造饭的，不是专吃现成饭的人了。求学亦然，要是但知练习技术，不去研究学术；或一国中，练习技术的人虽多，研究科学的人很少，那技术也是无源之水，不能会通改进；发展终属有限。所以希望留学诸君，不可忽视学理。

外人能进步如此的，在科学以外，更赖美术。人不能单纯工作，以致脑筋枯燥，与机器一样。运动吸烟饮酒赌博，皆是活泼脑筋的方法。但不可偏重运动一途。烟酒赌博，又系有害的消遣，吾们应当求高尚的消遣。西洋科学愈发达美术也愈进步。有房屋更求美观，有雕刻更求精细。一块美石不制桌面，而刻石像；一块坚木，不作用器，而制玩物。究竟有何用意？有大学高等专门学校，更设美术学校、音乐学校等。既有文法书，更要文学。所建设的美术馆、博物馆，费多少金钱，收买物品，雇人管理，外人岂愚？实则别有用心。过劳则思游息，无高尚消遣则思烟酒赌博，此系情之自然。所以提倡美术，既可人得以消遣，又可免去不正当的娱乐。

美术所以为高尚的消遣，就是能提起创造精神。从前功利论，以为人必

先知有相当权利，而后肯尽义务。近来学者，多不以为然。罗素佩服老子“为而不有”一语。他的学说，重在减少占有的冲动，扩展创造的冲动，就是与功利论相反的。但这种减少与扩展的主义，可用科学证明。这种习惯，只有美术能养成他。因为美术一方面有超脱利害的性质，一方面有发表个性的自由。所以沉浸其中，能把占有的冲动，逐渐减少，创造的冲动，逐渐扩展。美术的效应，岂不很大么？中国美术，早已卓著。不过好久没人注意，不能尽量发展。现在博物馆还未设立，岂不可惜！所以在外国的时候，既然有很好的机会，就当随处注意。不但课余可时往博物馆赏览，就是路旁校侧，处处都有美术的表现。不仅对于自己精神有利益，就是回国以后，对于提倡美术，也多有补助。若是此时失去机会，以后就懊悔也晚了！

我知道在爱丁堡的同学对于国内的政治是很注意的。中国现在的政治，可云坏极了，一要大权皆在督军掌握。督军并无何等智慧，不过相互为敌，惜养兵之名，去攫金钱就是了。譬如说有一万兵的，其实不过数千，将这空饷运人私囊。仅为金钱之计，实无军队可言，更无威武可怕。惟真正民意，为力最大。凡所喜的都可实现，凡所恶的，都可铲除。前清因失民意而亡，袁氏因失民意而歿。安福兵力很强，又有外人帮助，但因民意反对，终归溃败。现在人心又恨怨督军，都提倡“废督”。大概督军不久也必消灭。但是最重要问题：督军消灭后，又将何以处之？从前执政都想中央集权，实则中国之大，断没有少数人能集权而治的。现在极要的，是从“地方自治”入手。在各地方设高等教育机关，使人民多受教育，自然各方面事务，都有适当的人来担任。希望诸君专心求学，学成可以效力于地方，这是救国最好的方法。目前国内政治问题，暂可不必分心。

我想诸君必又很注意于国内学生的情形。曾记得革命以前。在上海、天津、以至日本留学界，都有学生作革命的运动。民国成立以后，学生却没有重要的表示。前年“山东问题”发生，学生关心国家，代表社会，又活动起来。国人对于学生举动很注重；对于学生议论，也很信仰，所以有好机会，为社会作事。不过五四以后，学生屡屡吃亏。中间经过痛苦太多。功课耽误，精神挫伤，几乎完全失败。因此学生发生两种觉悟出来：第一，受此番经验，自知学问究竟不足，于是运动出首的学生，或到外国求学，未出国的，也格外专心用功了。第二，经此番风潮，社会对于学生，都加一番重视。学生自身，也知人格可贵，就大家不肯作贬损人格的事情。所以对于中国学生将来，实有莫大的希望。

再者诸君在国外有数十同国的学生，时相晤聚，甚为难得。无论所学科目不同，所居地位不同，或所操言语不同，要之大家须彼此爱护。有从国外来，不能说国语的，国内来的同学，可帮助他们。互相亲爱，互相原谅，这也是很祷祝的一件事。

文学上各种新派兴起的原因 ——1922年在宁波“四明夏期讲习会”上的演讲

茅盾

今天能够把我的意见贡献给诸位，真是万幸。一时想不出一个适当的题目，因为我所研究的，似乎和诸位所需要的，不十分适合。虽则“文艺像空气一样的普遍”，小说戏剧是人人喜欢看而且常看的，但若要谈到文学上的种种理论，那就觉得太抽象得非人人喜欢听了。我们常常听得人说最新派的小说、戏剧看不懂，或者以为那些东西不值一笑。我想，如果就从解释这种“非难”入手，带便讲到文学上的理论，或者听者更觉有味，所以我就定了“文学上各种新派兴起的原因”一题。

中国近四五年，文学界起了一个变动，读者但凡看看最近出版的小说、诗、戏曲，总觉得另有一种现象。从前的小说，大都是章回体，内容不外离合悲欢的人事。像《红楼》、《水浒》就是现成的好例。现在可不是这个样子了，冰心女士所作的《笑》，是一篇短篇小说，里面第一段是描写老妇人的笑容；第二段是小儿的笑容；第三段是图画里天使的笑容。老妇人的笑容，是作者下笔前所得的印象，其余两个是回忆。这篇小说里没有悲欢离合，也不专讲一人一家的事，只是一段印象与回忆的混合品。若照旧例来，简直不算小说，但是我们现在即叫她这一篇是小说了。因为我们现在相信，小说的内容并不一定要离合悲欢，一时的感想，一时的印象，都可作成小说。譬如有人从上海到宁波，抵埠的时候，看见许多争先揽生意的脚夫，又看见靠在第三层船舱栏杆上的安闲的贵绅和美貌青年的女士，我们觉得这两种人生有了个“对照”，因此生了一种感想，写了出来，便可成为一篇小说。如果作者能够观察到极精微的地方，又把作者对人生的意义，运化在里面，或者竟可成为一篇极好的短篇小说。因为我们看一本小说，并非单单看到一点离合悲欢的人事，我们要得到欣赏，得到感动，有离合悲欢的人事小说，固能使人欣赏，使人感动，没有的也可以使人欣赏，使人感动。

其次，中国旧体诗注重格律，韵脚平仄对仗，都有固定的格律，不好随便变动。近来的白话诗，却不讲究这些，并且反对有格律；两句三句的白话，便可成为一首诗，例如郭绍虞的《暮气》：

夕阳之神

正在精心地撰写他的文章呢！

把满山红霞，

铺作满江红锦，

说他是垂死的留恋吗？

但是何曾有些儿暮气呢！

又如朱自清的《台州杂诗》中的一首《笑声》，却只得两句：

是人们底笑声哩，

追寻去，却跟着风走了！

这种诗若用旧诗式来批评，一定觉得极不合格，算不得诗了。但我们试问：诗是为什么做的，不是一个人胸中有种极热烈的非说不可的情绪，故发而为诗么？可知诗之成立，以情绪之真不真，能不能感动人为主要条件。形式、格律尚在其次。我们胸中的热烈的情绪，有时可以四句话表现出来，有

时或只得三句，有时说了五句方能畅尽，有时说了七句便已足够。而旧体诗的格律限定字句，七绝五绝一定只能四句，七律五律一定要八句，三句七句是万万不能的。作者拘于格律，于是只好硬硬缩短，或勉强拉长了。于是乎动笔时的真挚热烈的情绪也只好牺牲了。这种办法当然不对。可惜几千年来文人，竟然不知其不对，或虽知之而不敢说。我记得从前书上说，唐朝有个祖咏，应试《终南积雪》一题，本限五言律，他老先生却只作了“终南阴岑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雾色，城中增暮寒”便交了卷，人间他为何只有四句，他说我已作尽，此外不能再添一语了。这一段故事，就证明诗人若果要忠实于自己的情绪，便绝不能有什么来束缚他。诗有格律是诗人的不幸。我们平心而言，若果有人能够自然地热烈的情绪用旧诗的体裁发表出来，我们当然不反对，但若作者不愿用旧诗体裁而用白话一行一行写下来，我们当然不能因其不照格律而说他不应该；不过在看惯旧诗的人看来，觉得实在奇怪罢了。

像上面所引的短篇小说和新诗，就是现在所谓的新派，近年来以一日千里之势流行于社会，早惹起一般人的注意，同时又引起了很纷纭的争论，有人说新派好，有人说旧派好。好不好是另一问题，我们现在可以置之不问，但是我们到底应该问一向为什么近来忽然有这些新派出来，于今新派也受一部分人的欢迎，是什么缘故？我想，最普通的答案，一定是说新派文学之产生，由于人的厌旧喜新，由于青年的好奇心。这种浅薄的见解，简直把文学上的新派比作妇女的时装，实在很不对。喜新厌故原是人之常情，妇女衣服的袖口，从前以小为时髦，近来变成又短又大，渐渐又回小去，常常是循环的。但是文学上的新派，以外国的例看来，却是从不走回旧路的，只就这一点上看，已可证明文学上的新派决不是好奇心理的表现，而况文学作品是人类精神的结晶，他的改变安能没有更深刻的原因呢！

我们先要晓得，文艺是人生的反映，是时代精神的缩影，一时代的文艺完全是该时代的人生的写真。这种话，初看似乎是西洋来的“舶来品”，不是“国货”，然而细想起来，中国古人原也早已悟到这一层的。古语说“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这就是说，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产生出什么样的文艺，什么样的文艺是怎么样的人生反映。

《左传》上又说，吴季札到各国观乐，便知某国将兴、某国将亡；与其士大夫接交，听他们宴会时赋的诗，便知某也将败，某也将荣贵。这也是吴季札晓得文艺是人生的反映，丝毫不得错的。所以他听了某国的乐声而知某国的治乱，便敢断定某国的兴衰。变乱之世，自然要生出怨以怒的文学来，并非先有了怨以怒的文学，然后造成乱世。后代人大都误认“怨以怒”的文学是造成乱世的，极力要说谎话，粉饰太平，便是大错；因此而忽略了一时代的人生、一时代的时代精神对于文学的影响，那就更错的厉害。

不但文学思潮是跟着时代变迁的，即如文学上各种体裁的次第发生，也是跟着时代变迁而来的结果。法国近代批评家薄留契尔（Brunetierc）主张的文学进化论就是这么说的，他以为史诗、悲剧、抒情诗等等的发生，都根据于时代变迁的影响——或者有些地方难免穿凿，然而他的见解确是不错的。

根据上面说的，我们且看西洋新兴的派别是否都合于上述的原则。我们要晓得，中国所谓新派文学——白话诗与短篇小说——实在未为十分新奇、难以索解。我们不如把西洋最新的来看一看。西洋的较新派是：

- 一、未来派 Futurist
- 二、达达派 Dadaist
- 三、表现派 Expressionist

这三派中间，未来派是大战前几年就有的，以意大利为出发点，亦以意大利为最盛。达达派是大战正剧烈的时候发生的，现在法国颇流行。表现派是大战后德国的特产。我们为易于了解起见，仍想先把这三派作品的面目说一说，然后再追求发生的原因。第一先讲未来派。

未来派的历史比较长久些，所以他的运动的范围亦较广大，除意大利外，英、法、德、俄、美都有未来派的作家。这一派有绘画、有诗、有剧本，而以剧本为最多。我们知道，剧本都是描写一段人生，其中有男女角色若干——至少也要一个角色，场面至少要一幕。但是未来派的剧本可就大不相同了，竟可没有角色。我记得有一剧本，开幕时只见一条乌黑的小弄，一条黑狗在台前慢慢的走了过去，就闭幕了，就算完了。我们知道诗是表现作者的情绪，但是未来派的诗却写了一架机关枪跳在空中，向四面放射子弹，如此而已。这种完全破坏文学旧规则的“新派”，而且好像全无意义的作品，在我们看来，也觉得奇怪，也几乎要说他们是好奇心了。但是我们向四面搜求之后，便知未来派也是受了那时候的人生的影响。我们要晓得，未来派是小中产阶级心理的产物，当本世纪初，物质文明骤然进化，科学和机械挟其雷霆万钧之力扫荡社会，人的心理咸受其影响。机械是力量愈大愈好，愈速愈好，所以一般人的脑子里也旋转着“力”、“速”两个字。无论什么事，总想以愈大的力，愈快的速度把他做成，个个人背后好像有鬼赶着，拼命要向前去，力愈大愈好，愈快愈好，这便是那时人生的真相。未来派受了这种暗示，生当那时，住在那种社会里，自然也要做出崇拜力、崇拜速的作品来了。正如日处田野要讴歌大自然，乃同一合理的事，丝毫不足为奇。

第二且看达达派。达达派的历史暂只四五年，运动范围自然要小些，现在除法国的一群人外，俄国有×个，美国有×个，都是达达派。但从者不多，势力并不怎么大。法国的一派人，也是近一二年来方得了批评家的注意。一九一六年欧战正剧烈的时候，有几个法国作家避乱于世外桃源的瑞士，便开始了达达派的运动。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五日，他们为要使人注意，特在巴黎郑重其事地开了个展览会，这会里陈设着他们的诗歌、戏剧和图画。最奇怪的绘画，有一张 Marcel Duchamp 的绘画，乃是取普通铜版印物 Mona Lisa 像，加了两撇凯撒式的胡子在微笑的樱唇上，我们知道“Mona Lisa”是文西的杰作，他画了一个微笑的女子半身像，后面布着深山河源的背景，是有意义的。他说最不可测者，是女子的微笑，表面虽然极美丽、极温柔、极安静，然而底下是不可测的，犹如深渊的底下，或龙潜或魔斗，是不可测的，然而水面却只有微波。现在这幅“Mona Lisa”成为世界珍品，藏在法国罗浮宫中。铜版的影印品几乎各处都有，达达派的作家却就取了这么一张铜版影印品，加上了两笔胡子，就挂起来，这岂不是极无意义、极可笑的事么？又有一幅《圣女玛利》，却是一般白纸上洒些墨水，更不可解了。再看他们的诗，有一首叫做《基督的心》的，是 Picabia 所著，乃是无意义的自造的字组合成的。

Marcel Duchamp (1887~?) 马赛尔·杜尚，法国画家。

Picabia (1879~1953) 皮卡比亚，法国画家。

又有 Aragon 的一首《自杀》，则全是字母组成之。

总之，达达派在一切新派中，比较的是最难索解了。观上例就可明白他们自己的宣言。他们说：“不求人家懂……要打破艺术上已有的规则。”像这种样“突飞”的新派，势必不能不叫人看了诧异，以为是好奇心勃发的结果。然而我们细细去考究他们发生的原因，又觉得不足为奇了。我在上文说过，达达派兴起于一九一六年——正当欧战剧烈，法国拼死命的时候。那时两交战国胜负未分，两方都舍弃一切，作孤注一掷。布厂木厂——一切铸造人生已用必需品的工厂，都可以改作兵工厂，教育经费可以提用，口粮可以限制，大家都用了全部力量从事战争。在法国方面，因为半个国境已被德国占据，自然尤为困难，那时的法国人虽然牺牲一切，以求最后之胜利，然而究竟不敢确信最后胜利必属于己。诸位试想，牺牲一切以求一不可必得的目的，是何等可笑而无意识的事！然而那时的法国人，受了爱国的催眠术，狂热到视以为理之当然了。达达派的作家，一方面也亲身感受着这种空虚的悲哀，一方面却因置身世外，反而脑筋看得清楚，看得撤、见得到。他们觉得世界上的事都是可笑的、无意识的，人类就是可笑的、无意识的东西，所以他们就要本此见解以创作了。这结果就是我们上面说过的不可解释的东西。其次，战争是什么，是不是破坏？随便你怎样曲解，总是破坏。大战的时候，正是人类借了好听的冠冕堂皇的名词，实行破坏的时候。达达派亦感到了，所以他们实行破坏艺术上的一切法规了，其结果我们上面亦已说过了。由此观之，达达派也是应时而生的东西，不足为奇。

现在我们讲表现派。表现派是德国战败后兴起的新派。法国大战前出名的作家，经了这次大战，都像扰乱了神经，暂时没有什么作品，近三四年书坊里最流行的作品都是表现派的。他们有绘画、有诗、有剧本，他们的题材大都是一些刺激性极强的，例如战争、性欲等等。他们对于人间悲观极了，在他们看来，人性是恶的、物质的、肉的。从前印象派的画家画了一个妓女，尚从她的眼光里表现出人性的善，现在表现派画家画的妓女却就完全不相同了。女性的温柔也没有，可怜的影像也没有，只是痴肥、粗恶、淫毒的结晶罢了。譬如马尼的《俄林皮亚》，是一幅娼妓裸体画，他画一个妓女全身裸露睡在柔软的床上，旁边有一个女黑奴捧着一丛美丽的花。这个可怜的娼妓，不知犯过多少淫恶，现在老而且不中用了，她的身体大概已经腐了，爱之源泉也已枯涸了，但是她的瞳子尚很柔和，显着她心内深蕴的人性的善良。这是印象派画家所见的人生。白修修泰因的《女》也画的是个娼妓，那娼妓却肥胖如猪，唇厚、眼半闭，没有修养、没有道德、没有恋爱，并且没有柔软的床和香花，她只睡在荒凉的沙漠里，那分明是变态的肉欲和自然人没有意义的生活。这就是表现派所见的人生。再看他们的剧本，则和从前的完全不同，不论是布景、是结构，都和从前不同。譬如海似林的一篇《海战》，布景是用海景和一座巡洋舰，全剧极少动作，几乎满篇都是对话——直挺挺站在那里说话。然而水兵们憎恶战争的心理以及卑怯的畏死的情形，都跃然纸上。表现派的诗比剧本和绘画更为难懂，他们完全破坏旧规律，每每一个字一句，并且不求人懂。有一个勃鲁纳，他作的诗完全是无意义的字组成的。他说声、义、色、格四者虽是诗的四德，然而声最要紧。他的诗是旧的，也有意义，但须以神会，不能以理智求得。这种议论给我们看来，一定觉得非

常奇怪，就是他们对人生的见解，也不是我们听得惯的。可是细细的考察，就可以知道这种创作品也是人生的反映，不足为奇。我们知道大战以前，德国人是很自负的，在科学、艺术、哲学方面。德国都不示弱于人，不但不弱，并且比人家都行。可是此次大战一败涂地，物质上的困难引起了精神上的痛苦。德国人颓丧之余，觉得对自己的文化有点怀疑了，加以实际的生活问题又近在眉前，不能不想法。照德国现在的纸币低落的情形看来，谁也不敢料定明天要跌落多少。今天有 20 马克的人，原能吃二天，但到马克一落，不够吃两天亦说不定。所以德国人天天在危疑之中过生活。然而德国人确不能不生活下去，既不能不生活，而又终日烦闷，一定要想些娱乐方法来暂时自排遣的。但是心绪不宁，又无意去寻美妙的精神上的娱乐，只要求肉感的娱乐，刺激一下罢了。所以喜听战争、炸弹、性欲的事。在这一方面看来，可说德国人现在正过着变态的肉和自然没有意义的生活。

但是德国民族的特性，不是一败之后就能屈服沮丧的。德国人虽然战败了，却不肯认输，他们现在所渴望的是“精神复苏”。德国人再提起精神来从事创造——创造出新文化来，哪怕是一双靴子，一根带子，只要是新创造出来的，总比没有好些。我们从两方面看，又可说德国人现在苦心想创造，合了这两方面，就成了表现派的文学运动。表现派破弃一切旧规则而努力要创新的精神，以及变态性欲的生活，都是现在这时代的人生的缩影，既不是好新的缘故，尤其不是发昏。

从上面这三派看来，大概可以证明文学上各种新派兴起的原因，是因为时代不同，人生各异，并非源于人之好奇喜新。或者有人说文学上派别兴起的原因，不仅是时代的，那也未尝不可；不过总不能不承认时代背景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国近十年来，人生的变幻比从前要厉害得多，文学上要有新派兴起，亦是自然而且合理的事，虽然现在新派的东西亦尽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但这是启蒙时代必不可免的现象。希望大家能够把公正的心去批评新派。不要以为只是青年好奇心的表现，不值一笑。须知他们的价值实在高出一笑以上呢！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1923年1月在南京发表的演讲

梁启超

诸君！我对于贵会，本来预定演讲的题目是“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中间因有病，不能履行原约，现在我快要离开南京了，那个题目不是一回可以讲完，而且范围亦太窄，现在改讲本题，或者较为提纲挈领于诸君有益罢。

我以为研究国学有两条应走的大路：

一、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

二、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

第一条路，便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这部分事业。这部分事业最浩博最繁难又且最有趣的，便是历史。我们是有五千年文化的民族，我们一家里弟兄姊妹们便占了全人类四分之一，我们的祖宗世世代代在“宇宙进化线”上头不断的做他们的工作，我们替全人类积下一大份遗产从五千年前的老祖宗手里一直传到今日没有失掉。我们许多文化产品，都用我们极优美的文字记录下来，虽然记录方法不很整齐，虽然所记录的随时失散了不少；但即以现存的正史、别史、杂史、编年、纪事本末、法典、政事、方志、谱牒，以及各种笔记金石刻文等类而论，十层大楼的图书馆也容不下。拿历史家眼光看来，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贵的史料，又不独史部书而已。一切古书，有许多人见为无用者，拿它当历史读，都立刻变成有用，章实斋说：“六经皆史”，这句话我原不敢赞成；但从历史家立脚点看，说“六经皆史料”，那便通了。既如此说，则何只六经皆史？也可以诸子皆史，诗文集皆史，小说皆史，因为里头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和史部书同一价值。我们家里头这些史料，真算得世界第一个丰富矿穴，从前仅用土法开采，采不出什么来；现在我们懂得西法了，从外国运来许多开矿机器了，这种机器是什么？是科学方法，我们只要把这种方法运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烦，自然会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不独对得起先人，而且可以替世界人类恢复许多公共产业。

这种方法之应用，我在去年所著的《历史研究方法》和两个月前在本校所讲的《历史统计学》里头，已经说过大概，虽然还有许多不尽之处，但我敢说这条路是不错的。诸君倘肯循着路深究下去，自然也会发出许多支路，不必我细说了。但我们要知道：这个矿太大了，非分段开采不能成功，非一直开到深处不能得着宝贝，我们一个人一生的精力，能够彻底开通三几处矿苗便算了不得的大事业，因此我们感觉着有发起一个“合作的史学运动”之必要，合起一群人在一个共同目的共同计划之下，各人从其性之所好以及平时的学问根底各人分担三两门做“窄而深”的研究，拼着一二十年工夫下去，这个矿或者开得有点眉目了。

此外和史学范围相出入或者性质相类似的文献还有许多，都是要用科学方法研究去。例如：

(1) 文字学。我们的单音文字，每一个字都含有许多学问意味在里头，若能用新眼光去研究，做成一部《新说文解字》，可以当作一部民族思想变

“整理国故”，为胡适所提出。

迁史，或社会心理进化史读。

(2) 社会状态学。我国幅员广漠，种族复杂，数千年前之初民的社会组织，与现代号称最进步的组织，同时并存。试到各省区的穷乡僻壤，更进一步入到苗子番子居住的地方，再拿二十四史里头蛮夷传所记的风俗来参证，我们可以看见现代社会学者许多想象的事项，或者证实，或者要加修正。总而言之，几千年间一部竖的进化史，在一块横的地平上可以同时看出。除了我们中国以外，恐怕没有第二个国家了。我们若从这方面精密研究，真是最有趣的事。

(3) 古典考释学。我们因为文化太古，书籍太多，所以真伪杂陈，很费别择；或者文义艰深，难以索解。我们治国学的人，为节省后人精力而且令学问容易普及起见，应该负一种责任，将所有重要古典，都重新审定一番，解释一番。这种工作，前清一代的学者已经做得不少。我们一面凭借他们的基础，容易进行；一面我们因外国学问的触发，可以有许多补他们所不及。所以从这方面研究，又是极有趣味的事。

(4) 艺术鉴赏学。我们有极优美的文学美术作品。我们应该认识它的价值，而且将赏鉴的方法传授给多数人，令国民成为“美化”。这种工作，又要另外一帮人去做，我们里头有性情近于这一路的，便应该以此自任。

以上几件，都是举其最重要者。其实文献学所包含的范围还有许多，就是以上所讲的几件，剖析下去，每件都有无数的细目。我们做这类文献学问，要有三个标准以求到达：

第一求真。凡研究一种客观的事实，须先要知道它“的确是如此”，才能判断它“为什么如此”。文献部分的学问，多属过去陈迹，以伪传伪失其真相者甚多。我们总要用很严谨的态度，仔细别择，把许多伪书和伪事剔去，把前人的误解修正，才可以看出真面目来。这种工作，前清“乾嘉诸老”也曾努力过一番；有名的清学正统派之考证学便是。但依凭我看来，还早得很哩。他们的工作，算是经学方面做得最多，史学方面便差得远，佛学方面却完全没有动手哩。况且我们现在做这种工作，眼光又和先辈不同，所凭借的资料也比先辈们为多。我们应该开出一派“新考证学”，这片大殖民地，很够我们受用哩。

第二求博。我们要明白一件事物的真相，不能靠单文孤证便下武断。所以要将同类或有关系的事情网罗起来贯串比较，愈多愈妙。比方做生物学的人，采集各种标本，愈多愈妙。我们可以用统计的精神，作大量观察。我们可以先立出若干种“假定”，然后不断地搜罗资料，来测验这“假定”是否正确。若能善用这些法门，真如韩昌黎说的“牛溲马勃，败鼓之皮，兼收并蓄，待用无遗”。许多前人认为无用的资料，我们都可以把它废物利用了。

但求博也有两个条件，荀子说：“好一则博”；又说：“以浅持博”。我们要做博的功夫，只能择一两件专门之业为自己性情最近者做去，从极狭的范围内生出极博来。否则，便连一件也博不成。这便是好一则博的道理。又，满屋散线，穿不起来，虽多也是无用。资料越多越丰富，则驾驭资料越发繁难。总须先求得个“一以贯之”的线索，才不至“博而寡要”。这便是以浅持博的道理。

第三求通。好一固然是求学的主要法门，但容易发生一种毛病，这毛病我替它起个名叫做“显微镜生活”。镜里头的事物看得很清楚，镜以外却完全不见，这样子做学问，也常常会判断错误。所以我们虽然专门一种学问，

却切不要忘记别门学问和这门学问的关系；在本门中，也常要注意相互的关系，有许多在表面上看不出来的，我们要用锐利眼光去求得它。能常常注意关系，才可以成通学。

以上关于文献学，算是讲完，两条路已言其一。此外则为德性学。此学应用内省及躬行的方法来研究，与文献学之应以客观的科学方法研究者绝不同。这可说是国学里头最重要的一部分，人人应当领会的。必走通了这一条路，乃能走上那一条路。

近来国人对于知识方面，很是注意，整理国故的名词，我们也听得纯熟。诚然整理国故，我们是认为急务；不过若是谓除整理国故外，遂别无学问，那却不然。我们的祖宗遗予我们的文献宝藏，诚然足以做世界各国而元愧色，但是我们最特出之点，仍不在此。其学为何？即人生哲学是也。

欧洲哲学上的波澜，就哲学史家的眼光看来，不过是主智主义与反主智主义两派之互相起伏。主智者主智；反主智者即主情，主意。本来人生方面，也只有智、情、意三者。不过欧人对主智，特别注重；而于主情、主意，亦未能十分贴近人生。盖欧人讲学，始终未以人生为出发点。至于中国先哲则不然。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夙皆归纳于人生这一途，而于西方哲人精神萃集处之宇宙原理、物质公例等等，倒都不视为首要。故《荀子·儒效》篇曰：“道，仁之隆也。……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儒家既纯以人生为出发点，所以以“人之所以为道”为第一位，而于天之道等等，悉以置诸第二位。而欧西则自希腊以来，即研究他们所谓的形而上学。一天到晚，只在那里高谈宇宙原理，凭空冥索，终少归宿到人生这一点。苏格拉底号称西方的孔子，很想从人生这一方面做工夫，但所得也十分幼稚。他的弟子柏拉图，更不晓得循着这条路去发挥，至全弃其师传，而复研究其所谓天之道。亚里士多德出，于是又反趋于科学。后人有所谓道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话，其实他也不过仅于科学方面，有所创发，离人生毕竟还远得很。迨后斯端一派，大概可与中国的墨子相当；对于儒家，仍是望尘莫及。一到中世纪，欧洲全部，统成了宗教化。残酷的罗马与日耳曼人，悉受了宗教的感化，而渐进于迷信。宗教方面，本来主情意的居多；但是纯以客观的上帝来解决人生，终究离题尚远。后来再一个大反动，便是“文艺复兴”，遂一变主情主意之宗教，而代以理智。近代康德之讲范畴，范围更过于严谨，好像我们的临“九宫格”一般。所以他们这些，都可说是没有走到人生的大道上去。直到詹姆士、柏格森、倭铿等出，才感觉到非改走别的路不可，很努力的从体验人生上做去，也算是把从前机械的唯物的人生观，拨开几重云雾。但是真果拿来与我们儒家相比，我可以说仍然幼稚。

总而言之，西方人讲他的形而上学，我们承认有他独到之处。换一方面，讲客观的科学也非我们所能及。不过最奇怪的，是他们讲人生也用这种方法，结果真弄到个莫名其妙。譬如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讲人，绝不想到是从人生的本体来自证。却高谈玄妙，把冥冥莫测的上帝来对喻。再如用科学的方法讲，尤为妙极。试问人生是什么？是否可以某部当几何之一角，三角之一边？是否可以用化学的公式来化分化合，或是用几种原质来造成？再如达尔文之用生物进化说来讲人生，征考详博，科学亦莫能摇动，总算是壁垒坚固；但是果真要问他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安在？人既自猿进化而来，为什么人自人而猿终为猿？恐怕他也不能给我们以很有理由的解答。总之，西人所用的几种方法，仅能够用之以研究人生以外的各种问题；人，决不是这样机械易懂的。

欧洲人却始终未澈悟到这一点，只盲目的往前做，结果造成了今日的烦闷，彷徨莫如所措。盖中世纪时，人心还能依赖著宗教过活；及乎今日，科学昌明，赖以麻醉人生的宗教，完全失去了根据。人类本从下等动物蜕化而来，那里有什么上帝创造？宇宙一切现象，不过是物质和他的运动，还有什么灵魂？来世的天堂，既不可凭；眼前的利害，复日相肉迫。怀疑失望，都由之而起，真正是他们所谓的世纪末了。

以上我等看西洋人何等可怜！肉搏于这种机械唯物的枯燥生活当中，真可说是始终未闻大道！我们不应当导他们于我们祖宗这一条路上去吗？以下便略讲我们祖宗的精神所在。我们看看是否可以终身受用不尽；并可以救他们西人物质生活之疲敝？

我们先儒始终看得知行是一贯的，从无看到是分离的。后人多谓知行合一之说，为王阳明所首倡，其实阳明也不过是就孔子已有的发挥。孔子一生为人，处处是知行一贯。从他的言论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学而不厌”，又说“为之不厌”，可知“学”即是“为”，“为”即是“学”。盖以知识之扩大，在人努力的自力，从不像西人之从知识方法而求知识。所以王阳明曰：“知而不行，是谓不知。”所以说这类学问，必须自证，必须躬行，这却是西人始终未看得的一点。

又儒家看得宇宙人生是不可分的。宇宙绝不是另外一件东西，乃是人生的活动。故宇宙的进化，全基于人类努力的创造。所以《易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看得宇宙永无圆满之时，故易卦六十四，始“乾”而以“未济”终。盖宇宙“既济”，则乾坤已息，还复有何人类？吾人在此未圆满的宇宙中，只有努力的向前创造。这一点，柏格森所见的，也很与儒家相近。他说宇宙一切现象，乃是意识流转所构成，方生已灭，方灭已生，生灭相衔，方成进化；这些生灭，都是人类自由意识发动的结果。所以人类日日创造，日日进化。这意识流转，就唤作精神生活，是要从内省直觉得来的，他们既知道变化流转，就是宇宙真相，又知道变化流转之权，操之在我，所以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儒家既看清了以上各点，所以他的人生观，十分美渥，生趣盎然。人生在此不尽的宇宙当中，不过是蜉蝣朝露一般，向前做得一点，是一点，既不望其成功，苦乐遂不系于目的物，完全在我，真所谓“无入而不自得”。有了这种精神生活，再来研究任何学问，还有什么不成？那么，或有人说，宇宙既是没有圆满的时期，我们何不静止不作，好吗？其实不然。人既为动物，便有动作的本能，穿衣吃饭，也是要动的。既是人生非动不可，我们就何妨就我们所喜欢做的，所认为当做的做下去？我们最后的光明，固然是远在几千万年几万万年后，但是我们的责任，不是叫一蹴而几的达到目的地；是叫我们的目的地，日近一日。我们的祖宗，尧、舜、禹、汤、孔、孟，……在他们的行进中，长的或跑了一尺，短的不过跑了数寸，积累而成，才成今日。我们现在无论是一寸半分，只要往前跑才是。为现在及将来的人类受用，这都是不可逃的责任。孔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所以我们虽然晓得道远之不可致，还是要努力的到死而后已。故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正为其知其不可而为，所以生活上才含着春意。若是不然，先计较他可为不可为，那么，情志便系于外物，忧乐便关乎得失；或竟因为计较利害的原故，使许多应做的事，反而不做。这样，还那里领略到生活的乐趣呢？

再其次，儒家是不承认人是单独可以存在的。故“仁”的社会，为儒家理想的大同社会。“仁”字，从二人；郑玄曰：“仁，相人偶也。”（《礼记注》）非人与人相偶，则“人”的概念不能成立。故孤行执异，绝非儒家所许。盖人格专靠各个自己，是不能完成。假如世界没有别人，我的人格，从何表现？譬如全社会都是罪恶，我的人格受了传染和压迫，如何能健全？由此可知人格是个共同的，不是孤零的。想自己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是要社会的人格向上。然而社会的人格，本是各个自己化合而成。想社会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又是要自己的人格向上。明白这个，意力和环境提携，便成进化的道理。所以孔子教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立人达人，非立达别人之谓，乃立达人类之谓。彼我合组成人类，故立达彼，即是立达人类。立达人类，即是立达自己。更用“取譬”的方法，来体验这个达字，才算是“仁之方”。其他《论语》一书，讲仁字的，屡见不一。儒家何其把仁字看得这么重要呢？即上面所讲的，儒家学问，专以研究“人之所以道”为本。明乎仁，人之所以道自见。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盖仁之概念，与人之概念相涵，人者，通彼我而始得名。彼我通，乃得谓之仁。知乎人与人相通，所以我的好恶，即是人的好恶。我的精神中，同时也含有人的精神。不徒是现世的人为然，即如孔孟远在二千年前，他的精神，亦浸润在国民脑中不少。可见彼我相通，虽历百世不变。儒家从这一方面看得至深且切，而又能躬行实践，“无终食之间违仁”，这种精神，影响于国民性者至大。即此一分家业，我可以说真是全世界唯一无二的至宝。这绝不是用科学的方法可以研究得来的，要用内省的工夫，实行体验。体验而后，再为躬行实践，养成了这付美妙的仁的人生观，生趣盎然地向前进。无论研究什么学问，管许是兴致勃勃。孔子曰：“仁者不忧”，就是这个道理。不幸汉以后这种精神便无人继续的弘发，人生观也渐趋于机械。八股制兴，孔子的真面目日失。后人日称“寻孔颜乐处”，究竟孔颜乐处在哪里？还是莫名其妙。我们既然诵法孔子，应该好好保存这分家私，——美妙的人生观——才不愧是圣人之徒啊！

此外我们国学的第二源泉，就是佛教。佛，本传于印度；但是盛于中国，现在大乘各派，五印全绝。正法一派，全在中国。欧洲人研究佛学的甚多，梵文所有的经典，差不我都翻出来。但向梵文里头求大乘，能得多少？我们自创的宗派，更不必论了。像我们的禅宗，真可算得应用的佛教，世间的佛教间的确是印度以外才能发生，的确是表现中国人的特质，叫出世法与人世法并行不悖。他所讲的宇宙精微，的确还在儒家之上。说宇宙流动不居，永无圆满，可说是与儒家相同。曰：“一众生不成佛，我誓不成佛”，即孔子立人达人之意。盖宇宙最后目的，乃是求得一大人格实现之圆满相，绝非求得少数个人超拔的意思。儒佛所略不同的，就是一偏于现世的居多；一偏于出世的居多。至于他的共同目的，都是愿世人精神方面，完全自由。现在自由二字，误解者不知多少。其实人类外界的束缚，他力的压迫，终有方法解除；最怕的是“心为形役”，自己做自己的奴隶。儒佛都用许多的话来教人，想叫把精神方面的束缚，解放净尽，顶天立地，成一个真正自由的人。这点，佛家弘发得更为深透，真可以说佛教是全世界文化的最高产品。这话，东西人士，都不能否认。此后全世界受用于此的正多，我们先人既辛苦的为我们创下这分产业，我们自当好好的承受。因为这是人生唯一安身立命之具，有了这种安身立命之具，再来就性之所近的，去研究一种学问，那么，才算尽

了人生的责任。

诸君听了我这夜的演讲，自然明白我们中国文化，比世界各国并无逊色。那一般沉醉西风，说中国一无所有的人，自属浅薄可笑。《论语》曰：“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这边的诸同学，从不对于国学轻下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自然，我也闻听有许多人讽刺南京学生守旧，但是只要旧的是好，守旧又何足诟病？所以我很愿此次的讲演，更能够多多增进诸君以研究国学的兴味！

娜拉走后怎样

——1923年12月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

鲁迅

我今天要讲的是“娜拉走后怎样？”

伊勃生（按：现译易卜生。下同）是十九世纪后半的瑙威（按：指挪威）的一个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几十首诗之外，其余都是剧本。这些剧本里面，有一时期是大抵含有社会问题的，世间也称作“社会剧”，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 EinPuppenheim，中国译作《傀儡家庭》。但 Puppe 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是也；引申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是也。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这想来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了。

娜拉要怎样才能不走呢？或者说伊勃生自己有解答，就是 DieFrau vom Meer，中国有人译作《海上夫人》的。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来人会面。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她就不走了。这样看来，娜拉倘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伊勃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勃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伊勃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作了《傀儡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

娜拉走后怎样？——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罢，——说他所见的《娜拉》是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伊勃生自己寄给他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宠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

梦。

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谎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加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所以在家说参政权，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均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的剧烈的战斗。

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女子。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均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罢，但记性不佳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救济法就是各人去买一本 note — book（笔记本）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

后的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别的事也一样。

世间有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按：指义和团）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

其实，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

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欧洲有一个传说，耶稣去钉十字架时，休息在 Ahasvar 的檐下，Ahasvar 不准他，于是被了咒诅，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时候。Ahasvar 从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现在还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乐的，他何以不安息呢？虽说背着咒诅，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这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

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彀彀，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

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哪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我这讲演也就此完结了。

未有天才之前

——1924年1月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上的演讲

鲁迅

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托拖延得太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

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天才究竟有没有？也许有着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倘使据了见闻，就可以说没有；不但天才，还有使人一得以生长的民众。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山（按：指阿尔卑斯山），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举出几样来说：

其一就是“整理国故”。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于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绝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

其一是“崇拜创作”。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这和要求天才的步调很相合，其实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许多人对于托尔斯泰，都介涅夫（通译屠格涅夫），陀思妥夫斯奇（通译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名字，已经厌听了，然而他们的著作，有什么译到中国来？眼光囚在一国里，听谈彼得和约翰就生厌，定须张三李四才行，于是创作家出来了，从实说，好的也离不了刺取点外国作品的技术和神情，文笔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赶不上翻译品，甚者还要加上些传统思想，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而读者却已为他所牢笼了，于是眼界便渐渐的狭小，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作者和读者互相为因果，排斥异流，抬上国粹，那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

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

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评。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由来已久了，到

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可惜他们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像批评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到后来，连并非批评家也这样叫喊了，他是听来的。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也可以萎死的。我亲见几个作者，都被他们骂得寒噤了。那些作者大约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着。

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我以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说幼稚的话，只为自己要说而说，印出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以文艺来消闲，说来似乎有些可笑，但究竟较胜于戕贼也。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报酬，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赏鉴，正不必花卉自身，这才心旷神怡的——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说。

救国救民之责任在革命军 ——1924年2月对湘军将士发表的演讲

孙中山

湘军将领兵士诸君：

本大元帅今天在这地和大家相见，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并且可以和大家讲话，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本大元帅今天来对湘军兵士讲话，是希望湘军从今天以后，都能变成革命军。诸君听了这次讲话之后，便全体变成革命军，那才不负革命党全体同志的大希望。

什么是叫做革命军呢？革命军和寻常军有什么不同呢？不同的地方，小而言之，革命军的一个人常常能够打一百个人，至少也能够打十个人；大而言之，用我军的一千人，可以打破敌人一万人，用我军的一万人，可以打破敌人十万人。像这样以少数常常能够打破多数训练很纯熟、武器很精良的敌人，才叫做革命军。

大家都知道十三年以前，我们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受满洲人统治，被满清政府征服了两百多年。到了十三年前，有革命党起，用手枪炸弹，推翻满清皇帝，打破专制政体，建设共和国家。所以十三年以来，中国的名义上，才有中华民国之称，表现于世界上。那次推翻满清，成立中华民国，便是革命事业。讲到当时的革命党，人数是很少的。满政府在各省都练得有很多的新兵，在各险要的地方，又有满洲的驻防军。革命党推翻满政府，究竟是靠什车本领呢？简单的说，就是靠一个人能够打几百个人。那时候的革命党，因为有那样大的胆量和牺牲精神，所以能够成那样大的事业。

……所以本大元帅要大家以后能够打胜仗，做非常的事，更要变成非常的革命军，像黄克强那次在钦廉打仗一样。如果不然，就是枪好弹多，还是送给敌人，自己没有用处。

讲到战时以一可以当百的道理，是要各位兵士先有奋斗的精神。何以要先有奋斗的精神呢？有了奋斗精神，才能够牺牲，才不怕死。军人到了不怕死，还怕不能打胜仗吗？奋斗精神是从何而生呢？是从主义而生。兵士要发生奋斗精神，便先要有主义；先有了革命主义，才有革命目标；有了革命目标，才发生奋斗精神。革命目标到底是什么事呢？什么叫做革命目标呢？大家都知道革命党是拿三民主义来改造中国的。什么是三民主义呢？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我们要明白了这三种主义，才能够干革命事业。

大家都知道中国从前被满洲人征服过了两百多年，我们祖宗都是做满洲人的奴隶，习故安常，忘其耻辱。后来我们为什么能够推翻满清呢？就是因为明白了民族主义，知道自己都是汉人，总数有四万万，在明朝末年的时候，被满清征服了，压迫了两百多年，不能做主人，总是做奴隶。我们祖宗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对于满清反歌功颂德，说清朝有深仁厚泽。到了后来，全国之内，不但是受满清的压迫，并且受英、法、德、俄、美国、日本诸列强的压迫。便有先知先觉的人，发明了民族主义，推究满汉的界限：“为什么以少数的满洲人来统治四万万汉族呢？”“为什么四万万汉族总是应该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做满洲人的奴隶呢？”便发生极不平的思想，渐渐宣传，推广到全国，四万万人人都知道这是很不平的。古人说：“不平则鸣。”所以全国便要把这个不平来打平他，用极大的牺牲精神赶走满人。……专就满汉而

论，因为全国人明白了满汉的界限，知道满人和汉人的地位太不公平，所以发起辛亥年的革命。后来革命成功，便是民族主义达到目的。

什么是叫做民权主义呢？这个主义的道理，和民族主义是一样的。民族主义是对外打不平的；民权主义是对内打不平的。国内有什么不平的大事呢？就是有了皇帝或者军阀官僚的专制，四万万万人还是不能管国事，还是做他们少数人的奴隶。像这样压迫的不平，和外国人来压迫也是一样。所以对国内的专制打不平，便要应用民权主义，提倡人民的权利；提倡人民的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这种不平的专制，和外族来专制是一样。所以对外族的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义；对国内的打不平，便提倡民权主义。

民生主义又是什么道理呢？这种主义是近来发生的。五十年前，不但中国人没有讲到这个道理，就是外国人也不明白这个道理，也没有讲过这种话。现在世界上最进步的国家，像法国、美国都是从革命而来的，国外无外族的压迫，国内无皇帝的专制，他们的政治，都是很修明的，国家又富庶又强盛，在几十年以前，人民都是很享幸福的；但是近几十年以来，工业发达太过，一切工作，都是用机器代手工，譬如耕田织布和一切制造，没有不是用机器去做的。像大家由湖南到广东的韶关，都是走路，再由韶关到广州，不是走路，是坐火车。火车就是走路的机器，也就是运输的机器。用一个火车头，可以运几千人，可以运几十万斤行李；那些行李，用很多的人都难得挑动，如果专用人力去挑，非用几千人和十多日不能挑到；但是用火车，只要一日便可以运到。所以火车就是挑东西的机器，火车就是一个大挑夫，一个火车头所运的东西，可以替代几千个挑夫。耕田也是一样，织布也是这一样。一个机器做的工，可以代几百人。机器越多，出的物件越多，赚的钱也越多。所以有机器的人，便一日比一日富，没有机器的人，便一日比一日穷。因为机器的生产，故生出贫富极大的不平等；由于这种不平等，便发生民生主义。从前说民族主义是对外打不平的，民权主义是对内打不平的。民生主义是对谁去打不平呢？是对资本家打不平的。因为有了机器，生出了极大的资本家，国内无论什么事，都被资本家垄断，富人无所不为，穷人找饭吃的方法都没有，故发明民生主义，为贫富的不平等，要把他们打到平等。这种主义，近来在外国很盛行，渐渐传到中国。

诸位将士听到这里，便知革命党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是很容易明白的。这三种主义可以一贯起来；一贯的道理，都是打不平等的。革命军的责任，是要把不平等的世界，打成平等的；能够明白打不平等的三民主义，才可以做革命军。革命军是为三民主义去奋斗的，为三民主义去牺牲的。革命军为什么要为三民主义去牺牲呢？三民主义成功了，造成一个什么国家呢？大家要知道我们将来可以造成一个什么国家，便先要知道现在的中国，是处于什么地位。大家生在中国的这块地方，举目一看，是一什么世界？简单的说：中国现在是一个民穷财尽的世界，是一个很痛苦的世界；无论哪一种人在这个世界之内，都不能享人生的幸福。现在中国之内，这种痛苦日日增进，这种烦恼天天加多。我们看到这种痛苦世界，应该有悲天悯人之心，发生大慈大悲，去超度这种世界：把不好的地方，改变到好的地方；把这种旧世界，改造成新世界。要达到这种目的，其责任就是在我们革命军。我们革命军实行这种责任，把三民主义完全达到目的，中国便可成为一个安乐世界。

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文明顶进步的国家，是英国、美国。他们国富民强，人民所享的幸福，比中国好得多。但是他们国内还有贫富的不平等，所以普通人民还要革命。他们革命是用什么主义呢？所用的就是民生主义。因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在他们国内已经成功。除英国、美国的革命现在酝酿，还没有爆发以外，现在已经爆发了的是俄国革命。俄国革命发生于六年之前，现在已经完全成功。就是三民主义在俄国已经完全达到目的。

三民主义在中国完全达到目的之后，将来变成一个什么世界，我们突然一想，或者不容易见到，但是把俄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景像来看一看，便可以知道。七八年以前，俄国人民也是很痛苦的。当欧战的时候，全国加入协约国一方面去打德国，欧战没有终局，国内发生革命，便是要实行三民主义，对外不帮助协约国去打同盟国，对内推翻专制的俄皇；对于贫富的关系，反对世界上一切资本制度。因此列强当时便不去打德国，反移师来打俄国。故俄国革命，不但是皇帝的压迫要反对，就是列强的压迫也要反对，和全世界资本制度的压迫都一齐反对。当时革命军竭尽全力奋斗，把所有的压迫都打破了，于是组织一个新国家，叫做苏维埃共和国。现已得英国、意国承认了。所以俄国革命，可以说是完全成功。推究俄国革命的发起人，是由于三种人，叫做：农、工、兵。故俄国现时的政府，又叫做农工兵政府，是由于农、工、兵三界人民派代表所组织而成的。所以他们的政府，所持的政策，对于这三种人民便特别优待。……像俄国的人民，可说是自幼而老，一生无忧无虑。推究他们这种幸福，是由于革命而来的，是由于实行三民主义用革命方法造成成功的。在英美的政治社会，至今还有贫富的阶级。在现在的俄国，什么阶级都没有，他们把全国变成了大公司，在那个公司之内，人人都可以分红利。像这样好的国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从前反对我的，是满清皇帝，现在反对我的，是满清留下来的武人官僚；这些武人官僚的专制，就是小皇帝的行为。从前有诸先烈前仆后起的奋斗，便推翻了那个大皇帝。我们现在要继续先烈的志愿，推翻曹锟、吴佩孚这些小皇帝。……这种责任，是救国救民的责任。……我们要担负这样的大责任，做成这样的大事业，非有大志愿、大胆量和大决心不可。故本大元帅今天和湘军讲话，要大家变成革命军，便先要大家有大志气和大胆量，变成用一可以敌百的革命军，然后我们的三民主义才能够完全实行，中国将来才能够变成安乐国家。这个能不能，没有别的问题，只问诸位将士今天听了这次讲话之后，有没有决心。故本大元帅今天要求诸位将士的，是要诸位将士在今天立一个决心，变成革命军，共同去担负救国救民的责任。

关于知识阶级 ——1927年10月在上海发表的演讲

鲁迅

我到上海约二十多天，这回来上海并无什么意义，只是跑来跑去偶然到上海就是了。

我没有什么学问和思想，可以贡献给诸君。但这次易先生要我来讲几句话，因为我去年亲见易先生在北京和军阀官僚怎样奋斗，而且我也参与其间，所以他要我来，我是不得不来的。

我不会讲演，也想不出什么可讲的，讲演近于做八股，是极难的，要有讲演的天才才好，在我是不会的。终于想不出什么，只能随便一谈；刚才谈起中国情形，说到“知识阶级”四字，我想对于知识阶级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只是我并不是站在引导者的地位，要诸君都相信我的话，我自己走路都走不清楚，如何能引导诸君？

“知识阶级”一辞是爱罗先珂（V·Eroshenko）七八年前讲演“知识阶级及其使命”时提出的，他骂俄国的知识阶级来了；后来便要打倒知识阶级，再利害一点，甚至于要杀知识阶级了。知识就仿佛是罪恶，但是一方面虽有人骂知识阶级；一方面却又有以此自豪：这种情形是中国所特有的。所谓俄国的知识阶级，其实与中国的不同，俄国当革命以前，社会上还欢迎知识阶级。为什么要欢迎呢？因为他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他为什么能把平民的苦痛说出来？因为他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几年前有一位中国大教授，他很奇怪，为什么有人要描写一个车夫的事情，这就因为大学教授一向住在高大的洋房里，不明白平民的生活。欧洲的著作家往往是平民出身（欧洲人虽出身穷苦，而也做文章；这因为他们的文字容易写，中国的文字却不容易写了），所以也同样的感受到平民的苦痛，当然能痛痛快快地写出来为平民说话，因此平民以为知识阶级对于自身是有益的；于是赞成他，到处都欢迎他，但是他们既受此荣誉，地位就增高了，而同时却把平民忘记了，变成了一种特别的阶级。那时他们自以为了不得，到阔人家去宴会，钱也多了，房子东西都要好的，终于与平民远远的离开了。他享受了高贵的生活，就记不起从前一切的贫苦生活了。——所以请诸位不要拍手，拍了手把我的地位一提高，我就要忘记了说话的。他不但不同情于平民或许还要压迫平民，以致变成了平民的敌人，现在贵族阶级不能存在；贵族的知识阶级当然也不能站住了，这是知识阶级缺点之一。

还有知识阶级不可避免的运命，在革命时代是注重实行的、运动的；思想还在其次，直白地说，“或者倒有害。至少我个人的意见如此的。唐朝奸臣李林甫有一次看兵操练很勇敢，就有人对着他称赞。他说：“兵好是好，可是没有思想。”这话很不差，因为兵之所以勇敢，就是没有思想，要是有了思想，就会没有勇气了。现在倘叫我去当兵，要我去革命，我一定不去，因为明白了利害是非，就难于实行了。有知识的人，讲讲柏拉图（Piató）讲讲苏格拉底（Socrates）是不会有危险的。讲柏拉图可以讲一年，讲苏格拉底可以讲三年，他很可以安安稳稳地活下去，但要他去干危险的事情，那就很费踌躇。譬如中国人，凡是做文章，总说“有利然而又有弊”。这最足以代表知识阶级的思想。其实无论什么都是有弊的，就是吃饭也是有弊的，它

能滋养我们这方面是有利的；但是一方商使我们消化器官疲乏，那就不好而有弊了。假使做事要面面顾到，那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还有，知识阶级对于别人的行动，往往以为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先前俄国皇帝杀革命党，他们反对皇帝；后来革命党杀皇族，他们也起来反对。问他怎么才好呢？他们没办法。所以在皇帝时代他们吃苦，在革命时代他们也吃苦，这实在是他们本身的缺点。

所以我想，知识阶级能否存在还是个问题。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在动物界有很显的例；猴子的社会是最专制的，猴王说一声走，猴子都走了。在原始时代酋长的命令是不能反对的，无怀疑的，在那时酋长带领着群众并吞衰小的部落；于是部落渐渐的大了，团体也大了。一个人就不能支配了。因为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小，而渐趋灭亡。在古时野蛮民族常侵略文明很发达的民族，在历史上常见的。现在知识阶级在国内的弊病，正与古时一样。

英国罗素 (Russel) 法国罗曼罗兰 (R. Rolland) 反对欧战，大家以为他们了不起，其实幸而他们的话没有实行，否则，德国早已打进英国和法国了；因为德国如不能同时实行非战，是没有办法的，俄国托尔斯泰 (Tolstoi) 的无抵抗主义之所以不能实行，也是这个原因。他不主张以恶报恶的，他的意思是皇帝叫我们去当兵，我们不去当兵。叫警察去捉，他不去；叫刽子手去杀，他不去杀，大家都不听皇帝的命令，他也没有兴趣；那么做皇帝也无聊起来，天下也就太平了。然而如果一部分的人偏听皇帝的话，那就不行。

我从前也很想做皇帝，后来在北京去看到宫殿的房子都是一个刻板的格式，觉得无聊极了。所以我皇帝也不想做了。做人的趣味在和许多朋友有趣的谈天，热烈的讨论。做了皇帝，口出一声，臣民都下跪，只有不绝声的 Yes, Yes, 那有什么趣味？但是还有人做皇帝，因为他和外界隔绝，不知外面还有世界！

总之，思想一自由，能力要减少，民族就站不住，他的自身也站不住了！现在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这是知识阶级本身的缺点。

然而知识将怎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至于诸君，是与旧的不同，是二十世纪初叶青年，如在劳动大学一方读书，一方做工，这是新的境遇：或许可以造成新的局面，但是环境是老样子，着着逼人堕落，尚不与这老社会奋斗，还是要回到老路上去的。

譬如从前我在学生时代不吸烟，不吃酒，不打牌，没有一点嗜好；后来当了教员，有人发传单说我抽鸦片。我很气，但并不辩明，为要报复他们，前年我在陕西就真的抽一回鸦片，看他们怎样？此次来上海有人在报纸上说我来开书店；又有人说我每年版税有一万多元。但是我也并不辩明；但曾经自己想，与其负空名，倒不如真的去赚这许多进款。

还有一层，最可怕的情形，就是比较新的思想运动起来时，如与社会无关，作为空谈，那是不要紧的，这也是专制时代所以能容知识阶级存在的原故。因为痛哭流泪与实际是没有关系的，只是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时，那就危险了。往往反为旧势力所扑灭。中国现在也是如此，这现象，革新的人称之为“反动”。我在文艺史上，却找到一个好名辞，就是Renaissance，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意义，是把古时好的东西复活，将现存的坏的东西压倒，因为那时候思想太专制腐败了，在古时代确实有些比较好的；因此后来得到了社会上的信仰。现在中国顽固派的复古，把孔子礼教都拉出来了，但是他们拉出来的是好的么？如果是不好的，就是反动，倒退，以后恐怕是倒退的时代了。

还有，中国人现在胆子格外小了，这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人一听到俄罗斯，一看见红色，就吓得一跳；一听到新思想，一看到俄罗斯，一看见红色，就吓得一跳；一听到新思想，一看到俄国的小说，更其害怕，对于较特别的思想，较新思想尤其丧心发抖，总要仔仔细细的想，这有没有变成共产党思想的可能性？！这样的害怕，一动也不敢动，怎样能够有进步呢？这实在是没有力量的表示，比如我们吃东西，吃就吃，若是左思右想，吃牛肉怕不消化，喝茶时又要怀疑，那就不行了，——老年人才是如此；有力量，有自信力的人是不至于此的。虽是西洋文明罢，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己的了。好像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要是如此胆小，那真是衰弱的知识阶级了，不衰弱的知识阶级，尚且对于将来的存在不能确定；而衰弱的知识阶级是必定要灭亡的，从前或许有，将来一定不能存在的。

现在比较安全一点的，还有一条路，是不做时评而做艺术家。要为艺术而艺术。住在“象牙之塔”里，目下自然要比别处平安。就我自己来说罢，——有人说我只会讲自己，这是真的。我先前独自住在厦门大学的一所静寂的大洋房里，到了晚上，我总是孤思默想，想到一切，想到世界怎样，人类怎样，我静静地思想时，自己以为很了不得的样子；但是给蚊子一咬，跳了一跳，把世界人类的大问题全然忘了，离不开的还是我本身。

就我自己说起来，是早就有人劝我不要发议论，不要做杂感，你还是创作去吧！因为做了创作在世界史上有名字，做杂感是没有名字的。其实就是我不做杂感，世界史上，还是没有名字的……

艺术家住在象牙塔中，固然比较安全，但可惜还是安全不彻底。秦始皇、汉武帝想成仙，终于没有成功而死了。危险的临头虽然可怕，但别的命运说不定，“人生必死”的命运却无法逃避，所以危险也仿佛用不着害怕似的。但我并不想劝青年得到危险，也不劝他人去做牺牲。说为社会死了名望好，高巍巍的铸起铜像来。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么请你自己先去死吧。诸君中恐有钱人不多罢。那么，我们穷人唯一的资本就是生命。以生命为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赚一点利才好；以生命来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所以我从来不叫人去牺牲，但也不要再爬进象牙之塔和知识阶级里去了，我以为是最稳当的一条路。

至于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却不在我所论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

今天的说话很没有伦次，望诸君原谅！

革命时代底文学

——1927年在黄埔军校发表的演讲

鲁迅

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是《革命时代底文学》，我从前学矿业，叫我开矿，比叫我讲文学容易。我对于文学颇怀疑，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没有办法对付他们。那时候我就想：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是无聊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能杀人，受压迫的人开口讲几句，就要被杀；所以文学是不中用的。鹰捕雀，不声不响者为鹰，吱吱而鸣者为雀；猫捕鼠，不声不响者为猫，吱吱而叫者为鼠；结果，还是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文学家做几篇文章，或能称誉于当时，或能得到几百年的虚名，那些都是没有用处的，对于现实，总是吃亏；所以我对于文学颇怀疑。我没有学过陆军，手中没有枪，虽然我从前学过一点海军；我手中只有一支笔，才有今天这一个题目。

文学家讲文学和革命有关系，但我以为其中关系，颇为寥寥，他们以为文学在革命中可宣传、鼓吹、煽动；但这些文字在文学中底价值很低，不成为高尚的文艺，因为纯洁的文艺作品，不受他人命令，不管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说出。革命与文学是有关系的，革命时代底文学比普通文学不同，革命来了，文学就变换色彩；大革命可以变换文学色彩，小革命不成为革命，所以不能变换文学色彩。在此地听惯了革命，在江苏、浙江谈到革命二字，听的人很害怕，讲的人很危险；其实革命并不稀奇，革命就是社会的改革，因为社会天天改革，人类就天天进步，人类天天进步，社会就天天改革，这样地循环不已，所以人类没有一刻不革命，生物学告诉我们：人类与猴子没有异样的，人类与猴子是表兄弟。为什么人类成为高等动物，猴子仍为猴子呢？这就是因为猴子不革命，——猴子用四只脚走路，一个猴子站起来，用两只脚走路，许多猴子就说：“我们的祖先一向是坐的，不许你站。”猴子不但不肯站起，而且不肯讲话，因为它守旧；人类就不然，一个人要站起，一个人要讲话，当时虽受反对，究竟他还要站起，还要讲话，结果他胜利了，大家模仿他。照上例看来，革命并不稀奇，凡是负责任，没有死亡的民族都天天在革命，虽然是小革命。

大革命与文学有什么影响呢，现在分开三个段落来说：

（一）大革命之前，它有一种文学出现，对于种种社会状态，觉得不平，觉得痛苦，就叫苦，鸣不平，在世界文学中关于这类的文学确是不少。这些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对于革命没有大影响，因为叫苦、鸣不平，没有力量，压迫你们的人仍然不理，老鼠虽吱吱地叫，尽管叫出很好的文学，猫儿吃起它来，还是不客气；所以仅仅有叫苦鸣不平的文学，这个民族没用，因为止于叫苦鸣不平。例如乡下人打官司，失败的方面到了分发冤单的时候，官厅就知道分发冤单的方面没有力量再打官司，马上官司要归了结；所以叫苦鸣不平的文学等于叫冤，压迫者对此觉得很放心。不中用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连苦也不叫了，这些民族成为沉默的民族，这些民族快要灭亡了：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除泰戈尔一人外），都没有声音了。富有反抗性，蕴藏全副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它的声音改变了，由哀音变为愤怒之音，带有愤怒之音的文学出现，反抗就快来了；因为它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

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它要反抗，它要复仇。苏俄革命将起时，曾有此类文学；波兰、芬兰虽然复国，因为苏俄革命成功而使之复国，没有经过革命的阶级，因此没有此类文学。

（二）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受革命潮流波及，大家由呼声转之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再一层那时候民生凋敝，一心一德找面包吃而加紧革命，哪里有心思谈文学呢？守旧的人因为受革命潮流打击。气得发昏，不能再唱所谓他们的文学了。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当我在北京，穷得很，到处借钱，无有文学发表，到薪俸发放时，方坐下来做文章。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文学作品，挑担的人必要把担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定要把车子放下，才能做文章。大革命时代忙得很，同时又穷得很，一部分人和他部分人斗争，非变换现代社会底状态不可，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做文章；所以大革命时代底文学只好暂归沉寂了！

（三）等到大革命成功后，社会底状态缓和了，大家底生活有余裕了，这时候就产生文学。这时候底文学有二：一种文学是赞扬革命，称颂革命，——讴歌革命；因为进步的文学家想到社会改变，社会向前走，对于旧社会破坏和新社会建设，都觉得有趣味，一方面对于旧的制度崩溃高兴，一方面对于新的建设讴歌。当社会没有改变时，以为社会应该改变，非毁灭社会反对社会不可，进步的文学倡出这番议论后，人们都表示同情，大家都实行破坏，信仰的人少，没有影响，信仰的人多，文学竟成为社会运动；运动起来了，社会改变了，所以讴歌革命。另一种文学是吊旧社会底灭亡，——挽歌也是革命后底文学，有些人以为这是反革命的文学。社会虽是改变了，但社会上底旧人物很多，旧人物不能一时变成新人物，他们底脑壳中藏着旧思想旧东西；这些人在革命时不革命，革命后反革命，因为革命时对于自己没有关系，对于自己没有损失，但是革命后，社会底一切都改变了，影响到他们自身的一切，回想旧时的舒服，对于旧社会眷念不已，恋恋不舍，因而讲出很古的话，陈旧的话，形成这样的文学，这种文学都是悲哀的调子，表示它心里不舒服；一方面看见新的建设胜利了，一方面看见旧的制度灭亡了，所以唱起挽歌来。怀旧唱挽歌，表示已经革命了；如果没有革命，旧人物正得势，不会唱挽歌的。

不过中国没有这两种文学，——对旧制度挽歌，对新制度讴歌；因为中国革命还没有成功，正是青黄不接忙于革命的时候，没有什么话可说，所以看不见这两种文学。但是旧文学仍然很多，报纸上底文学，旧式的居多；因为中国革命对于社会没有多大的改变，对于守旧的人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旧文学仍能超然物外。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的广东。不特如此，并且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止看见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中国社会没有改变，没有怀旧的哀词，也没有崭新的进行曲；仅有苏俄已经产生这两种文学。苏俄旧文学家逃亡外国，所作的文学，皆是吊亡挽旧的哀词；新文学也正在努力向前走，伟大的作品还没有，但是新作品已不少，它已离开愤怒的时期而过渡到讴歌的时期了。赞美新建设是革命进行后的影响；再往后去的情形怎样，没有前例可知，无从考据，依我想来，平民文学快来了，因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底结果。

现在中国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所有的文学，歌呀，诗呀，是给阔人富人看的；它们吃饱了，睡在躺椅上，捧着看。一个才子出门遇见一个佳人，两个人很好，有一个不才子从中捣乱，生出差迟来，但终究团圆了，这样地看着，多么舒服；或者讲阔人富人怎样有趣和怎样快乐。前几年《新青年》载过几篇俄国小说，描写罪人在野外的生活，大学教授看了不懂，难怪他们不知道天下有这样的下流人，因为他们住在高大的楼房里。如果歌诗描写车夫，就是下流歌诗；一出戏内，有犯罪的事情，就是下流戏。他们戏内的角色，只有才子佳人，才子中状元，佳人封一品夫人，在才子佳人本身很欢喜，他们看了也很欢喜，我们没奈何，也只好替他们欢喜欢喜。直到眼前，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称之为平民文学，实质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底生活，假装平民底口吻而说的。因为眼前的文人都有钱，有的虽很穷，总得比工人农民富些，才能有钱读书，才能做文章；你们以为是平民所说的，其实不是，而是冒充；这不是平民小说。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有人写下来，以为是平民之音，因为是老百姓所唱的，其实他们间接受古书的影响很大，他们对于乡下底绅士有田三千亩，羡慕得不得了，每每拿绅士底思想，做自己底思想，绅士们惯咏五言诗、七言诗；因此他们所唱的山歌野曲，大半是五言七言。这是就格律讲，还有构思取意，也是很陈腐的，不能称是真正的平民文学。现在中国底小说和诗实在比不上别国，没法奈何，只好称之曰文学；谈不到革命时代的文学，更谈不到平民文学。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底思想，所以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有些人说：“中国已有平民文学”，其实这是假的。

诸君是战争者，是革命的战士。学文学对于战争没有益处，只有战余休憩时，拿本诗看看，觉得有趣。在革命时代讲文学，譬如农夫种柳树，待到柳树长大，浓荫蔽日，本可以坐在树荫休息休息，但是农夫一天到晚，耕作不息，只有在正午——十二点钟时候，或者可以坐到柳树底下吃饭，此外没有什么用处。中国现在的社会问题，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撵走了。他人以为文学至高无上，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不过是一种消遣品，无非民族底文学表示一民族的文化罢了。

我从前不过做了几篇文章，承诸位到此听讲；我呢，愿意听一听大炮的声音，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好听得。我的演说只有这样多，感谢诸位好意！

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 ——1931年12月发表的演讲

宋庆龄

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1925年孙中山病逝北京，国民革命突然失却了领导，以致中辍。幸而当时在广州的党内同志严格遵守他的遗教，以群众为革命的基础，使北伐能于短期内在长江流域取得胜利。但是不久之后，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与军阀和政客之间的相互争吵，造成了宁汉分裂，使党与人民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

残暴的大屠杀和恐怖迫使革命转入地下。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并继续进行反动活动。在中央政府中，国民党党员力争高位肥缺，形成私人派系，以巩固他们的地位；在地方上，他们也同样剥削群众，以满足个人的贪欲。他们和一个又一个的军阀互相勾结，因而得以跃登党和政府中的高位。但是，忠实的、真正的革命者却被有意地百般拷打，以致于死。邓演达的惨遭杀害就是最近的例子。

五年以来，内战和政治阴谋循环不已。由于背弃了革命政策，各敌对的派系都向帝国主义者投降，并且不惜利用武力和最下流的手段。过去北洋军阀政客所不敢做的事，都在“党治”的名义下毫无顾忌地做出了。因此，国民党今天已名誉扫地，受到全国的厌弃和痛恨，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孙中山的遗嘱连一天也没有真正实行过。

近来宁粤两派发生分裂，形成两个对峙的力量。双方各自指摘对方的缺点，又夸耀自己的长处。他们用虚伪的政治口号，比如“政治公开”、“民主统治”、“革命外交”等，作为欺骗中国人民大众的武器。但实际上，广州和南京这两派都以军阀为靠山，都在力争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的欢心，而且都背叛并屠杀中国人民大众。

由于日本公然侵入我东北，广州和南京，这两个集团由于国难当前和舆论的谴责，都不得不暂时停止公开的战争，而召开所谓“和平统一会议”。阴谋围绕着会议进行了三个月之久，争论的中心问题不外乎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中职位的分肥。关于构成全国极大多数的农民工人的苦难和急需，在这个会议上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些敌对的派系，昧于自私自利，完全看不出个人独裁、党的堕落、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都是它们使国民党脱离了群众的结果。

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假如所谓“和平”与“统一”进行顺利，从而各派都满足了它的贪欲，那么“和平”不过是和平地分赃，“统一”不过是对群众进行统一的掠夺而已。绝不可能想象中国人民愿见这样的“和平”，或全国愿要这样的“统一”。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在南京看到这种统一的第一个果实。仅在三天以前，在帝国主义国家使节的命令之下，这个“统一政府”竟力图镇压爱国的学生运动。在不到十二个小时的时间内，兵士和流氓包围了学生，棒打枪刺，把他们像畜牲一样地赶出城去。学生多人死伤，据报另有大批失踪。

暴行是在这样的时候演出的：一支外国帝国主义的军队正向锦州推进，

而所有卖国贼和帝国主义分子正受到优待、阿谀和保护。在口头上讲着革命外交、全民民主和言论、出生、集会自由的人们到达南京后，这个暴行就发生了。可以明白地看出，新的统一的政府是由日、法、英、美等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组成的，是服务于这群利害冲突的主子的，它将继续接受帝国主义者的命令，镇压中国民族求解放的任何一种形式的群众运动。

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

因此，我不得不率直地宣布，既然组织国民党的目的是以它为革命的机器，既然它未能完成它所以被创造起来的任务，我们对它的灭亡就不必惋惜。我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我深信：虽然今天当权的反动势力在进行恐怖活动，中国千百万真正的革命者必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反之，由于国家当前形势的危急，他们将加紧工作，朝着革命所树立的目标胜利前进。

民国光复

——1933年10月在其思想发生变化时的演讲

章太炎

所谓辛亥革命者，其主义有二：一、排斥满洲；二、改革政治。前者已达目的，后者至今未成。有功于光复之役者，今存在尚夥，特众口纷纷，归功于谁，亦未能定也。当时之改革政治，亦只欲纲纪不乱，人民乐生耳，若夫以共和改帝制，却非始有之主义，乃事势之宜然也。

按清入主中原三百年间，反清之意见，时载于书籍，鼓励人民之同情，今举其一代所宗大儒之言论以概其余，顾亭林《日知录》中解《中庸》“素夷狄行乎夷狄”，见目录而解义删去。然见钞本《日知录》中说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是之谓素夷狄行乎夷狄。非谓可仕于其朝也。”又解《论语》“管仲不死子纠”，谓“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即见亭林之志矣。王船山亦谓“一朝之变革不足论，惟宋之亡于夷狄，则中国失其为中国矣。”又云：“种族不能自保，何仁义之云云。”二先生学问极大，见地独高，故彰明于世，学者宗之。而草野户牖中诸儒，与二先生论调同而名不显者，不知几何也。吕留良之意见与顾、王相同，及曾静狱兴，事乃大露，清廷因之大兴文字之狱，以集《四库全书》之名，焚禁天下诋毁清廷之篇籍。秦始皇焚书，刘向校书，二者不可得而兼，惟清四库馆则兼而行之，其防制可谓无微不至。然不知此种观念已深入人心，故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孙中山虽未读顾、王诸先生之书，亦能起兵抗清，何必读书之士为能然耶？

余成童时，尝闻外祖父朱左卿先生言：“清初王船山尝云，国之变革不足患，而胡人入主中夏则可耻。”排满之思想，遂酝酿于胸中。及读《东华录》至曾静案，以为吕留良议论不谬，余遂时发狂论曰：“明亡于满清，不如亡于李自成，李自成非异族也。”及后与梁启超等相处，康、梁主保国、革命同举，并谓“保中国不保大清”。是时上海报载广东人孙文于英国伦敦为中国公使捕获，英相为之担保释放，余因询孙于梁氏，梁曰：“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余曰：“果主张革命，则不必论其人才之优劣也。”庚子拳（按：指义和团）乱，八国联军入北京，唐才常辈籍勤王名，主张革命，发表宣言，粤人容闳手笔也，严复译成汉文，大意诋毁清政，别立政府，而又云戴光绪皇帝为主。余不然其说。时康、梁之徒已渐变原有革命主张，而趋重保皇，遣人询余意见，余力言奉戴光绪为非，因剪发自誓。后因《驳康有为书》及序川人邹容《革命军》被捕，与邹容人上海狱。三年期满，出狱东渡，同盟会已由孙中山、黄克强等成立，以余主《民报》。初，孙之兴中会可号召南洋华侨，黄之华兴会可号召沿江会党，徐锡麟等之光复会可号召江、浙、皖士民。三党纠合为同盟会，惟徐锡麟未加入。黄克强系两湖书院出身，留学生亦多通声气，国内文学之士则未能生影响。自余主笔《民报》，革命之说益昌，入会之士益众，声势遂日张。至辛亥革命之主谋，则湘人焦达峰也。达峰者，共进会会负，初与湖北日知、文学等会议起事，焦建议自湘首倡，鄂响应之。并曰：“若湘起后，鄂于十日内不响应，则湘将以鄂为敌人。”适彭楚藩、刘尧澂、杨洪胜等谋炸事露，总督瑞澂大索鄂中党人，

于是鄂不得不先湘发难，占据武昌，举黎元洪为都督。清廷命黄忠浩发湘省防军袭武昌，势甚急；焦达峰起，袭取长沙，杀黄忠浩，革命军势益盛。未数日，焦氏被梅馨所杀，传为谭延闿主使，其事今犹未明也。时共进会突然起事，同盟会首领俱未知之，孙在英，黄在香港，即与谋之宋教仁、谭人凤，亦谓须训练三年方可从事，未料及此事如此之速。共进会由张伯祥组成，其成立在同盟会后，起事则先之。初，黄兴在大森，尝劝达峰并入同盟会，达峰以同盟会舒行阔步，未果。

革命之成功原因有二：一、远因，排满思想潜伏已久；二、近因，党人鼓吹甚力。虽共进会有倡义之功，若元同盟会之鼓吹革命，布置各省革命基础，则绝无如是大之影响。当袁世凯命冯国璋攻下汉口，不敢复取武昌者，以革命军已遍满南方，不可复抑也。若只湘、鄂二省，袁何爱而不攻耶？故同盟会有倡始布置之功，而共进会有实行发难之功。姑以弈喻，布全局与白黑相杀，在弈中有相等之重要。布局，同盟会也；相杀，共进会也。今日咸以实行之功归诸一二人，虚妄已甚，其去魏收史不远矣。

武昌立政府后，黎元洪为首，同盟会则以孙文为首，国之元首有相争之局，故行共和制以均衡权力，乃举孙大总统，黎副之，此固不得不然之势，而事前筹备实未尝周密也。试观袁世凯称帝，同盟党员附和者尚有其人；张勋复辟，未有一人附和者，虽今伪国成立，党员附和者亦绝无其人，皆足证革命之起实为排满也。

宋案发生，孙、黄欲举岑春煊，岑受梁鼎芬、郑孝胥之愚，议举溥伟为总统，以诱致冯国璋，余力斥之，岑翻然悟，拒梁、郑，梁大骂而去。若余不阻之，虽满清不能兴，然于黄一生功绩将受影响矣。以上皆论排满之事。

今论政治之改革。政治至今只有纷乱而无改良，盖革命党人忠实者固多，而好勇疾贫行险侥幸者亦不少，其于政治往往隔膜。当革命未成时，群目宋教仁为将来之政治家，然宋氏仅知日本之政治，处处以日本之政为准，如内阁副署命令，两院决可否，矜为奇异。不知此二制度，中国已行于唐、宋。副署之制，唐时诏令俱然，并谓不经凤阁鸾台不得为制敕，其所谓墨敕内降者，则出乎法外者也，逮宋亦然。明之内阁大学士，实即唐之翰林学士，只是天子秘书，放不能副署诏令。清亦沿明制，然如军机大臣奉上谕，内阁奉旨，虽不以人署名，而以机关署名也，则未尝无副署之意。下此则州县决狱，典吏亦须副署，此何足矜为奇创耶？又两院议可否，唐之门下省给事中，即议诏令可否者也，有封还、涂归、批敕诸名，宋、明因之，清则将给事中并人都察院，无封还诏令之权，仅能分发诏令与各衙门，所谓邸抄者也。唐给事中四人，明设六科，亦只数十人，而国会议员至数百人之多，当时所选者半非人望，议员以可否权之奇货自居，于是势凌总统，敲诈贿赂，无所不至，国会名誉扫地无余矣。而宋之在政府，亦以副署权陵轹元首，终蒙杀身之祸。由今观之，其政治知识实未备也。

上述诸事，欲政治之澄清，岂可得乎？孙谓革命尚未成功，信然。党员步调不齐，人格堕落，革命初成时已渐暴露，黄在汉阳，尝以扩大同盟会远询于余，余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告之，克强未纳。其后，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吴景濂等五团体合组国民党，竟留十二年曹锟贿选之丑，可见其政治上之节操，与其维持共和之能力矣。

关于练兵与带兵问题

——1943年10月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演讲

朱德

练习要有个目的。练到什么样了才算是一个好兵，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呢？一个是要勇敢，一个是要有技术。这两个东西非常重要。如果你不勇敢，你怕死，那就打不成仗。过去我们的红军很勇敢，很好，可是技术不够高明。勇敢再加上技术，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那就更好了，我们练兵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个人又勇敢又有技术，这样，打起仗来就有把握了。

怎样练兵呢？练兵没有旁的巧妙，首先是干部以身作则，亲自动手。别的事情也要干部以身作则，亲自动手，练兵更要这样。练兵是谁去练？第一是班长，第二是排长，第三是连长，任何一个动作都要靠他们以身作则。我们当连长、排长的大部分是党员，他们的政治热忱可以影响士兵的政治热忱，他们的阶级觉悟可以影响那些不觉悟的人。有觉悟要革命的这些干部，可以表现出很多美德，如大公无私，互相帮助，谦虚等等。他们就可以去影响别人。相反，如果你政治上不觉悟，自私自利，甚至还做了坏事，那就糟了，那也会影响下面的人跟着你学。所以，好的表现可以影响下面的人学好，坏的表现也可以影响下面的人学坏。参加革命的人，有工人、农民、但也有二流子。有些人是为了升官发财，不是为革命而来的。要把他们变过来，靠什么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靠我们用自己的阶级觉悟、政治觉悟的实际表现去影响他们。是不是一定要给他们上课？当然，上课不可少，但也不能光靠上课。要在日常生活中，闲谈中，在一起走路、吃饭的时候，和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去影响他们。这样的影响有时比正式上课还要好。这是有经验的。我也当过排长、连长。在我当连长的时候，还说不上阶级友爱这一套，只知道民族国家危亡，要救亡，我们就拿这个道理去宣传，从政治上影响下面的人，他们无形中就接受了。军事上也是如此，首先，自己要把动作搞好，做出模范动作，下面的同志就会模仿你。你做什么样子，他就学什么样子。这比上正课、比有计划地去教育有时还要好。我在井冈山的时候，大家去挑米我也去挑，挑到半山上我就挑不动了，肩膀被压痛了，虽然如此，但是你一挑他们就都来抢着挑，一带头事情就好办了。我们练兵带兵在各方面都要以身作则。要战士们打枪打得好，自己就要首先打得好，要战士们投弹投得远，自己也要懂得投弹要领，一般的动作自己都要带头去做。

练兵必先练心，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封建地主阶级要工农给他们当兵，又要压迫工农，他们讲的练兵必先练心，是要你把心完全向着他们，忘记自己本来的阶级，反过来替他们去压迫工农。我们不是这样，我们讲练兵必先练心，是要启发战士们的阶级觉悟，要他们了解自己属于什么阶级，怎样受压迫，怎样受剥削，为了解除自己所受的压迫和剥削，要怎样团结起来，怎样练好本领。他们懂得了这个道理，再看一看社会的情况确是那个样子，一点也不假。从此以后他们的心就完全为革命了，就一心一意地学习技术，一心一意地团结自己，打击敌人。所以练兵必先要从政治着手。练心就是做政治工作，启发战士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从不觉悟到觉悟。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个道理，还是同过去国民党军队那样的练法差不多，认为只要强迫战士们做就行了。这是要不得的。

还要练体力、练技术。用什么办法练体力呢？首先体操（徒手体操、军事体操、持枪体操、器械体操）、跳高、跳远。愈动体力愈好，体力愈好愈爱动。这样就愈练愈好。体力发展均匀了，要怎样用就怎样用。日本练兵的方法有些我们要学。他们先搞一个月的体操，各种操都搞，这一个月都是练体力。六个月的练兵是很有作用的。体力搞好了，拿枪就稳了，爬山、跑步都行了，这也就是技术。我们的老兵技术不高的，要想办法补起来。技术是有各种各样的，我这里不一一去讲了。总之，我们要培养很多神枪手，培养最好的炮手、最好的机枪射手，各种技术都要练好。

要把士兵们的个人生活习惯改造成集体的生活习惯。集体的生活骤然是过不惯的，要慢慢地才能养成习惯。集体生活对练兵是有很大作用的。通过文化娱乐、上课、出操、开会等进行教育，这是我们军队所特有的优点。

我们练兵有这四个方面：第一，以身作则；第二，做政治工作，就是练心；第三，加强体力和技术；第四，生活集体化，过有规律的生活。做好这四方面的工作，我们的练兵就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

兽·人·鬼

——1946年1月在国民党制造“一二·一”血案后发表的演讲

闻一多

刽子手们这次杰作我们不忍再描述了，其残酷的程度，我们无以名之，只好名之曰兽行，或超兽行。但既已认清了是兽行，似乎也就不必再用人类的道理和它费口舌了。甚至用人类的义愤和它生气，也是多余的。反正我们要记得，人兽是不两立的，而我们也深信，最后胜利必属于人！

胜利的道路自然是曲折的，不过有时也实在曲折得可笑。下面的寓言正代表着目前一部分人所走的道路。

村子附近发现了虎，孩子们凭着一股锐气和虎搏斗了一场，结果遭牺牲了，于是成人之间便发生了这样一串纷歧的议论：

——立即发动全村人手去打虎。

——在打虎的方法没有布置周密时，劝孩子们暂勿离村以免受害。

——已经劝阻过了，他们不听，死了活该。

——咱们自己赶紧别提打虎了，免得鼓励了孩子们去冒险。

——虎在深山中，你不惹它，它怎样会惹你？

——是呀！虎本无罪，祸是喊打虎的人闯的。

——虎是越打越凶的，谁愿意打谁打好了，反正我是不去的。

议论发展下去是没完的，而且有的离奇到不可想象。当然这里只限于人——善良的人的议论。至于那为虎作伥的鬼的想法，就不必去揣测了。但愿世上真没有鬼，然而我真担心，人既是这样的善良，万一有鬼，是多么容易受愚弄啊！

文艺的新旧内容和形式 ——1946年在上海发表的演讲

郭沫若

文艺有新有旧，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时有些错综。有新的内容而有旧的形式，也有旧的内容而有新的形式的。像人一样，衣服尽管穿得摩登，而仅有一种陈腐的思想，那就是旧内容新形式。倒不如反过来好。外表虽旧而思想很新，倒很值得欣赏。但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最好是内外都合乎新的标准。文艺是反映生活的，要反映当前的生活，要批判今天的生活。它要求有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这就是今天的文艺。

新文艺，一定要有今天的知识。过去的诗人在杜鹃的叫声中赋予以怀念故乡的情趣。一般说杜鹃的叫声是在喊着“不如归去”，还造出了一些传说来美化它。但在事实上杜鹃鸟是一种懒惰的鸟。它自己不砌巢，并没有家乡。它下蛋在黄莺的巢里，让黄莺的母鸟替它孵化、哺喂。鹃雏比莺雏大，一经孵化后把莺雏挤出巢外饿死、冻死，独占着义母的抚育。所以这杜鹃是一种法西斯式的鸟类。到今天，我们知道了这个事实，就不好再以杜鹃的啼声来表现思乡的情感了。今天的诗人，要以今天的水准来表现。

又像雁鹅，也是诗中常用的。诗人们特别同情孤雁，事实上那是在同情落伍者。雁为了争取时间的关系，鼓足最大的劲头飞行，因而飞得很整齐划一，这便形成了所谓“雁阵”或者“雁行”。但如果有一只雁劲头不够，它就要落伍了，其余的雁鹅为了免除累赘，便要把这落伍者立刻抛弃，甚至啄死，毫不慈悲。

新的作品非但要有新的知识，还要有新的感觉。过去，写到山，便一定是青山；水，一定是绿水。这山和水是死的，事实上山不一定青，水不一定绿。我们今天一定要有新的直党的印象，把它固定下来发生新的感觉作用。中国的旧诗人，因中国西部多山，河流是往东流的，所以习惯着说“日落西山水东流”。但如环境不同，西边不一定有山，而水是可以南流、北流、西流的。我们应该抛弃一些陈腔腐调，照实感写。

新的思想是最要紧的。写作的动机，作家的生活立场、思想，是艺术作品中真正的灵魂。

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旧式的文艺，封建思想很浓厚。它的对象是上层阶级，对于当时有权势的阶级的歌功颂德。在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正相反，不应再只看到上层分子，不能再以少数人为对象，应当是以社会的真正主人作为对象，即一般人民大众。文艺作者应当向下看，为人民大众歌功颂德。今天的文艺作家应当歌颂劳动人民，表达劳动人民的感情和希望。这是新文艺和旧文艺的分水岭。

无论哪一个民族，原始时代的文艺，都是由人民大众集体来创造的。虽然有数千年的历史，可是有它的重要性。本质上讲，是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者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而分化了。分化的时候，一部分向上，一部分向下。上层的工作者即产生贵族文学，下层的工作者即产生平民文学。留在民间的文学是被当代的特权阶级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土式的。其实这倒才是真正的文艺正统。那些上层阶级只是把文艺当作少数人的玩弄品。这批判并不是在今天才开始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断不断地在进行着批判。

为人民的和为少数人的文艺作品，不断不断地在进行斗争。每逢改朝换代，新的统治者由民间上台，因而每每带来些民间的东西。文艺正是这样，每一个朝代差不多都有新的气氛产生，是由民间带来的。但民间的东西一登庙堂，就跟新的统治者逐渐就失去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样，新起的文艺也成了贵族的文艺。对于历代作家，我们也是有严格的批判。倘使你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大众说话的你便享有身份。如像屈原、杜甫。倘使你只是作为上层的弄臣，你便失去身份。如像宋玉、杨雄。是否为人民服务？这真可以作为新旧的标准。今天的文艺作品，不仅要有种种新的知识和感觉，主要的还要有新的思想，要以工农大众为我们的对象，要诚心诚意为他们服务。这是新文艺的最新最基本的条件。

我们的文艺既要以人民大众为对象，我们就应当向人民大众学习。有人怀疑：许多知识都要向专家们请教，为什么文艺却应当向人民学习？我们受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熏陶，眼睛总是向上不向下，一般人不知不觉把人民看不上眼。其实文艺既然是人民生活的反映，那么对于一般人民的生活，人民便是专家。例如你要代替农民说话，代替工人说话，你就应当向一般工农老百姓去请教，去学习他们的生活。除掉工农之外，哪儿还有工农生活的专家呢？

有这么一个故事：十九世纪法国一位著名的画家叫德勒珂罗亚，气魄很大。他喜欢画马。有一次在巴黎的展览会上，大家都很称赞他所画的马。可是有一个衣冠不正的人，表示摇头。画家就上去向他请教。他说：“我是一名马夫，对于马的生活很熟悉。在马飞跑的时候，口角上有白沫，但是你的奔马却没有白沫。”画家听了很佩服，立刻把展览会中止了。他准备重新向马的真实生活去学习。这是具有教育的故事。

在今天，我们要从事我们的文艺工作，一定要把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铲除，还要铲除买办阶级的意识。什么月亮也只有美国的好，完全是狗屁！要这样才可以满足今天的人民要求和时代的需要。我们不仅不应该轻视人民，还要礼赞人民，歌颂人民。人民是文艺的真正主人，真正的老师。今后我们的新文艺，就需要把人民作为老师，作为主人。向人民大众彻底服务，向人民大众学习一切，要和人民大众保持密切的关系。

将来新文艺的发展可能有几种新的途径：一种是“五四”以来的文艺形式，受外来的影响多些，油画、雕塑、音乐特别显著。我们不应该排外，要继续吸收外来的好东西，而使它民族化，为今天服务，为人民服务。另一种途径，就是发掘和发展流传在民间的许多旧有的形式，在形式上加以改进，并盛入新的内容。许多歌谣和地方戏剧是应该重视的。在今天应该把一向为人民服务的形式加以整顿，使它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两种途径都是我们应当发展的。可能还有第三种途径，便是把新旧融合起来，创造出新的民间形式。总之，今后的新文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应当以人民大众为前提。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今天是人民的世纪。还有，文艺创作也是艰苦的工作。要创作一种纪念碑式的巨著，必须要把全生命灌注下去，要把全生命奉献给中国人民。

一个女人能干什么 ——1947年8月在妇女大会上发表的演讲

蔡畅

今天讲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女人能干什么？

一个女人能干什么呢？我的回答是：“能干，什么也能干；不干，什么也不能干。能干又不能干，不能干又能干。”为什么这样说呢？要确定女人能干不能干，有两方面的条件。首先要看看环境，就是要看处在一个什么政权下，什么社会制度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要看个人努力怎样。如果环境好，自己不去努力，只靠人家解放，那就什么也不能干。但如果自己经常努力干下去，就可以得到好的结果。如果努力干，就是从些小的具体工作到管理国家大事都能够干；如果不干，就又会变成新社会的寄生虫。

男女的智力，本来没有大差异，我们从历史的发展上来看便知。原始共产社会，有所谓母权时代，那时妇女能生产，执掌家政，很多事情都是妇女来管，甚至男子打回来的野兽，也要妇女来负责分配。但一到封建社会，由于私有财产的产生，出现了阶级，强悍的封建主，夺去了别人的土地，让农民给他耕种，于是就有了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之分，就有了贫富的悬殊，随之也就有了男女的悬殊，男人掌握了家政，作主人，女子降为从属的地位。那时候，当了主人的男人创造了“宿命论”来统治被剥削者，麻醉他们从思想上不要求翻身。对占人口半数的女人呢，更制造许多封建道德，如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三从四德”等论调来剥夺女人发展能力的机会，使女人从广阔的社会活动渐渐退到狭窄的小天地——家庭里去。这样来巩固他们的统治。

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把我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他们勾结了封建统治来榨取广大的人民，这社会的女人，还是喘息于封建压迫之下。

至于“八·一五”以前，完全殖民地化了的东北，日本统治者根本不把女人当人看待，他们给女人能力发展以最严格的限制，即使极少数有机会念书或就业的女子，也受着纯粹奴化的思想教育。女学校里教的是怎样烹饪，怎样当太太，怎样侍候老师和客人，机关里下级的女职员，便是侍奉上级和忍受上级的戏弄。在这里曾经身受其苦的女同胞，会比我得更清楚。

说到劳动妇女，无论在封建社会也罢，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也罢，或殖民地社会也罢，都受着剥削和封建压迫的两重痛苦，比其他阶级妇女更苦些。现在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却大不相同了。施政纲领上规定女子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社会地位与男子一律平等，不仅在纲领上规定，更重要的是付诸实行。解放区里有女专员，女县长，女政委，女主任，女区长，女村长，女经理，女编辑等。学校里没有男女的限制，工作中没有男女的限制，只看能力和工作经验来决定工作，不像旧社会的以年纪、相貌、财产、资格等，限制女性。我们看看东北解放区吧：

最高政权机关政委会有女委员（兼松江省教育厅长），宾县的女政委，哈大理学院的女院长，裕长源火磨、松江商场等的女经理，各省市的女参议员，女校长、女科长，女秘书和女区长，女主任，女队长不可胜计。女护士，女会计，女电报、电话员等各种技术人员里面，也涌现了大批的模范与英雄。

这是女知识分子方面的，至于劳动妇女呢，也普遍地得到提高与深造的

机会。过去劳动妇女百分之百的文盲，不仅在社会上没地位，即使在家庭里也没地位。但解放以后的她们也和男子一样卷入了土地改革斗争，一样的分地分房子，一样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而且和男的一样站在生产的最前线；拥军劳军支援前线，捉匪防奸，巩固后方也尽了很大力，因此出了不少女英雄、模范和群众的领导人物。这些女人，不仅在社会上看重她们，即使在家庭里，也获得了尊敬。现在很多当丈夫的抱着孩子，让妻子去开会，婆婆也舍不得骂能干的媳妇了，她们亲手把“三从四德”、“烧茶做饭，喂鸡抱蛋”等等许多坑人的枷锁粉碎了，现在举个例子：

陕北土地革命的折聚英，原是一个不识字的乡下姑娘，后来参加了土地改革，又带头努力生产，组织妇女自卫军；后来进女子大学学习，提高了文化，总共不到几年的工夫，便当上了政治指导员、延安县的参议员，能文能武，被群众所爱戴。齐齐哈尔的石老太太，斗倒了窑主之后，她恨旧社会害她不识字，她就把斗争的果实（二十万元）拿出来办学校，她积极出来替群众办事，遇到困难时，她便和群众开会，大家伙出主意来克服困难。现在她是嫩江省的参议员呢。

至于洮安的张寡妇，瓦房的杨老太太，北安的吴大嫂和东北各地成千上万的翻身妇女，在民主政府的各种协助之下，都正以超凡的热情，因公忘私地努力工作，而且在工作中提高别人和提高自己——这样的例子真是说也说不完。她们拿自己的劳动来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因之家庭地位也随之提高。总之，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解放了的妇女正以飞跃的姿态来改变着自己原来的面目。

我们认为妇女解放主要的内容，就是要在经济上翻身，所以我号召妇女起来分土地，分房子，生产。我们对劳动生产是看成最高贵、最有价值、最荣誉的事情，希望妇女能劳动致富，从经济上翻过身来。

我们是在中共的领导下，获得了解放的。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解放根本谈不到。这也证明了有正确的领导，而且加上主观的努力，妇女什么也能干了。劳动妇女能干，知识妇女也能干。

有些女同志曾提出这样的问题说：“在参加革命的初期，我工作和男的一样，为什么后来不如男的呢？”其原因之一是女人除了革命的工作外，还有另一种任务，就是生孩子和带孩子，所以前进不是直线而是曲线的，“之”字形的。正因为这样，女子更应当努力，不然就会赶不上，就会掉队。当然我们要想办法设立保育机关，减轻妇女一部分负担，但总不能减轻怀孕十月的负担。妇女的重担在两肩，因此要有一股劲，否则想做又不做，做起来又没劲，看见别人前进自己又不舒服，做了一下又放下，这就会变成一个庸俗的女性，又有些人想过去如何好，将来如何好，现在却不好好干，这是脱离现实的幻想。还有些人眼高手低，想于大事不干小事：要做政府委员，不做技术工作，认为自己能力很高，想一干，就变成英雄，闻名世界。这些思想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我们必须知道，妇女几千年来被剥夺了培养能力的机会，因此养成了好些懒性和缺点，如果我们不加倍努力和注意克服，就很容易落后。

“一生了孩子的女干部能不能工作？”我说：“能工作。”过去在蒋匪区从事革命工作的妇女，哪一个不是有一儿半女的呢？那时的环境比现在解放区坏得多了。又看看，现在在乡村工作的翻身妇女，哪一个不是带着儿女的？所以问题不在于有了孩子能不能工作，而是有了孩子怎样把工作搞好。

那就看我们是否有毅力，能不能吃苦，和办到科学的管理家务和孩子，和有条件的节制生育等等。

未婚的女同志在工作中，可能碰到一些与自己有关的切身问题，如在某机关中工作，有男同志向你求婚，怎么办？这权柄是属于你自己的，由你决定。有人问，是否可以不结婚。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结婚是生理上的需要，问题在于怎样避免多走弯路，减轻这个曲线的角度。如果现在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女子，为了很好工作，这个问题可以推迟几年再解决。假如要结婚，就要考虑生孩子的问题，如果事先没有这样的准备，生了孩子后，自己会感到悲观失望，前途暗淡了。

不可否认，女同志有了孩子，是增加了很大的困难的。同样要把工作做好，则有孩子的女同志比没有孩子的要苦得多，累得多。这一次我看见好些做群众工作的女同志，很多是带着孩子的，洮南有一个女同志带了四个孩子，只有一个保姆，同样把工作做好。她们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值得敬佩和学习的。相反的，后方机关里有个别的女同志，生一个孩子有一个保姆，依然不工作。可见得问题在于我们主观努力够不够，毅力够不够，和善于克服困难与否。

现在我们妇女讲自己的问题，当然强调自己尽了一切努力，至于组织上多体贴和多帮助女同志解决困难也是应该的。不过这超出我们主观力量范围了。女人能干什么，决定于历史条件，决定于主观努力，这是真理，中外都差不多。我这次走过的欧洲民主国家，见过的那些妇女，都是什么也能干的。像捷克的妇女，在祖国解放战争中与异民族作了残酷斗争后，现在复兴建设，都干的很好。法国的妇女领袖、自然科学家戈登夫人，年纪七十四岁还在那里干。苏联有一位很普通的农村姑娘，她由学校毕了业，在火车上学司机，很多人认方她学不好，但后来她学好了，而且还号召了很多的女性去学，并在一个火车上完全由女子来管理一切，抗德战争中她运输了许多军火到前线去，被奖为英雄，后来不断苦干，荣获少将头衔。我在莫斯科曾访问她，她说：“这没有什么诀窍，我相信人民的力量，相信斯大林政策的正确，只要对人民有利的我就去做。”她现在是莫斯科地道车管理局副局长。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今天我们解放区，有良好的政治条件，如果我们仍然觉得干不了什么，那就是自己不努力，或努力不够的结果。假如单靠党和政府供给，坐享革命之福专吃解放之饭，那即使有了解放的条件，我们自己不去改造和栽培自己也是枉然。

我们要干，什么也能干，但为谁辛苦为谁忙呢？我们都是旧社会里来的人，过去在旧社会里生活，甚至替统治者做事，都是不能免的。这且不去说它，但是今天呢？在今天新的政治条件下，应该替谁干，为封建残余、地主恶霸服务呢？还是替人民服务？说也奇怪，虽然在新的政治条件下，可是还有人愿意替日暮途穷的统治阶级服务，也有一些不知不觉地替统治阶级服务的，很多狗腿子和特务，他们已被人民严正打击或被人民清算。很明显，为前者是白流汗，如果为人民干，不顾个人利益，那是最光荣不过的。

另外有一种人认为我是为自己干，是为了自己出头露面，扬名显亲，得一官半职。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已成为新社会的渣滓，应该去掉，因为有这样思想的人必然是自私自利、脱离群众的，我们所需要的英雄，是群众英雄是集体的英雄主义。如果没有群众拥护一味追求名誉地位，前途也就很危险。据说我们东北青年英雄气魄很浓厚，我希望把它发扬为集体英雄主义。

为谁是个思想问题，确定这个思想，首先检查一下自己的人生观，即是为谁而生存？为国家民族、广大人民呢？抑或为个人私利而生存？人生观确定，就可以弄清楚替谁服务了。当然，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呢，还是替人民服务？这个人人有选择的自由，我们绝不勉强，只有自己从思想上认识应该为人民服务，才算是站稳了立场，才是真正为人民勤务员。

为谁干决定了，那么，干什么呢？目前主要的题目有两个。一是人民的翻身，一个是支援爱国保田的自卫战争。这两个大课题下有许多具体工作，积极参加城、乡的各种翻身斗争，从领导斗争到替人民记帐，站岗放哨，代民收割，推动各种优属拥军、扩军的工作，参加或管理后方生产事业，儿童保育，乡村卫生，妇女识字，交通运输，部队政治，文化娱乐等，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何止千种，种种都是具体的革命工作，都需要人去做。

怎样干法才干的好？这又需要我们去注意了。我们干工作是要老老实实地埋头苦干，这样一定干的好，没经验的也能很快地得出经验来。我们这里就有很多例子，苦干的、正派的人，常常由工人升为厂长、站长，在农村中和政府机关里也如是。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剥削，政府是人民的，故能注意培养人才。有些人不是老老实实的态度，不合口味的工作就不干，有些呢表面看干的不坏，实际上干的很差。因为这些专讲表面，图形式，铺张，还带有很浓厚的旧习气，对上逢迎，对下蛮横，这都是不正确的态度。干什么工作，要服从组织分配，因组织是根据工作需要的，服从组织要思想上服从，而不是盲从。做工作一定会碰到许多困难，不要因此而垂头丧气，不会于，可以开会讨论，交换意见，想办法，向群众学习，不要以为自己有天才，不相信群众的天才，我们要放下架子，当老百姓的小学生，不要光以为是群众的老师。我们在工作中，不要只会动手动脚，而且要会用脑子，要很好地思索问题，总结经验。所谓经验，就是从许多很小很小的具体工作中积累下来的，这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的积累过程，就是我们培养能力，把自己提高的必经之径。此外没有任何捷径。如果我们偷懒，基础不打好，脱离群众地往上爬，爬到半岭掉下来会摔得更痛。

总之，共产党解放了妇女这个条件已具备，剩下来便是我们自身努力的问题了。我重说一遍，我们是从几千年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女性，到了实际中一定会遇到好多困难，但假如我们能把握住正确的认识，有毅力和善于克服困难，那么什么困难都要在我们面前低头，因为，我们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并且相信妇女自身的力量。

新的大厦

——1949年9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讲话

黄炎培

主席团、诸位代表们、来宾们、工作同志们：

我们兴奋了，我们这一群人，今天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之下，要从地球几万万部大历史上边，写出一篇意义最伟大最光荣的记录，它的题目，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

我们要在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间，在东半个地球大陆上边，建造起一所新的大厦来。这所新的大厦已提名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所新的大厦，是钢筋水泥的许多柱子撑起来的。这些柱子是什么？第一是中国共产党，还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这些单位就是一根一根柱子。这钢筋水泥是什么？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所新的大厦的基础是什么？说理论基础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所新的大厦最高的顶尖上边，飘扬着一面大旗，大旗上写的是什么呢？是新民主主义。这所新的大厦多大，有九百五十九万多平方公里。中间住着多少人？有四万万七千五百多万人。连我在内。我们将乘着大厦成立的机会，立刻创设一个工作总机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所新的大厦，在没有建造起来的时候，这一群人常常闹着外来的大强盗，就是帝国主义。家里常常闹着一群小偷，就是官僚资本家和封建地主。中间有一根柱子，它也是当中的，它给这般外来的大强盗和家里的小偷们破坏它，迫害它，这根柱子是什么？就是民族工商业者们。现在这老的柱子，变成新的柱子了。民族工商业者们嘴里都在邪许！邪许！共同地卖着力气来建造这所新的大厦了。小偷偷完全消灭了，大强盗不许进门了。这所新的大厦的环境，多么美丽！多么伟大！有很高的高山，很大的大水，很多条高山，很多条大水，统统趋向着一个很大的大洋，就是太平洋。太平洋应该是太平的。可是一群小的海盗，想倚靠着大的海盗，来兴风作浪，并且强盗们自己先闹起来了。只有沿太平洋的各国人民自己觉悟起来，才能保障太平洋的太平。

这所新的大厦，有五个大门，每个门上两个大字，让我读起来：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

这所新的大厦，周围有很辉煌灿烂的墙壁；墙壁上写着一行一行顶大的大字，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这所新的大厦，有很好的邻居，最好最接近的邻居，是一所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厦，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它是唯一的帮助我们建造这所新的大厦最出色的一个邻居。

回过头来想，为了建造这所新的大厦，不知多多少少人卖尽了他们的气力，流尽了他们的血汗，多多少少劳苦大众，爱国志士，伤残了他们的肢体，牺牲了他们再宝贵没有的生命，就是换得来这所新的大厦。

这所新的大厦完成了。这所新的大厦的主人，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大家要站立在各个岗位上，去好好地工作了。我们全国人民要谢谢建造这所新的大厦的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战斗员、指挥员，他们的总司令朱德先生。我

们全国人民要谢谢领导建造这所新的大厦的空前伟大工程的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先生。

怎样批判旧文学

——1950年3月在燕京大学的演讲

周扬

我们对旧文化、旧文学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有人嘲笑过我们，说共产党没有文化，不要文化。无疑的，这种肆意的造谣是不值一驳的。可是有没有什么客观的因素使某些人有这样看法呢？有的，在对旧文化问题上，我们发生过偏向。在过去异常紧张的军事形势下，我们没能十分注意地研究这个问题，在个别解放区也错误地斗争过一些知识分子。

在今天，我们应该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民族遗产，怎样继承民族遗产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

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分不开：从“五四”起，才有新文学。“五四”时期深刻地接受了西洋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严格地批判了封建文化、封建文艺；反对文言文、四六体，斥桐城派古文为妖孽，反对旧戏曲；介绍进来大批的现代小说、话剧、自由诗。“五四”运动借西洋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武器，来反对封建文化、封建文艺，是完全革命的。“五四”运动表面上受了很多外来影响，实质上它却有深厚的民族基础。不要认为吸收外来文化就没有民族基础了。正是因为中国民族有这种需要，所以才有了“五四”运动。有人说“五四”新文化与旧的民族文化没关系，这是错误的。“五四”仅仅反对了旧文化中的落后部分、封建部分，同时却继承了人民的或比较接近人民的一部分。陈独秀、胡适力争白话文是文学的正宗，宣扬《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的价值，这是很正确的。（虽然后来胡适一直反革命，现虽没盖棺论定，怕也是很难再争取到人民方面来。但我们有一种辩证的历史态度，我们不抹煞他的成绩。）

那么，“五四”运动有没有缺点呢？“五四”运动在总路线上是正确的，但也有些偏向。当时有一部分过“左”的人，说西洋一切都好，对整个中国旧文化采取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所有的旧的只能进博物馆。这种倾向后来也被左翼文学继承下来。左翼批判了“五四”运动的不彻底，批判了胡适等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但是这种否定一切旧文化的偏向却没有克服。我当时也在左联，当时我们是坚决摒弃一切旧东西，反对旧戏，就连《水浒》也不主张叫人看的。抗战起来了，民族形式比较得到重视，但那也只认为是一种权宜之计，完全认不清采取民族形式是新文学发展的必然规律，仅只为宣传方面，拿来轻轻利用一下就得了。值得指出的是：鲁迅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正确的。鲁迅劝青年不要读线装书，那只是怕当时的青年还没批判能力，读了倒反受坏影响。鲁迅自己并不是把中国的旧文化一齐否定的。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很受果戈理，尼采的影响，但到《呐喊》、《彷徨》却是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了。鲁迅自己把这摆脱外来的技巧影响，当作一种进步的表现。的确，不摆脱外来的影响，一个人是没法成为真正民族的作家的。不要认为鲁迅抛弃了民族传统，恰恰相反，正是鲁迅继承了民族传统。鲁迅细心地研究过中国旧文化、旧文艺，写了《古小说钩沉》、《中国小说史略》等书。鲁迅举过一个很恰当的例子，说对于旧的应该“恰如吃其牛羊，弃其蹄毛，留其精粹”。假如不分辨，连蹄带毛一起吞，当然很危险；反过来，要是把

好肉当作蹄毛扔了，也未免太可惜了吧？“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鲁迅早就把新旧的关系正确的指出了。可惜当时我们这些人不留意鲁迅的这些话，偏喜欢说洋东西，不喜欢中国的。这个问题还没能解决。抗战一起，《放下你的鞭子》等小剧流行，老百姓却说：你们这些人要救国，很好，戏也演得很好，就是有点不合乎咱们的口味，不好。这就是跟群众隔离了。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就指出来：文艺宣传运动“不合民众神气等，与民众发生隔膜，必须切实的改一改。”“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当时我们也觉着这话很好，可是并没很好地把它贯彻到实践里去，我们那时没能真正体味毛主席的话，就像我们在那以前不能彻底了解鲁迅的主张一样。又过了四、五年，经过整风，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我们才纠正了这个偏向。

对于旧文化、旧文艺的基本观点，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极明确的说明：“中国现时代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因此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这就是说新文化是旧文化的进一步的发展，新的和旧的是相互衔接的，而不是相互隔绝的。

这就是说尊重古代文化，批判地吸收其精华，是相信自己的民族，爱护自己的祖国的不可少的条件。新文化是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新文艺是反映反帝反蒋，土地改革，劳资两利的。这只是横的一面；但还有纵的一面，新文艺必须是从旧的发展而来的。我们必须拿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来改造旧文学，发展其中的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不要把封建时期的文学和资本主义时期的文学贴上个封条就算完了。列宁说过：“在每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哪怕是不发展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因为在每个民族里面有劳动的和被剥削的群众，他的生活条件必不能免地要产生着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比如故宫是供封建皇帝住的，但同时不要忘了它是劳动人民在封建压制下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来的，长城更是这样，不过人民那时被统治着，所以只得按统治者的意思来创造罢了。列宁又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那人类的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官僚社会压迫之下所造成的智力的合乎规律的发展。”人民在封建社会下，创造出来很多戏剧、唱词、民谣、音乐……这里面有很多是人民自己的东西。被剥削的生活条件下不可避免地使人要求平等、自由、反抗压迫专制。这里面有很多民主的革命的成分，不过因为时代限制，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所以他们得到的结论也解决不了问题。不是以神仙式的幻想来结束，就是投降妥协，要不干脆就失败。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民主的斗争。我们祖先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只有等我们这个时代才能解决。诸位朋友说解放后有位小姐看了《红楼梦》，一心想做林黛玉，因做不上林黛玉而大为烦恼。其实这是不必要的，自由恋爱不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我们举个例来考察一下文学遗产里面进步的和民主的成分。

刚才提到的《红楼梦》，大家都知道是描写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从兴盛到没落，人民除了当作陪衬的刘姥姥外，在书里没有地位。但这里面就没有民主的成分么？贾宝玉、林黛玉这一派和贾老爷、薛宝钗这一派是恰恰对立的。

假如贾宝玉生在现在，说不定是个民主人士，有住国际饭店的资格呢。贾宝玉不想当官，只想追求人间比较单纯的爱；反对等级制，对丫环小姐同是称姐道妹，一视同仁。不用说，他这种作风是为封建专制所不允许的，所以他结果也只有出家当和尚了。《西游记》里的孙猴子也是革命的，他反抗一切封建组织和封建纪律，他把天宫闹得熙熙攘攘，你怎么能说他不革命？从这里，我们找到这些书所以流行如此广而为广大人民所欢迎的原因。这就是说在分析批评这些作品时，我们要有阶级观点，要有历史的观点。我们切不可要求从前的人民像要求现在的人民一样。记得从前延安演郭沫若的《屈原》，演戏的人觉着屈原太懦弱了，屈原不该自杀，于是叫屈原的弟子婬娟小姑娘劝说屈原，结果是屈原没自杀，屈原和群众结合了。这完全不合历史。我们应该了解屈原在那种社会制度下只有牺牲。又有人演旧戏，把贪官打下去而让群众自选县长，群众看了戏虽然很满足，情绪很高，但是这把历史给歪曲了。我认为：在照顾观众情绪时，原则上是不能歪曲历史的。只要从历史上看是最革命的，那就行了。比如刚才说过在封建的贾府里，贾宝玉类型的人物是有革命性的。有位同志说：《水浒》里面除了官就是流氓，没有一个人民群众。这位同志是不完全了解《水浒》的。《水浒》一百单八将里有很多是劳动人民，比如李逵，阮小七等等。他又说宋江不好，宋江一直想作官。还是由于没有历史的眼光。你以为今天的农民要不是受共产党领导，受无产阶级的教育，就没有那种幻想么？例如在东北，有的农民发家了，就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我是纯洁的共产党员，但是我的经济成分要上升到富农了，要剥削人了，怎么办？党教育他说要照顾大家，要帮助别人。农民离了共产党离了无产阶级是很容易走到从中农升到地主，继而组织军队，终局是想作皇帝的路上去的。宋江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没有无产阶级，我们要求他不想作官怎么成呢？

有人会问：过去的中国的落后的文学里面的民主的、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因素比较少；西洋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比我们多得多，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么重视旧文学，一定要发展旧文学呢？我们的回答是：这除了我们刚才已经说明过的那个文学本身发展的必然规律以外，还有一个爱国主义的问题。

在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有些中国人不知不觉地丧失了民族自信心，无形中形成了民族自卑感，以为外国都是好的，中国的全不好。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思想上的问题。比如演电影一定要学好莱坞，搞话剧一定要模仿外国人，演讲起来也得耸几下肩膀，老百姓实在不懂你搞的是什么名堂。这就是由于忘了毛主席再三嘱咐我们的“要有中国气派、中国作风”。

问题在于我们究竟相信不相信我们的祖先。假如说我们的祖先不全是混蛋，假如说我们的祖先都有过为民主自由奋斗的历史，假如我们认识了这些血泪斑斑的事迹，明了了我们祖先为反对内外压迫者付出了光辉的代价，那我们就应该为我们的祖先而骄傲，我们就该敬爱他们尊崇他们。这是一个非常原则性的问题。

有人说哈姆雷特好。不错，哈姆雷特好，可是中国老百姓不知道他，中国老百姓不喜欢他。老百姓所熟悉的是关公、张飞、李逵、薛仁贵等等人物。我们应该请专家把民间流行的一切故事、歌谣、戏剧等等搜集起来，用马列主义、阶级观点、历史观点，加以分析研究。决定哪些是好的，哪些是有用的，和哪些是没用的。把没用的送进博物馆，对于好的有用的，我们不仅只是消极地去继承它，而且更要积极地去发展它。我们希望有很多人来研究反

映劳动人民生活的民间文艺。我们绝不忽视这个丰富的、宝贵的文学泉源。例如“孟姜女哭长城”是广泛地流行着的，正是反映着人民的反抗情绪。其调虽悲，但其悲足可以哭倒长城。要不注重民间的东西，比如只写自由诗吧，诗的思想性很高了，艺术技巧也很好，可是老百姓却偏好到西单、天桥听大鼓书，那又拿什么去打倒封建文化呢？先是一个燕大或者再加上一个文化部都是新民主主义文化，那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吧？老百姓爱大鼓，那我就来编大鼓，唱大鼓。改造旧曲艺单靠艺人还不够，同时也要靠真正有修养的搞新文艺的朋友们。这些人读过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借他们的好东西来改造旧曲艺。例如《打渔杀家》吧，改一下就得了。《空城计》里面也许是还有好东西。要是我们写三、四个剧本是反映目前的现实题材的，那我们就应该拿出写一两本的力量来去做改造旧戏曲工作。旧曲艺的思想性虽然差，但是它的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新的思想性虽然强，内容和形式却往往是分裂的，比如演旧戏，要打着令旗喊“我是政治委员是也”，岂不要闹笑话，我们对于这些旧的文学遗产一定要改造它，加以新的内容，提高其民主性、革命性和艺术性。你好听大鼓，我们就有民族气派好的、音乐好的、思想好的大鼓给你听，那你为什么不喜歡呢？秧歌就因为这样改造了，所以秧歌就受到这样广大的欢迎。我们在分析旧文艺时必须分别清楚：哪些是只有修改一下就成了的，另外一些却是需要比较彻底改造的；再另外一些却只有某些好的成分供我们吸收的。

对于曾经流行过的而和现在人民隔绝了的文学，例如大学里讲的《诗经》、《楚辞》，我们也应该做一番清理工作，如果可能的话甚至做一番翻译工作，否则人民没法接近它，它没法成为人民的东西。特别是在大学里的人更有给人民介绍这些古代文学的责任。只有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才会有高度的民族自信心。

也许有人要说北京是大地方，共产党进来也变成复古派了吧？那完全是过虑。我们对于旧文学仅是说：你是我的祖宗，好，我尊敬你，我接受你的好处。但是我是你的儿子，是你进一步的发展，那我当然就更有资格来裁判你。我们就是用这种科学的马列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文学遗产的。

崇高的理想

——1960年5月在华南师范学院和暨南大学的演讲

陶铸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理想。但是，理想到底指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一个时代与一个时代不同，同一个时代，一个人与一个人又不同。比如，从前的学生，大都是希望毕业时搞张文凭，找到职业，或者是希望在社会上能出人头地，以至显亲扬名。这就是他们的理想。做教师的，则是希望能把职业安定下来，能写出一两本书，或者能去外国留学“镀金”，回来求得更高的名誉和地位。这就是他们的理想。当然，那时候，也有一部分学生和教师，把推翻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一个富强独立的新中国，以至于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的。现在，与从前大不相同了。大多数的学生与教师，都是以为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完成全人类的革命事业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虽然抱有像前面说的那样理想的人也还有，但为数已经很少了。你们也许会想着自己将来成为航海家、飞行家、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大学教授……但是，所有这些想头，都是围绕着为人民服务、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崇高最伟大的理想的。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特征。当然，也有少数人，他们的理想并没有和我们这一伟大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他们也想做一些事情，但是他们做事的目的是为了他们自己。比如为了自己能够有一个“明窗净几”的环境，有一个爱人，一座野墅，一部汽车。他们把这种个人打算作为自己的“理想”。一点理想也没有的人有没有呢？一般他说，是没有的。有一些人怀念他们的过去，但是过去的东西是永远不会再来了，因此他们感到将来的渺茫，从不把希望寄托在将来。这种人好像是没有理想了，其实，那消逝了的过去就正是他们的“理想”。也还有一些人认为现在已经生活得差不多，甚至感到已经满足，心安理得，不想再前进，生怕一前进，就会破坏他们现有的生活。这样，他们便忘记了革命必须不断前进的真理，忘记了一个人一生的责任，忘记了更广大的群众。这种人可以叫做“现状维持派”。他们也可以说自己再没有什么理想了，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然是对的。但是，究其实，他们仍旧是有理想的，这眼前的光景就正是他们的“理想”，或者说，他们正躺在自己的“理想”上睡觉哩。

理想是有社会性、阶级性的。在什么样的社会，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理想：什么样的阶级，更确切他说，站在什么样的阶级立场上，就有什么样的理想。在封建社会，金榜题名，衣锦还乡，往往是那些地主阶级或者是向往地主阶级生活的人的理想；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理想是希望钱越赚越多，利润越来越高，而且希望这个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是“永恒”的。而无产阶级，却要打破这个“永恒”，把这个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推翻。在社会主义社会，为人民服务，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就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所以，我们说，理想是受到一定的社会、阶级的限制的。比如古时候，就像屈原那样富于理想的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理想，也主要是为当时被秦国侵略的楚国的贵族阶级利益服务。此外，理想还受到社会的一定的生产力的限制。比如传说中的鲁班以及过去许许多多伟大的科学家，他们虽然有着各种各样改造自然，改进人民生活的理想，但是由于那时的自然科学水平还

很低，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提出像今天我们所说的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等计划来。因此，我们在谈到理想问题的时候，就要分辨出什么样的社会和什么样的人，而这些人又抱有怎样的理想，然后才能做出确切的评价。当然，我们对理想还是有一个基本的看法的，那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里，一个人的理想，是为多数人的利益，为社会的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合乎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就是伟大的理想。为了这样的理想，付出毕生精力的人，不管他的事业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重要还是不重要，也不管他所从事的事业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他都不失为一个值得赞扬的人物。反之，为了那些不合乎社会发展要求、不合乎人民群众利益的“理想”，尽管他用尽毕生精力，甚至于丧失自己的生命，或即使是获得了成功，创造了“宏绩伟业”，都是元足称道的。总之，一个人的思想行为，要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

在我国历史上，许多民族英雄、人民英雄、大发明家、科学家，他们都是有一些有伟大理想的人。当强敌压境，国家民族危在旦夕的时候，民族英雄的理想，就是要把敌人赶走，使自己的民族生存和发展下去。当统治者昏庸腐朽，横征暴敛，使得人民无法生活下去的时候，人民英雄就揭竿而起，把反抗强权，救民于水火之中作为自己的理想。当时人民的劳动强度很大，生活很苦，劳动生产率很低，发明家、科学家们的理想，就是要以他们的创造、发明，去改善人民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人民的生活。归根结蒂，这些人对促进社会的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所贡献的，虽然他们的贡献还不免要受着历史条件的限制。

正因为伟大的理想合乎社会的进步，合乎人民的利益，合乎社会发展的规律，所以对于一些具有伟大理想并为伟大理想而斗争的人，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尊重他们，怀念他们，纪念他们。相反地，对于一些破坏这些理想，阻挠这些理想实现的人，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怀恨他们，憎恶他们，咒骂他们。前一种人，在传说中和历史上很多的。如众所周知的，夏禹在治水十三年中，三过家门而不入；李冰父子为了解决当时成都平原的水利问题，不知克服了多少困难，终于修成了泽被后世的都江堰；扁鹊深人民间，“周游列国”，“随俗为变”，解除人民疾病的痛苦；还有我们所熟知的出身贫苦的黄道婆，她从海南黎族地区回到故乡（上海市郊），把当时海南岛先进的纺织工具和她熟练掌握的纺织技术毫无保留地传给家乡的人们。这些人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尊重、怀念。汉代的霍去病，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强盛，在戎马中度过了一生。宋代的岳飞、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离妻别母，转战疆场，最后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屈死在风波亭上。文天祥，抗击当时的元兵进攻，坚贞不屈，被敌人抓住后，仍旧临危不惧，和敌人作了坚决的斗争，誓死不投降。清代的林则徐，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腐朽的当权派作斗争，及至充军伊犁，他一点也不灰心，一直没有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而且在那里和群众一道修水利、栽葡萄，为当地人民造福。洪秀全，看到当时清室的腐败，民不聊生，看到当时的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阴谋，就聚集群众，要把清室推翻，为中国找出一条出路。孙中山，为了推翻清朝，为了建立一个强盛的中国，他奋斗了四十年……。所有这些人，都是有伟大理想并坚决为他们的伟大理想而斗争的人。他们的理想不是为了哪个人，而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符合广大的人民的利益。他们为了自己的伟大的理想，有些人家可以不要，有些人官可以不做，有些人生命可以抛弃，有些人真正是做到了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地步。这样的一些人，是永远不会从人民的心中消逝的。相反地，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不少为着个人的利益和少数人集团的利益，不惜专门破坏人民的、民族的伟大理想的败类，如宋朝的秦桧，明朝的洪承畴，清朝的曾国藩，以及后来的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等等。他们一直遭到了和将要永远遭到人们的憎恶、咒骂；咒骂之不足，人们还通过许多文学艺术作品，对他们不遗余力地进行了鞭挞。理想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人的世界观问题。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奋斗目标呢？什么样的社会才是最理想的社会呢？这是和一个人的世界观密切联系着的。抱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所谓资本主义式的“西方文明”就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制度是完全合理的，是“上帝”的旨意，是不能也不应该改变的。相反地，抱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则认为世界是向前发展的，社会的财富都是劳动者所创造的，必须推翻而且能够推翻那个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使全人类都过着幸福生活的共产主义社会。至于小资产阶级呢？他们也有着另一种“理想王国”。比如有些青年人认为，自己的理想生活就是“温暖的小家庭”（而不是幸福的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像一潭死水一样的滞止不前的“安静”（而不是波澜壮阔的斗争），就是属于这一种。不过，归根结蒂，这是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一脉相承的。总之，有不同的世界观就有不同的理想；不同的理想，同时也就表现出各种不同的世界观。所以，在今天谈到一个人有没有伟大的理想的时候，还必须注意到世界观问题。

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是树立崇高理想和实现崇高理想的最好时代和社会。生活在我们这样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人，没有崇高的理想，是可悲的。一个没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好像迷失了路途一样，不但不知道明天走到哪里，做什么，就是连今天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都弄不清楚。我们大家为什么要进学校呢？为什么要读书呢？进学校、读书的目的何在呢？当我们翻开书本第一页的时候，就要回答这个问题。同学们！这个问题，也就是要我们回答的关于一个人应该有什么样的理想的问题。“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开始的时候，就得有个盘算，才不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理想问题，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社会里的青年人来说，更是一个大问题。

为什么说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最崇高最伟大的理想呢？这是因为共产主义、也只有共产主义能够使人类从私有制的束缚下彻底解放出来，能够使人类过着最快乐、最美满、最幸福的生活、能够实现古人所常说的“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这个理想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中国古代的不说，大家知道，在四百多年以前，英国的托马斯·莫尔等，就始创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到了十九世纪，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英国的欧文等人，又使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都梦想着要在世界上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虽然有力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矛盾，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力量，不懂得要经过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去取得胜利。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被压迫的群众，只需要给予同情和帮助就够了。因此，他们的理想尽管是好的，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也就是空想的非科学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

指出了我们的理想是共产主义社会，指出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创造者，正是受着资本家剥削与压迫的工人阶级，他们解答了多少年来人类进步思想所提出的但不能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列宁（包括斯大林的一部分功绩在内）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在俄国缔造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他们不但从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而且给全世界做出了榜样，用铁一样的事实告诉人们。这个最崇高最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在我们中国，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不少的先进人物曾经想使我们的国家变为独立富强的国家，使我们的社会变为一个理想的社会，但是都没有成功。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才真正为我们的国家找到了一个伟大的理想和实现这个理想的道路。我国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事实，又一次证明了这个最崇高最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当然，我们现在的社会，还只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要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还要经过长时期的艰苦奋斗。大家都知道：只有使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三个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以及反映这些差别的资产阶级权利残余逐步消失了，国家的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则失去作用了，只有到了这时候，共产主义理想才算实现了。

